

刘少奇传

(下)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主 编 金冲及

副主编 黄 峥

中央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刘少奇传 / 金冲及主编;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073-3406-7

I. ①刘… II. ①中… III. ①刘少奇(1898~1969)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3395 号

刘少奇传

编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编/金冲及

责任编辑/边彦军 杨茂荣

版式设计/寇炫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网址/www.zywxpress.com

邮编/100017

销售热线/010-66513569 63097018 66183303

经销/新华书店

排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刷/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680×960mm 16 开 62.5 印张 760 千字

2011 年 10 月第 2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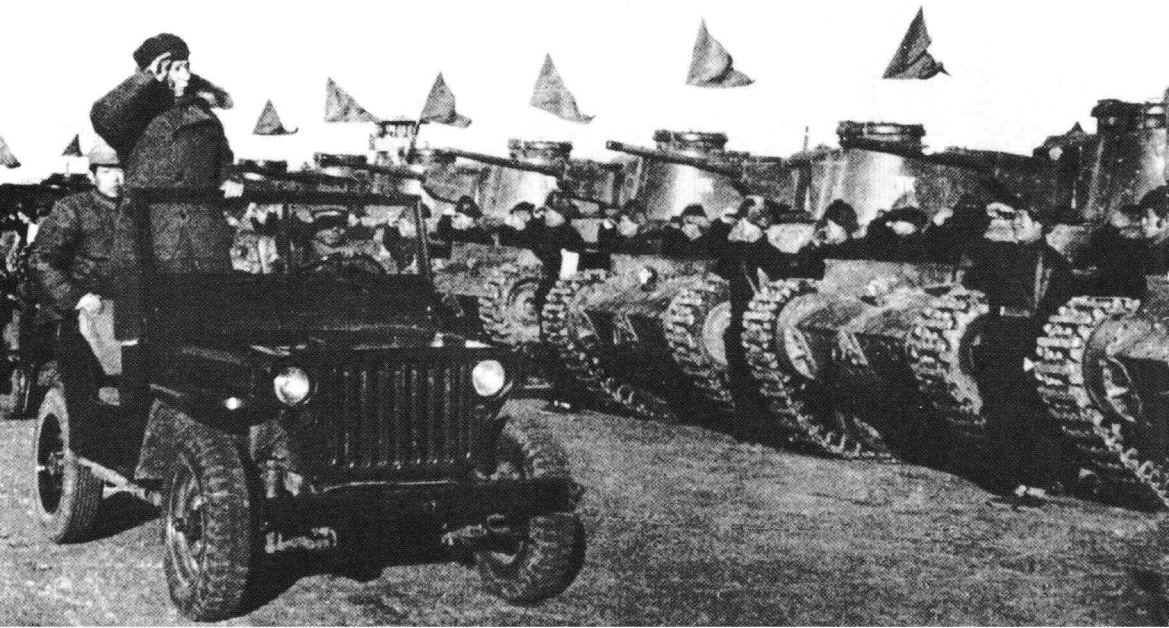
ISBN 978-7-5073-3406-7 定价:200.00 元(上、下卷)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



1949年3月25日，在北平西苑机场检阅部队。



1949年7月，在莫斯科宾馆办公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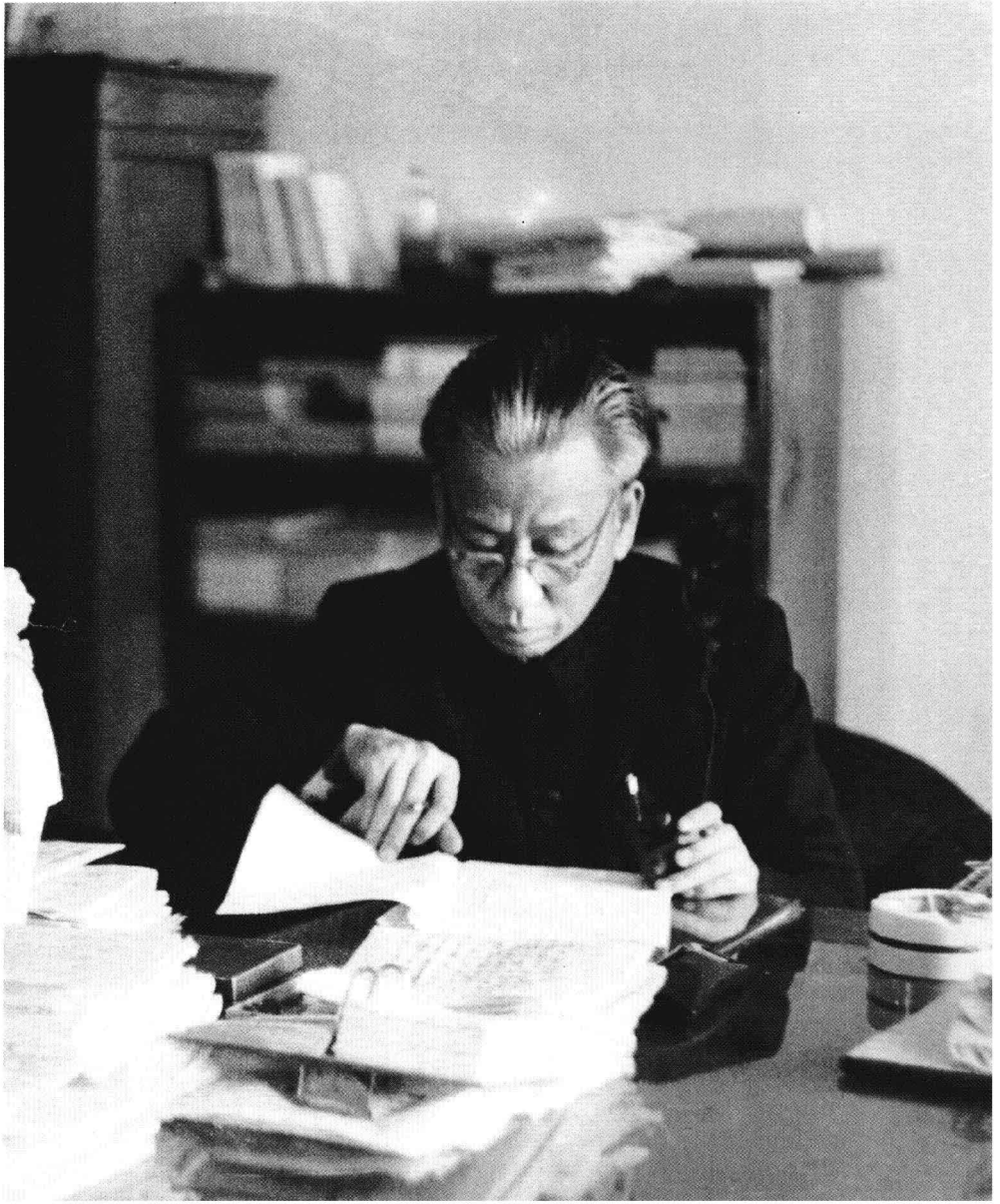
1949年10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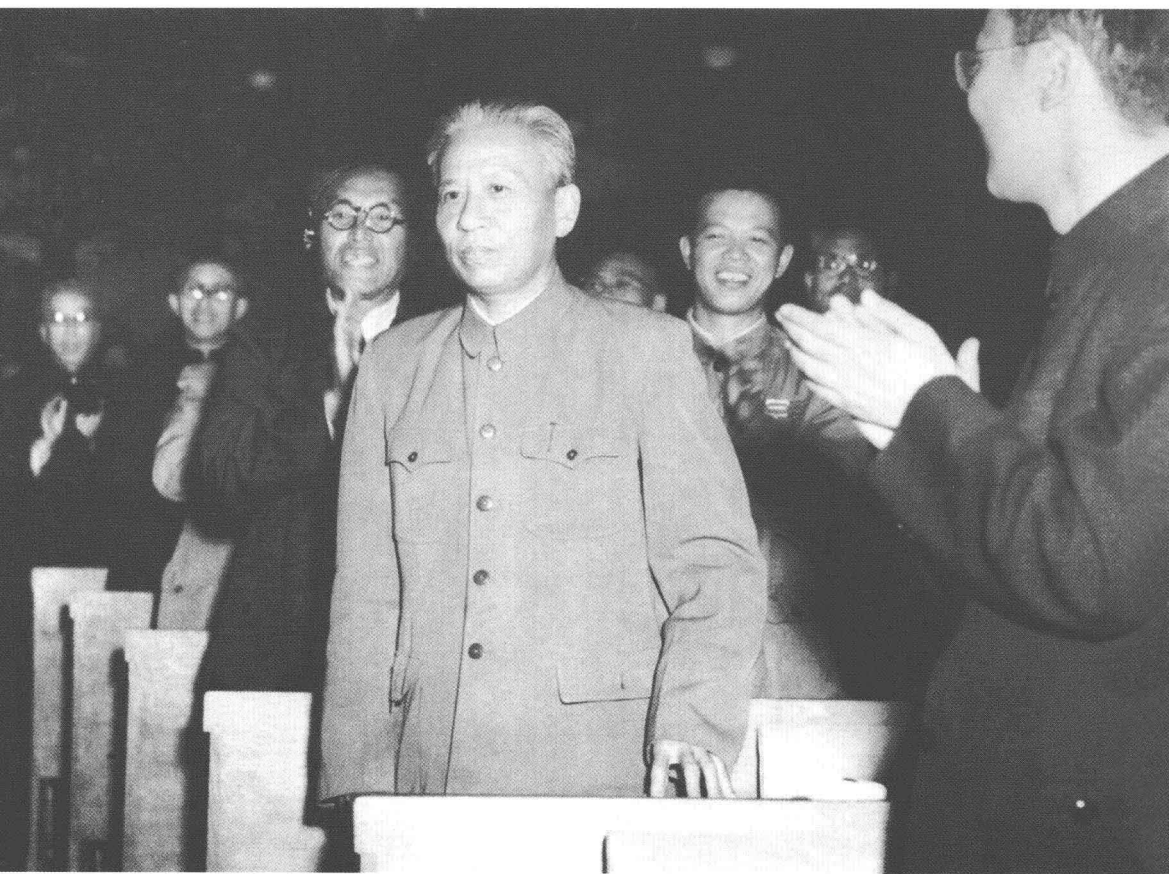
1951年3月，在全国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1951年夏，在中南海散步时，走进正在修缮的迎薰亭，刨起了木头。



1953年，在中南海办公室工作。



1954年9月，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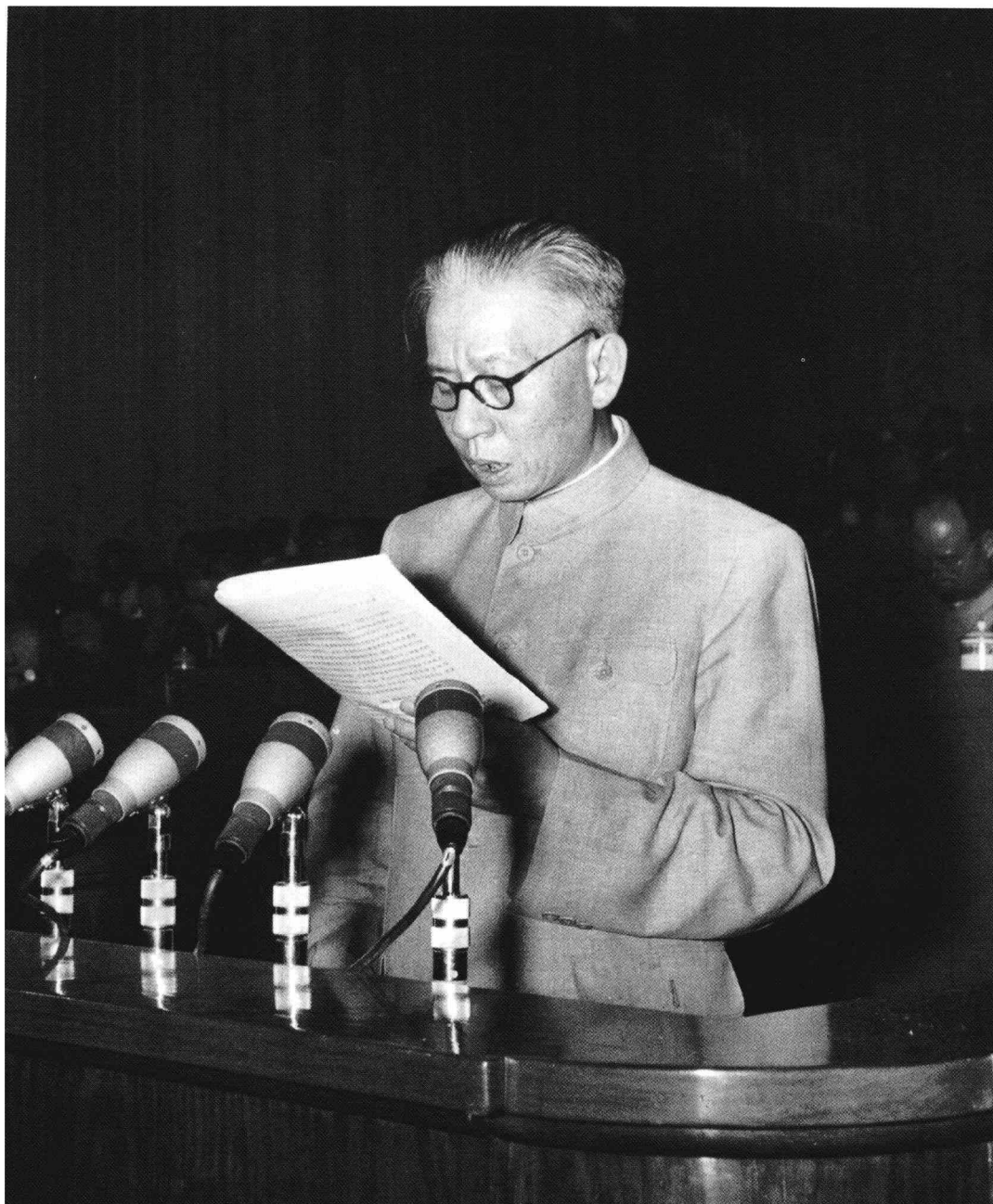
1955年5月,同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在一起。



1955年，同皮肤病专家胡传揆席地而坐，促膝交谈。



1955年5月，在北京郊区向商贩询问经营情况。



1956年9月，在中共八大上作政治报告。



1958年夏，在天津开往济南的列车上。



1958年9月，在开滦煤矿井下。



1958年5月，同中央领导人前往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



1959年10月，接见北京崇文区清洁队掏粪工人、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



1959年4月，刚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的刘少奇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后院接见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1960年，同朱德、董必武、陈毅等在首都机场。



在办公室查看地图。



1961年4月，在家乡调查研究。



1961年7月，在黑龙江林区小兴安岭冒雨视察红松人工林的生长情况。



1962年1月至2月，同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在七千人大会主席台上。



1963年5月，在柬埔寨访问时，接受欢迎群众献花。



1966年7月，出席首都人民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大会。

目 录

二十三、建国前夕（上）	（557）
二十四、建国前夕（下）	（589）
二十五、为了新生政权的巩固	（606）
二十六、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	（630）
二十七、从“三反”、“五反”运动到过渡时期 总路线的提出	（650）
二十八、高饶事件	（670）
二十九、第一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695）
三十、八大的筹备和召开	（712）
三十一、对人民内部矛盾的调查和思考	（736）
三十二、在“大跃进”的热潮中	（759）
三十三、湖南农村调查	（783）
三十四、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上）	（804）
三十五、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下）	（823）
三十六、中国人民的使者	（845）
三十七、在“四清”运动中	（866）
三十八、探索改革的道路	（894）
三十九、“文化大革命”暴风雨的来临	（919）
四十、工作组事件	（930）
四十一、“炮打司令部”	（945）
四十二、“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962）
后 记	（992）

二十三、建国前夕(上)

中共中央来到华北，同中央工委会合，表明夺取全国政权已直接提到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上。一九四八年四五月间的城南庄会议期间，中共中央发布的“五一”口号中，提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很快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响应。大家都看得很清楚：新中国的诞生已为期不远。从这时起，刘少奇的主要精力便转向为创建新中国，从事紧张的准备工作。

当时的华北，不仅已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它原先被分割为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石家庄解放后，已有可能把两个解放区的机构合并，作为建立未来中央政府的雏形。五月九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决定将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通知指出：

“晋冀鲁豫及晋察冀两中央局合并为华北中央局，以刘少奇兼华北中央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为第二书记，聂荣臻为第三书记，以刘、薄、聂及董必武、彭真、叶剑英、徐向前、滕代远、罗瑞卿、刘澜涛、赵振声、王从吾、萧克、黄敬、杨立三、赵尔陆、杨秀林（杨秀峰——编者注）十七同志为委员，刘、薄、聂及董必武、

彭真、滕代远、刘澜涛、黄敬八同志为常委。”“中央已与中工委会合，中央工委即行撤销。”^①

五月二十日，华北局举行第一次会议。刘少奇在会上指出：华北解放区是全国最大的解放区，四面八方都有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对敌人实行攻势，华北是个中心，这一特点决定了华北解放区最巩固，故中央才搬到这里来。因此，要把一切工作做得比别人好，否则就没有理由见人。华北的方针是建设的方针，进行土改，发展生产，训练干部，以便支援前线、改善人民生活，这是基本方针。我们现在建设的各种制度将来要为全国所取法。我们从陕北出发，落脚华北；今天又从华北出发，走向全国，故华北工作带有全国性的意义。我们要逐步走向正规化，强调统一，强调集中；反对分散主义和无政府状态。^②刘少奇的这个讲话，讲清楚了华北工作在全局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也说明了华北工作的基本方针。

随着解放区范围的迅速扩大，中共中央越来越需要利用报纸这个工具来指导各地的工作。六月三日，毛泽东批评“各地领导机关（包括中央局、区党委两级）对于报纸通讯社等极端重要的宣传机关放弃领导责任，或者虽未放弃领导但是抓得不紧，听任许多错误观点广泛流行，宣传工作极不严肃。此种状况，必须坚决改正。改正方法之一，是中央局（分局）及区党委（省委）对于自己的报纸，必须于每天出版之前，由一个完全懂得党的正确路线和正确政策的同志，将大样看一遍，改正错误观点，然后出版。各地领导同志必须以严肃的科学的态度对待宣传工作。”^③

^① 《中央军委关于改变华北、中原解放区的组织、管辖境地及人选的通知》，1948年5月9日。

^② 刘少奇在华北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5月20日。

^③ 毛泽东在批转华东局关于一年来办报情况给中宣部的报告上加的按语，1948年6月3日。

毛泽东要刘少奇直接负责审看新华社电稿和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大样。在不久后召开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称赞说：“现在少奇看大样。专政专得这样好呀。专两三个月也好，搞上了路，然后交给别人。”^①

为了适应全国急剧发展的形势，及时处理各方面遇到的大量新问题，中共中央决定，从七月下旬开始，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在每晚六时以后实行集体办公，由刘少奇主持，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对需要处理的问题及时做出部署。刘少奇在七月二十六日的第一次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总而言之是‘收’、‘发’、‘来’、‘去’。有各种来、去，如电报，写信，派人……一句话：‘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各地来的东西不要漏掉，书记处要分工一下”。“我们的方式要由游击到正规，手工到工业，乡村到城市。作长期打算。”“我们是可以开始建设了！”^②

“我们是可以开始建设了！”这句话对刘少奇说来，有着极不寻常的含义。从这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他就梦寐以求地期待着“想从工业入手改造中国”。^③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现在终于可以使它成为现实了！在以后几天的会议中，他提出要组建财政部，还要建立一个规模较大、部门较齐全的华北政府，下面设立农业部、工商业部等，并且由上而下地建立起供销合作社组织，开展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

刘少奇对事情总是想得很远。他在处理当前头绪纷繁的种种工作的同时，已在开始比较系统地思考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他吸取前一年土地改革中的教训，认为“经济建设问题是个新的问题，要弄清楚……要有系统地搞出点东西来，不然又可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8年9月13日。

② 中共中央会议记录，1948年7月26日。

③ 刘少奇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5日。

能犯‘左’倾或右倾错误”。^①九月初，刘少奇写出《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的手稿，对怎样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应该包括哪些成分，合作社经济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等作了初步探索。为中共中央召开九月政治局会议进行准备。

中共中央的九月政治局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次重要决策性会议。这时，人民解放战争正以破竹之势迅猛发展。中国共产党经过两年和国民党的较量，总体力量已经超过国民党。尤其是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极端不得人心，同国民党的战略决战已日益迫近。毛泽东感到有许多问题需要同中央各领导人一起商量。从八月下旬开始，他先邀集各解放区领导人饶漱石、邓小平、贺龙、徐向前、薄一波、聂荣臻等，在西柏坡开会，讨论各解放区的财经、贸易、金融、支前等统一筹划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中央政治局召开九月会议，着手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绘制蓝图。

九月八日下午三时，在西柏坡简陋的机关小食堂内，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局会议开始了。毛泽东首先指出：“此会是政治局会。中央事先未准备召集全会，人数不足。现有七个政治局委员，另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十个是旁听的，故是政治局会议。自出延安后，这是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议事日程：过去十一天即是准备的，正式会议准备三天，后天结束。”^②

刘少奇主持这一天的会议。会议主要听取毛泽东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全党工作任务的报告。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基本上打倒国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8年9月13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8日。

民党。”刘少奇在发言中指出：打倒国民党，统一全中国，以前是宣传口号，现在是摆在议事日程上来计划了。对这些困难要重视，但总的方向，前途是光明的。“现在我们要准备大的会战，消灭其两三个兵团，这一关也还没有过。这两个关过了，那就解决了。锦州、济南的会战，如果他们的援兵来，那是于我们最有利的。”“这种思想要在主要将领中大大宣传，解释清楚，这就是围城打援。”^①

这次政治局会议由于议程较多，突破了原定开三天的计划，实际上开了六天。刘少奇在会议期间，还谈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中应该大力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问题。薄一波在发言中说：“少奇同志讲合作社，从思想上理论上解决了问题。”^②朱德在发言中也指出：“少奇讲了合作社，同志们都认为有了办法，把合作社章程、法令、干部都搞好。它发展，就是与资本家竞争的问题，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就带它们走上社会主义。”^③

九月十三日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阐述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成分和基本矛盾问题。这些都是新中国建立前必须作出明确回答的大问题。刘少奇提出：

“整个国民经济，其中包含着自然经济、小生产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半社会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以及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国民经济的总体就叫做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包含着上述各种成分，并以国营的社会主义经济为其领导成分。分析这些问题，其目的在于发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基本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资本家和富农）与社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② 薄一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0日。

③ 朱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2日。

会主义的矛盾。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胜利以后，这就是新社会的主要矛盾。”“斗争的方式是经济竞争，经济竞争是长期的，首先就是反对投机资本。这种斗争的性质，是带社会主义性质的，虽然我们还不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这种竞争是贯穿在各方面的，是和平的竞争。这里就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我们竞争赢了，革命就可以和平转变；竞争不赢，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就被资本主义战胜了，政治上也要失败，政权也可能变，那就再需要一次流血革命。”“因此，固然不能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但也不要对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估计不足，而要清醒地看见这种矛盾。”^①

鉴于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国情，和党内有些急于反对资本主义的倾向，刘少奇特别强调：“最后还要严格地说一句，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政策是要不得的。”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决定的东西是小生产者的向背，所以对小生产者必须采取最谨慎的政策。”“合作社是团结小生产者最有力的工具。合作社办得好不好，就是决定的关键。合作社搞好了，就巩固了对小生产者的领导权。单是给小生产者以土地，只是建立了领导权，还须进一步使他们成为小康之家”。^②

刘少奇的这篇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所作的比较系统的理论思考。毛泽东十分重视刘少奇的这篇讲话。他在会议结论中说：“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少奇同志的提纲分析得具体，很好。两个阶段的过渡也讲得很好。各同志回中央局后，对这点可作宣传。”“至于经济成分的分析还要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8年9月13日。

考虑，由少奇同志考虑，并草拟文件，以便在召开二中全会时用。”^①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继续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经济这个大问题。这时，在东北局工作的张闻天也在探索这一问题。东北的工业比较发达，大部分地区（包括哈尔滨等重要城市）解放得比较早，在这方面已经积累起一些经验。九月十五日，张闻天为东北局起草《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在九月三十日报送到中央。

刘少奇对张闻天起草的提纲进行认真修改，增写了许多内容，对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性质、特点，民主革命胜利后国内主要矛盾和合作社的各种形式等都作了比较详细的阐述。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说：“此件修改得很好。”^② 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不登报纸”。^③ 十月三十一日，这一文件先印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各领导人。刘少奇在附信中说：

“这个文件是东北局发来请中央审查的。已作了一些修改。中央准备把这一文件发给全国各地，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地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但为了免于过早地警觉资产阶级，故一律不在报纸上公开发表。此件还须征求东北局意见后才能向全国发出，特印发各同志，请各同志提出意见，以便再加修改。各同志意见请于十一月十五日以前送交我。

^① 毛泽东在九月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1948年9月13日。

^② 毛泽东致刘少奇信，1948年10月26日。

^③ 周恩来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上的批语，1948年10月30日。

是为至盼!”^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到这年年底，刘少奇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已形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设想。十二月二十五日，他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作了系统的论述。他说：

“现在我国革命的性质还是民主革命，但它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经济也是新民主主义的。这个革命，不论我们主观上如何看，客观上是为资本主义扫清道路的。革命胜利了，资本主义是要发展的。”“我们对资本主义是采取限制政策，限制在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大圈子内。它一定要超出，我们一定不准超出，还是一个长期的斗争。”

“新民主主义经济是资本主义的呢？还是社会主义的呢？都不是。它有社会主义成分，也有资本主义成分。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的特点是过渡时期的经济，可以过渡到资本主义，也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过渡性质不能长久存在，但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种过渡可能是十年到十五年，这样对无产阶级有利。”^②

刘少奇没有“套书本子”，他从中国现实的阶级关系出发，认为中国革命的情况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从没有当过政，因此无须乎推翻。“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与资产阶级联合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胜利后，我们是不是马上反对资产阶级？”刘少奇认为：“还不是”，“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我们推翻国民党以后，把资产阶级保留一个时期，十五年内诚恳地发展它，对无产阶级是有利的。”

^① 刘少奇致有关同志信，1948年10月31日。

^② 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

刘少奇对合作社问题给予极大重视。他认为，列宁、斯大林对合作社的重要性都有过论述，我们过去没有系统地提出这个问题。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后应该这样提出问题：“没有合作社，无产阶级就不能在经济上领导农民，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合，这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是一个带决定性的问题。”他说：“新中国的国家经济是无产阶级手中的基本工具，而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的集体经济，它与国家经济相结合，建立同盟，就能向社会主义发展。只有国家经济而没有合作社，国家经济就无所作为；只有合作社而没有国家经济，合作社就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因此，无产阶级有了政权，有了大工业，还要有合作社，才有社会主义前途。”^①

刘少奇特别关心供销合作社的问题，这不仅因为他深刻地了解：“中国还是一个小生产占极大优势的国家，还是一个农业国。在这样的国家中，千千万万的分散的独立小生产者，是经过一种商业关系把他们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构成国家和社会的经济整体。”^②而且还由于他看到了商业对生产发展的重要促进作用。这一点，刘少奇在党内表现得非常突出。

由于受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党内相当多人对商业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认识不足，对市场的重要意义更认识不足。他们认为生产是基础，商业只是附属于工业。有的人还提出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的问题。刘少奇从多年的实践经验中深深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他认为不能这样提问题，需要把生产和流通、商品和市场的关系弄清楚。他说：

“在历史上，小商品生产者是受商人的支配与控制
的。因为小生产者依赖市场，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卖

① 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

② 刘少奇：《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与合作社》，1948年9月。

得掉，价高，就发展，反过来就会破产。商人正是利用小生产者的这种弱点，来剥削与控制他们。因此，尽管商业是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上，但反过来它又可以支配生产。《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商业资本的史的考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那末，今后要不要同过去一样去组织生产合作社呢？毫无疑问，应当这样做。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生产力。但也不能由此得出商业不重要的结论。我们不是更重视生产就更轻视商业，而是更重视生产也更重视商业。要看到商品是经过市场来分配的。”“各种关系表现为市场问题，因此，中心问题是建立适当的市场关系”，“今后商品生产愈多，商业便愈重要。从来资产阶级是依靠商业积累资本的。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重农轻商’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观点了。我们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特别在今天要着重提出商业问题，提出供销合作社问题，因为我们历来重视工农业，而忽视了商业的重要性。我们今天要与资本家竞争，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问题不在于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而在于今天供销合作社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

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还初步论述了发展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关系。他说：

“为了要恢复工业特别是大工业，必须首先恢复农业如棉花，这是计划的出发点。要从工业生产的着眼上来计划农业生产，重视重工业或轻工业。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农业与轻工业是我们的重点，重工业我们基本上

还没有，打下太原后如果有办法恢复而且费力不大的尽可能恢复。”“历史上的国家要从轻工业积累资本之后才能建设重工业。重工业有的可以搞出来，没有的可以不搞。”“主要危险性只是顾军工，不顾民工。如果不能联系人民，发展经济，即使供给有保证，也不能战胜。发展经济是一切斗争的终极目的。”^①

今年夏天，刘少奇的个人生活增添了一件喜事。他自从一九四六年同王前分手后，生活一直无人照管，工作又一直处在紧张状态，因此身体常常不好。邓颖超、康克清等大姐对此非常关心。一九四八年春，中央外事局干部王光美从山西土改工作队回到西柏坡外事局机关。刘少奇同她在延安时就已经相识，有些来往，这时更熟悉了。八月二十一日，两人终于喜结良缘。

王光美是天津人，北平辅仁大学的物理硕士研究生。她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有联系。一九四六年初，中共北平市委介绍她到设立在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任翻译。军调部工作结束后，王光美到了延安，被分配在军委外事组^②工作。以后她又到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不久，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刘少奇结婚后，王光美从外事组调到中央办公厅工作，从此成为刘少奇的伴侣。

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正值刘少奇五十岁生日。十二月一日，是朱德的六十二岁寿辰。在人民解放战争捷报频传的日子里，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同志们，高兴地以他们俩生日中间的一天，合办了一次简朴热烈的祝寿晚会。几年来朝夕相处的老战友朱德，即兴写了一首五言诗，向刘少奇表示祝贺。他写道：

“少奇老亦奇， 天命早已知。

^① 刘少奇在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1948年12月25日。

^② 1947年5月1日，军委外事组改组为中央外事组。

幼年学马列， 辩证启新思。
献身于革命， 群运见英姿。
人山人海， 从容作导师。
真理寻求得， 平生能坚持。
为民作勤务， 劳怨均不辞。
党中作领袖， 大公而无私。
群众欣爱戴， 须臾不可离。
修养称楷模， 党员作范仪。
今年虽半百， 胜利已可期。
再活五十年， 亲奠共产基。”^①

九月政治局会议后，革命形势继续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已由全面内战开始时的一百二十万人壮大为二百八十万，其中野战军一百四十九万人。而国民党军队则由四百三十万人减少到三百六十五万人，至于能用在第一线的兵力只有一百七十四万人。情况表明，人民解放战争已到了进行战略决战的关键时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抓住国共双方力量对比转化的契机，果断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和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随着各个战役的胜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的地区越来越广大，城市接管工作日益繁重。解放区原来绝大部分是农村和中小城市。进入大城市和工业区后遇到许多过去十分陌生的新问题，需要及时确定相应的政策。因此，刘少奇便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指导各地的接管工作上，先后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系列有关文件。

一九四九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

^① 朱德：《贺少奇五十寿于西柏坡》1948年，手稿。

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议召开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准备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八日，刘少奇在会上说：“形势发展，胜利很快，我们为此很着急；但在这时更是急不得，急了易犯错误，再受挫折。这时很可能发生轻敌，而且我到新、藏、青等地也要发生困难的，故必须慎重；但另一方面又必须赶快进行准备工作，政策要搞一本手册，新区口号也要拟一个新的口号单子，调干部很多要准备。”^①他着重提出要搞好城市工作，指出：

“我们对农民对知识分子是搞得好的，已有不少经验；现在到大城市到工业区，对于与工人搞好仍是一个问题，尚未系统地完全解决，这仍须贯彻下去。一定要把工人工作搞好，这与经济政策、工资政策有关，还须训练工人干部，大批的、抗大式的、短期训练班式地系统地宣传教育，以便培养一批干部，研究工厂中及工人工会工作中的系统问题，我看这一方面还差一点工作。工人是我们的基础。”“城市工作应集中在市一级，而不应一切都堆在街一级政府。”“现在接收城市是学会了，但管理好，组织好，改造好城市，问题尚未解决。一九四九年应注意学习解决这一问题，城市里是依靠无产阶级联合一切人民。”^②

这次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为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做好了准备。毛泽东和刘少奇在会上都提出要在全党进行政策教育。毛泽东说：使中央路线能在全党全军贯彻，这比徐州胜利还大；政策教育务要在一九四九年再贯彻，要出一本书，汇集起来，保证有把握取得全国胜利。他把指导编印政策汇集的任务交给刘少奇。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致

^{①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1月8日。

信周恩来：“少奇修改《政策汇编》（似可用此四字为书名），请印数十份，作为清样，发给二中诸同志。正式出书，可在二中后一二星期内，以便重校一次。”^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共五十三人。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为夺取全国胜利和胜利后的各项工作制定方针政策。

这次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是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的主要工作从城市转移到乡村；经过二十二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断聚集力量，现在已面临着夺取全国政权、以城市领导乡村的新任务。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转变点。”^②会议就这一问题连续讨论了五天。

十二日，刘少奇在会上就城市工作谈了三个问题：

第一，全党今后的工作重心是城市工作，但要有城乡一体的观点。过去我们只有乡村，现在加上城市，就是说，加上了大工业、国营企业、国家资本主义、城乡关系等新问题。我们要以城市工作为重心来领导全党工作，照顾到种种问题。现在接收城市的问题已大体解决，管理城市的问题还没有基本解决，主要是私人企业的复工和接收企业的经营问题。“二中全会后，大家应努力学习解决。接收得好，还要管理得好，还要改造。有些旧的东西要去掉，新的东西要生长起来，但也不能去掉太多，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就是去掉的太多了。把城市建设起来，发展起来，就是管好了，就使工人与农民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信，1949年2月26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3月5日。

接近起来了。”

第二，依靠工人，发展生产。但阎王老子并未命令工人阶级支持共产党。我们必须努力工作才能使工人阶级完全可靠；如疏忽不做工作，就去靠，那是靠不住的。必须时刻注意毛主席依靠工人的指示，加强工人工作，在同等条件下优先保证工人生活，并通过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广泛地对工人进行唯物史观的教育；在此基础上组织工会，建立党组织。这样，我们才能掌握工业，掌握城市，工人阶级就可能成为最可靠的力量。

第三，人民代表会议是人民政权的主要组织制度、组织形式，有整个的代表会系统，由代表会选出各级政府委员会。这就是民主的形式，是由上而下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行政命令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一种主要的经常普遍运用的形式。各地应抓住代表会这一形式，大量的搞。大革命时期我们没有搞，内战与抗战时期搞得不多。现在不能再拖了，如再拖延，就不足以反官僚主义，不足以有力地克服行政命令中的一切毛病。

三月十三日是七届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总结报告，对夺取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工作作了总的部署。他指出：“少奇同志讲的都很好，全部意见我都同意。”^①他号召全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服困难，夺取全国胜利”。这次会议提出了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

如何把全会确定的方针具体化，用来指导各地的实际工作，是一项艰巨而具有开拓性的工作。特别是城市工作，这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很不熟悉的新任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此非常注意，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报告，1949年3月13日。

要刘少奇来“注意研究这个问题”。^①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准备迁往北平。这时，北平已在一月三十一日和平解放，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已先搬到北平办公。

三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离开西柏坡。二十五日，乘火车到达北平。在颐和园稍事休息后，前往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一千多人见面；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随后，中共中央机关暂时驻在香山。

刘少奇和王光美住在香山寺北侧的来青轩，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也都住在这里，离毛泽东的住处双清别墅不远。

在香山这段时间里，刘少奇的工作重点就放在指导城市工作上，尤其是北平和天津的工作。

从三月二十六日开始，他连续六天听取中共北平市委和军管会、文管会、物管会、各区委书记和各工会工作干部，以及财经方面的工商局、银行、合作社和财政局等单位的工作汇报，了解北平接管以来的工作。四月一日，刘少奇召集北平市委会议。他在讲话中强调，在接管完成后，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

“北平头一个阶段是接管，现在已经过去，秩序未受到大的破坏，大体已安定下来。虽然还有些特务活动，还有抢案，这很难避免，在较长时期内也还会有。照目前秩序来说，人民也可以生活下去，学生可以读书，商人可以做买卖，工厂可以开工，影戏院可以唱戏演电影，一切活动都可以进行，所以说人民生活必需的秩序已经有了。”

^① 刘少奇在妇女和青年团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4日。

“现在北平的任务是什么？干些什么？如何干法？北平人民及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就是在目前情况下，更更进一步（不是两步），不能满足于目前的收获，必须把封建残余继续肃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北平，要恢复生产，发展生产，要把旧的封建制度与文化肃清。经过这一步之后，再走第二步。如何前进？一句话，就是搞生产，把生产提高，只要生产有了进步，各方面就都会进步。因此，我们在郊区，就是搞农业生产，在市内就是搞工业生产。”^①

如何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一项亟待解决的困难问题。在当时新解放的城市中，天津的问题特别突出。

天津是华北工商业最集中的大城市。一月十五日解放后，社会秩序恢复很快，而生产恢复却很缓慢。这除了战争造成的城乡交换阻隔、外贸断绝、原料匮乏、产品滞销、通货膨胀等因素外，没有处理好公私、劳资等关系是一个重要原因。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在向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工人、店员误认为我们允许分厂、分店，进行清算斗争。天津解放一个月内，曾发生五十三次清算斗争。”“资本家脑子里有三怕：一怕清算，二怕共产党只管工人利益，三怕以后工人管不住，无法生产。”“因此，他们抱着消极等待、观望的态度，甚至跑去香港。据天津统计，当时私营企业开工的不足百分之三十。”^② 由于许多工厂不开工，天津有上百万人口生活没有着落，这自然是极为严重的问题。

天津存在的问题在新解放的城市中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能不

① 刘少奇在中共北平市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9年4月1日。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1页。

能正确地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迅速地恢复生产，发展经济，这不仅关系到天津一个地方，而且对江南即将解放的上海、南京、武汉等大城市的接管也有重要影响，直接关系到人民政权的稳定和巩固。薄一波指出：“所有城市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有步骤地有计划地妥善地复工，这一问题得到解决，则万事皆通。否则，一切均谈不到。”^①为此，中共中央在四月初决定刘少奇到天津去，解决如何尽快恢复和发展城市生产的问题。

行前，刘少奇做了许多准备工作，还邀请熟悉财经工作的龚饮冰、卢绪章和他同行。临行，他先向华北局报到。薄一波回忆说：

“四月初的一天，少奇同志来到华北局机关，对我说：‘我来向你报到。’并告诉我，他将去天津巡视工作。我说，你是中央领导同志，该上哪就上哪，何必特意来告诉我。少奇同志严肃地说，按照组织原则，应该这样做。并嘱咐我，他在天津的活动，由天津市委向华北局报告，再由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报告；中央和毛主席有什么意见，由我向他传达。此事，表现了少奇同志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使我受到一次深刻的党性教育。”^②

四月十日晚，刘少奇一行抵达天津，在旧德租界小刘庄的一座二层楼房中住下。那时，在市区内还经常能听到零星的枪声，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0页。

^② 薄一波：《回忆刘少奇同志建国初期的一些经济建设思想》，《领袖元帅战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54页。

国民党的飞机偶尔也来骚扰。^①

第二天上午，刘少奇就开始到天津各主要工厂企业进行调查。他上午视察工厂车间，召开工人代表座谈会，听取工人和资本家两方面的意见，下午听取有关领导部门的工作汇报。在一个多星期内，先后视察了棉纺织厂、造纸厂、电工器材厂、汽车制配厂等企业，听取了天津市委、军管会、人民政府、工商局、粮食局、外贸管理局、公用局等单位的工作汇报。当时随同刘少奇去天津调查的张文松回忆：刘少奇“一到天津便系统地听取天津市领导工作情况的汇报，从天津概况、接管工作、政府工作、党的工作到工业、商业、财政、教育、外贸、公安、外事等，逐项汇报，务求详尽。少奇一面听汇报，一面提问、插话，有时也答复同志们的提问。汇报时总是坐得满满的一屋人，少奇时而坐在沙发上细听，时而站起来在人丛中踱步。有一次一个同志埋怨各部门间工作不协调，互相扯皮。少奇一面在人丛中绕来绕去，一面形象地打比喻说：你们看，在人多的地方走路难免要碰着这个人的腿、那个人的身子，要尽可能避免碰撞就是了。于是引起大家一阵哄笑。”^②

刘少奇在初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从十八日起开始召开各方面的座谈会，同他们交换意见。他首先召集天津市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并对天津整个工作提出意见。他说：

“天津是完整的接收了，很有成绩。现在接收工作告一段落，当前任务是如何改造、管理与发展这一城市。管理改造是为了发展。因此，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方

^① 王光美：《从香山到中南海——记少奇在建国前夕的重要活动》，《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83页。

^② 张文松：《随刘少奇同志视察天津》，《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94页。

面。总的路线，二中全会决议已经指出：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同时即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这就是城市工作的总路线、总方针。”^①

刘少奇这段话，是他这次天津之行的指导思想。正如他指出的：“这里讲的有群众，有队伍，有斗争对象，是很完整的一个路线。”他针对天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讲解毛泽东提出的“四面八方”政策。他说：“毛主席说过，我们考虑问题要全面，要照顾四面八方。四面就是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就是城乡关系的城乡两方，内外关系的内外两方，公私关系的公私两方，劳资关系的劳资两方。都要照顾到，这才叫全面照顾。”他提出：“天津工作须重新安排，主要应该是工会工作与经济工作，但首先要搞好工会工作。”“城市是集中的，一切工作应该以集中为原则，不应以分散为原则。”他强调：“天津如果把工人、学生、妇女……都组织起来之后，差不多占全市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有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口组织起来，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②

接着，刘少奇又分别召集工商业家、内外贸易负责干部、文教干部等十多个行业的代表座谈。他特别邀请天津一些著名的工业资本家李烛尘、周叔弢、宋槊卿等座谈。他感到在天津的资本

^①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18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18日。

家和工人中都有许多模糊认识。工人认为共产党来了，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有饭吃，有房子住，这就叫共产。在乡村分地，在城市还不是一样要分吗？”因此，普遍要求增加工资。有的工厂男工工资由六十斤小米增加到三百六十斤；学徒工工资由二十一斤增加到二百一十斤。^①资本家感到共产党对他们太冷淡，不了解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资本家究竟放在什么地位，因而生产经营情绪不高，顾虑将来是不是会像土改时消灭地主那样地消灭资本家。十一日，黄火青在汇报天津私营企业的情况时谈道：“六区有三十三个铁工厂，开全工的一家，开半工的三家，其余二十九家都未开工。”“少数感到成品销路好，已扩大营业，但仍觉得摸不着底，共产党没有章程。主要的是工资问题，做法也是有‘左’的情形，这是目前解决问题的关键。”^②

但是，许多干部对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还不了解。他们在处理劳资纠纷中，对为工人谋福利这一点很习惯，一听说“发动群众”就很快发动工人斗争，“斗争谁呢？就是斗企业主，‘大肚皮商人’。”^③他们认为：“天津解放后，帝国主义、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找不到了，看不到了，于是就把子弹打在资本家头上”，^④“来津后对他们很冷淡，不找他们，他们找来了也不见他们。报纸上是对他们骂得多而表扬少，在劳资关系上工资和劳动条件都订得高，……使得劳资关系很紧张，生产效率也因之降低了。”“贷款也不贷给资本家，政府也不理他们，又不许他们解雇工人，所以他们说是告贷无门，呼吁无门。”^⑤

这些现象严重阻碍着生产，特别是几万家中小私营企业的恢

①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员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18日。

② 黄火青汇报天津私营企业问题时的记录，1949年4月11日。

③ 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49年8月28日。

④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

⑤ 黄火青汇报天津私营企业问题时的记录，1949年4月11日。

复和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几十万失业工人的就业也无法解决。这就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应当怎样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怎样根据中国的现实国情逐步向社会主义转变？

刘少奇在天津把工作重点放在解决这个问题上。他一方面同天津市委共同研究，作出紧急决定，要求党的基层领导到工会去，军管会成立劳动局，帮助解决劳资纠纷；一方面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在各种场合向广大干部、工人解释中国的国情，提高他们的认识。他说：“中国经济有百分之九十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只有百分之十是进步的工业。其中一部分是国营的，一部分是资本家的。因为有了这百分之十的工业才产生了无产阶级。所以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有其进步性。”“私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是最大量的”，国家手中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大量的产品，特别是供给市场的产品还操在私人资本家手里。私营经济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是有利的。因此，“城市里发展生产，第一是发展国营企业的生产，第二是发展私营企业的生产，第三是发展手工业生产”。“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都照顾到，以实现发展生产的目标。”^①

为了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统一认识，解决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四月二十四日、二十八日和五月二日，刘少奇先后在天津市干部大会、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作报告。在这些报告中，相当一部分内容是针对工人和资本家思想中存在的问题，讲了如何正确看待资本主义剥削的问题。他指出：

“关于剥削问题，这不是几个资本家可以负责的。

^① 黄敬传达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1949年6月20日。

剥削行为不是由意识决定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整个社会制度问题。中国工人阶级还要忍受一个时期的剥削痛苦。”^①“剥削也要分清有几种：奴隶的剥削制度已经废除，封建剥削制度我们也废除，但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今天还不能够废除”。^②“马克思在一百年以前，就认为资本家对发展生产、组织生产是有历史功绩的。”“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功有过，今天是功大于过。但我们也要限制它”。^③“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挥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和建立功劳的时候”。^④“有人说：‘有人来剥削比没人剥削好’，‘没人来剥削，我们就失业了，失业还不如有业’。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受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在目前中国条件之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有若干发展是进步的”。^⑤

为了通俗地说明这个问题，解除有些资本家存在的“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的顾虑，刘少奇借用天津市领导人在汇报中提到的“有人剥削比没人剥削好”的说法，^⑥向工商业资本家解释说：“今天在我国资本主义的剥削不但没有罪恶，而且有功劳。封建剥削除去以后，资本主义剥削是有进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厂开得太多，剥削的工人太多，而是太少了。你们有本事多开工厂多剥削一些工人，对国家人民都有利。”^⑦“如东亚

①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

②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8日。

③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

④ 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5月2日。

⑤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

⑥ 刘少奇在听取黄火青汇报私营企业问题时的指示记录，1949年4月11日。

⑦ 刘少奇在天津市工商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5月2日。

毛纺织厂资本家现在剥削一千二百人，要能多办工厂，剥削两千人、两万人那更好。工人要求复工就是要求剥削。剥削他，他舒服，不剥削他，他不舒服。不论怎样讲，剥削是事实。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剥削是有进步性的。能扩大则更好。”^①

刘少奇强调说：自由资产阶级不是我们的斗争对象，而是争取对象。如果把资本家当作斗争对象，就犯错误，“等于农村中伤害了中农一样”。“现在还必须允许资本家存在，因此就要使他们有利可图，实行‘劳资两利’的政策，不是一利。国民党时是一利，只利资本家不利工人。而现在，只利工人不利资本家也是不对的。对的政策是两利，就是也允许资本家对我们剥削，剥削不能完全消除。剥削是不好的，但在现在来说，也有一点好处的。”“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家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的好处多，坏处少。”^②

刘少奇也讲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他说：“工人和资本家间是有斗争的，而且是不能避免的。这斗争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天生的，不能不斗的问题。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有斗争的一面，有联合的一面。在政治上要联合他们，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作斗争。在经济上要联合他们发展生产，但在联合当中不能缺少斗争。因此，只斗争不联合是错误的，只联合不斗争也是错误的。但以哪个为主呢？今天来讲，重点是联合不是斗争。因此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适当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如果斗争到把资产阶级消灭，这样工厂减少了，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③

①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

②③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8日。

刘少奇的讲话尖锐鲜明，一如他平素的个性那样，尽管个别用语可能说过了点头，但总的说来，正确地阐述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有力地纠正当时城市工作中出现的“左”的偏向，起到很好的作用。正如薄一波指出的：

“他（刘少奇——编者注）的本意，是要稳住民族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秩序（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增长）。这在当时是正确的。他讲话之后，大家感到讲得好，对如何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提供了重要思想武器。当时，华北局曾派人到各地择要进行传达，六月份还起草了一份给太原、石家庄、张家口、唐山等市委的电报指示，要求‘普遍宣传少奇同志在天津所讲解的各个问题’（毛主席同意的了）”。^①

同恢复和发展城市工业生产密切联系的，还有一个职员和工人的关系问题。在刘少奇拟订的调查提纲中，“职员问题”仅次于“自由资产阶级”问题。^②这是刘少奇天津之行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解放前，工厂在国民党和资本家统治下。他们依靠一部分职员和工头，其中有些人做过对不起工人的事，如打骂工人、克扣工资等。过去工人只能恨在心里。解放后，工人有了说话的权利，就要报复；而职员又是脑力劳动者，穿长袍，轻视体力劳动。因此，职员和工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团结现象，有些工人甚至要求清算职员。

刘少奇分析了这些情况，认为：“职员，在马克思主义者看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3—54页。

^② 刘少奇：《天津工作问题》1949年4月，手稿。

来，是无产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是整个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国家依靠工人，同时也依靠职员。”“职员和工人统统是工薪劳动者，雇佣劳动者，虽然一个是脑力劳动，一个是体力劳动，但基本上都是劳动者，因此，职员和工人的关系必须搞好。”^①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刘少奇在四月二十五日召开全市国营企业职工大会，推心置腹地同他们交换意见。他实事求是地分析工人和职员之间产生不团结现象的原因，劝告他们要改正轻视体力劳动的观点，正确看待自己；要实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他还用自己走过的道路和中共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启发他们，指出：“如果用这两种方法，就会取得工人的谅解，解除对立现象，达到团结。”“我劝大家放下架子，进工厂时穿工人服装，让工人看和他们一样，就能去掉隔阂。”^②

刘少奇从发展生产的角度出发，反复告诫各级干部要十分爱惜技术人才。他说：“不能埋没人才。世界上最宝贵的就是人才，埋没人才比破坏房子、破坏机器的罪过还大。斯大林说：‘爱护干部，要如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要发现人才。”^③他多次说，某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工资应该高于或至少等于党的负责干部的工资。

刘少奇还在各种场合一再指出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强调这是搞好城市一切工作的基础。他除在所视察的工厂中接见工人代表，详细听取他们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外，还分别在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和华北职工代表大会上作报告。他对天津市职工代表大会所作的报告还在全市进行转播。刘少奇在这些报告中，阐述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和中国共产党同工人阶级的血肉联

① 刘少奇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5日。

② 刘少奇对天津国营企业职员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5日。

③ 刘少奇在华北总工会汇报时的指示，1949年4月29日。

系，告诫工人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分清敌友，正确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使目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此外，他还对按行业组织工会和组织工人阶级进行学习等问题，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刘少奇的“天津讲话”，同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总体设想密切相连；反过来，通过实践和调查研究，又进一步充实并发展了他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例如，他提出让“资本家替国家制造东西，我们帮助他，共同买原料，共同推销。”^①实际上是用加工定货的方法，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四月二十六日，他在天津干部会上回答了各级干部提出的四十多个问题。对有的干部提出“国家资本主义何时能实行”的问题，刘少奇明确回答说：“我说现在就可实行，具体办法就是定货。至于如何进行，详细的办法尚须研究。”^②他还提出组织交易市场，搞好城乡物资交流，并支持贸易部门提出的由政府设立纱布和证券交易所的想法。不久，天津市委就按照刘少奇的指示，办起了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和在几个行业初步实行了加工订货。他还在同资本家的谈话中，提出和平赎买、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设想。

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是紧张繁忙的。他先后调查了工交、外贸、外事、文教、市政机关等十几个行业，听取了二十多次汇报，作了十多次讲话。他在五月二日还召开有一百二十八位工商业者参加的大型座谈会。他的这些工作收到明显成效，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资产阶级，社会各界出现团结、向上的情绪，促进了天津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四月三十日，刘少奇曾经视察过的东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

①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4日。

② 刘少奇在天津市干部会议上解答问题的记录，1949年4月26日。

总经理宋棐卿致信刘少奇：“敝厂自蒙阁下惠临训话后，全厂职工对于政府之工业政策有了新的了解及新的希望与新生命，至为愉快，因此已决定每人皆尽最大之努力以完成此伟大为人群服务之使命，而副政府及阁下关垂训示之至意。”^①刘少奇在五月三日给他回信说：“得悉贵公司职工团结、劳资双方共同努力扩大生产、增设新厂之计划，甚为欣慰。望本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之方针，继续努力，前途光明，国家民族之复兴指日可待也。”^②

《天津日报》五月一日刊登一篇题为《心顺气顺，干活有劲》的文章，报道工人们自从明白劳资两利的政策是为了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后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情景：过去一个工厂，工人工作十三小时染布二百七十八，现在十一小时，出成品三百二三十；还“组成了业务学习小组，学文化、办壁报、唱歌子”。六月二十日，天津市长黄敬在一个会上传达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后，兴奋地说：“少奇同志来天津对我们帮助很大，过去很多模糊的认识和错的不觉悟的看法，这次都弄清楚了，把要紧的地方给尖锐地指出来了。”^③

刘少奇在天津的一系列讲话，在工人、职员和资本家当中广为传播，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正确的政策一旦为群众掌握，就会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全市的工商业迅速恢复，工业主要生产行业六、七月以后就恢复到解放前水平。九月，被批准开业的私营工商业户从四月份的二百九十三户增加到了三千八百户，职工人数增加近百分之二十。^④以工业、商业迅速复苏为标志，天津的经济建设呈现出生气蓬勃的兴旺景象。

① 宋棐卿给刘少奇的信，1949年4月30日。

② 刘少奇答宋棐卿的信，1949年5月3日。

③ 黄敬传达刘少奇对天津工作的指示记录，1949年6月20日。

④ 《工商管理》（市政资料甲集之十五），天津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编印，1950年3月15日版。

五月六日深夜，刘少奇同天津市委领导人进行了这次天津之行的最后一次座谈。他欣慰地说：“来津后帮助你们解决两个问题，其中一个私人工厂中的劳资关系。资本家现在比较高兴了，情绪稳定，准备搞生产了，甚至有资本家讲，一年内可改变天津。证明这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利用私人资本家的积极性来生产是见效了。”^①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注意到了防止另一种倾向。他提醒天津市的领导同志，对某些调皮捣蛋的资本家，将来要进行批判，要进行适当的斗争。五月七日，刘少奇又在对《天津日报》一篇报道的批示中指出：“在劳资问题上批评‘左’倾之后应注意右倾情绪的生长。”“不要宣传劳资感情的融洽，虽然也不要去煽动劳资间的恶感。因宣传劳资感情融洽，是要麻痹工人阶级觉悟的。在客观上劳资阶级对抗不独仍然存在，而且在根本上是无法融洽的，即无法在根本上调和的（虽可设法暂时缓和一下）。这样宣传是违背马列主义精神的。”^②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这一批示后，指示转发华北局予以注意。

天津恢复发展生产的成就和经验对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各地的资产阶级，防止了南方即将解放的各大城市资金大量外流。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当时就曾深有感慨地说：“五月初，刘少奇同志在天津向私人资本家明确的解释了四面八方的政策，在解除私人资本家的思想顾虑上起了很大的作用。”^③后来，邓小平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针对高岗对刘少奇天津讲话的攻击，公道地指出：

“据我所听到的，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些讲话是根

^① 刘少奇临行前在天津市委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49年5月6日。

^② 刘少奇对“私营生产”一稿的批评，1949年5月7日。

^③ 《叶剑英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上的报告》，1949年8月9日，《新华月报》创刊号。

据党中央的精神来讲的。那些讲话对我们当时渡江南下解放全中国的时候不犯错误是起了很大很好的作用的。虽然在讲话当中个别词句有毛病，但主要是起了好作用的。当时的情况怎么样呢？那时天下还没有定，半个中国还未解放。我们刚进城，最怕的是‘左’，而当时又确实已经发生了‘左’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采取坚决的态度来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渡江后，就是本着中央的精神，抱着宁右勿‘左’的态度去接管城市的，因为右充其量丧失几个月的时间，而‘左’就不晓得要受多大的损失，而且是难以纠正的。所以，我认为少奇同志的那个讲话主要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①

刘少奇在天津调查期间，了解到唐山市开滦煤矿在生产方面遇到严重困难，弄得不好有停工停产的危险。开滦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煤矿，关系到国计民生。强烈的责任心使刘少奇在天津的工作告一段落后，让临产的妻子王光美先回北平，自己立刻赶赴唐山处理问题。

开滦煤矿是英国资本家在中国开办的带垄断性的企业。当时从华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都靠它供应煤炭。唐山解放后，中共唐山市委向开滦煤矿派出军代表。英国资本家及其代理人采取消极态度，缩减生产，停购器材，向国外转移资金，致使大量煤炭积存在煤场销不出去，五万职工的生活失去保障，拖欠职工薪金达几百万银元。唐山解放不久，开滦煤矿总经理、英国资本家裴利耶和中方总经理余明德，写信给毛泽东和华北人民政府主席

^①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05—206页。

董必武，要求大宗借款和减产。^①

五月五日晚，刘少奇在天津会见余明德和裴利耶，了解开滦煤矿的情况，说明中国共产党对待外侨投资的政策，对他们要求借款的问题答应到开滦调查后再予解决。五月七日下午，刘少奇到达唐山。这时，“正赶上煤矿工人因为矿方发不出工资酝酿罢工”。刘少奇连夜听取开滦煤矿军代表的汇报。张文松回忆说：

“第二天清晨我在大厅里看见少奇同志一个人在散步。他头发乱蓬蓬的，脸色也不好。问起来才知道他在为工人罢工筹思解决办法，一夜未眠。少奇要下到矿井去视察，经过同志们劝阻，好容易才打消了他的计划，但他仍然在井口细致地了解情况。”^②

刘少奇先后两次召开开滦各煤矿工人代表的座谈会，听取矿工们对生产和生活方面的意见，关切地询问工人群众想些什么，对人民政府有些什么意见和要求。刘少奇恳切地对工人们说：“开滦的事情，横竖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你们自己拿主意才是。你们组织起来以后，要努力排除生产上的障碍，推动资本家维持生产。无论如何，要把开滦的事情办好才行。”^③

刘少奇又分别召集军管干部、资本家代理人、井下工人座谈。他果断地提出解决问题的三条基本原则：第一，要依靠工人阶级办好开滦，尽快安定职工生活，同时向工人讲清困难，发动工人克服暂时困难；第二，对待中外资本家要讲策略；第三，开滦煤矿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要置开滦于国家监督之下，其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

① 中共天津市委致中共中央电，1949年2月14日。

② 张文松：《随刘少奇同志视察天津》，《中共中央在香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95—296页。

③ 王林：《刘少奇1949年在开滦》，《革命回忆录》第2期，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页。

料供应等都要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中外资本家维持开滦生产。

同时，刘少奇还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开滦恢复生产：指示华北贸易公司，每月以相当于十五万袋面粉的物资换取开滦的煤炭，以维持职工生活；中国人民银行向开滦发放贷款以支付拖欠的职工工资；政府每月以现款购煤两万吨，并以杂粮、坑木、布匹交换开滦煤炭，使开滦资金得以周转。当时在开滦煤矿担任军管会主任的王林回忆说，这些指示“使我们的耳目为之一新。他帮助我们既克服了一些同志对管好开滦一筹莫展、失掉信心的右倾情绪；又纠正了那种排斥中外资本家，急于接管、没收企业的‘左’倾错误思想”。“由于采取了上述一系列经济措施，既维护了开滦工人的利益，又推动了中外资本家维持生产，为开滦迅速恢复和蓬勃发展准备了条件。”^①

开滦煤矿问题解决后，刘少奇在九、十日分别视察唐山机车车辆厂和林西矿。这时，他接到黄敬转达毛泽东要刘少奇速回北平的电话通知，决定连夜赶回天津。

^① 王林：《刘少奇 1949 年在开滦》，《革命回忆录》第 2 期，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12 月版，第 5 页。

二十四、建国前夕(下)

天津之行给刘少奇留下很深的印象，使他进一步了解到恢复国民经济的紧迫性和艰巨性。他在一次会议上说：“建立中央财政经济的统帅部，其紧急不亚于军事及其他问题。以前我们不懂，这次去天津，与产业界和地方工作同志谈了一谈，才感到这项工作很紧急。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接收了很多东西，外国人要来做生意，交通需要统一，因此财政经济上需要高度的集中。”^①

基于这样的认识，刘少奇感到必须尽快建立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他在视察天津的紧张工作同时，起草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提出：“由于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的胜利，迅速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以供给目前人民革命战争的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之目的，即须建立从上至下的国家的财政与经济机构。”^②为了审慎起见，刘少奇先把这个《大纲》草案送给一部分领导人征求意见。他指示工作人员：“抄朱、周、陈云、稼祥、董、薄、刘各

^① 刘少奇在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9年6月4日。

^② 刘少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1949年4月24日。

一份。明日晚间送到。”^①

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回到北平后，又对这个大纲草案作了修改。三十日，把它报送毛泽东，并附言说：“毛主席：此件很简单，请阅，看是否即如此写法。”^②第二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很好。”^③

这样，领导新中国财政经济的统帅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很快成立起来。刘少奇起草的《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成为中财委机构设置和运作原则的基本依据。六月三日，刘少奇在中财委成立会上作报告，系统地阐述了新中国的财政经济政策。

刘少奇回到北平的当晚，立刻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之行的情况。毛泽东肯定他的工作，并建议他就城市管理和对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向干部讲一讲。刘少奇在五月十二日和十九日，分别向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北平干部会作了天津调查的报告。

为什么毛泽东那么急地用电话通知刘少奇速回北平？是要让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苏联，同联共中央和斯大林商谈有关两党两国的问題，这也是建立新中国一项重要准备工作。

本来，从一九四七年初开始，毛泽东一直想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联共中央就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问题交换意见。由于战事和交通等原因，这一出访始终未能成行。只是在一九四九年一月底二月初，联共中央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来到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四月下旬，国共和谈破裂后，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

① 刘少奇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手稿上的批语，1949年4月24日。

② 刘少奇致毛泽东信，1949年5月30日。

③ 毛泽东在刘少奇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上的批示，1949年5月31日。

此世情多未周，陈言标榜者，皆
 名作。明日晚向送到。
 中国定章军事委员会，
 国家财政经济机关的总纲(草案)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总纲是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定章军事委员会在总纲的总纲》
 定章军事委员会在总纲的总纲，即须建立
 国家财政经济机关的总纲。
 第二章 总纲
 第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二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三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四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五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六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七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八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一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二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三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四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五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六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七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八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九十九条 本总纲的总纲。
 第一百条 本总纲的总纲。

1949年4月，刘少奇在天津调查期间起草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国家财政经济机构的组织大纲(草案)》手稿

江，迅速占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国民党统治基本解体。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已迫在眉睫。同联共中央直接交换意见，取得苏联对新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已成为更迫切的事情。因此，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高岗、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团，去苏联秘密访问。

从天津回到北平后，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准备工作的。他收集并分析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有关情况，准备同苏共中央和斯大林交换意见；并同中央有关部门研究确定所需苏联专家的数量；还约有关地区和部门汇报，准备同苏联交流工作经验。六月十六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指示中指出：

“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已经基本地打败了国民党。全部消灭反动政权，解放全中国，已为期不远了。不久，中国人民的中央联合政府将要组成，中国将要进入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建设时期。中国革命向来都得到苏联的援助，这种援助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中国转入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以后，中国人民将从各方面得到苏联更大的援助，中苏两国人民的亲密合作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我们应当与苏联建立经济上的亲密合作，我们将要取得苏联物资的和技术的帮助，我们将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使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更顺利进行。不久的将来，苏联专家会来到中国，他们将分配到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工业、农业、铁路、交通、工厂、矿山等经济机关中去工作。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对中国人

民空前有利的好事。”^①

六月中旬，刘少奇在参加新政协筹备会议后就启程前往苏联。行前，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奇、王稼祥一起商定中共代表团的工作方针。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王稼祥从北平出发。陪同他们前去的有苏联总顾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还有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权和翻译师哲。

刘少奇一行原计划乘二十日晚十一点的火车离开北平。不料由于科瓦廖夫的“汽车连出事故，致迟开三小时”。^②二十一日凌晨一时半，刘少奇等从清华园车站动身，经沈阳同高岗会合后到达大连。在这里换乘道格拉斯飞机，经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地，在二十六日下午两点抵达莫斯科。^③

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城内一个公寓里。第二天，他们被邀请到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外孔策沃的别墅。刘少奇向斯大林递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苏联方面参加会见的还有马林科夫和米高扬。斯大林对贷款、派遣专家和海、空援助等问题，初步谈了苏联方面的意见。刘少奇表示希望在联共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国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形势同联共中央交换意见。斯大林同意这个要求，答应过三四天后进行会谈。^④

会见结束后，刘少奇召集代表团成员一起回忆这次会见的情况和谈话内容，拟出下一步会谈的要目。^⑤当天下午，刘少奇和高岗、王稼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会见情况，并就贷款形式、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的组织及经济机关中党员的指示（草案）》，1949年6月16日。

② 周恩来致高岗和李富春电，1949年6月20日夜。

③ 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1949年6月26日。

④ 《斯大林与中共代表团的会谈纪要》，译自《远东问题》，1996年第4期，第66—70页。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398页。

代表团活动方式、派往中国的第一批苏联专家、解放新疆的时间等问题，请示毛泽东。^①

七月二日，双方进行第二次商谈。这天，刘少奇两次致电毛泽东请示有关问题。七月三日和四日，毛泽东分别复电同意“苏中两方组织共同委员会来把借款和定货等问题具体化”，并建议“由于我们全国经济机关方开始成立，地区不断扩大，专家缺乏，材料缺乏，故目前实无法提出全部货单，可否商请联共中央同意将共同委员会设在中国，由科兄先带主要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②毛泽东并同意代表团以“书面报告的方式为报道情况，提出问题”。^③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代表团进行了两天的紧张准备。七月四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身份，向斯大林提交一份一万多字的书面报告。报告中，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的政治协商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有关的问题。刘少奇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由于中国半殖民地的国情，中国人民民主专政与列宁在一九〇五——一九〇七年革命中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有其共同点，但也有区别点：“无产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这是共同点。但中国人民民主专政包括愿意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势力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派别在内，这是区别点。”^④斯大林完全赞同报告中的这些观点，在阅读时连续批了十五个“对”字。七月六日，刘少奇又致信斯大林，就学习苏联经验和要求苏联援助的有关方面提出八个问题。他还致信米高扬，希望同他谈一谈有关商业和贸易的问题。

七月十一日晚十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

①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电，1949年6月30日。

②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电，1949年7月4日。

③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电，1949年7月3日。

④ 刘少奇：《中共中央代表团给联共中央斯大林同志的报告》，1949年7月4日。

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中方刘少奇、高岗、王稼祥出席。苏方参加的有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米高扬、布尔加宁以及有关的军队领导人。斯大林首先说明这次会谈是按照中共代表团的愿望召集的，“少奇同志的报告写得十分清楚、明确，我们方面的人都看了，没有问题”。^①斯大林在询问一些具体问题后，就对中共代表团在报告中所提出的问题发表意见。“其他同志发言甚少，会议十分严肃。”^②

斯大林主要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題。斯大林说：你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合作并吸收他们参加政府的观点是正确的。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东欧各国以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由于在战争中同希特勒合作，因而在反希特勒胜利后所要处理的只是他们的企业，而不是他们本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却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日本投降后其中一部分虽然企图同美国建立关系，取得美国的援助，但中美通商航海条约的订立对中国资产阶级是极不利的，于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美国和蒋介石。

第二，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斯大林说：你们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是对的。你们引述我在一九二六年所说的“中国未来的革命政权是偏重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也是对的。

第三，外交问题。斯大林认为中共在报告中所说的外交原则是对的。要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矛盾，发展中国同各国特别是同苏联及东欧各国的通商贸易。斯大林说：你们不要急于要求各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以便加以观察，了解情况，看他们表现如何。你们有很好的法宝，就是帝国主义要和你们做买卖。帝国主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04页。

^② 刘少奇、高岗、王稼祥致毛泽东的信，1949年7月18日。

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已经开始了。我想列强很快就会要承认你们的，你们可以先和他们做买卖，再谈承认问题。

第四，中苏关系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刻承认你们。一九四五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同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美国在日本驻兵很多，蒋介石又勾结美国，苏联在旅顺驻兵是抵制美蒋武装力量的自由行动，保护苏联，同时也保护中国革命的利益。当时联共中央内部已有决定，即在对日和约订立、美国从日本撤兵后，苏联可以考虑立刻从旅顺撤兵。如果中共要苏联从旅顺立即撤兵，苏联军队现在就可以从旅顺撤退。这个条约等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

关于毛泽东来莫斯科的问题，斯大林说：中国政府成立、两国关系建立后，毛泽东就可以来，如果毛泽东还不便来，苏联可以派代表团到中国去。

此外，双方就在莫斯科办一所中国大学，为中国培训建设和管理人才交换了意见。斯大林还表示愿意帮助中国在大连办一所海军学校，从蒙古的乌兰巴托到中国的张家口修一条铁路。双方决定共同组织一个关于借款条约的起草委员会，联共方面由米高扬及科瓦廖夫参加，中共方面由刘少奇等三人参加。斯大林还同意刘少奇同联共各政治局委员谈谈苏联各方面工作的经验。^①

会谈结束后，斯大林关切地询问代表团的生活情况，并邀所有到会人员和中共代表团一起看电影。“斯大林亲自选择四个影片放映，并在放映时亲自向我们加以若干解释。”^②

十一日的会谈取得了很大成果。十八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以后十几天内，刘少奇率领代表团广泛地进行参观访问和座谈，学习苏联政府和工厂、集体农庄的经验。他还把自

^① 王稼祥：《我的履历》，1968年。

^②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49年7月18日。

己已有十年没有见面的儿子刘允斌和女儿刘爱琴接到身边，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

七月二十三日，双方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借款达成初步协议。二十五日，毛泽东来电同意刘少奇提出的“原则上同意，具体文字待译好后再谈的态度”；并指示刘少奇同斯大林商量能否“在莫斯科于半年或一年内训练一千名空军人员，三百名地上机械人员，并卖给我们一百至二百架战斗机、四十架轰炸机作为明年下半年我军进攻台湾之用”。^①毛泽东指示刘少奇：“你们待此事交涉完毕，即可回国。”

七月二十七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席间双方继续进行会谈。这次会谈气氛比较轻松，大家边吃边谈。谈话的重点集中在两党两国的关系方面。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②

斯大林谈到两党关系时说：“我们不愿别国共产党强制我们执行他们的意见，我们也不要求更不愿意强制别个国家的共产党一定要执行我们的意见。我们两党之间，经常交换意见是必要

^① 毛泽东致刘少奇、高岗、王稼祥电，1949年7月25日。

^② 刘少奇记录的斯大林谈话，1949年7月27日。

的，但我们的意见并不都是正确的，各国共产党可以拒绝我们的提议，当然我们也可以拒绝各国共产党的提议。”斯大林带着歉意地问中共代表团说：“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刘少奇有礼貌地回答说：“没有。”但他提到，一九四五年毛泽东或者可以不到重庆去，有周恩来去就够了。但毛泽东到重庆去，结果是很好的，使我们有了政治上的主动权。斯大林说：“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问刘少奇：“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刘少奇回答说：“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斯大林最后感慨地说：“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①

斯大林还向中国代表团介绍了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师哲回忆说：

“我亲眼看到，斯大林对少奇是信任和尊重的，他从来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少奇的语意和心情，并对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根据中方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并且他不准别人插手，以免横出枝节。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或不愉快。可以说，历次会见都是在热

^① 刘少奇记录的斯大林谈话，1949年7月27日。

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中进行的。”^①

七月三十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贷款协定。随后，高岗离开莫斯科先行回国。当天下午，刘少奇还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座谈了三个小时，向苏联学习外交机构的组织和工作原则。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和王稼祥：“少奇可先回国，留稼祥在莫斯科帮助刘亚楼、张学思等接洽创办空、海两校事完毕，于八月中旬或下旬回国一行，参加政协，然后再去苏联。”^②

八月二日，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把毛泽东电报中的这一意思告诉斯大林，并表示：“我希望科瓦廖夫和部分专家和我一起走，其他专家可以和王稼祥一起走。为了给科瓦廖夫和其他苏联专家一点准备时间，我将于八月十日离开莫斯科，希望您能对加快去中国苏联专家的工作给以指示。在我离开莫斯科之前，除与苏联一些同志座谈以外，我愿意完成您所交办的任何任务。”^③

以后的几天，刘少奇又对购买苏联高射炮、设立中国大学和苏联专家到中国工作的待遇等问题同苏联方面商谈，并签订了有关协定。对中国大学设在什么地方问题，刘少奇、王稼祥建议“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较为方便。”毛泽东很快复电同意这个建议。^④

这样，刘少奇率团访问苏联的事情都已办妥。师哲说：“少奇自始至终以充沛的精力、振奋的精神，带领代表团的同志进行了多方面的工作，成功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使命，为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建国初期经济建设的发展，做出了杰出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18页。

②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年7月31日。

③ 刘少奇致斯大林信，1949年8月2日。

④ 毛泽东致刘少奇、王稼祥电，1949年8月7日。

的贡献。”^①

八月十四日，刘少奇踏上归国的旅程。回国时，他把已经从技工学校毕业的女儿刘爱琴带回国内。行前，刘少奇致信斯大林，感谢他对中国代表团的热情款待。

刘少奇的这次访问直接沟通了中共中央同联共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对以后中苏关系的发展以及苏联对新中国的态度有着重要影响，也为年底毛泽东的正式访苏做了准备。

八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同科瓦廖夫带着二百名苏联专家，抵达沈阳。

当时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南方还在打仗，因此苏联专家的大部分留在东北工作。刘少奇非常关心这些专家，“做了一系列细致、具体而周到的工作。他还亲自探望专家，了解专家的住宿条件和饮食情况，总之，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们。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十分感人的。苏联专家无不感动地说：‘我们像遇到了自己的亲人一样，你们对我们这样亲昵，尤其像刘少奇这样一位高级领导人亲自出面关怀我们，并且一直注意我们的生活细节方面的问题，不能不使我们深受感动，如果我们在这里不能尽心努力做好工作、完成任务、做出成绩，那我们将问心有愧，也对不起两国的劳动人民。’”^②

刘少奇在沈阳停留了四天。在这期间，他出席了东北局工作会议；主持了中国干部同苏联专家的联席会议和对苏联专家的招待宴会；并进行了一些参观访问。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讲话。他在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后，强调指出：“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

^①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24页。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425页。

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

刘少奇在讲话中还特别提出，学习外国经验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他说：

“中国因为帝国主义的威胁，资产阶级和我们合作，而且我们要在相当长时期内和资产阶级合作，所以中国不能够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是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专政，以及政协会议、人民代表会这一套形式。不要这样想：东欧搞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就搞无产阶级专政，那不是从实际情况出发，而是从东欧出发的，‘言必称希腊’，那就变成教条主义。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①

在新中国建设将要起步、各项工作基本上以苏联为榜样来进行时，刘少奇提出“我们的问题要根据中国具体情况决定”，是有重要意义的。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乘车赶回北平。

这时，中共中央机关已经从香山搬到城内的中南海，刘少奇一家住在中海西侧的万字廊。这是一排旧式的三间房子，王光美已带着孩子们先搬进去了。中共中央正在紧张地筹备召开新政协和建立中央人民政府。刘少奇立刻投入这一工作。

在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全国进军。在一片胜利声中，刘少奇向准备出席政协会议的共产党员讲话，告诫共产党人不要因为自己劳苦功高，就不满意有的民主党派人士得到比较优厚的待遇。他说：“我们共产党员是最先进的分子，为人民服务是无条件的，不讲求代价的。”我们要

^① 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8月28日。

研究历代皇帝、袁世凯和蒋介石等为什么坐不稳天下的教训，我们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坐得稳。就是要用统一战线的形式团结民主人士。共产党员在政协会议上的行动要研究和学习，要谨慎、要商量，有组织、有指挥的活动；有什么提议、行动，要详细讨论、考虑，遇到同中央不一致的意见更要多用脑子。^①

九月十七日，新政协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出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由各小组分头起草的政协组织法草案、共同纲领草案和政府组织法草案等。会议将新政协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参加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单位共四十五个，代表共六百六十二人。九月二十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最后确定政协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成员的名单。

九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会议开幕时，响起了雄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五十四响礼炮声。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庄严宣布：“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毛泽东指出：“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

刘少奇在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四百四十八万名党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的组织形式，是全国人民实行革命大团结的一种最重
要的具体方式。它在今天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之后，将长

^①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参加政协会议党员大会上的报告，1949年9月15日。

期地继续在中国存在，并将在一切必要的地方建立它的地方组织。中国人民在一百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艰苦斗争中深深地懂得：必须实行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才能战胜压在自己头上的强大的敌人，并在战胜这些敌人后巩固胜利的果实，成功地建设新中国。”“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的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①

这次会议充满着热烈欢庆、团结协商的气氛，体现了人民革命胜利带来的全新气象。会议充分吸取代表们提出的意见，如原来中共中央提出的国旗样式，有将近三分之一的人不同意，于是便放弃原有的方案，采纳有些民主人士提出的以五星红旗作为国旗的意见。经过一个多星期的认真讨论，会议正式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以及纪年、国歌、国旗等决议案。很多民主人士对这次会议都非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32、433页。

常满意，说：“这一回可搞得好了。”^①

九月二十九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是总结中国人民近百年来特别是最近二十多年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经验而制定出来的一部人民革命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的临时宪法。它规定了新中国建国后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正如刘少奇在会上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共同纲领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端重要的文献”，“是目前时期全国人民的大宪章”。^②

三十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陈毅等五十六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又选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由一百八十人组成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人民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宣言，并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会议由朱德致闭幕词。他满怀信心地指出：“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就要诞生了。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不屈不挠、流血奋斗的结果，也是刘少奇和他的战友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率领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换来的成果。当晚，刘少奇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典礼，以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中以及从一八四〇年以来在反对内外敌人的斗争中，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牺牲的无数先烈。

^① 刘少奇在参加政协会议的党员大会上的报告纪要，1949年10月7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34页。

近百年受尽苦难的中华民族终于凝聚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开始建设一个民主、富强、繁荣的新中国。刘少奇和他的战友为之奋斗三十年的事业，终于取得了第一步的成功！

中国历史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的刘少奇，将要担当起新的建设国家的重任。

二十五、为了新生政权的巩固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日子。北京三十万军民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下午三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出席这一盛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新中国成立时，刘少奇担任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十月十九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他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还没有满五十一岁的刘少奇，肩负着党、政、军的重要领导责任，以他丰富的经验和旺盛的精力，投入到巩固新生政权、治理国家的浩繁工作中去。

建国伊始，摆在新中国领导者面前的形势，是严峻而复杂的。以美国为首的许多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力图孤立和扼杀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国内来看，人民解放战争尚未结束，包括重庆、广州等重要城市在内的西南、华南大片地区和沿海岛屿还有待解放。在新解放地区，两百万土匪武装仍严重威胁着新生政权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经过国民党长期统治和连年战乱，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一方面是生产萎缩带来大量失业，一方面又是恶性通货膨胀

胀造成物价飞涨。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迎来伟大胜利的同时，又面临着国际国内多方面的严峻考验。刘少奇一九五〇年元旦在《人民日报》发表题词号召：“一九四九年是中国人民胜利最大的一年，也是困难最大的一年。一九五〇年就要在基本上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胜利。同胞们！同志们！为克服我们的困难与巩固我们的历史性的胜利而战斗啊！”^①

新中国诞生的最初阶段，刘少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在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进行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和加强党的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需要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那时西方国家敌视新中国，这种状况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改变。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夕确定了“一边倒”的外交方针：“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② 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为了加强中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五天——十月五日，中苏友好协会在北京成立。朱德、刘少奇、宋庆龄三位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首都群众一千余人出席中苏友协总会的成立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以三十年来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今天的事实，说明苏联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说：“苏联对中国人民真诚友谊的帮助，是恢复和发展中国经济的有利条件之一。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国人民应该特别重视和珍贵对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月1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75页。

苏联人民的友谊与合作。”^①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苏友好协会总会会长，宋庆龄等七人为副会长。

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后，在中苏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到一九五一年四月初，会员达到五百三十七万多人。

为了使新中国获得有力的国际支持，毛泽东应邀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就两国政治经济关系广泛地交换意见。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毛泽东出访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共中央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毛泽东这次访苏，历时近三个月：十二月六日启程，到第二年三月四日才回到北京。在此期间，他同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毛泽东自莫斯科致电中共中央，通知周恩来去苏联参加谈判，因为斯大林已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②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有关问题。一月四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报告政治局讨论的情况，提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应有时间期限等意见。^③次日，毛泽东复电说：“谈判要点及准备工作，你们所指出的各点都是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④经过几天准备后，周恩来在一月十日前往莫斯科。这以后，刘少奇在国内主持党、政、军的全面工作，并密切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在苏联的谈判。

为了在百废待兴的情况下，促进中国的经济建设，刘少奇提出应该尽可能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允许中外合资，合作办企业

^①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8日。

^②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1950年1月2日。

^③ 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4日。

^④ 毛泽东致中共中央电，1950年1月5日。

和工厂，这种合作可以首先从苏联开始。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刘少奇致电正在苏联的毛泽东，提议在新疆设立开发金属、石油的中苏合资股份公司。他在电报中说：“这种事业可能不只在新疆，不只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在中国其他地方，也可能合办这种工厂和企业。甚至帝国主义国家内的团体和资本家也可能要求来办这种工厂和企业。但我们如果不主动表示要苏联来办，苏联是不会要求我们办这种事业的。现新疆同志则要求苏联来办，我们是否向苏联作这种要求，请你考虑决定。此间同志认为是可以作这种要求的。”^① 经过双方谈判，中苏两国签订了关于新疆石油与有色金属两个合股公司的协定。这些消息发表后，在一部分群众中引起思想波动，怀疑这两个协定是否要损害中国主权。为了向干部和群众说清楚这样做的原因，三月三十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指出：“为了利用外国资本以促进中国的工业化，某些事业的和外资合营及成立这种合股公司甚为必要，不独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甚至和某些资本主义国家还可能在适当条件下订立这种合营合同甚至租让合同。”^②

中苏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周恩来不断将会谈情况和草拟中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内容用电报发给刘少奇，刘少奇在国内组织党内外各界人士进行讨论，并把意见汇总起来，告诉毛泽东、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电告毛泽东：“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今天政治局会议讨论后一致同意。”^③ 二月十四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莫斯科正式签订。

二月十五日，刘少奇举行有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负责人、外国使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负责人参加的庆祝《中苏

①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2日。

② 中共中央对党内的指示，1950年3月30日，手稿。

③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27日。

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盛大宴会。刘少奇在宴会上发表演说：

“中苏两大国人民之间的深厚友谊，是久已存在的，然而，只有到了今天，由于中国人民的历史性胜利，这种深厚的真诚的友谊，才用条约的形式把它确定下来，因而就使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开始了一个完全新的时代。”^①

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受到极大鼓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便决定在北京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举办国际性会议。作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中华全国总工会名誉主席的刘少奇，具体指导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世界工联主席、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路易·赛扬和三十一个国家的一百多名工会代表参加会议。

十一月十六日，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开幕。刘少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并在开幕式上致词。他说：

“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今天能够在中国召开，这是由于亚洲和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强大发展的结果。这是世界工联所领导的世界民主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反对美、英、荷反动工会领袖的分裂政策，坚持国际工人运动团结统一，以保卫世界和平、民主与工人阶级权益的一个伟大胜利。同时，这也是由于中国人民大革命在中国这一块广大的土地上获得了决定胜利的结果。在这样的基础上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无疑的，它将推动亚洲澳洲进步的工人运动和广大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更加向前发展，并在国际无产阶级亲密团

^① 《人民日报》，1950年2月16日。

结的基础上促进亚洲澳洲各国工人阶级的亲密团结。”^①

接着，刘少奇介绍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受到代表们的热烈欢迎。

会议期间，一些国家的工会代表之间在讨论有关文件时发生了争执。刘少奇了解情况后，邀集这些代表座谈协商。他在斡旋中既坚持原则，又尽量照顾到各方面的意见，使风波迅速得到平息。路易·赛扬十分满意。

十二月一日，亚澳工会代表会议在通过《告亚洲各国工人和一切劳动者书》、《关于建立世界工联亚洲联络局的决议》等文件后闭幕。告别宴会上，路易·赛扬热情地伸出大拇指向刘少奇祝酒，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亚澳工会代表会议期间，两位越南特使带着胡志明的亲笔信来到北京，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请求。胡志明是越南共产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领导人，二十年代以来曾在中国广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早有交往和友谊。他领导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一九四五年成立后不久，法国殖民主义者卷土重来，占领了越南南方各个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向越南北部解放区步步进逼。越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正处于敌强我弱、极其艰苦的时期，迫切需要得到国际上的支持援助。

这时中共中央还没有设立对外联络部，涉及外国党的问题由刘少奇直接处理。鉴于中越两党、两国之间的通讯和交通极为不畅，情况不甚明了，刘少奇决定先派人作为中共的联络代表，带工作人员赴越南，沟通两党联系。

经过研究，刘少奇选调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担任联络

^① 《人民日报》，1949年11月22日。

代表。他在自己的办公室向罗贵波当面布置任务：转达两党的意见，沟通两国的关系；搞好调查研究，向中央提供制定援越计划的依据。在罗贵波临出发前，刘少奇又约他谈了一次，仔细交待工作方针和注意事项，并要他对这次行动暂时保密，在适当时候回国汇报。最后，刘少奇为罗贵波写了封介绍信：

越共中央：

兹派罗贵波同志前来与你们联络，希予接洽。我们给予罗贵波同志的任务，由罗同志面告，特此介绍并致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刘少奇

一月十三日^①

一月十六日，罗贵波带着刘少奇的介绍信和工作人员由北京启程前往越南。一月十七日，刘少奇给越共中央发电报，通知他们中共联络代表罗贵波已经出发赴越南。第二天，他又致电越共中央正式通报：中国决定同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几天后，刘少奇接到中南局报告，胡志明本人已经秘密来到中国广西境内。刘少奇立即为中共中央复电中南局，要他们热情欢迎胡志明来访，并指示：“在他到达武汉后，你们可和他商量是否能在北京公开欢迎他，看他意见如何再作决定。你们对胡同志应热情招待，周密护送来京。”^②

一月三十日，胡志明抵达北京。按照他的意见，北京没有组织公开的欢迎仪式。当晚，刘少奇、朱德等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设宴盛情欢迎胡志明并进行了会谈。对胡志明提出的希望中国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要求，刘少奇要朱德、聂荣臻、李维

^① 刘少奇致越共中央信，1950年1月13日，手稿。

^② 中共中央致中南局电，1950年1月26日，手稿。

汉、廖承志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研究方案。会见结束后，刘少奇立即致电在莫斯科的毛泽东，报告胡志明来访情况：“胡志明同志今日已到北京，晚间政治局设宴招待并进行谈话，他作了简单的情况报告并提出了要求。我们除盛赞越南抗战成绩外，对他们的要求均给以满意的答复”，“他离开工作已有一个月，赤足步行十七天才进入中国地界。他年已六十，身体瘦削，但尚健康”。^① 由于胡志明提出要去苏联会见斯大林和毛泽东，刘少奇迅速安排他在二月三日晚乘火车去莫斯科。

这以后，根据中央领导的分工，向越南人民的抗法斗争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的工作，由刘少奇直接负责。三月十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党内指示，说明：我们在革命胜利以后，应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② 本着这一精神，刘少奇指示和协调国内各有关方面，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支援越南人民抗击法帝国主义的斗争。他一再要求有关部门：所调武器必须是合用的，所配干部必须是条件好的。一九五〇年三月，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正式通知罗贵波组成援越顾问团，任命罗贵波为团长。后来，中共中央又陆续加派陈赓、韦国清、乔晓光等一批高级干部赴越南，帮助越共中央训练部队、指挥战役和开始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成立，有关援助越南的具体工作由中联部直接办理，但每一项较为重要的决策与工作，仍在刘少奇的关心和指导下进行。

在毛泽东、周恩来出访苏联期间，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胜利进军，肃清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军队。刘少奇在一九四

^① 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30日，手稿。

^② 中共中央致西南局、中南局、华南分局、陈赓、宋任穷等电，1950年3月14日，手稿。

九年十二月八日为中央军委起草命令：“两广战役即将结束，陈赓所部休息十天至半个月，然后进兵云南，解放云南。”^①第二天，原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宣布起义。十五日，刘少奇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同意他们用前线将领名义批准成立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并任命各将领。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四日，他又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进军西藏和有关问题的指示。但这时就全国来说，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的主要任务。其中，在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是最重要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不做好，恢复经济和发展生产都无法从根本上得到实现。

土地改革的工作，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历来由刘少奇分管。一九五〇年一月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指示，根据各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新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的步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陕西、甘肃十一省应该准备在一九五〇年秋后分配土地。在宁夏、青海两省完全汉人居住的地区亦须准备秋收后进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及汉人与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则不进行。在贵州、云南、西康则在一九五〇年还不能进行土地改革，一九五一年秋后来进行。”^②

一月十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回电：“一月四日中央发各中央局关于土改及征粮等项工作的指示很好。请你们考虑可否要各中央局将此项指示电转发给各省委研究，并要各省委向中央局及中央表示自己的意见。这些电报收到后，由你汇编告我。”^③十一

①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致林彪、谭政、刘伯承、邓小平并告陈赓电，1949年12月8日。

② 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和征收公粮的指示，1950年1月4日，手稿。

③ 毛泽东致刘少奇电，1950年1月10日。

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指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一月四日中央发给你们关于土改与征粮等项工作的长电，请你们转发各省委研究。”^①

土地改革是一场剧烈的社会变革，新解放区又占全国人口的一多半，所以刘少奇对新区土改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经过广泛征求意见，他在二月十二日重新起草了《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对一月四日中央指示中提出的步骤作了若干调整。新的《指示》规定：一九五〇年秋收以后，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陕西九省和甘肃、宁夏、青海三省的汉人地区，凡是准备工作已经充足、群众的觉悟与组织已达应有水平的地区，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开始实行分配土地的改革；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绥远六省，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由各省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新疆和全国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以及少数民族与汉人杂居的地区，则在一九五一年秋收以后另行决定；所有新解放区，在实行分配土地之前，应一律实行减租。刘少奇将这个新指示电请在莫斯科的毛泽东、周恩来审阅。十七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同意。随后，刘少奇又召集各党派人士协商。经政务院第二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后，《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和征收公粮的指示》于二月二十八日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名义发出。

三月四日，毛泽东、周恩来从苏联回到北京。中共中央又就新区土改的政策进行反复讨论并征询党内外人士的意见，最后确定了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四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在北京庆祝五一劳动节大会上的演说中公开宣布：今后的土地改革“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②

^① 中共中央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电，1950年1月11日，手稿。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2页。

此后，刘少奇以主要精力，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和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作的关于土地改革工作的报告。

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至九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土地改革的完成是获得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首要条件。刘少奇在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的报告，提出这次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总路线和关于富农土地问题、债务问题、人民法庭问题等方面的方针政策，经会议通过。全会还决定成立由刘少奇负责，彭德怀、习仲勋、王震、刘伯承、邓子恢、黄克诚等参加的中央土地改革委员会，负责审定有关土地改革的文件，指导全国的土地改革工作。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刘少奇主张不能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做法。六月十三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指示，指出：“关于各地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改革，特别是有关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土地制度、租息制度、婚姻制度的改革等，必须从缓提出。”“必须严格防止机械搬用汉人地区的工作经验和口号，必须严格禁止以命令主义的方式在少数民族中去推行汉人地区所实行的各种政策。”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不久，在北京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二次会议，中心议题就是土地改革。六月十四日会议开幕的当天，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土地改革的伟大意义、基本目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政策。报告分五个部分：一、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二、土地的没收和征收；三、保存富农经济；四、关于分配土地中的若干问题；五、在进行土地改革时若干应该注意的事项。刘少奇在报告中指出：

“土地改革的基本内容，就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

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这样，当作一个阶级来说，就在社会上废除了地主这一个阶级，把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种改革，诚然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一次最大最彻底的改革。”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不是单纯地为了救济穷苦农民，而是为了要使农村生产力从地主阶级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获得解放，以便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①

关于保存富农经济，刘少奇指出：

“我们所采取的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暂时的政策，而是一种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中，都是要保存富农经济的。只有到了这样一种条件成熟，以至在农村中可以大量地采用机器耕种，组织集体农场，实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富农经济的存在，才成为没有必要了，而这是要在相当长远的将来才能做到的。”^②

鉴于老解放区土地改革中曾发生“左”倾错误的教训，刘少奇在报告中特别告诫：

“我们在今后的土地改革中，不能容许混乱现象的发生，不能容许在偏向和混乱现象发生之后很久不加纠正，而必须完全依照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人民政府所颁布的法令及其所决定的方针、政策和步骤，有领导地、有计划地、有秩序地去进行。因为我们今后的土地改革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土地改革，只有这样，才能符合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③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2、34页。

^{②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0—41、31页。

六月二十日，刘少奇又在会上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起草、修改情况的说明报告。二十二日，他就会议对土地改革问题的讨论作了结论。会议通过了刘少奇的报告和中共中央建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草案）》。六月三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经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后公布施行，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这样，从一九五〇年秋后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分批分期陆续展开。

刘少奇清楚地看到：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是土地改革中“可以引起各种错误的一个关键问题”^①。因此，他对这个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土地改革开始前的一九五〇年七月下旬，刘少奇就主持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它是以一九三三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作出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改革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为基础，根据新的情况加以补充后制定的。八月四日，政务院第四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了这一决定，并于八月二十日公布施行，为土地改革中正确划分阶级成分提供了明确的政策依据。刘少奇十分注意运动发展中出现的动向。十二月二十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中南局并告华东局、西北局、西南局电，说：“我们基本上同意你们发这样一个指示，着重纠正土改中的右倾偏向，以便发动广大群众进行土地改革。但在指示中还应增加一些防止‘左’倾危险的指示，指出那些‘左’的错误是不允许再犯的，例如侵犯中农利益，忽视联合中农的重要性，破坏富农经济，对地主普遍地扫地出门，乱打乱杀，在工作方式上的强迫命令、大轰大嗡等。如此，才能一方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转发华东局批转浙江省委关于纠正错划阶级现象的指示上的批语，1951年1月22日，手稿。

面既放手发动群众，另一方面又不犯或少犯‘左’的错误。”一九五一年二月下旬，根据几个月来土地改革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刘少奇又领导制定了《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补充规定（草案）》，对各种政策界限作出更加清晰的规定，使这一工作更具可操作性，避免发生以往在土地改革中曾出现的一些偏向。

刘少奇的姐姐刘绍懿在土改中被定为地主，写信给刘少奇。刘少奇复信说：“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人家说你们剥削了别人，那是对的，你们过去是剥削了别人。”“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①

由于这项工作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由于实行了保存富农经济等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政策，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很顺利。在全国范围内，新老解放区的人数达三亿多的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摆脱了原先要向地主每年缴纳约七百亿斤粮食的繁重地租，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土地改革后的农村出现了“贫雇农得地开心，中农有利放心，富农不动定心，地主劳动回心”的喜人景象。到一九五二年冬、一九五三年春，广大新解放区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外，如期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务。这一历史性任务的胜利完成，彻底消灭了延续两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使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贫苦农民翻了身，得到他们多少年来渴望获得的土地。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它加强了工农联盟，并为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证。刘少奇在这项工作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① 刘少奇给刘绍懿的信，1950年5月2日，手稿。

国民党政府在逃离大陆时，遗留下大批残余力量和特务、间谍分子。这些反动分子，有的结成土匪武装同人民政权直接对抗，有的进行暗杀、放火、抢劫以至聚众骚乱，使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难以得到保障。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有些地区这种破坏活动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此外，在各地还有许多过去长期骑在老百姓头上的恶霸、流氓、封建把头等仍在继续为非作歹。不把这些恶势力打下去，人民便不能扬眉吐气，感到自己真正翻身做了主人。

一九五〇年三月十八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最近各新解放区的股匪有许多地区业已肃清，另有许多地区的股匪则正在清剿中。但在股匪业已肃清地区，又发生多次反革命的武装暴动，杀害我们干部多人，抢劫甚多公粮和物资，并在各地工厂、仓库、铁路和轮船上进行了多次的破坏。这证明在这些地区反革命分子的活动仍是十分猖獗的，而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亦给了反革命分子以造谣和鼓动群众的机会。对于这些反革命活动，各地必须给以严厉的及时的镇压，决不能过分宽容，让其猖獗。”“对于一切手持武器，聚众暴动，向我公共机关和干部进攻，抢劫仓库物资之匪众，必须给以坚决的镇压和剿灭，不得稍有犹豫。”指示要求在“镇压反革命活动和土匪的行动中，决不应发生乱打乱杀、错打错杀的现象。此事应由各省委、省政府的负责同志亲自掌握”。^①

经过严厉打击，各地土匪、特务、流氓、恶霸等的活动有所收敛。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他们产生错觉，以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反攻倒算的活动再度猖獗起来。一九五〇年七月和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

^① 《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1950年3月18日，手稿。

示。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在此期间，刘少奇以很大一部分精力来抓这项工作。他及时答复各地的请示，批转介绍这方面斗争经验的报告，指导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健康发展。十月十九日，他批复中共中央西北局上报的《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工作指示》：

“一贯道及其他类似的秘密迷信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固然是人民生活的痛苦和文化的落后，但它们在最近迅速发展及其活动的猖獗（已有许多暴乱及反动谣言宣传），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和特务反革命分子的活动和我们的麻痹，我们放任其自由发展和活动，没有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所以他们的活动越来越猖獗。我们应该迅速纠正这种错误，进行正面的有系统的反对一贯道的斗争。”^①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电报，答复西北局：

“你们应即在军区军分区及各城市军管会与剿匪司令部下组织军事法庭，在减租土改地区组织人民法庭。凡土匪、特务、反革命案犯，在军事管制时期，经军事法庭判决执行，在内部经省委或地委批准后，即可执行。”“在城市中的反革命亦可大杀几批，才能压下反革命气焰，鼓励群众的情绪。应告诉我们的干部，对反革命的坚决镇压，只要我们不杀错办错，是完全符合最大多数人民利益的，理直气壮的，不要怕民主人士有什么批评和不满。”^②

^① 刘少奇对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开展反对一贯道活动的工作指示》的批示，1950年10月19日，手稿。

^② 中共中央致西北局电，1951年2月7日，手稿。

为了使镇压反革命运动有法可依，一九五一年初，刘少奇主持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一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说：“惩治反革命条例，已经多次讨论修改，我看可以发布了。请审阅。”“但审判反革命罪犯仍以照现在办法归各地军事法庭为好，有些地方无军事法庭组织者，可立即组织起来，故人民革命法庭可以不组织，亦很难组织起来，组织起来后审判案件也很麻烦，各地一下转不过来，不能应付目前情况，故以军事法庭审判来得简单有力。”^①当天，毛泽东批示：“此件关涉军事及法院权限，应由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开一次会通过，并用主席名义公布。”二月二十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这个条例。第二天，正式公布。这个条例根据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规定了处理反革命分子的原则和方法，使这场全国规模的斗争有了可以依据的法律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随着《惩治反革命条例》的公布和《人民日报》发表《镇压反革命必须大张旗鼓》等社论，运动很快进入高潮。一九五一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适时地指导公安部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将运动转入清理积案阶段。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到会讲话，总结镇压反革命运动以来的成绩，并针对一些地区发生的工作草率和“左”的倾向，指示镇反工作现在要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精力处理积案。会议最后确定，从一九五一年六月到九月的四个月内，全国各地一律停止捕人（现行犯除外），集中清理积案。到一九五一年十月，镇压反革命斗争作为全国性的运动基本结束。中国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被镇压下去，社会秩序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安定局面，使人民能够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从而大大巩固了人民政权，保证了恢复经济、抗美援朝、土地改

^① 刘少奇给毛泽东的信，1951年1月28日。

革的顺利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许多党员干部手里掌握了很大的权力。有些人还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诱惑。这种环境和地位的重大变化，给党的建设带来新的考验。刘少奇一直特别重视党的建设，并且在党中央领导层中分管这方面的工作。建国前夕，他就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曾说：

“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唐太宗曾与魏徵争论过一个问题：创业难呢，还是守成难呢？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①

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对革命胜利后党的自身建设所面临的新问题，作了清醒的估计。毛泽东在会上正确地提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② 根据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刘少奇在建国后认真地研究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解决这一问题。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1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38页。

一九五〇年二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组织部关于一些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的恶劣作风的情况报告上批示：“对于以上较为严重的事件，应交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及人民监察委员会加以调查，弄清事实，并给以处分（须本人到场）。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些处理的事件在报纸上公布，在群众中树立党与政府的纪律的威望，而不要把这些隐蔽起来。”^① 四月十九日，刘少奇修改、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并加写了这样一段话：

“如果我们对于我们党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经济机关和群众团体的缺点和错误不能公开地及时地在全党和广大人民中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就要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由于这样的原因，中共中央特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②

尽管中共中央对端正党风采取了若干措施，但一些危险的倾向还是很快出现了。由于党的队伍急速扩大，新党员数以百万计，其中不少人思想作风不纯，甚至混进了少数投机分子和坏分子。同时，在一些老党员、老干部中，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和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甚至贪污腐化现象也在滋长蔓延。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极为重视，于五月一日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一九五〇年夏秋冬三季，结合各项工作，在全党全军中开展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以整顿全党首先是党的干部的作风。主要方式是，阅读若干指定文件，评定工作，分

^① 刘少奇在中共天津市委关于一些干部中发生贪污腐化、欺压群众的恶劣作风的情况报告上的批示，1950年2月7日，手稿。

^② 《中共中央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决定》，1950年4月19日。

析情况，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次整风到同年冬季基本结束。运动收到一定成效，使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得到遏制。但由于这次整风时间短，而且重点在解决各级领导机关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因此党的基层组织中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共中央召开有各中央局负责人参加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对整党建党问题也进行了讨论。会议决定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一次整党运动，首先用一年时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

三月二十八日至四月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贯彻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整党建党的决定。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会上作报告，全面分析党的状况。他在报告中作出“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论断，指出：“我们党经过了三十年来伟大的、艰苦卓绝的和复杂的革命斗争，已经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①同时，他又指出，党内还存在着问题，有些地方还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一部分党员不完全具备党员条件或有严重毛病或丧失了党员条件，甚至还混进了一些坏分子。因此，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是完全必要的。根据党章和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刘少奇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

（一）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

^① 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51年3月28日。

(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

(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

(四)“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

(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

(六)“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

(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

(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①

四月九日,刘少奇又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作题为《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总结报告,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的问题。他说:“由于中国革命已经胜利,新的更伟大更艰苦的革命任务已经被提了出来,因此,今后共产党员必须比过去具有更高的条件,才能担负这些任务,否则,是不能担负这些任务的。这也要求我们必须更加提高党员的条件。”^② 对党的队伍中存在的思想不纯和组织不纯的情况,刘少奇具体阐述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2—64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9页。

了整顿党的基层组织、提高共产党员的条件等问题，要求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一次普遍的整理，对所有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

会议通过《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把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作为整党中对党员进行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指出这“是每个共产党员所应该和必须具有的条件”。这就向全党说明了在革命取得胜利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五月初，中共中央将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两个决议和刘少奇在会上的总结报告转发全党，要求立即传达并贯彻执行。整党工作随即在全党有计划、有步骤地展开。

这次整党，是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发动“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后，整党工作和“三反”运动结合进行，取得很好的成效，为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创造和积累了经验。

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开完后不久，五月上旬起，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党在宣传工作方面也遇到许多新课题。尤其在开国初社会情况复杂、思想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党的宣传工作应该怎么做，任务是什么，机构怎样设置，这些都还缺乏经验。五月七日和二十三日，刘少奇两次在会议上作报告，全面地论述了这些问题。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一方面在广大的范围内宣传了马列主义，使马列主义的原理通俗化，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另一方面在极为深刻的意义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理论，在马列主义总武器库中增加了不少新的武器。他提出：在当前的新形势、新条件下，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用马

列主义的思想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教育人民”。^① 宣传工作可以分为两项：一项是当前工作、时事政策的宣传，一项是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宣传。要建立经常的宣传机构和工作，注意思想斗争，反对自由主义。

中共第一次宣传工作会议开得很有成效。党的宣传部门和广大宣传工作者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认清了方向。随着会议精神的贯彻，各级党的组织进一步健全宣传机构，建立起一套相应的制度。经常性的宣传工作很快开展起来，全党的宣传工作出现了新的面貌。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82页。

二十六、探索新中国建设道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到共和国缔造者们的面前。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应该怎样进行建设，走怎样一条道路，这是一个没有现成经验可以搬用的全新的课题。特别当它开始时更需要从各种角度作多方面的设想和探索。刘少奇是一个十分重视理论思考，而又有独立见解的人。他在建国前就已开始思考并尝试设计新中国的建设蓝图。建国后，他更从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扎扎实实地钻研经济工作。建国初的头两年内，他围绕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道路，从宏观方面到具体的某一侧面，深入地进行探索，写下多篇文章，发表很多讲话，阐述他的思路，指导实际工作。

刘少奇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应该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一切工作都应当围绕这个中心并为它服务。早在建国前夕他就斩钉截铁地说：

“今后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恢复与发展中国的经济。”^①

“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经济建设的任务就不变。二十年甚至于三十年不爆发战争，我们的任务就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26页。

一直是经济建设，要把中国工业化。”^①

一九五〇年，刘少奇写了一篇题为《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手稿，指出人民最大的要求是提高生活水平，这应该是党和政府的最基本的任务。手稿劈头就说：“直到现在，中国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和世界许多先进国家比较起来，还是很低的。他们还很穷困，他们迫切地需要提高生活水平，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这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力求实现的最基本的任务。”他接着写道：怎样才能使中国劳动人民从穷困、痛苦和被侮辱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并不断地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使他们能够过富裕的和有文化的生活呢？这就必须做好两件最基本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推翻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中国，在城市和农村中解放已有的生产力。这件事已经基本上做好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利用已经建立并且巩固起来的人民民主专政作为主要的工具，并利用其他各种条件，来发展一切有益于人民的生产及其他经济事业。他写道：“只有做好了第一件事情，才有可能做好第二件事情。当着我们去做好第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的目的就是为要要做好第二件事情。”“如果我们在做好第一件事情之后，不能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没有什么大的意义了，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②

以后，他又在许多场合强调这个问题。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参加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讲话中说：“经济建设现已成为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中心任务。”“我们的基本口号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8月28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4页。

是：民主化与工业化！”^① 七月五日，他为了给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的学员讲课，写了一份详细的提纲，又强调：“在建设时期，除开必要的国防外，一切工作和其他建设均配合经济建设，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②

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刘少奇主张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建设，使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国家要集中资金、人力、财力发展国营经济，国营经济比重会增大，作用也增大，主要是领导作用、控制作用越来越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从绝对数字讲也要增大，但比重会降低，作用也在缩小；农业要发展，手工业要发展，并要更多地组织起来。总之，“五种经济都发展，但比重变了，作用变了”。他把这段过程称作“新民主主义阶段”，认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是过渡阶段也是准备阶段，即准备进入社会主义。”^③ 这个阶段需要多长时间？刘少奇在一九五一年七月写的一份提纲手稿中说：“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段时间，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④

刘少奇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应当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他认为：“采取进入社会主义的步骤，第一步是实行工业国有化，就是将私人工业收归国有。”“再进行一个时期的建设，国有化更巩固、更发展了，就可以进一步采取农业集体化步骤。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0页。

②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18页。

③ 《刘少奇论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08、214页。

④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19页。

这是进一步的社会主义步骤，即在乡村里也实行社会主义，废除乡村中的富农阶级和城市中的小资产阶级，普遍在乡村里组织集体农庄。”“进入社会主义主要是这两步：工业国有化，农业集体化。”^①他当时的设想是：等到具备一定的经济基础后，再通过国家引导、经济竞争、赎买等和平手段，有步骤地进入社会主义。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说：

“现在就有人讲社会主义，我说这是讲早了，至少是早讲了十年。当然，作为理论和理想，我们做宣传工作还要讲，而作为实践的问题，十年建设之内社会主义是讲不到的。十年以后建设得很好，那时我们看情况，就可以提一提这个问题：社会主义什么时候搞呀？但是还要看实际情况才能答复这个问题。”^②

刘少奇提出：“中国实行社会主义至少需要十年二十年以后。”“如果目前即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对人民是无益的。伤害私人工业生产的积极性，无疑地是破坏着目前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③因此，他几次明确提出：“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④，“我们在今天是五种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将来是要搞社会主义”。^⑤

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这些设想，和毛泽东在同一年期间发表的意见是大体一致的。后来，毛泽东根据形势的发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0、212、214页。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82页。

③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民主人士学习座谈会上的讲话》，1951年5月13日。

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62页。

⑤ 刘少奇在政协全国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11月4日。

展，在一九五二年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转变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刘少奇完全赞同毛泽东这一新的思想，并在同年十月访苏时详细论述了“中国怎样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①的具体内容。

对中国经济建设的步骤，刘少奇也从宏观上作了研究。他说：“经济建设要有步骤，先搞什么，后搞什么，总要有个先后轻重。”^②在一九五〇年的《国家的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篇手稿中，他初步论述了这个问题。认为：“在恢复中国的经济并尽可能发挥已有的生产能力之后，第一步发展经济的计划，应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为重心。”一九五一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中，他就讲得更具体了：“经济建设步骤——首先恢复农业及一切可能恢复的工业；其次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以及少数必要的重工业；然后发展重工业；然后倚靠已经建立起来的重工业，进一步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③

在刘少奇提出的经济建设步骤中，把农业摆在第一位。他的理由是：“农业是工业的基础，农村是工业的市场，依靠农业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依靠农业积累资金。所以我们要先发展农业。”^④

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农民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所以，刘少奇思考中国经济建设方略时，对

① 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苏联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1952年10月20日。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03页。

③ 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历史任务》，《党的文献》1989年第6期，第18页。

④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04—205页。

如何发展农村生产力、稳妥地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开国初，中国农村存在着两种情况：在大约一亿人口的老解放区，土地改革已经完成，农村经济开始得到恢复和发展；在人口更多的新解放区和待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剥削仍保留着。对新解放区，要逐步开展征收公粮、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对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老解放区，应该采取什么政策呢？

老解放区，东北的情况具有典型性。东北全境解放较早，大部分农村在一九四八年就完成了土地改革。大多数分得土地的农民经过辛勤耕耘，生活得到改善，并不同程度地扩大了生产规模。其中一小部分人还购进了少量土地或拥有少量雇工。怎样对待农民这种要求发家致富的积极性？是加以限制，还是让它发展一段，以提高农村生产力？这是党的农村政策必须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党的领导层中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主张现在就加以限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他在东北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提出：“必须使绝大多数农民‘由个体逐步地向集体方面发展’。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①十二月三十一日，东北局组织部作出《农村支部工作指示》说：“应当教育党员，积极参加变工组，大量在合作社入股，搞好变工组与合作社，是农村党员的基本任务。批评某些党员只想个人发财，不管多数群众贫困，甚至想剥削别人的富农思想。”^②

刘少奇认为现在是新民主主义阶段，应该鼓励老区农民劳动致富，充分发挥他们的个体积极性，以提高农村生产力。一九五

^① 《新华月报》第1卷，第4期。

^② 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1949年12月31日。

○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了批复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向刘少奇请示。刘少奇对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等谈了他的意见，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副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现在东北，应该使这种中农得到大量的发展。”“因此现在限制单干是过早的，现在能够单干是很好的。”“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①

当时中共中央正酝酿在新解放区土地改革中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为了稳定农村形势，刘少奇认为对老区出现的少量新富农要采取慎重的态度。他在一月二十三日同安子文等的谈话中提出：“富农雇人多，买了马，不要限制他，现在要让他发展，没有坏处，这不是自流。将来我们对富农有办法，让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将来再予以限制，三五年之后再予以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②

根据刘少奇的意见，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答复东北局，批评了东北局组织部《农村支部工作指示》中的一些提法。高岗对这件事十分不满。

到一九五一年，党内对老区的农村政策又发生了一场重要争论。这年四月，中共山西省委向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写了一份《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一些新的看法。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如搞不好，会有二个结果：一个是使互助组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2、154、155页。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54页。

涣散解体；一个是使互助组变成富农的‘庄园’。”报告主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当是逐步地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①。

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为了慎重起见，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先后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明确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七月三日，他对山西省委的报告写下这样一段批语：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②

在写这个批语的前后，刘少奇几次发表讲话，进一步阐述反对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一九五一年五月七日，他在中共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说：“靠十家八家组织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走到社会主义去是不可能的。如果相信这个理论，就是幻想的社会主义，就是空想的社会主义，也叫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它是实现不了的。我们中国的党内有很多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要纠正。因为仅仅依靠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

① 中共山西省委：《把老区的互助组织提高一步》，1951年4月17日。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2页。

业社会化要依靠工业。”^①

刘少奇认为，土地改革后农村小生产者的自发力量是不可避免、不能阻止的，也是不可怕的。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使农业生产提高，农村生产发展，另一方面使农村重新发生阶级分化，少数人变成富农，一部分农民重新破产变成贫雇农。”^②那么是不是任其自流呢？刘少奇回答说：“不是，而是要加以适当的领导，适当的控制”。他提出四条办法：“第一，用现有的互助组，帮助农民组织起来，使他们不破产，使自发势力带一点组织性。”“第二，国家贸易与合作社从商业价格政策上领导农民，限制富农，控制小生产者，使农民的自发性有些限制。”“第三，国家在税收政策上的限制。”“第四，农村中组织工会。”^③刘少奇这样设想土地改革后中国农村的发展方向：

“土改后，一方面是广大的自发势力、富农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工会、党的政治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发展。两种潮流同时发展，其中有斗争，最后要依靠国家领导，只要共产党人的脑筋不糊涂，就能保证社会主义的胜利，而不是自发势力的胜利。”^④

毛泽东知道刘少奇批评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和谈话后，把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找去，明确表示他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而不支持刘少奇等人的意见。随后，毛泽东要陈伯达在一九五一年九月召开第一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把这个决议草案批转全党，要求各级党委“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互助合作运动由此在全国农村逐渐大步地开展起来。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83页。

^{②③④}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18、221—222、222页。

无疑，毛泽东、刘少奇都主张要逐步引导个体农民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对这个根本目标，他们的看法是一致的。区别只在于：对老区的互助组织目前应该采取怎样的步骤。毛泽东认为现在就可以把互助组织提高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则认为现在不要去动摇互助组织的私有基础，让农民的个体经济积极性发挥出来，等农村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再采取社会主义步骤。到一九五一年秋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时，刘少奇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意见。后来他谈到这一思想变化时说：

“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对我国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要实行农业集体化，对于这个基本方向，我是没有怀疑过的。因此，我主张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要经常地向农民说明：仅仅实行土地改革还不能最后地解放农民，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使农民最后地获得解放，免于贫困并富裕起来。在目前要广泛地发展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要限制富农经济，对于这些，我的观点都是明确的。但是，我有过一种想法，就是我以为还要等一个时候才能在我国农村中大量地、普遍地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而没有想到立即就可以大量地组织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并由此逐步地发展到完全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即集体农场。同时，在目前的劳动互助组与将来的集体农场之间没有抓住以土地入股的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组织形式，作为由互助组过渡到集体农场的十分重要的中间过渡形式，因而，就以为互助组不能过渡到集体农场，而把二者看成在组织上是没有多少联系的两回事。”

“在一九五一年秋，中央讨论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后，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得到了纠正，我也就抛弃

了这种想法。”^①

共产党在掌握全国政权后，怎样领导亿万农民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刘少奇认为不能用行政手段和强迫命令，而应该采取为广大农民所乐意接受的恰当形式。他说：“合作社这一个组织形式，是无产阶级及其所领导的国家去帮助、教育、组织与改造千千万万的小生产者最主要的形式。”^②“在老区已使合作社经济开始成为我国人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的发展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在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的帮助之下，它将在长期的不断教育中引导我国数万万独立的小生产者走上社会主义的轨道。”^③

合作社大体上分为流通、生产两大类：前者包括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后者包括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等。刘少奇特别重视农村供销合作社在现阶段的作用。他认为：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目的，首先是农民自愿地将自己当作消费者联合起来，凑合资金，建立自己的商业组织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日常消费品，并购买生产资料，同时推销自己所生产的多余农产品及其他副业产品。他认为：这种组织对教育并引导农民自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有着重要作用。刘少奇的设想是，农村在完成土地改革以后，可以先发展低级形式的劳动互助组 and 小型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尤其是发展群众易于接受的供销合作社，让农民休养生息一段时间，然后再逐步引导农民组织类似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生产合作社。因此在建国初期，刘少奇把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放在优先和重要的地位，花了很大力量，从理论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54年2月10日。

^{②③}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1、100页。

上和实践中对这项工作作了具体细致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设立了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各省、市、县也相应地设立了合作社管理机构。但由于缺乏经验，合作社在实际上发展不快，办得并不顺利。到一九五〇年七月，基层合作社在城市只有三千六百多个，农村只有三万四千多个，而且“一般还没有走上正轨。好的合作社，合乎要求标准的合作社，只有一小部分，大部分还不合标准，不能及格”。^①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〇年七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

会议期间，刘少奇在七月二十一日召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秘书长薛暮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合作事业管理局局长孟用潜以及出席会议的各大行政区负责人座谈，讨论怎样使合作社走上正轨。他提出：“目前主要是搞供销、消费、生产及特种合作社。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哪一方面工作需要就办哪一种合作社，不必提以供销合作社为主。要使合作社走向巩固，走上轨道，必须制定合作社法，扩大宣传工作，但主要是国家贸易公司、银行、税收机关要帮助合作社。”^②刘少奇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很重视，亲自为《合作社法（草案）》起草了总则部分，提出：“合作社是劳动人民群众自愿联合，保护自己正当利益的经济组织，各类合作社不得违反自己的目的去追逐高额的利润。”

七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到全国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解放区和新中国成立以来合作社事业的经验，阐述了合作社性质、作用和工作方针。他提出：“目前主要应办三类合作社：（一）在工人和城市劳动人民中组织消费合作社，（二）在

^{①②}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73、69页。

农民中组织供销合作社，（三）在城市和乡村独立生产的手工业者及家庭手工业者中组织手工业生产合作社。”^①刘少奇说：合作社既区别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又不同于社会主义经济，其性质是半社会主义的，是国家经济的同盟者；中国现代工业生产占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很小，绝大部分是小生产，合作社能把小生产者组织起来，“因此，合作社办好，走上正轨，是我们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关键”。^②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全国合作社工作者第一届代表会议讨论确定了合作社要走上正轨然后发展的方针。会议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并选举产生了它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临时理事会，制定了联合总社章程（草案）。随后，政务院陆续制定出一系列扶助合作社的具体政策。

这次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着重解决合作社在方针政策方面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讨论具体的业务工作。然而，“合作社只讲方针政策，不把业务搞好，不把业务上一系列的问题解决好，要使它走上正轨，仍是不可能的”。^③会后不久，刘少奇又召集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秘书长薛暮桥和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副主任孟用潜、梁耀等研究合作社的业务问题，提出：“合作社是群众工作，又是经济工作。经济工作就是业务工作。”^④他针对合作社经营中的商品多样性、同国营贸易机关的分工、贸易网点设置、资金周转、提高商品规格质量、营业方针等十五个业务问题发表了意见，要求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机关深入下层调查研究，把业务上的一系列问题解决好。

第一届合作社工作者代表会议后，老区的合作社经过整顿逐

^{①②③}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76、80、90页。

^④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0页。

步走上正轨，基本解决了农民的商品流通问题。但在广大的新解放区，由于旧的商业网在战争和土改中已被破坏，而新的尚未建立，农民买难卖难的问题十分突出。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一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在新区农村建立合作社的指示》，提出：“目前在新区除尽力建立国营贸易并组织私商来推销土产外，组织农民群众的合作社来推销土产，已成为迫不及待的一个办法。应放手地普遍地在推销土产的基本要求之下来组织新区农村合作社。”^①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很快建立起一批供销合作社，基本上解决了农民推销土产和购置生产资料等问题。

这段时间内，刘少奇潜心研究合作社问题，接连写出一批有关的文件、文章。他说，列宁给我们留下了《论合作制》；我国合作社的经验已经不少了，应当加以总结，用来指导工作。从一九五一年初起，他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先后写了《为组织广大的合作社经济而斗争》、《关于合作社的若干问题》、《论合作社问题（初稿）》等文章。他还指导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登记办法（草案）》、《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等法规性文件。在这些文章和文件中，刘少奇运用列宁论合作制的基本思想，总结老解放区特别是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创办合作社的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中国发展合作社经济的道路、任务、方针、政策和方法。他反复地论证这样一个观点：

“供销合作社的发展，能够发展全国的物资交流，能够把多数以至全体农民吸收到合作社的组织中来，使合作社成为国营经济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之间密切结合的纽带，使国营经济与合作社能够掌握大量的物资，进

^①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02、103页。

行有组织的贸易，对市场实行决定性的领导，因而就使农民和国家都能在一定限度内避免商人的中间剥削，使全体人民也得到好处。最后，合作社还能在长时期内逐步地教育并引导农民群众自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农村供销合作社在全国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局面。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发展供销合作社组织的任务已经完成，社员接近一亿五千万人。当年供销合作社商品零售额五十点一亿元，占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的三分之一。农民出售农副产品和购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主要依靠供销合作社来进行。

一九五一年秋，毛泽东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提倡在农村推广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刘少奇赞同这个决议草案，并主张要同时继续办好农村供销合作社。他认为不应该提出“生产合作社与供销合作社哪一个重要”这样的问题，因为“商业如果组织得好，就有刺激生产的作用。‘重农轻商’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传统观点，我们不能再有这样的观点了。我们要重视农业、工业，也要重视商业，这三者是有机体的配合，是缺一不可的。”^②

全国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由于过去在相当长时期内党一直主要在农村中活动，同工人的联系相对减弱，这方面的工作也生疏了。刘少奇曾对工人们说：“过去中国共产党是接受了工人阶级的命令上山打游击，今天完成了任务是奉命下山交

^①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38页。

^②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22—23页。

令，回到自己的队伍里来了。”^① 所以，他在进城后对工人问题特别关注。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转发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的报告的批语中提出：“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于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望各中央局、分局及省委区党委和市委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于工会工作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② 刘少奇还要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加强对工人问题的教学和研究。他给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写信说：“马列学院对于工人运动及工厂管理问题的教学情形，不知怎样？应认真地教一教这一门课，因为我们多数党员对于工人中的问题太生疏了，这就使他们不能很好地领导工人群众。”^③

一九五一年五六月间，刘少奇开始集中研究工会工作和工厂管理问题，阅读了大量有关的文件资料。新中国的国营工厂里面和工人当中还有没有矛盾？这种矛盾属于什么性质？应该怎样对待和处理这种矛盾？这些问题都是新问题，在党内又存在着不同看法。这种情况引起刘少奇的思考，力图从理论上作出新的概括。

刘少奇把在这个问题上持有不同意见的文章找来看，还从东北等地调来一批关于工厂情况的文件资料，进行分析研究。他写

① 刘少奇在天津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49年4月28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转发邓子恢关于中南区工会工作报告上的批语，1950年8月4日，手稿。

③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陈伯达、教育长杨献珍的信，1951年6月3日。

了《读邓子恢和高岗两篇文章^①的笔记》，论述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和工会工作的基本任务。值得注意的是，刘少奇在这篇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人民内部的矛盾”这一概念，并指出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道：“什么是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基本矛盾呢？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种矛盾和关系是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因此，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由此可见，矛盾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根本上敌对的不能和解的矛盾；另一类是在根本上非敌对的可以和解的矛盾。我们在观察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清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性质”。^②这篇文章是最早提出和论述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的文献。

刘少奇在这篇文章里还提出：“工会工作必须从普通工人的要求出发，力求实现他们一切合理的能够实现的要求，然后逐步地提高工人人们的觉悟，来实现我们党的要求和目的。”^③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刘少奇十分重视工人的切身利益。一九五一年七月，他代表中共中央批转劳动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在批语中指出：

“工资问题对于工人阶级来说，犹如土地问题对于农民一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问题。如果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不认真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地处理这个问题，而如果不正确地处理工资问题，我们就不能建立与工人阶级的密切联系，就不能取得工人阶级对于我们党的全心全意的支持，就使我们不能依靠工人阶级去

^① 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发表在1950年7月30日《长江日报》上的《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写于1951年4月的《论公营企业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两篇文章。

^{②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93—94、99页。

搞好生产并搞好其他各种工作。”^①

在刘少奇指导下，劳动部主持对全国的企业职工工资进行了调整。通过调整，职工工资水平有较大幅度增长。这次调整工资中确定的实行八级工资制等制度，成为后来很长时间内中国职工工资体系的基本模式。

建国后，鉴于中央领导人长时期来工作过于紧张、身体状况普遍较差，中共中央开始安排领导人轮流外出休假。周恩来在一九五一年五月下旬至七月上旬去大连等地休息。十一月底，刘少奇也动身去南方休假。

自从到中央工作以来，刘少奇除了打仗转移和必要的外出工作，一直没有机会到各地去进行考察。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每回也都是匆匆忙忙地赶路。所以，他想利用这次休假的机会，到一些地方走一走、看一看。十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夫人王光美陪同下离开北京。他们先到天津，参观了正在那里举行的华北物资交流大会，然后沿津浦铁路南下。

刘少奇这次休假前后将近两个月。在这期间，他到了八九个省市。每到一地方，他总要找当地负责人了解情况，视察有代表性的工厂、学校和军事单位，看望一些老同志；还参观了山东曲阜的孔庙、孔林等古迹和雨花台烈士陵园、南湖中共一大会址等革命纪念地。

刘少奇一直很敬仰孙中山。在这次休假中，他参谒了南京中山陵、上海中山故居，又去看望在上海居住的宋庆龄。宋庆龄对刘少奇夫妇的来访非常高兴，亲自煮咖啡招待，并对刘少奇向中山陵献花圈表示感谢。刘少奇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革命家，

^①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李立三《关于调整工资情况的综合报告》的批语，手稿。

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现在实行的新民主主义就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宋庆龄说：“我一直相信，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山先生的主张才能实现。”^①

在上海期间，刘少奇还视察了海军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在一九五〇年刚刚组建起来，刘少奇是第一个去海军部队视察的中央领导人。他乘海军“南昌”号军舰出海，冒着凛冽的寒风，巡视了吴淞口要塞，并为“南昌”舰题词：“为保卫祖国的海岸而奋斗。”

在这次休假中，刘少奇还有一个安排，就是看书。他是个很爱读书的人，但平时紧张繁忙的工作使他抽不出比较完整的时间来学习。这次到南方休假，刘少奇觉得是读书的好机会，从北京动身时把范文澜的著作《中国通史简编》带了出来，到杭州住下后，就开始攻读，常常读得废寝忘食。因此，他在杭州停留的时间最长，差不多有一个月。

一九五二年一月四日，刘少奇离开杭州，在南昌、长沙、武汉作短期停留后，于一月二十四日回到北京。

^①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228页。

二十七、从“三反”、“五反”运动 到过渡时期总路线 的提出

从一九五一年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一场以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主要内容的运动（简称“三反”运动）逐步展开；接着，以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为主要内容的运动（简称“五反”运动）也随之展开。这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为贯彻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的中心任务，在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取得胜利的基础上采取的又一项重大举动。

刘少奇一九五二年一月下旬从南方回到北京后，参与领导“三反”、“五反”运动。

“三反”、“五反”运动是在毛泽东提议和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支持抗美援朝运动的号召。随后，全国各地的爱国增产节约运动蓬勃开展起来。十一月一日，中共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向中央作了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

争的报告。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个报告的批语中明确提出要“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①十二月八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华东局和福建省委并转各中央局、各大军区和志愿军党委的复电中再次提出：“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一样的发动广大群众包括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人士去进行，一样的大张旗鼓去进行”。

“三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针对党内和政府内少数干部中出现贪污受贿等问题而进行的一场反腐败斗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华北局和河北省委揭发出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和原天津专区专员张子善贪污救灾款项的案件，更给全党敲响了警钟。因此，这场运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发现党政干部的贪污往往是同不法资本家暗中行贿、腐蚀拉拢、内外勾结分不开的，还发现一些不法资本家在经营活动中严重偷税漏税，承包国家工程中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以及收买国家干部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违法犯罪活动，甚至有的不法厂商将变质罐头食品、伪劣药品、带菌急救包卖给国家，作为军需物资运往抗美援朝前线，造成一些战士致病、致残、致死。问题的严重程度令人震惊。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三反”运动的同时开展一场“五反”运动，打击不法资本家的违法活动。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五反”运动随之开展起来。

“三反”、“五反”运动开展起来后，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

^①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高岗关于“三反”斗争的报告的批语，1951年11月20日。

关于运动的部署计划、进展情况的汇报、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纷纷报到中央。刘少奇回到北京后，详细看了这些材料，对运动的进程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有了全面的了解，并在逐步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不少重要文件，如转发全国总工会关于“五反”运动中店员工作经验报告的通知、转发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工会“三反”运动报告的批语、转发天津国棉五厂“三反”运动与生产结合的经验批语、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国营工厂“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的批语等。这些文件经毛泽东审阅同意后下发。

毛泽东对刘少奇所做的工作十分满意。三月十五日，他在审阅刘少奇起草的转发上海市委关于国营工厂“三反”运动综合报告后，写信给刘少奇：“你批发的上海市委的综合报告，已阅，很好。嗣后，关于‘三反’、‘五反’各地来报请你多看，需要批转各地参考的，请你负责批转。”

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上半年用主要精力审阅和批转各地报来的报告和材料，对各地的“三反”、“五反”运动进行具体指导。

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刘少奇清楚地看到，进城后的短短几年中，在新的环境中确实有一些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腐化堕落了，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刘少奇深感：应该利用这次运动的机会，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清理和整顿。三月中旬，他在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对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时，加写了一段话：“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因此，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

肃的整理。”^① 他还将各地报来的有关干部贪污腐化材料中的一些典型案例转发全党。

各地报来的有关“三反”、“五反”运动的材料中，有一个情况引起刘少奇的注意，那就是贩毒活动。

二月二十八日，天津铁路管理局党委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反映了在“三反”运动中揭发出铁路系统内部某些职工同社会上不法分子相互勾结，贩运毒品和走私金银的问题，并提出了处理意见。刘少奇在三月二十五日将这份报告批转全国，并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提出：

“各地在铁路‘三反’运动中应切实注意号召职工坦白和暴露贩运毒品和走私金银的情况……关于处理这类分子的办法，天津铁路党委所提办法大体是正确的，但贩运毒品和走私金银应分别处理，不应一律看待，以便能迅速根绝贩运毒品行为。中央将研究处理这类分子的意见，各地如有意见，亦望电报。”

几乎在同一时间，铁道部党组也向中央报告了铁路系统发现走私贩毒的情况。三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审阅这份报告后，又在为中央起草的给各中央局和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批语中写道：“在铁道、交通、邮政等部门应在‘三反’斗争中发动反走私运毒的群众运动，注意破获走私运毒的案件，教育员工爱国守法，造成走私运毒是最可耻行为的风气，建立在‘三反’运动后犯者从严惩治的纪律。”

贩卖和吸食毒品是旧中国遗留的恶习，建国初中央人民政府就严令取缔，颁布了禁烟禁毒令，并曾集中力量进行过打击和清理。但是，没有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毛泽东看到刘少奇批转的

^① 刘少奇对《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对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的修改，1952年3月18日。

贩毒走私材料后，批示由周恩来负责考虑此事。周恩来立刻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这个指示经毛泽东、刘少奇等审阅修改后，在四月十五日下午下发。指示指出：

“‘三反’中，从铁路、航运、邮政、公安、司法、税务等部门，并从很多地区，暴露出为数甚多的国家机关内部人员包庇或勾结奸商、毒贩、流氓，甚至反革命分子贩卖毒品、金银私货的各种罪恶活动，在若干部队工作人员中亦有发现。”“为了根除这种旧社会的恶劣遗毒，在全国范围内有重点地大张旗鼓地发动一次群众性的运动，来一次集中地彻底地扫除，是十分需要的。”

由于禁毒运动涉及的面比较大，需要中央有个部门负责总的统领和协调，五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在征求彭真意见后，写信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陈云等，建议：“禁毒运动虽然主要由各地方党委领导，但各地具体行动仍有许多事情须配合办理。这种配合行动主要由中央公安部负责，另由彭真召集公安、铁道、交通、邮电、海关、内务、卫生等部门，定期汇报处理。中央宣传部亦派人参加。”经毛泽东等同意后，刘少奇按上述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各地的指示。

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准备，公安部决定在七月底、八月初对全国的贩毒活动进行一次集中打击。七月十日，刘少奇为中央起草批语，批准公安部的这个计划。从七月底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一场轰轰烈烈的禁毒运动打响了。刘少奇又多次批转公安部门关于禁毒运动进展情况的简报和对毒犯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导这场禁毒运动的发展。

对禁毒问题的集中处理，收到了显著效果。吸毒贩毒这个在旧中国蔓延流行了一百多年的痼疾，经过短短几个月时间，在社会上销声匿迹了。

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刘少奇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既

要积极领导，又要注意政策，注意不扩大打击面，不影响经济的发展。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它的运动进展情况将对全国其他城市产生重大影响。刘少奇把上海作为工作重点，多次向全党批转上海市委的报告。继三月十四日批转上海市委关于国营工厂“三反”运动的综合报告后，二十一日，刘少奇又批转上海市委关于“五反”运动部署的报告，并根据上海市私营工商企业经营规模比较大的实际情况，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在上海，基本守法户一般规定以违法所得在一千万元^①以下者为标准，是适当的。但有些户营业额颇大，而违法所得虽在一千万元以上，情节不恶劣（例如只有漏税或成本核算稍高，因营业数量大，违法所得超过两千万元），坦白较好者，亦可算作基本守法户，而不要机械规定为违法所得在两千万元以下者。如此，可使基本守法户扩大，可使若干比较规矩的大户亦算作基本守法户，这对团结资产阶级是有好的作用的。”

在“五反”运动中，如何处理好私营企业内部的劳资关系，做到既调动职工和店员的积极性，又不损害守法资本家的利益，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刘少奇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多次提请各级党委重视这个问题，防止出现偏差。同时，他也抓住实际工作中出现的苗头，及时给予指导。

三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党组给中央的关于如何巩固“五反”胜利的报告中，提出在私营企业中要实行民主管理，由劳资双方制定民主管理计划、工人参加管理等意见。刘少奇认为不妥。他在四月一日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指出：“关于在私人企业中工人监督生产问题，中央已有指示，现在只提监督生产和经营，不提参加管理，而且必须在试办成熟、由中央决定之后，才

^① 指旧币，10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1000元。

能普遍推行，不要在各地盲目推行。”

三月三十一日，全国总工会党组在另一份报告中反映了部分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店员在“五反”斗争中提出过高的福利要求，劳动纪律比较松懈。报告要求私营企业的职工和店员在同资本家的不法行为作斗争时也要加强自我教育，防止这两种倾向。刘少奇十分重视并赞同全总党组的意见。他在给李富春和赖若愚的信中建议，就这个问题发一个内部指示，并在报纸上适当地进行宣传。^①

鉴于私营企业劳资关系中陆续出现的问题，刘少奇认为有必要在更大范围内提请各地注意，设法予以解决。四月六日，他就这个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指出：

“各城市在‘五反’运动之后，在劳资关系中发生了许多新的问题，望各地党委注意加以研究和处理，否则，有陷入某种被动状态的可能。为了在‘五反’后新的条件下建立今后相对安定的正确的劳资关系，以利生产和经营的发展，除开工人监督生产问题应即加以研究和试验外，关于工人的生活以及其他的关系问题，应用劳资合同的形式加以规定。这种合同不应设想是把什么都规定上的复杂的形式，而应是实事求是地根据工人若干迫切的要求以及资本家提出的迫切问题，经过双方平等的协商，认为是可以确定者，才加以规定，并由双方代表签字，在以后规定的时间内予以遵守。没有解决的问题，则可留待以后继续协商解决。签订劳资合同，是使劳资关系趋于正常和相对安定的一种基本方式，否则，劳资关系总是动荡不定的，望各地党委注意研究进行并加以掌握。”

^① 刘少奇给李富春和赖若愚的信，1952年4月2日。

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和广泛深入的发动，“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取得很大的成绩。到五月份，运动发展较快的地方，已开始进入对运动中揭发出来的问题定案处理的阶段。但是，各地运动进展情况是不平衡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以急风暴雨的群众运动的形式开展起来的，在它的高潮时期不可避免地会对社会正常经济生活以及城乡经济交流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持续时间过长，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消极作用。中共中央考虑到这个问题，决定在已经取得显著成绩的基础上，尽快缩短运动时间，转入正常的经济建设。五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代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推迟县区乡的“三反”和中小城市的“五反”的指示》，指出：

“由于过去各地‘三反’、‘五反’的影响，使社会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发生了阻滞现象，现在已经进行了‘三反’、‘五反’的地方，正在结束‘三反’、‘五反’，并大力恢复正常的经济生活和城乡交流。对于尚未进行‘三反’的县区乡和尚未进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决定一律推迟进行，即在秋征以前凡未发动‘三反’的县区乡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发动，待今年秋征以后或明年再有步骤地来进行。”“在目前应集中力量做好生产、城乡交流及土改复查等项工作。”

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在六月份进入收尾阶段。十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关于结束“三反”、“五反”运动的两个报告。运动在取得预期效果后宣告结束。

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国的国内形势已发生深刻变化：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大规模土地改革等任务，除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已基本结束；持续了一年多的抗美援朝战争已

进入和谈阶段，并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协议，可望在近期结束；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尽快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在“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指导下，已超过原来设想，在不到三年时间内实现了预定目标；在经济恢复和发展的过程中，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要变化，在五种经济成分都得到发展的基础上，国营经济发展得更快，已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决定，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时，新的形势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在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即将开始大规模建设的形势下，两个问题日益突出出来：一个是农村中大量存在的个体经济很难满足国民经济发展对粮食和其他工业原料的需求，农村中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也使刚刚掌握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人感到担忧；另一个是，建国以来，尽管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一直采取鼓励发展的政策，但经过稳定物价、“五反”运动等几个回合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方面的担忧也在增加。在对这两个问题深感担忧的情况下，尽快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来。

首先提出这个问题的是毛泽东。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三反”、“五反”运动将要结束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刚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汇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毛泽东在会上谈了对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新的设想。他提出：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更丰富了。现在工业中私营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国营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资（本主义）的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

五年以后又会怎么样，要想一想。^①

毛泽东这个新的设想，同党在建国初期所提出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相比较，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建国初期，党在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大体上是这样设想的：先搞一个相当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待工业发展了，国营经济壮大了，再采取重大步骤，实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国有化和农村经济的集体化。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刘少奇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的讲话中说过：“要在中国采取相当严重的社会主义的步骤，还是相当长久的将来的事情。”^②在建国后的最初几年中，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党的会议上和其他场合也多次说过，到底什么时候搞社会主义，估计至少要十年，多则十五年至二十年。而毛泽东这次谈话表明，根据国内形势的发展，这个时间表要提前了。

毛泽东提出的设想，得到刘少奇和其他中央书记处成员的赞同。但由于这个设想刚刚提出，还没有成熟，因此毛泽东表示，此事只是在党内的小范围内议论，不向下传达，同时准备征求苏共中央的意见。

这年十月，苏共中央准备召开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率代表团出席。

刘少奇这次访苏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受毛泽东委托，就中国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件事向苏共中央和斯大林本人征求意见。

出席苏共十九大的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饶漱石、陈毅、李富春、王稼祥、刘长胜等组成，刘少奇任团长。除李富春因参加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1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35页。

中国政府同苏联政府关于援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谈判已在莫斯科外，代表团其他成员和工作人员在九月三十日从北京起飞，十月二日抵达莫斯科。

十月五日，苏共十九大在莫斯科隆重开幕。来自苏联全国各地的两千多名代表以及来自世界四十四个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代表团出席或列席了大会。中共代表团受到很高的礼遇，被安排在大会主席台的第一排就座。八日，刘少奇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宣读了由毛泽东签署的中共中央的祝词。

苏共十九大在十四日闭幕。在闭幕大会上，斯大林发表了热情的演说，并对前来祝贺的各兄弟党代表团表示谢意。

刘少奇在大会召开期间，对大会的内容以及当地新闻报纸的报道都很注意。在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致祝词的第二天，苏联报纸将刘少奇的职务报道成中共中央总书记。刘少奇很快注意到了，在十月九日专门就这件事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写信作了解释：

“今天《真理报》发表我在联共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祝词时，注明我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现在要申明：中共中央现在没有总书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均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席。而我只是中央书记处的书记之一，虽然我对于党内的问题过问得比其他同志稍多一些。中共中央有一个秘书长的职务，这个职务是管理中央本身的行政事务工作的，以前由任弼时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去世后，即由我代理。这个职务和各国兄弟党总书记的职务是不同的。也许翻译同志将我担任的职务和总书记的职务混同起来，以致使你们有这个误会，我现在特向你作这个申明，如果你认为需要的话，并请你转告《真理报》编

辑部的同志。”^①

刘少奇原来准备在苏共十九大闭幕后就同斯大林面谈中国准备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以及其他问题，向苏共中央提出了会见斯大林的要求。由于苏共中央在大会闭幕后紧接着要开全会，再加上斯大林的身体状况等原因，没有能立刻会见刘少奇。大会闭幕后的一天下午，斯大林亲自给刘少奇打来电话，对抽不出时间马上会见刘少奇表示歉意，建议刘少奇稍事休息几天，再安排会见。刘少奇表示理解并同意斯大林的安排。他决定给斯大林写一封信，将中共中央的想法先用书面形式告诉斯大林，为以后的会谈做好准备。

十月二十日，刘少奇写了一封长信，经翻译后送交斯大林。

刘少奇在信中提出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关于中国怎样从现在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他首先介绍了中国工业结构的现状及对未来十年发展状况的预测，指出：中国现在的工业生产总值（不包括手工业），国营已占百分之六十七点三，私人企业只占百分之三十二点七；再过五年，即我们执行了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之后，在工业中国营经济的比重将会有更大的增加，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比重则会缩小到百分之二十以下；再过十年，私人工业会缩小到百分之十以下。私人工业在比重上虽然缩小，但在绝对数上则还会有些发展，因此，多数资本家还会觉得满意，并和政府合作。

基于这种分析，刘少奇谈了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体设想。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他写道：

“在征收资本家的工厂归国家所有时，我们设想在多数的情形下可能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即劝告资本家把工厂献给国家，国家保留资本家消费的财产，分配能工

^① 刘少奇给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的信，1952年10月9日。

作的资本家以工作，保障他们的生活，有特殊情形者，国家还可付给资本家一部分代价。

“我们估计：到那时，中国的资本家可能多数同意在上述条件下把他们的工厂交给国家。为什么会可能是这样呢？因为：

“第一，中国在基本上还是一个资本主义没有发展起来的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论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很软弱的，并且富于妥协。

“第二，我们从现在起就一方面照顾资本家得到不太少的利润，另一方面，我们又动员人民反对资本家各种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违法行为……如此，多数资本家和政府的关系没有破裂，但资本家在政治上已经孤立，在社会上的威信大大降低。无疑问，在今后，严重违法的资本家将会陆续地被处罚，而保留下来的，则将是守法的或比较守法的资本家。

“第三，今天中国比较大一点的私人工厂差不多都是为国家加工订货，他们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成品及银行贷款等。此外，还有工人监督。无疑问，在将来，资本家更是要依赖国家，工人监督也更会有组织。

“第四，现在已有少数比较有远见的资本家看到了社会主义企业的优越性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信社会主义的前途已不可避免，他们现在就积极要求将他们的工厂公私合营……中国资产阶级内部的这种变化现已开始发生，在今后还会继续发展。

“第五，中国社会主义成分的增长，到那时，少数资本家可能完全处在社会主义的包围中，全部工业（手工业除外）国有化的步骤，已经不能抵抗。”

关于个体农业，他写道：

“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现在全国参加这个运动的农民已有百分之四十，在老解放区则有百分之七十到八十，并已有几千个组织得较好的以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几个集体农场。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在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

关于个体手工业，他写道：

“在中国，除开近代工业和农业外，还有广大的手工业。现在手工业的生产量超过机器工业的生产量，人民必需的制成品大部还是由手工业供给的。对于这些手工业，我们准备用力帮助小手工业者组织生产合作社，并鼓励手工作坊主联合起来采用机器生产，还有一部分则会要被机器工业所挤垮。”^①

刘少奇在信的其他部分还谈了何时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问题。

刘少奇在信中谈的不是个人意见，但也不是中共中央的正式决定。他在信的开头就说明： these 问题是受毛泽东的委托提出的。后面又说：“这些问题还没有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讨论过，还只是若干同志的一种设想，并在非正式的谈话中谈论过。”^②可以说，信中所谈的设想，实际上表达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初步设想。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0—243页。

^② 刘少奇给斯大林的信，1952年10月20日手迹底稿。

可以看出，到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已在开始考虑中国如何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但是这些设想还不成熟，还处在探索过程中。至于何时采取这些步骤，并没有确定的时间。正如刘少奇在信中谈到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过渡形式时所说的：“这是我们设想的将来可能的一种工业国有化的方式。至于将来所要采取的具体的方式以及国有化的时机，当然还要看将来的情形来决定。”^①

斯大林收到刘少奇的信后，十分重视。二十四日，他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其他成员。中方参加会见的有陈毅、饶漱石、王稼祥和翻译师哲，苏方参加的有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马林科夫、布尔加宁、贝利亚。

会见时，刘少奇对信中所谈的内容作了简要的补充。斯大林赞同中共中央关于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他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②接着，斯大林还谈了对中国土地国有化、对待富农的政策以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等问题的意见。二十六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详细报告了这次会见的情况。

二十八日，斯大林再次会见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座的除苏共中央主席团部分成员外，还有越南劳动党总书记胡志明。这次会见主要谈了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和制定宪法问题以及越南的国内局势问题。这是斯大林最后一次会见中共领导人。四个月后，他就与世长辞了。

在苏联访问期间，刘少奇的身体状况一直不大好，在莫斯科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42页。

^② 刘少奇给毛泽东并中央的电报，1952年10月26日。

参观时又受凉得了感冒，身体检查中发现血糖等指数也不正常。代表团成员王稼祥的身体也不好，战争年代负的伤时常复发。他们希望利用这次机会在苏联进行检查、治疗和休养，并向中央提出了报告。毛泽东同意他们的报告，并要他们的夫人前去照顾。他在给刘少奇的复电中说：“中央同意你及稼祥同志在苏休养一个月至一个半月，王光美、朱仲丽二同志即去莫斯科。”^①

十一月下旬，刘少奇、王稼祥在莫斯科参加了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三十五周年庆祝活动后，在苏方安排下，同王光美、朱仲丽一起来到苏联南方著名的疗养胜地黑海边休养。十二月中旬，刘少奇接到毛泽东从北京发来的电报，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明年二月五日召开党的代表会议，希望刘少奇能在十二月下旬或明年一月初回国，以便准备开会的议程。刘少奇和王光美便提前结束了在黑海边的休养，在一九五三年一月七日从莫斯科动身回国，十一日回到北京。

斯大林对中共中央关于从现在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设想的赞同，使中共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更加坚定了。从一九五三年上半年起，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以及中央有关部门的领导人更深入更实际地探索如何过渡的问题，以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避免和减少社会震动的有效途径。

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焦点在于解决好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的顺利过渡。这年春天，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带领一个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就资本主义工商业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民主党派的工作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五月，李维汉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出《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和说明性的信件。李维汉在报告中建

^① 毛泽东给刘少奇的电报，1952年10月19日。

议：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变革。他并在报告中详细论述了采取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目前在国内的有利条件和可行性。

对于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纳入国家经济计划的轨道这个问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在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都作过思考。他们对李维汉的报告非常重视。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李维汉，告诉他，这个报告要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①

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李维汉的报告。会议一致同意李维汉在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周恩来在发言中说，我这段时间也在调查寻找对私人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的报告解决了问题”。刘少奇在发言中也认为中央统战部的文件很好，系统地解决了问题。^②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用比较明确的语言表述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③这次会议后，李维汉又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的报告，并传达了毛泽东的讲话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精神在一定范围内传达后，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引起了一些不安，党内一部分人中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疑虑。为了统一党内的认识，中央统战部于六月二十五

^{①②}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742、748页。

^③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6月15日。

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第四次统战工作会议。七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统战工作问题。十八日，刘少奇代表中央到会讲话。他在讲话中再次重申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

“党的总路线、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逐步地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改造，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为了实现这个总路线、总任务，要做很多工作，就是说：要进行很大的工业建设工作；要进行很大的农业合作化工作；要进行手工业合作化的工作；要发展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要采取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主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①

对于为什么要采取国家资本主义这种方式来改造资产阶级，以及采取这种政策在现实中的可能性，他在讲话中针对党内部分人存在的疑虑作了重点论述：

“消灭剥削阶级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采取直接剥夺的方法，我们并不拒绝采用这种方法，我们过去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就是采用这种方法，苏联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是采用这种方法，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消灭剥削阶级也是采用这种方法。另一种是采取逐步改造的方法，也就是统一战线的方法，即经过教育、说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政治上工作上生活上进行安排等等又团结、又斗争的方法，引导那些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或不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资产阶级分子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分化成为两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18—119页。

部分：一部分是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的，使他们跟着我们走到社会主义去；另一部分是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对待坚决反抗的这一部分，应像消灭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那样地消灭他们，好在我们对这种方法是熟练的，这个比较简单，比较容易，不成什么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我们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问题在于有没有别的办法使他们不坚决反抗社会主义改造或服从社会主义改造。他们中间有一部分（可能是一小部分）会坚决反抗，这是一定会有的，如果不估计到这一点，就要犯错误；但是他们中间的另一部分（可能是大部分）由于我们执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而有可能跟着我们走到社会主义，因为这样对于我们和他们都有利，因为我们有政治上的优势和经济上的优势，只要我们的政策是正确的，我们的工作做得好，就会使他们感到跟着我们走对他们也是有利的。因而他们能够服从社会主义改造。”^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党内酝酿，中共中央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法逐步成熟了。一九五三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责成中央宣传部起草《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报送中央后，毛泽东作了修改和审定。年底，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主持批准并向全国转发了这个提纲。提纲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20页。

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提纲下发后，全国掀起了学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高潮。

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代表中央政治局向会议报告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过程和基本内容。十日，刘少奇主持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二十八、高饶事件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当中共中央正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并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关键时刻，党内却发生了高岗、饶漱石阴谋分裂党中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事件。这是建国后党内出现的第一次重大斗争。

这一事件中，高岗、饶漱石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刘少奇，使刘少奇处在这一事件的漩涡中心，经历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高岗曾是显赫一时的人物，他在建国前曾担任过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等重要职务，并在党的七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建国前夕，又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和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二年，中共中央决定加强中央集中领导，调各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到中央工作，高岗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但高岗是一个权欲极重的野心家、阴谋家，他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权力和地位，一直觊觎着党和国家的更高权力。在他看来，刘少奇和周恩来是他攫取更高权力的主要障碍，只要拱倒这两个人，便可取而代之，实现他的目的。于是，他在建国后不

久，便在暗中收集材料，不择手段地散播种种流言蜚语，把进攻的矛头对准刘少奇和周恩来。

刘少奇同高岗在历史上没有很多交往，只有一般工作关系。但由于刘少奇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常对各地工作提出指导和建议，在工作中难免会同各地区负责人产生不同意见。建国前夕和建国初期，在高岗主持东北工作期间，刘少奇曾直率地对东北工作提出过几次批评。这本来是正常的。高岗对此却怀恨在心。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收到中共中央东北局社会部第二部长邹大鹏的一封信，反映东北局在对待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存在着过“左”的倾向。当时，刘少奇刚刚结束天津调查之行，深感这个问题在全党带有一定的普遍性，需要郑重地提出，引起大家的警惕。经过中央研究后，刘少奇在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东北局的电报。电报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问题“是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那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在当天发出。毛泽东同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各中央局，山东分局，平、津、济、沪、汉诸市委，各野战军前委的通知，要求各地“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

刘少奇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关于东北地区变工互助和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以及经他批转的中组部答复东北局的信，也是对高岗等在处理东北农村中一些新问题时表现的“左”的错误倾向提出批评。在那次谈话中，刘少奇针对高岗所主张农村在土改后要立刻起步向社会主义过渡、限制

单干、限制雇工的思想，提出：东北地区建立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变工互助“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在发展变工互助这个问题上“要防止急性病”。^①刘少奇同安子文的谈话，经过整理后送给高岗和东北局少数负责人。高岗对刘少奇的这些批评十分不满，但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当面不说，背后搞了不少小动作。

当一九四九年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出访苏联前夕，高岗曾向当时担任东北铁路系统总顾问的科瓦廖夫造谣说，中国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亲美派”，企图挑拨刘少奇同苏联的关系。^②科瓦廖夫写信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件事。斯大林没有相信高岗的话，并把科瓦廖夫的信转交给了后来访苏的毛泽东。高岗并不甘心，他在随刘少奇访苏回国后又向人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对刘少奇的报告不满意；同时又吹嘘和抬高自己，说斯大林最赏识高岗。^③

这以后发生的几件事，使高岗以为有了机会，更加加紧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攻击。

一件事是建国初期围绕工会工作方针问题发生的争论。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工会作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群众组织，应该怎样在新形势下开展工作？这是建国初期工会工作急迫需要解决的重大方针问题。随着各级和各行业工会的普遍建立，党内一些主管或分管工会工作的负责人开始探讨这个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中南地区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举行扩大会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152—155 页。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311 页。

③ 周恩来在关于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提纲，1954 年 2 月 25 日；高岗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

议，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在会上作了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他鉴于当时中南地区工会工作出现严重脱离工人群众、没有很好维护工人群众利益的问题，提出：在国营企业中，工会工作同志的立场和态度，应该与企业管理人员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在“基本立场是基本一致的”前提下，因为彼此的岗位不同，任务不同，“具体立场又有所不同”。工会不能脱离“代表工人的利益”、“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切身利益”的基本任务，成为厂方的“附属机关”。当厂方某些规定或措施对工人不利时，工会工作者应当反映工人的要求，同厂方商量修改。二十九日，邓子恢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报告了会议情况和报告要点。三十日，中南局机关报《长江日报》全文发表邓子恢的报告。

八月四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批语，批转了邓子恢给毛泽东的报告。批语中说：“这个报告很好。”“工会工作是目前我们党的主要工作之一，但各地党委对工会工作显然注意不够。望照邓子恢同志的做法，在最近三个月内认真地检讨一次工会工作并向中央作一次报告，以便加强各级党委对工会的注意，改善工会工作，是为至要。”这个批语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李立三（当时担任全国总工会主席、党组书记）圈阅后，同邓子恢给毛泽东的报告一起下发。

同一天，《工人日报》全文转载了邓子恢在中南总工会筹委扩大会上的报告，并在编者按语中提出：“希望全国各级工会组织和全国一切工会干部，都要好好学习这个报告，改进自己的工作。”接着，全国总工会发出通知，要求工会干部认真学习邓子恢的报告。九月四日，《人民日报》也全文转载了这个报告。

工会工作也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他在同年十二月三十日转发西北局关于工会工作报告给各中央局、上海北京天津三市委、华南分局并转所属各省市区党委的批语中提出：在一九五一年春季党的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各地要“负责认真地检查一次工会工

作，准备向四中全会作报告”。并且指出：“各地工会工作存在着严重的缺点，而各级党委一般地说来注意得很不够，或者完全没有注意，这是不对的，必须改变这种情况。”

这样，邓子恢在报告中提出的观点，就在领导干部和工会工作者中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

高岗显然不同意邓子恢的观点。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他在东北总工会执委扩大会议的报告中就说过：“党政工一个目的，亲密团结搞生产，切忌对立起来提问题。”

一九五一年四月间，高岗针对邓子恢的报告，主持写出《论公营工厂中行政与工会立场的一致性》一文。这篇文章认为，工会同政府和工厂管理机关“基本立场”一致、“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不对的。这种说法，第一模糊了工人阶级的领导思想及其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地位；第二模糊了国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性质，模糊了国营企业与私营企业的本质区别。文章强调，在国营企业内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关系，因而在国营企业中行政的利益与工人群众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只有分工的不同，没有立场的不同。

这年五月召开的东北城市工作会议上，又有人在发言中批评邓子恢的报告是“机会主义的原则和理论”，“不能以此原则与理论教育工人”。高岗在会议总结中也批评邓子恢的报告“欠妥”，“混淆思想”。

高岗主持写的那篇文章原准备作为《东北日报》社论发表。四月二十二日，高岗把它送给毛泽东审阅，并请示能否在报上发表。二十九日，当时担任毛泽东秘书并负责报刊宣传工作的胡乔木在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给毛泽东的信后，写信给毛泽东和刘少奇，认为“邓子恢同志的说法确有不完善的地方”，但“《东北日报》的文章用正面批驳的方法也不适宜”，邓子恢提出具体立场有所不同的观点“是有原因的”，“工会更应当重视工人的直接

福利，许多工会不重视是不对的，但不要由此得出工会与国营企业和政府的具体立场不同的观点”，“有些工会干部由此而强调与厂方对立，是不对的”。信的最后附言：“此文是否由《东北日报》发表？或由《人民日报》发表较好？亦请斟酌。”

刘少奇看了高岗送来的文章和胡乔木的信。他于五月十日在胡乔木的信上批示：“我意高岗同志文章暂不发表，待四中全会讨论此问题时当面谈清楚。高文可送邓子恢同志一阅。”

五月十六日，刘少奇又为这件事给高岗写信，信中说：“关于工厂与工会立场问题你写的文章，我已看过，已送交主席，可能主席尚未来得及看。我的意见以为四中全会即将开会并要讨论这个问题，子恢同志亦来，可以在那时加以讨论，因此，你的文章暂时以不发表为好。”

刘少奇不赞成立刻在报刊上公开讨论工会工作的方针问题，但这个问题却引起了他的浓厚的理论兴趣。

抓住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从理论的高度加以分析，弄清后用来指导实践，这是刘少奇多年来指导工作的一个特点。在他看到高岗送来的文章后不久，大约在五六月间，写了一份《读邓子恢和高岗同志两篇文章的笔记》。这份笔记近九千字，详细阐述了他对工会工作方针的看法。

刘少奇首先从分析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入手，认为：一切事物的构成都是矛盾的构成，国营工厂的内部结构当然也是如此。在国营工厂内部，阶级矛盾没有了，但矛盾仍然存在，这就是“国营工厂管理机关与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就是国营工厂内部的公私矛盾”，这是一种“不容否认的、客观存在的、真正的矛盾，是在长时期内要我们来认真地加以调整和处理的矛盾”。他把这种矛盾概括为“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在分析了国营工厂的内部矛盾后，他强调指出：“目前在国营工厂中所发生的一切问题，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基本问题上发生出来的，

或与这个基本问题有关系的。”^①

基于这种分析，刘少奇在笔记中又写道：

“工会工作者与国营工厂管理人员，在保护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整个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出发点，他们所站立的位置与立场，是或者应该是相同的、一致的。在这些关涉工人阶级基本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有共同的、一致的立场和出发点。但是，在处理有关双方的各种个别的日常的问题时，他们又各自有自己的出发点，各自站在自己的同对方相矛盾的地位与立场上来协议和调处这些问题，以至各自代表自己的一方面来签订合同等。这就是说，在关涉工人阶级整个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利益和立场是共同的、一致的；但是在关涉双方的各种个别问题上，他们彼此之间又有某些利害矛盾，需要认真地来加以调整。这就是说，在整个的或基本的利益相同的前提之下，又有个别的或部分的利益矛盾。而后一种利益是要服从前一种利益的。”^②

从这些论述来看，刘少奇显然是赞同邓子恢的基本观点的，并且从理论上作了更深入的分析。

刘少奇这份笔记在他生前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也没有给其他领导人传阅过。那么，他写这份笔记的用意何在呢？刘少奇建国初期在党内分管工会工作，并且兼任全国总工会的名誉主席，围绕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在党内高层中发生，并且准备在即将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讨论，看来刘少奇是准备参与这场讨论的。但四中全会因故延期，有关工会工作的讨论暂时搁置起来，后来情况又有新的变化，所以刘少奇这份笔记就一直很少为人所知。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93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95—96页。

情况出现变化是在这年十月以后。十月初，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李立三就党内在工会工作方针上发生的争论向毛泽东写了一份报告，反映在这个问题上的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完全一致的，没有矛盾，甚至认为“公私兼顾”的政策不适用于国营企业；另一种意见认为在国营企业中公私利益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有关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是存有矛盾的，这种矛盾的性质是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协调的方法，即公私兼顾的方法来取得解决。李立三明确表示：“我个人是同意后一种意见的。我觉得公私关系问题，不仅在目前国营企业中，而且在将来社会主义时期各种对内政策问题上也还是一个主要问题，否认‘公私兼顾’的原则可以运用到国营企业中的意见，可能是不妥当的。”

毛泽东不同意李立三的意见，并且尖锐地批评了李立三和他所领导的全总党组，认为在工会工作中有严重错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于十一月解除了李立三全国总工会主席和党组书记的职务，批准成立了由刘少奇、李富春、彭真、赖若愚、李立三、刘宁一组成的全国总工会党组干事会，指导全国总工会的工作。

这年十一月底，经中央批准，刘少奇到南方休假，全总党组干事会实际上由李富春负责。十二月，全总在李富春主持下召开第一次党组扩大会议。会上，李立三受到批判。其中，“推崇”邓子恢的文章成为李立三的“错误”之一，认为他夸大了“公私利益的矛盾”。李立三在会上作了检讨。在这种形势下，邓子恢也于十二月底在中南局会议上就“工会立场”问题作检讨，并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这场关于工会工作方针的争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展开，就结束了。刘少奇无疑也受到牵连。他在一九五四年二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时就说：“我受中央的委托负责管理全国

总工会的工作”，对李立三的错误，“我是应该负一定的责任的”。^①

另一件被高岗看作找到机会的事，是前面说过的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九月间围绕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而发生的那场争论。刘少奇的意见以及经刘少奇修改过的华北局给中央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这以后不久，高岗写了一份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互助合作运动的报告，在十月十四日送给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中，高岗列举东北农村在开展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中的做法和成就，概括了互助合作组织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表示要“继续坚持贯彻毛主席屡次指示的方针，即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积极发展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并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

高岗的报告受到毛泽东的重视。十月十七日，毛泽东将高岗的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等阅，并嘱杨尚昆将高岗的报告“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以及参加当时在北京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人员和参加即将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共产党员。同一天，毛泽东又为转发高岗的报告起草了中央批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和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同时不要轻视和排斥不愿参加这个运动的个体农民。”

还有一件事是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对“新税制”的批评以及由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1954年2月10日。

此发生的对中央政府领导分工的调整。

“新税制”，是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颁布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试行办法》，其中规定：“应税货物，一律按国营公司批发价核税；加工，定货，包销者同。”在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提出“公私一律平等纳税”。新税制公布后，在全国特别是公有企业中引起了波动。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当时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当时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兼财政部部长）的信中对新税制提出批评，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要求主管机关在研究处理意见后上报中央。这以后，毛泽东又进一步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认为政府工作中存在着分散主义。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三年三月十日作出《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其中规定：

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应即撤销，政务院各委的党组组织和直属政务院的其他部门，直接接受中央领导。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

导。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的责任。

决定还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重新作了分工，新的分工如下：

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

政法工作（包括公安、检察和法院工作），由董必武、彭真、罗瑞卿负责；

财经工作，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李富春、曾山、贾拓夫、叶季壮负责；

文教工作，由习仲勋负责；

外交工作（包括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文化联络和侨务工作），由周恩来负责；

其他不属于前述五个范围的工作（包括监察、民族、人事工作等），由邓小平负责。

以后，政务院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又在五月十五日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对中央人民政府所属的财政经济部门的工作领导重新作了分工，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把政务院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部，即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程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由国家计委主席高岗领导。

建国以来，政府工作一直是由政务院总理兼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书记周恩来负责的。显然，中央的决定和政府工作的重新分工是对周恩来工作的批评和对他工作范围的削弱。而高岗却进一步受到信任和重用。高岗当时曾得意地把他所领导的国家计委称为“经济内阁”。

高岗是一个善于窥测风向的人物。从上面所说的几件事中，高岗作出判断：刘少奇和周恩来已经失去了毛泽东的信任，而他却得了分，看来从政治上拱倒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时机已经成熟。

于是，他的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急于发难，急于向党索取更高的权力。

高岗的“发难”，首先发端于一九五三年夏季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于六月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由周恩来主持，中央各部门、各大区、各省市的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的原定议程主要是讨论关于国民经济五年计划、财政工作、民族资产阶级三个方面的问题和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但在会议分组讨论中，由于意见集中在新税制问题上，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为会议的中心。

高岗感到这是一个借以攻击刘少奇和周恩来的绝好机会，于是在会内会外采取许多不正常活动，企图从中渔利。

一方面，高岗在小组会上和会后的私下谈话中，多次“鼓动”别人向薄一波等“放炮”，给会议的气氛加温。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刚刚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后，高岗就把他请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①

另一方面，高岗亲自出马，在会议发言中对薄一波等提出种种责难。他还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法，把刘少奇曾经说过的话，如一九四七年土改时的一些讲话，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视察时讲的一些观点，一九五〇年有关东北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一九五一年对山西互助合作报告的批语等，统统安在薄一波的头上加以批判。这种明里批评薄一波、暗中攻击刘少奇的“批薄射刘”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41、311页。

的用心，凡是了解情况的人都看得很清楚。高岗在后来被迫写的《我的反省》中作过这样的交待：我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高岗还对人说过：“我在财经会议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①

对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表现，邓小平在一九五五年三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指出：高岗利用财经会议“大大施展他的阴谋活动。他和他的追随者不但在会议上为了有意制造党内纠纷而发表种种无原则的言论，并且在会外大肆散播各种流言蜚语破坏中央的威信，特别攻击中央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同志，同时鼓吹他自己。他是想经过这些阴谋活动把这次会议转变为对党中央的进攻”。

财经会议结束后，高岗的活动更加嚣张。他收集整理了许多刘少奇的讲话材料，向人散布说现在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在南下杭州、广州期间，他又到处游说，制造种种流言蜚语，指名道姓地贬低和攻击刘少奇、周恩来，抬高他自己。

高岗在分裂党的活动中，提出了所谓“军党论”。他散布说，在党的历史上，党的干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区党，一部分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白区党。党是红区的党即军队的党创造的，是“枪杆子上出党”，“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手里，应当彻底改组。他还说，党的历史上有“二元论”，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要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新作出结论。

一九五三年下半年，毛泽东在领导层内提出中央分一线、二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241、311页。

线的问题，希望自己退居二线，由其他同志主持一线工作。中共中央还提出过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部长会议的形式、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的问题。高岗觉得这是他谋取更高权力的好时机，他在背地里从事的阴谋活动达到了高潮。

高岗四出活动，捏造说刘少奇已不被毛泽东所重视，还说毛泽东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来搞政治局。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担任部长会议主席，主张由林彪来担任。他还要陈云去向毛泽东转达他的意见，遭到陈云的拒绝。他不赞成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且反对刘少奇担任总书记或副主席。后来他听说书记处要开会把这个问题定下来，唯恐自己当不上，找陈云说：要搞副主席就多搞几个，你一个，我一个。遭到陈云的断然拒绝。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准备去外地休假，在二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议由刘少奇临时主持中央工作。从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以后，毛泽东有事离开中央时，中央的工作都由刘少奇代理，这本是正常的安排。在会上，刘少奇提出，这一次不要代理了，还是由书记处的同志轮流负责好了。书记处其他成员都赞成毛泽东的提议，不赞成轮流。高岗在会上不吭声，会后却一再说：“轮流吧，搞轮流好。”^①高岗这样做的目的，在他后来写的《我的反省》中承认：我就是“企图把少奇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②

对高岗的阴谋活动，邓小平、陈云立刻向毛泽东和党中央报告了。事隔二十七年后，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曾说：

“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一九

^{①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315 页。

五三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①

高岗的阴谋活动，得到了党内个别人的呼应，其中主要是饶漱石。

饶漱石在战争年代曾在刘少奇领导下工作过，受到刘少奇的器重。建国后他担任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一九五二年又调到中央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可是他进京后，看到刘少奇受毛泽东的批评，认为刘少奇已经失势，就一反常态，同高岗串通一气，相互配合，企图拱倒刘少奇。

饶漱石一到中央组织部，就排斥和打击组织部原有的干部，开展对原来主持工作的副部长安子文的无理斗争。财经会议期间，他配合高岗反对刘少奇。当高岗在财经会议期间施展“批薄射刘”的手法后，饶漱石同他呼应，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开辟了“讨安伐刘”的“战场”。

饶漱石“讨安伐刘”的借口是安子文草拟的一份名单。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93页。

一九五三年三月初，高岗向安子文转达了毛泽东同他的谈话内容，说中央政治局成员要改组，要加强中央各部机构。安子文没有经过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一份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政治局委员分两组写出，一组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以上是书记处成员）以外，写有高岗、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邓子恢（以上是各中央局书记）；另一组上写有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对中央各部，列了组织部、宣传部、政法统战部、农村工作部、财经工作部负责人和中央正副秘书长人选。^①这个名单安子文曾给高岗看过，也向饶漱石谈过。后来中央批评了这件事，安子文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处分。但高岗和饶漱石却抓住把柄不放，拿这个名单大做文章。

高岗和饶漱石私下里在许多人中间传播这个名单，并造谣说这个名单是刘少奇授意的。高岗还编造说，政治局委员会的名单中“有薄无林”（即有薄一波而无林彪），连朱总司令也没有；说刘少奇不赞成陈正人担任建委副主任或中组部副部长、陶铸在广西工作等。饶漱石也捏造说，某某等是一个宗派，一个“圈圈”，刘少奇是他们的支持者。并说，财经会议上斗了薄一波，会后还要斗“圈圈”中的安子文。

果然，财经会议结束后，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开展对安子文的斗争。他利用名单事件，并故意夸大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在中组部的两次部务会议上大批安子文。

一九五三年九月，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研究如何加强干部工作。饶漱石在这次会议上故意改变会议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13页。

的主题，再次挑起批判安子文的“高潮”。中央发觉问题的严重性，决定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饶漱石不但没有收敛，反而继续对安子文进行指责和攻击，致使会期一再延长，直到十月底才结束。

饶漱石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如此起劲地大批安子文，实际上矛头是对准刘少奇的。饶漱石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受到批评后，曾对安子文这样说过：我说你对财经会议有抵触，其实不是指的你，而是指的刘少奇。后来他在检讨中也承认，在中组部斗争安子文，目的也是反对刘少奇，以取得高岗的信任，进行政治投机。

面对高岗和饶漱石的责难与攻击，刘少奇承受了巨大的政治压力。

刘少奇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经多次受到过来自党内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评，在三十年代“左”倾错误统治时期，甚至被撤销党内职务，但他在逆境中始终保持着对党的事业的忠诚，体现出坚韧不拔的政治品格。在高岗和饶漱石的责难和攻击面前，刘少奇又一次表现出这种顾全大局、忠诚于党的政治品格。

毛泽东在知道高岗对刘少奇有意见后，曾建议高岗直接找刘少奇谈谈，并且对高岗说：少奇同志是个很老实的同志，他会有自我批评的，你跟他可以说得通的。^①可是，高岗根本不去找刘少奇。刘少奇本着维护团结的愿望，曾两次主动找高岗谈话，征求意见，并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高岗反而对别人造谣说，刘少奇不肯进行自我批评。

刘少奇了解到饶漱石在中央组织部的不正常活动后，同饶漱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18页。

石谈话，坦率地表示不同意他的做法，希望他冷静从事，不要再在中央组织部内继续争吵。

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两次到会讲话。

十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参加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领导小组会。他在讲话中，一方面对饶漱石提出批评说：中组部过去三个月的争论，“使得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地进行，使得中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发生了一些影响，这当然是工作上的损失”；另一方面又主动承担了责任：“对于这个争论，我也是有责任的。我没有在事先对双方做充分的工作，没有对双方充分交代清楚，使双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对双方的帮助都不够，这是我应检讨的。”在讲话最后，他诚恳地提出：“希望各地区党的组织部的同志们，到处去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反对任何只看到和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看不到和不关心全党的倾向。”^①

二十七日，刘少奇出席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闭幕会。在讲话中他实事求是地总结了中央组织部过去几年的工作，认为“是有成绩的”，“是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中组部领导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错误。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对会议中提到的几个问题，如农业生产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党员发展成富农如何处理等问题，比较系统地作了自我批评和情况说明，再次主动承担责任。

对农业生产互助组问题，刘少奇说：我在这个问题上“曾经有一个时候有过一种想法是不正确的”，“主观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观上的可能和需要。一点是我认为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时间要慢，一点是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个中间的过渡形式没有找到，所以我就

^① 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要点，1953年10月22日。

以为互助组不能直接过渡到集体农庄，而把互助组和集体农庄看成是没有什么联系的两回事”，而这“不是毛主席的想法，毛主席的想法是农业生产的集体化要很快地搞，其形式就是农业生产合作社”。他并对给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批示和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讲话中提出的观点作了自我批评。

会议中提到的“半工人阶级”这个提法，是指一九五一年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形成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草案）》中关于党的性质的一句话：“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城市工人阶级和乡村半工人阶级领导的”。从理论上讲，把“乡村半工人阶级”作为领导阶级确实很不妥当，但以前党的文件上也使用过。经刘少奇修改审定的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草案沿用了这个提法。后来中央发觉这个问题，在当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中作了纠正。在这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饶漱石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对安子文进行责难。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明了情况，并承担了责任，说：“这件事情主要由我负责，应该放在我的账上，而不应该放在安子文同志或其他同志账上。”

在谈到党员发展成为富农如何处理的问题时，刘少奇明确表示：“中央组织部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是经过我的。”他说明了就富农党员问题给东北局答复的过程和当时的想法，认为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还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同时也检讨说：“由于我对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问题有一种不妥当的想法，所以在处理富农党员的问题上，可能在和个别同志谈话的时候，说了一些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应该说，所有说的不妥当的或者错误的话都应该取消和修正。”

刘少奇在这次讲话结束时，语重心长地说：

“我们绝不能允许我们自己把眼光限制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里面，只关心本地区、本部门，而不关心全

党。希望这一次到会的各地区党委的组织部长同志到处提倡全党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要巩固全党的团结，是要努力的，要做工作的。邓小平同志讲了，全党过去是团结的，今天也是团结的，那么是不是高枕无忧了，就看不到缺点了，或者看到有些缺点而把它掩盖起来呢？不是的，要努力，要消除我们的缺点，要做工作，要为巩固全党的团结而努力！”^①

高岗、饶漱石在财经会议上和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上的反常活动，以及在背地里搞的种种活动，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和警惕，他逐步觉察到高、饶的阴谋活动。

尽管毛泽东在某些问题上对刘少奇有过批评，但他对刘少奇是信任的。他发觉高岗的问题后曾经对人说过，少奇同志是大公无私的，是正派的，他绝不是那种搞宗派的人。在关于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问题上，毛泽东也说过，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②

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针对饶漱石的问题，提议党内干部要重温《联共（布）历史简明教程》的六条结束语，加强党的基本理论的学习。十月二十二日，他在写给杨尚昆的信中说：“请将联共党史六条结束语印成单张，于今晚或明天发给到组织会议的各同志，请他们利用停会的两三天时间，加以阅读、研究，可能时还加以讨论，使他们在刘少奇同志及别的同志在大会上讲话讲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所了解。”“同时可多印一点（可印一二千份），发给北京的干部，并由总党委通知各部门、各党组要他们阅读和讨论。”

^① 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3年10月27日。

^②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18页。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①就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当面对高岗和饶漱石提出严重警告：“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②毛泽东在会上还提议要起草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的明确态度，把高岗和饶漱石的阴谋活动进一步暴露在全党面前。

政治局扩大会议后，毛泽东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宪法，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刚刚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当天，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汇报了中央工作情况，并派人将决议草案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修改。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决议草案，并作了多处修改。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并中央书记处全体成员的。信中提议决议草案“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并对全会的召开时间、主要议程、报告内容等作出具体部署。毛泽东在信中提出，“报告请少奇同志做”，同时也提出，在进行全会第三个议程即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时，“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另一封信是写给刘少奇个人的，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

① 《中央召开会议报告表》。

②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所作的结论，1955年3月31日。

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毛泽东关于召开中央全会的提议得到中央领导人的一致同意。一月十五日，刘少奇签发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通知》。他多次向毛泽东电告中央日常工作和全会筹备工作的情况，并把起草好的在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报告送给毛泽东审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认真修改了在全会上的检讨稿。一月十六日，刘少奇将检讨稿报送毛泽东。他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陈、彭、邓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个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毛泽东没有表示不同意见。

毛泽东的警告和七届四中全会的即将召开，使高岗、饶漱石慌了手脚。他们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企图蒙混过关。毛泽东在杭州的时候，高岗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他犯了错误，拟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想到杭州和毛泽东面谈。毛泽东在一月二十二日给刘少奇的信中谈到此事，明确表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上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毛泽东再次强调：“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在一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五日两次找高岗谈话，对他进行教育和挽救。二

月三日，刘少奇又同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①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主持了这次会议。开幕当天，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在全会上作报告。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一、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三、为增强党的团结而斗争。在第三个问题中，报告针对高岗、饶漱石的错误，明确提出：

“我们从来反对任何党员由满腔热忱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方面去；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召开的党的二中全会，曾经特别告诫全党干部在革命胜利以后严防骄傲，因为骄傲就可以引导到个人主义的发展，就可以引导到党的团结的损害和破坏，就可以引导到党的事业的严重损失。我们应当时时刻刻都记得，我们的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而且凶恶的敌人还包围着我们，等待着利用我们的不谨慎不和睦来损害我们，而只要有可能，他们就要来消灭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团结就是党的生命，对于党的团结的任何损害，就是对于敌人的援助和合作。只要党内出现了个人主义的骄傲的人们，只要这种人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党的坚决的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地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直至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因此，中央政治局认为自己有绝对的责任，哪怕只是发现了这种状况的萌芽，就必须敲起警钟，动员全党来克服这种危险，并要求犯有这种错误的同志迅速

^① 刘少奇工作日志。

彻底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如果等闲视之，任其蔓延滋长，就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

“党的中央委员会和省（市）委员会以上负责同志和武装部队的高级负责同志的团结，是全党团结的关键。在增强党的团结的事业上，这些负责同志担负着主要的责任，因此，他们应当以身作则，增强相互间的团结，并且在党的所有组织和全体党员中进行积极的工作，为增强全党的团结而斗争。”^①

在全会上，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四十四人发言，对破坏党的团结的行为进行严肃的批评。高岗和饶漱石也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全会一致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在发言中，刘少奇除对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已经谈过的关于生产合作互助组、“半工人阶级”的提法、如何对待富农党员等问题又一次作了检讨和情况说明外，并对建国初期负责全国总工会的工作、解放战争后期土地改革工作中一些“左”的做法、一九四三年延安审干期间发生的一些问题、一九四六年关于“和平民主阶段”的提法以及一九四九年在天津视察中讲过的一些话也作了检讨和说明。最后，他诚恳地说：“党中央给我很大的责任，就我所处的工作地位来说，我就应该有更多警惕，特别慎重，去尽量避免发生错误。有些问题如果我能够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更多地向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请示，用适当的态度更多地和同志们商量，就可以不犯或少犯错误。”^②

七届四中全会结束后，根据中央书记处的决定，在二月中旬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27、131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的检讨，1954年2月10日。

分别召开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三十七人、重要工作人员四十人参加的关于高岗和饶漱石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对证高岗和饶漱石搞阴谋活动的事实。在事实面前，高岗、饶漱石虽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错误，但仍避重就轻，百般抵赖。高岗竟在座谈会期间以自杀（未遂）拒绝党对他的挽救，并在八月间再次自杀身死。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中共中央举行全国代表会议，正式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至此，高饶事件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转变中的一个“插曲”，以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彻底暴露和失败而结束。但这件事无论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刘少奇个人的政治生涯中，都造成严重的影响。高岗、饶漱石借以攻击刘少奇的一些“问题”，有些确是刘少奇在工作中的失误，有些却是党在前进道路上还需要继续探索的问题，并且在以后的实践中证明未必都是错了。对这些问题，是非没有得到完全澄清。尽管刘少奇作了检讨，但在十二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这些问题又被重新翻出来，当做刘少奇的“罪行”而加以批判，这不能不说是这次事件在党的历史上留下的一个缺憾。

二十九、第一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一九五四年九月，新中国成立五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次会议上，诞生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刘少奇当选为第一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举行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为了这次会议的顺利召开，刘少奇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一起，做了充分的酝酿和筹备。

建国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暂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随着国内政治局势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议题，开始列入中共中央的议事日程。

一九五二年十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时，他受毛泽东委托在写给斯大林的信中，谈了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设想。当时，中共中央设想在晚些时候，也就是中国基本进入社会主义后，再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新的宪法。斯大林同刘少奇谈话时建议，为了驳斥国际上敌对势力对新中国的攻击和便于中国更好地开展建设事业，中国应该

将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时间表提前。^①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接受了斯大林这个建议。

一九五二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尽快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和制定宪法的决定。这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举行的全国政协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由全国政协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提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建设的说明。一九五三年一月十三日举行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在当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在这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在大会上制定宪法。同时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宋庆龄、刘少奇等三十二人为委员；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以周恩来为主席，张治中、彭真、邓小平等二十三人为委员。

选举法在周恩来主持下，很快拟定出来。二月十二日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按照这个选举法的规定，成立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主席，朱德、邓小平等二十八人为委员。

这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和宪法的起草这两项工作，先后开展起来。这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刘少奇为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当家做了主人的中国人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自己的代表大会，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从一九五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五四年八月间，在刘少奇主持的中央选举委

^① 刘少奇关于同斯大林的谈话给毛泽东的电报，1952年10月30日。

员会指导下，在全国范围内先后开展了人口调查登记、选民登记、基层选举等工作。在此基础上，全国省、市、县、区各级行政区域先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并在省一级的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了全国人民代表。

在领导选举工作的同时，刘少奇也参与了毛泽东主持的宪法起草工作。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五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带着由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等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到杭州开始起草宪法草案。在此期间，刘少奇在北京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人员，对宪法草案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一九五四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杭州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提出了宪法起草和讨论的安排，并开列了一个书单，建议各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阅看，为日后讨论宪法做准备。在这份书单中，列有苏联、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法国等国宪法以及中国辛亥革命以来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宪法。

十二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的来电进行讨论。十六日，他在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说：“此间同志同意主席所定宪法起草工作及讨论的计划，即将来电印发在京各中委及候补中委，并要他们阅读所列参考文件。”^①

二月下旬，毛泽东和宪法起草小组拟出宪法草案初稿的三读稿，派人送回北京，提交政治局讨论。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毛泽东在杭州主持起草的宪法草案初稿三读稿。会议责成由董必武、彭真、张际春负责，以董必武为主，根据中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及宪法起草小组的意见，对三读稿加以研究和修改。这以后又形成宪法草

^① 刘少奇给毛泽东的电报，1954年1月16日。

案初稿的四读稿。三月十二日、十三日和十五日，刘少奇再次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这个四读稿。会议决定：（一）以陈伯达、胡乔木、董必武、彭真、邓小平、李维汉、张际春、田家英八人组成宪法小组，负责初稿的最后修改；（二）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以李维汉为秘书长。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从杭州回到北京。二十三日，刘少奇参加毛泽东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向会议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会议决定，宪法草案初稿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同时扩大讨论范围，政协全国委员会也进行分组讨论，并分发各大行政区、各省市的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接着，刘少奇连续主持召开五次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对宪法草案初稿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在那些日子里，刘少奇的工作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

五月二十七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的序言和第一章总纲；

二十八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三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第二章；

二十九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第二、第三章；

三十一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第二、第四章，并对宪法草案初稿进行通盘讨论；

六月八日，主持宪法起草委员会第六次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修正稿）》。

六月十一日，刘少奇出席毛泽东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修正稿)》和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报告，决定提交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十四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十次会议，决定将宪法草案交付全国人民讨论。在这以后的近三个月中，全国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了讨论。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九月八日召开第八次会议，中共中央在九月九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对宪法草案再次进行修改。九月九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三十四次会议，讨论通过宪法草案，决定正式把它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刘少奇先后出席了上面所说的各次会议。

在参与宪法讨论修改的同时，刘少奇还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起草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九月十二日，在刘少奇主持的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讨论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决定由刘少奇代表宪法起草委员会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作这个报告。这次会议还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规草案。

经过一年多的紧张工作，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和宪法草案的起草修改工作终于全部就绪。

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开幕那天，刘少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

刘少奇在这个报告中，首先回顾了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反对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英勇斗争的历史和中国近代关于宪法问题宪政运动的历史，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历史，阐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产生的历史意义。接着，报告从新中国的国家性质、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步骤、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和人民的权利义务、民族区域自治等方面，说明了宪法草案的基本内容。报告的最后结论中指出：

“我们的宪法草案，经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将成为我国的国家根本法。这个宪法既然是表达了人民群众的亲身经验和长期心愿，它就一定能够在我国的国家生活中起巨大的积极的作用，一定会鼓舞人民群众为保卫和发展我们的胜利成果而斗争，为粉碎一切企图破坏我国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敌人而斗争，为促进我国建设事业的健全发展和加速我国建设的进度而斗争。”^①

报告在号召全国人民和一切国家机关必须遵守宪法的同时，特别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新的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我们国家的领导核心。党的这种地位，决不当使党员在国家生活中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只是使他们必须担负更大的责任。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必须在遵守宪法和一切其他法律中起模范作用。一切共产党员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同各民主党派、同党外的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为宪法的实施而积极努力。”^②

大会经过充分讨论，在二十日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同时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68页。

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

二十七日，大会产生了新的国家机构领导人：

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

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加措、赛福鼎·艾则孜为副委员长；

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

二十八日，历时十四天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圆满闭幕。

国家的经济建设工作一直是刘少奇关注的重点。在筹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和协助毛泽东起草宪法的日子里，刘少奇的工作十分繁忙。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后，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也用了他大量时间。尽管如此，他仍以相当多的精力思考并参与国家经济建设的筹划和实施，特别是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在一九五一年上半年国民经济没有完全恢复时就着手准备了。这年二月中旬，刘少奇出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作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重要决策。会后，中共中央责成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

“一五”计划的编制是在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陈云领导下，由中财委具体实施。经过紧张的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六月形成“一五”计划的最初蓝本——《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计划轮廓（草案）》。它勾画出我国钢铁、机械、煤炭、石油、电力等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建设指标，对重大水利、铁

路、桥梁建设也做出总体规划，大致形成了我国工业建设的框架设想。

“一五”计划轮廓草案拟出后，为了征求苏联的意见和取得他们的援助，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率领阵容庞大的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从一九五二年八月到一九五三年五月，经过历时八个多月的中苏谈判（周恩来、陈云回国后，由李富春代理代表团团长），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苏联政府援助中国政府发展国民经济的协定》。

由于高饶事件的干扰，特别是高岗一度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一五”计划的编制工作曾受到一定影响。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饶问题后，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一五”计划的制定进入全面落实阶段。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领导编制“一五”计划的工作班子，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编制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八人小组。

四月，陈云向中央提出《五年计划纲要（初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审阅了这个纲要。这以后，刘少奇曾多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一五”计划进行讨论。六月二十九日至七月一日，刘少奇连续三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并讨论了陈云《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七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六日、十九日和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连续五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先后听取邓子恢关于农业、林业、水利的五年计划的报告，李富春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建设任务几个问题的报告，李先念关于国家财政五年计划的报告和薄一波关于基本建设五年计划的报告等，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的基础上，周恩来、陈云领导编制五年计划八人小组经过多次修改，在九月间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交付中共中央讨

论审定。

为了摆脱繁杂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对“一五”计划草案初稿进行审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十月底来到气候宜人的广州。从十一月一日到二十三日，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对草案初稿作了反复的审议和修改。

为了使这个计划更加符合全国各地的实际情况，并推动省市一级五年计划纲要的制定，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从广州联名致电中共中央：“现在亟须要有各省市的地区计划，我们代中央起草了一个指示电报，如同意，请印发为盼。”在随电发去的中共中央给各省市市委《关于请各省市制定地方经济五年计划的指示》中指出：“中央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发给你们，除请你们于十一月底以前提出意见报告中央外，并请各省、市委召集本地区的计划工作会议，根据草案的精神和主要指标，结合当地的特点和具体情况，定出各省、市地方经济的五年计划纲要，于十二月十日送中央。”经过这样几上几下的审议修改，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

七月六日，在刘少奇主持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三——一九五七）》——这个凝聚着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心血和智慧的我国第一幅建设蓝图获得正式通过。

蓝图的制定使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有了具体的方向和目标，它的实现需要更为艰辛的努力，需要党对经济建设实行正确的领导和采取更有效率的工作方式。刘少奇在参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制定的同时，认真地思索着这些问题。

一九五五年三月底，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闭幕。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利用全国各省市主要领导人都在北京的机会，从

四月二日到九日，先后邀集西北、西南、中南、华东、华北和东北等地区的省市委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有关当地工作情况的汇报，并谈了自己对一些正在思索的问题的想法。座谈会议论的问题很广。当谈到经济建设问题时，他说：凡是盲目发展得多的行业，困难就大。这里有一条经验，并不是任何发展都是好的，如果发展不是有计划、有前途的，发展本身就带有破坏性。当谈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他说：目前主要问题是要把现有的巩固好，只要巩固好现有的，就会有农民要求入社，所以，为了发展，就要巩固。今年明年少发展些，因为干部没有训练出来，经验不成熟，再快了就要发生危险。当谈到法制建设时，他说：为了提高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要号召群众监督。而他在这些次谈话中谈得最多的是党对经济建设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并在工作重心逐步转向经济建设以后，究竟怎样实行正确而有效率的领导？从平时了解的情况和各地负责人的汇报中，刘少奇深深感到，现在党正处在从领导社会改革向经济建设转变的过程中，这个转变过程并没有完成，党的各级机关在领导经济建设的问题上还十分缺乏经验，处于很不得力的状态，而要适应新的建设形势，必须下决心改变这种状况。他多次提出：“我们熟悉的事，如打游击、土地改革等现在都完成了，而不熟悉的事，如基本建设、五年计划等却强迫我们去做，我们没有经验，因而很吃力，很被动。现在要创造新的领导经验。”^①

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刘少奇指出：“过去搞革命，现在搞建设。因之组织形式、工作方式也要随之改变，但领导人的觉悟程度没有那么多高，没有自觉地随着任务的变化而改变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这就发生各种力量与任务不相称和领导不好的现

^① 刘少奇同东北地区各省市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5年4月9日。

象。现在这个变化还未结束，还要有意识地完成这个转变。”^①

刘少奇认为，要完成这个转变，最关键的是要实行党政分开，要改变过去由党委包办一切、“一揽子”的领导方法。在战争年代和经济恢复时期，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必需的，也是行之有效的，但是，随着建设工作的逐步开展，这种一切由党委来管的领导方法显然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在同中南地区各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一揽子的领导方式是不行的，要有分工，要建立各种业务机构。”^②在同东北地区各省委负责人谈到厂矿实行一长制时，他说：实行一长制，以便有人负责，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党委要监督、保证，管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这些，不是破坏一长制，而是有利于更好地实现一长制。厂长要依靠党和群众，才能做好工作。谈到有些地方脱产干部太多时，他说：不能无限制地脱产，要加以控制。^③在同华北地区各省市负责人的谈话中又说：“党不管党问题，有个整个问题在内。党委整天忙，不能管党，管了什么？管了征兵、统购统销、基本建设等等业务；而这些事应该是由业务机构来管的。党应该管的是检查工作、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④

刘少奇提出，当前党的中心任务，是“必须健全中央以至地方政府部门的业务机构，提高其水平，使之能负担它所应负担的任务。”“如果各方面的工作都有得力的业务部门去做，党委就能腾出手来做自己应当做的事情了。”“就可以站在监督的地位来指导和帮助业务部门的工作，即管理干部、检查工作和做政治思想工作，而不必直接地管他们的业务。”他明确地指出，“今后，党对政府部门的领导方式，原则上将是如此。”^⑤

①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26页。

③ 刘少奇同东北地区各省市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5年4月9日。

④⑤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28、626页。

当然，实行党政分开，改变过去的党委一揽子领导方式，并不意味着可以放松对各级党委和党的干部的要求。相反，需要对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刘少奇在同各省市谈话中多次强调：“为了进行监督，党的干部对业务工作也要逐步地熟悉起来变成内行。”^①

刘少奇提出的的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九五五年全国代表会议以后，党在经济建设工作中开始注意纠正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的倾向，经济建设方面的业务工作逐步走上正常的轨道。尽管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这个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而且又出现不小的反复，但刘少奇的这些思想，对改善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以后，刘少奇以相当多精力投入这项工作。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建国初期，刘少奇在北京市第三届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预见到它将是“一个有伟大功效的制度”，^②将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没有现成的章法可以遵循。在它诞生以后，应该怎样开创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新局面，有效地行使人民赋予它的权力？怎样发挥它对中央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机构的监督作用？对这些问题刘少奇作了深入的思考和卓有成效的工作：

第一，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初创时期，刘少奇逐步摸索和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和工作方法。他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表人民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该“能够便利人民行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626 - 627 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57、156 页。

使自己的权力，能够便利人民群众经常经过这样的政治组织参加国家的管理，从而得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①，因此，它的工作方法必须有利于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有利于加强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刘少奇在这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五日，刘少奇就任不久，就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给人大代表发出通知，要求人大代表“把你在生产中、工作中、社会活动中所了解的情况，以及人民群众向你反映的问题和你的意见，随时告知常务委员会”。同时，经同有关部门商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关于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室的意见》，决定在全国各省、市、区的首府以及重庆、青岛、旅大、鞍山等城市设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办公室，以便利各地人大代表的活动和及时向中央反映情况。

刘少奇多次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人大代表要分期分批地到地方和基层去视察，人民代表大会要建立经常的视察制度，这样，才能及时了解情况，改进工作。在他主持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多次专门讨论了人大代表的视察问题。他在会上说：“我们去视察，反映下面的情况和问题，看看他们有什么缺点，同时也要看看我们中央下去的东西有没有缺点，合不合情况。这样就可以改进中央的领导，也可以改进地方领导，使工作做得更好些，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更快一点解决。”^② 在刘少奇担任委员长的几年中，每年都分期分批组织全国人大代表到各地视察，并逐步形成制度。

在组织人大代表到地方视察的过程中，刘少奇积极为视察工作创造条件，排除障碍。当了解到有的地方领导人对前来视察的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57、156页。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记录，1956年5月8日。

代表封锁消息、不如实汇报情况时，他提出了严肃的批评，建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通知纠正这种现象。为此，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六日向地方各级党委和中央各部委党组发出《关于人民代表到各地视察工作的通知》，提出：中央认为，代表们定期下去视察工作，应该成为党和国家领导机关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一种工作制度。要求各级党委要如实地向代表们介绍情况，“应该采取是就是，非就非，好就好，坏就坏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在选择视察地区和对象时，应该分别选择比较好的、比较坏的和中等的三种不同的类型给代表们看。要使代表能够真正实地进行考察，接见他们所要接见的人”。

在主持人大常委会讨论国家大事、通过重要决定时，刘少奇都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到会，向委员们详细汇报有关情况，在此基础上组织讨论，听取委员们的意见。这种做法，逐步形成一种惯例。

刘少奇还领导人大常委会的有关部门，对人大代表的政治待遇、生活补贴等问题制定一系列具体规定。

在刘少奇和人大其他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初创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经过短暂的调整，很快进入正常运行的轨道，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发扬民主必须同健全法制紧密结合，需要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来管理国家事务。在刘少奇主持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充分讨论，制定出一批重要的法律法规，对初步建立和健全我国的法律制度做出重要的贡献。

建国初，我国的法制建设几乎还是从头做起。建国后几年中，虽然初步制定和试行了一些法规法令，但远远不能适应需要。因此，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后，加强法制建设成为人民代表大会工作中的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在政治报告中明确提

出：“我们目前在国家工作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①

制定和通过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是宪法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一九五五年七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二次会议，还通过了授权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在刘少奇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日程表上，讨论和通过各项法律法规成为最经常的工作之一。

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闭幕到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这四年多时间里，刘少奇共主持召开了五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一百零九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先后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关于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等一大批重要的法律法规。

在讨论和通过这些法律法规时，刘少奇要求代表和委员对每一项法律法规的条文都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地加以审议。他曾经在人大常委会上说：“一个法律搞得不好，就会限制人民的积极性，限制生产力的发展。”^② 经过认真的审议，人大常委会通过的这些法律法规，在我国法制建设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

第三，刘少奇十分重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工作的监督作用。

他认为，在我们国家工作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命令主义、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53页。

^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7次会议记录，1958年6月5日。

官僚主义以及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要纠正这些问题，除了在中共党内和政府内加强自身建设、开展批评外，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也是重要的途径。在党的八大政治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必须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对中央一级政府机关的监督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地方各级政府机关的监督。”

在实际工作中，刘少奇要求人大代表和常委会委员无论在工作岗位上还是在外出视察中，都需要注意发现问题，提出建议，发挥人大的监督职能。他在人大常委会上对准备下去视察的委员们说过：要重视视察工作，“下去视察才可以看到一点问题，你们可以看出他们的假，一次掺假可以，但是每年掺假就难。视察有很大的好处，所有国家工作人员以及共产党员都要群众监督。我们共产党员要有监督，党外人士也是这样，彼此互相监督一下，有好处”。^①

对于代表和委员们反映的问题，刘少奇总是及时作出处理和回答。一九五五年三月，全国人大常委张难先给刘少奇的信中，反映了湖北监利地区某些领导干部在抗洪救灾工作中的一些违法乱纪问题，并对工作提出改进意见。刘少奇在四月七日给张难先的复信中赞同他提的意见，并再次谈到监督问题：

“我们的国家这样大，机关这样多，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但也有少数不好，这是事实。同时，好的干部如果没有经常的监督也可能变坏。因此，对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都应实行监督。除了广大人民的监督以外，还必须加强各级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认真实行国家的监督。”^②

刘少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担任到一九五九年四

^①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记录，1956年5月8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4页。

月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家主席后，由朱德继任。在他四年多的任期内，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和正常运转，做了具有开创性的工作。

三十、八大的筹备和召开

在解决高饶事件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中国共产党的议事日程。

自从一九四五年中共七大以来，十年过去了。十年内，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何适应形势的变化，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制定正确的路线和纲领，是中共中央面临的重要任务。在一九五二年底国民经济基本得到恢复后，中共中央曾考虑在适当时候召开党的八大，并已着手进行准备。但是，由于发生了高岗和饶漱石的问题，先后召开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和全国代表会议着重处理这个问题，召开八大的事就拖延了下来。到一九五五年下半年，中共中央认为召开八大的时机已经成熟。

一九五五年十月四日至十一日，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主要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同时通过《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提出：“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决定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和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

大会的四项主要议程是：一、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二、修改党章的报告；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示；四、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由刘少奇负责大会

工作报告的起草，邓小平负责修改党章报告的起草，周恩来负责“二五”计划指示的起草。邓小平在全会上对召开八大的决议草案所作说明中宣布，这次全会以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将开始上述四项议程的准备。

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刘少奇的主要精力转向主持八大工作报告（后来改为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

八大准备期间，国内形势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以席卷全国之势猛烈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和手工业的合作化大大加快了步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十二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集有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央座谈会。会上，刘少奇传达毛泽东关于召开八大的指示，并对八大准备工作作出部署。他说：

“在关于八大的准备工作谈话时，主席提出：中心思想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提早完成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

主席说过，我们要利用目前国际休战的时间，利用这个国际和平的时期，再加上我们的努力，就可以加快我们的发展，提早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也是客观要求我们加快发展。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我们不快建设，农业未合作化，私营工商业未改造，工业未发展，将来一旦（战争）打起来，我们的困难就更多；如果完成了就好办。因此必须加快速度，在我们的一切工作中都要反对保守主义，一切工作要办得又多、又快、又好，要求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更大的成绩。这不是急躁冒进，而是实际与可能的需要，是稳

步前进。

主席说，我们可以有几条路线前进，几条路线比较一下，要选择一条比较合理的、正确的路线。上、中、下三策，哪个合理，哪个正确，就选哪一个。

要站在群众前头，不要做群众的尾巴。要鼓励群众，不要泼冷水。在较短时间内得到较大成绩，这就是现在中央所实行的路线，这就是稳步前进。另一条是按常规走路，照老样子前进，时间拉得很长，群众没有气，成绩不大，这是保守主义路线。我们有不少同志却正在走着这条路。

计委做平衡工作，希望平衡一次，安定一个时期。主席说，客观事物，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不断平衡，不断冲破，这是我们前进的规律。冲破了平衡是好事，不要怕。（周恩来：湖塘的死水是臭的，活水才不臭。）不要按平衡办事，按平衡办事就恰恰要犯错误。

搞工业的同志不要骄傲，要加油，否则就有可能出现两翼走在前面而主体跟不上的可能。特别是重工业千万不可骄傲，因为我们既无经验又未搞好，工业体系还未建立起来。有人说：‘可不可以让农业等一下工业，不要走得那么快。’这种说法是右的。不能叫农民等，而是工业要赶上去。农村合作化了就更有利于促进工业化的发展。

准备明年九月召开八大，中心问题就是这些。希望各部门立即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发现新的工作方法，改进工作，反对保守主义，加强全面工作规划，迎接八大，使八大开好，使八大的工作和各部门各地方的工作结合起来。”

他在讲话结束时提出：

“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所以我准备找各部门的同志个别谈谈，请你们准备。有材料请你们送一些来。”^①

刘少奇的这次讲话，是在较大范围内第一次明确传达中共中央在八大准备工作上的指导思想。它表明：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正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党中央思考八大路线基本思路时，已经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作为党今后奋斗的主要纲领和主要任务。这是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大事。但当时，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还了解得很少，对它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估计十分不足。刘少奇在讲话中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要“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说法，反映出一种急于求成的思想。

“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这种思想最初是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特别是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提出来的。它在一段时间内对党的各项工作都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的决议（草案）》以来，一直发展得较快，到一九五四年底形成了一个高潮。这年年底，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十万个发展到四十八万个，并计划到明年发展到六十万至七十万个。在一大批新建的合作社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反映出在这个问题上有些盲目求快。为了使合作化运动能够健康发展，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一九五五年初以简报的形式向中央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将合作化运动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邓子恢的建议，最初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一月十日，经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刘少奇签署发出的《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55年12月5日。

社的通知》中明确指出：“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应基本上转入控制发展、着重巩固的阶段。”

四月上旬，刘少奇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同各省负责人谈话时，又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农业生产合作社，各省都有了很大发展。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巩固和办好已经建立起来的这一批。这一批办好了，就给农民树立了旗帜，训练了干部，积累了经验，就为今后更快地发展打下了基础。在今天大部分农民对农业社还有怀疑、干部还没有培养出来和办社经验不成熟的情况下，如果再像去年那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是冒险的。”^①

四月二十日，刘少奇在他主持的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又说：今后一年农业合作化的总方针是“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现在全面停下来，秋后看情况再定，个别县、乡、区未办的，有条件的可以试办。全国合作社已经发展到六十七万个，其中发展过多的省份超过两三万的，主观力量控制不了，要收缩一些。能巩固住五十几个社，即是最大胜利。这次会议以后，一些农业合作社上得较快、问题较多的省份，如浙江、山东、河北等省，在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帮助下，压缩了部分办得不好的合作社，其中浙江压缩得最多，约一万五千个，全国的农业合作社从六十七万个减至六十五万个。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子恢关于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邓子恢在会上建议，在一九五六年秋收前农业生产合作社从现在的六十五万个发展到一百万个。会议批准了这个建议。刘少奇在讨论时说：明春发展到一百万个，然后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

^① 刘少奇同西北各省、西南各省、中南各省、华东各省市、华北各省市和东北各省负责人谈话的要点，1955年4月9日。

对于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反映的情况，毛泽东最初是相信的；对中央制定的停止发展、整顿和巩固合作社的方针，毛泽东也是同意的。但是到一九五五年夏季，毛泽东的想法起了变化。他在到外地进行调查后认为，在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过程中，党内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农村工作部的部分同志，存在一种消极情绪。在五月中旬一次有部分省市书记参加的会议上，他提出警告：在合作化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他对邓子恢提出批评，要求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在七月三十一日至八月一日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十月上旬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以更为严厉的措辞，批评邓子恢和农村工作部在农业合作化问题是“小脚女人走路”，是被胜利“吓昏了头脑”，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在党内造成一种紧张气氛：谁不跑步前进，谁就是“小脚女人走路”。这就大大改变了农业合作化的原定进程，使全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在一九五五年下半年急速发展，形成前所未有的高潮。对毛泽东的决断，刘少奇一直是很信服的。这年十月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中表示：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中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他作检查说：几年以前我也有过一种想法，以为在土地改革后，除开普遍发展劳动互助组以外，大约还要过一些时候再来普遍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因而对于当时已经出现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提倡，这是不对的。到一九五五年底，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农户已占全国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九；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达到百分之九十多。

毛泽东反对右倾保守、加快农业合作化步伐的思想同样表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在一九五五年十月

的七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表露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也要加快的设想。十月下旬，毛泽东接连两次找工商界代表人物谈话，就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以后，到杭州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召开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工作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部署了今后的工作。十六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讲话。他说：废除资本主义所有制，大体上有这么几种办法：一种是没收，一种是挤垮，一种是赎买。在我国，用赎买的办法，统一战线的办法，是最好的办法。他在讲话中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即采用赎买的办法废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分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状况和实行和平改造的国际国内条件，要求全党在目前这个紧要时期要统一思想，积极领导，争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决定性胜利。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号召全党要消除顾虑，加快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步伐。

这次会议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步伐大大加快了。刘少奇在十六日的讲话中提出的时间表还是“在两三年之内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搞出一个头绪来，公私合营要基本上完成”，^①可是在实际进程中，到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仅仅半年时间里，全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就基本上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在很短时间内完成了。

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说，是符合客观需要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地上建立起来，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此后一切发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6页。

展和进步的基础。但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过程中产生的要求过急过快、急于求成的急躁情绪，留下不少问题。这种急躁情绪，同样也带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中。

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正确指导即将全面展开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是一项正在继续探索的异常艰巨的任务。

按照在中央座谈会所说“八大中央的报告也要与各部门的工作结合起来”的设想，刘少奇在中央座谈会结束的第二天，开始分别约请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了解经济战线以及其他各条战线上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问题，为起草八大报告做准备。

这是一次系统的调查。据“刘少奇工作日志”记载，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至一九五六年三月九日，在三个多月时间里，刘少奇先后约请中央和国务院三十七个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汇报座谈，内容包括工业、农业、商业、财政、交通运输、文教卫生、体育等各个方面。大致如下：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七日——国家建委主任薄一波；

城建总局局长万里；

十二月八日、十日——一机部部长黄敬；

二机部部长赵尔陆；

三机部部长张霖之；

十二月九日——中央农村工作部负责人廖鲁言、刘瑞龙、魏震五；

十二月十二日——煤炭工业部部长陈郁；

十二月十三日——电力工业部部长刘澜波；

十二月十四日——地质部部长李四光，副部长刘景范、宋应；

十二月十五日——建筑工业部部长刘秀峰，副部长

周荣鑫；

十二月十六日——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副部长吕东；

十二月二十二日——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

十二月二十七日——地方工业部副部长张劲夫；

十二月二十八日——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钱之光、张琴秋；

十二月二十九日——轻工业部部长贾拓夫；

十二月三十日——手工业管理局局长白如冰，副局长邓洁；

十二月三十一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副部长金明；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日——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陈希云、喻杰；

一月三日——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王磊；

一月四日——商业部副部长姚依林，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张启龙、邓辰西、邓飞；

一月五日——外贸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解学恭；

一月六日——农产品采购部部长杨一辰；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副行长陈希愈；

一月七日——劳动部部长马文瑞，副部长刘子久、毛齐华；

一月八日——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副主席刘宁一；

二月十六日——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刘建章、余光生；

二月十七日——交通部副部长李运昌、朱理治、马

辉之；

二月十八日——邮电部副部长范式人、钟夫翔；

二月二十一日——民航局局长邝任农，副局长李平、沈图；

三月五日——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副部长刘能风、刘子载；

三月六日——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柳湜；

三月七日——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张凯、傅连璋、崔义田；

三月八日——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陈克寒、刘芝明、夏衍；

三月九日——国家体委副主任蔡树藩、荣高棠。

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又分别听取新华通讯社负责人吴冷西、朱穆之、缪海稜、邓岗、石少华和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负责人梅益等的汇报。

为了开好这些汇报会，刘少奇在这几个月内，除了出席外事活动和参加中央有关会议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这件事情上。座谈会常常从白天一直开到次日凌晨。

在座谈中，我国经济建设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方向一直是刘少奇关注的重点。他详细询问和了解各个部门、各个行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设备状况、产品流通以及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等各方面的情况，记下了几万字的笔记，并对各部门的当前工作和今后目标提出意见。这些意见主要有：

——在大力发展内地工业的同时，也要注意发挥沿海工业的潜力，因为沿海地区现有企业需要的投资少，能力大，见效快，可以为国家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

——今后投资的重点有两个：一个是重点建设，一个是利润大、见效快的事业；

——应当重视利用中国手工业发达的特点发展中国的工业，把机器工业和手工业结合起来，接受手工业的优良传统技术，同时帮助手工业机器化，提高生产率；

——要想办法把产品质量标准定下来，多搜集技术资料，为了研究新产品，要把资本家中会搞设计的人养起来；

——工业生产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生产，商品供应也要根据消费者的需要供应，不断增加品种花色，满足人民的需要，用刺激人民更高的消费欲来促进生产；

——企业内部要高度重视经营管理工作，加强科学研究，学习和尽量采用国内外先进技术，研制新产品；

——要表扬先进，批评落后，允许企业间地区间的竞争，造成落后就不能生存的气氛，技术太落后的要加以淘汰；

——要积极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积极创造条件，采用多种办法培养和选拔懂技术的干部，同时要注意发挥资本家的一技之长，虚心向资本家学技术，学管理；

——企业中的工人不能全招正式工，要采用合同制；

——社会主义商业现在存在着不灵活性、愚蠢性，不能适应地方情况的变化，做生意的人要很灵活，很敏感；

——小商贩可以组织起来，但不要完全并掉，留下百分之十也不要紧，不要改变他们的经营方法；

——学习国外经验时，要从中国的特点出发，不能照搬外国的经验。

由于刘少奇这些意见是在汇报会上用插话的形式提出的，事后也没有经过归纳和整理，不很系统，但对启发大家的思路，指

导当时的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通过这次调查，使刘少奇对我国的经济建设状况，对各部门各行业存在的问题，心中大致有了数，这就使起草八大报告有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毛泽东从外地回到北京，得知刘少奇正在系统地听取各部门的汇报，十分称赞这种方法，表示也要用这种方法做一番调查研究，要薄一波帮他组织。于是，从一九五六年二月中旬到四月底，毛泽东又先后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部委的汇报。刘少奇也多次参加了毛泽东所组织的汇报会。

汇报会结束后，毛泽东集中这次调查研究中的成果，经过政治局几次讨论，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路。

在四月二十五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月二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两次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历史任务，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个主要问题，即十大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这十大关系是：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论十大关系》的提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具有开创性的大事，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探索一条自己的道路。毛泽东一九六〇年六月在《十年总结》一文中这样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一条自己的适合中国的路线。”

此后不久，刘少奇在多次谈话中指出：要强调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用我们自己的经验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不能照抄人家的。任何外国经验只能用作参考，决定问题必须从本国的具体情

况出发。任何外国的经验，包括苏联的经验，可以加以改变而不能死搬。他又说：社会主义制度也有它的缺点，必须不断改进，使它更完善，更适合于各民族经济和社会的情况。把任何一个制度绝对化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和毛泽东先后主持的这两次汇报活动，是建国以来中共中央对经济建设中各方面问题进行的时间最长、内容最系统的调查研究，为中共中央在八大制定正确的经济建设方针做了重要的准备。

在胜利前进的大好形势下，一种盲目追求数量和速度的急躁冒进倾向却在我国经济建设中悄然滋长起来。

这种情况的出现，同一九五五年底提出的“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的指导思想直接有关。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制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提出：“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正在引起全国农业生产的高潮，并转而促进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新的新高潮”，并要求各级党政机关根据以上精神拟定新的规划或重新审定原有规划。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务院各部委纷纷修改了一九五五年夏季在北戴河汇报时提出的长期计划指标，粮、棉、钢、煤四大经济项目的指标比原计划提高了一半以上，完成的时间也被大大缩短。各地区、各部门对基本建设的投资数额越来越大。中央原定一九五六年的基本建设投资控制数字是一百一十二点七亿元，后来增加到二百多亿元。这使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的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全面紧张的局面。

在第一线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长李先念等较早就觉察到这个问题。一九五六年二月上旬，周恩来对国家计委和财政部提出，要对过高的指标

“压一压”。在随后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经过多方工作，基本建设的年度指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压缩。但经济过热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

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中央领导人高度重视这个问题。经过深入调查和冷静分析，他们逐步形成共识：在反对经济建设上的保守主义的同时，必须警惕急躁冒进的倾向，这是关系我国经济建设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警觉。

这年五月，刘少奇主持召开一次中央会议，为即将在六月召开的一届人大三次会议做准备。这次会议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要实行既反保守主义、又反冒进、坚持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刘少奇在会上提议中央宣传部就这个方针写一篇文章，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

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在六月一日召开的部分省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上透露了中央这个精神：“反对右倾保守，现在已高唱入云，有必要再提一个反对急躁冒进。中央要我们写篇社论，把两个主义反一反。”^①

这个精神在中央有关文件上也反映出来。六月四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准备向一届人大三次会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预算报告初稿。这份由财政部起草的报告初稿上，根据五月中央会议的精神写上：“必须全面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十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基本通过预算报告初稿，并提出要加重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会议指定胡乔木对报告初稿作进一步修改。修改后的预算报告进一步加重了反对急躁冒进的分量：

“在当前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着重全面地执行多、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534页。

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

“生产的发展和其他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六月十一日，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初稿送陆定一审阅，同时根据陆定一的意见另送胡乔木一份。陆定一对社论作了几处修改后，六月十二日把社论清样送刘少奇审定。在社论清样上，陆定一写道：“少奇同志：嘱写社论，已由本部王宗一同志写好。我认为可用，特送上请审正。”刘少奇看了社论清样，并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四处主要修改都加重了反冒进的语气。刘少奇又将清样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清样上只批了“不看了”三个字，便退回了。

六月二十日，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虽从两方面提出问题，但着重点强调了反对急躁冒进。社论在谈到当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时指出：

“缺点现在是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些工作中仍然有右倾保守思想在作怪，另一方面是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又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偏向，有些事情做得太急了，有些计划定得太高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的可能性。这是在反保守主义之后发生的一种新情况。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的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一出来，各个系统都不愿别人

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地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来。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就必然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各个部门和各个地方的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有些还未纠正，或纠正得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则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在今后经常注意。”

“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地前进。”

六月十五日至三十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举行第三次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五年国家决算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的决议》中写道：“在执行一九五六年国家预算过程中，必须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年上半年出现的冒进势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本年度的经济建设得以较健康地发展。

在反对急躁冒进的问题上，党的领导层内的认识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毛泽东对社论批示的“不看了”三个字，表露他对反对急躁冒进的不满。但在当时，党内的政治生活比较正常，毛泽东尽管有不同意见，对中央的集体决策还是采取尊重的态度。

总起来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向经济建设，并且经过充分的调查研究，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认识，初步形成了指导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

从一九五六年六月底开始，八大政治报告进入具体起草阶段。

为了写好这个报告，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由刘少奇主持的

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召集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李维汉、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等开会，布置报告的起草工作。这以后的两个多月时间里，无论是在北京，还是中间有一段时间移到北戴河，刘少奇几乎全力投入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刘少奇工作日志”记录下这样一张时间表：刘少奇七月二十三日到北戴河，到八月十七日返回北京，除因接见外宾回京两天外，其余全部时间都用在八大报告的起草上。他常常足不出户，埋头伏案，进行紧张的写作。从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八大政治报告过程稿可以看到，很多文字是刘少奇亲笔所写的。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一直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刘少奇作为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同毛泽东密切配合，协同工作。从七月初到八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先后主持了十九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少数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刘少奇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这些会议。报告起草的每一稿几乎都送毛泽东审定。两人在这期间信函往来十分频繁，很多问题都经过共同商量才最后确定下来。例如：

八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将他连夜起草的“国家的政治生活”一章中的一部分送毛泽东审阅，并附信说：

“主席：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刘少奇 廿四日”

毛泽东当天就给刘少奇写了回信：

“退少奇同志：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作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

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毛泽东 八月廿四日”

“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八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又将“国家的政治生活”一章中关于改进国家工作的一部分改写后送毛泽东审阅，在信中说：

“主席：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四千七百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志（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刘少奇 廿九日三时”

毛泽东在当天的回信中说：

“退少奇同志：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十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毛泽东 八月廿九日”

直到九月十四日，即政治报告在大会宣读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刘少奇送来的“国际关系”部分和“党的领导”部分的清样，并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终于顺利完成了。

在这期间，刘少奇还多次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会议，参与讨论修改党章、起草修改党章报告和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的报告等工作。

八月二十二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七中全会。

会议通过了八大的日程安排，通过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提出的政治报告、党章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草案和关于发展“二五”计划建议的报告等一系列文件。刘少奇出席了这次会议。

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隆重举行。

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一千零二十六人，代表着全党一千零七十三万党员。五十多个来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大会开幕式上致开幕词。他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作政治报告。

这个报告在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的基础上，分析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向全党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基本任务。

第一，在正确地估量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形势的基础上，作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决策。报告指出：“现在，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①“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53页。

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第二，在总结以往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经济建设总方针。这个方针是党中央《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提出的，八大政治报告重申了这个方针，指出：“党中央委员会所建议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是积极的，同时又是稳妥可靠的。发展速度必须是积极的，以免丧失时机，陷入保守主义的错误；又必须是稳妥可靠的，以免脱离经济发展的正确比例，使人民的负担过重，或者使不同的部门互相脱节，使计划不能完成，造成浪费，那就是冒险主义的错误。”^②报告在确定这个方针的同时，对工业、农业、商业、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的发展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第三，适应即将开始的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改进国家工作的任务。报告指出：“为了大大地发展我国的已经开始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彻底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人民民主专政，继续改进国家工作。”^③报告提出的改进国家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一、进一步扩大民主生活，开展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二、适当地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行政管理职权，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三、正确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用更大的努力来帮助各少数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步，使各少数民族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充分地发挥积极作用；四、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的秩序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为了惩治反革命分子和其他犯罪分子，要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

第四，指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新的时期、新的条件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03、227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41页。

下的建设方向。报告认为，党在目前形势下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继续保持正确的、健全的领导”。^① 为了做到这一点，需要全党特别是党的各级干部一致努力。要努力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善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和解决实际生活中的问题；要大大加强对于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在党的各级组织中无例外地贯彻执行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扩大党内民主；在全体党员和干部中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报告最后指出：

“一个好党员、一个好领导者的重要标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劳动状况，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他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不在人民面前摆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同他说。只要我们的党是由这样的党员组成的，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不可征服的力量。”^②

九月十六日，邓小平向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向大会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

来自全国的一千多名代表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和邓小平、周恩来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九月二十七日，大会闭幕。在闭幕式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这个决议是九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通过后提交大会的。决议批准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并写道：

“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41、265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75页。

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我们必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采取正确的政策，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一切有利的条件，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

刘少奇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构成八大政治路线的主要内容。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作了这样的评价：“八大路线是正确的，它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and 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这条政治路线的制定，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在八大精神的指引下，开始了向社会主义建设进军的新的步伐。

九月二十八日，在八大闭幕的第二天，召开中共八届一中全会。这次全会的主要内容是选举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酝酿新的中央领导机构的组成方案和人选，也是八大筹备工作的重要内容。在最初的方案中，曾设想过党的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这个设想已写进了新党章草案），由毛泽东担任主席，刘少奇担任副主席。刘少奇提议多设几位副主席。经过慎重研究，中共中央在七届七中全会上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将新党章草案的有关条款改成“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

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对这个改动作了说明：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四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

有四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①

根据八大通过的新党章的规定，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十七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任副主席，邓小平任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由以上六人组成。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1956年9月13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

三十一、对人民内部矛盾的 调查和思考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在国际上，特别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间产生了巨大反响。但就在这以后不久，东欧某些国家接连发生了一些令人不安的事件，引起中共中央的密切关注。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书记处候补书记胡乔木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这次访问是应苏共中央的紧急邀请，为商讨如何应付波兰国内出现的紧张局势而前去的。

波兰国内出现的紧张局势不是突然发生的。长期以来，苏联对东欧一些国家抱着大国主义态度，实行严密的控制，不断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这些国家的党和政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又犯了不少错误，严重地脱离群众，在人民中积累起强烈的不满。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在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的当晚，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基塔·赫鲁晓夫突然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这个报告立刻在东欧以及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极大的思想动荡。要求摆脱苏联控制、要求社会改革的呼声在波兰以及其他一些东

欧国家中日益高涨。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兰西部的工商业城市波兹南发生由于工人的某些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引起的流血冲突事件。尽管事件很快得到控制，但它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部产生重大分歧，并且愈来愈公开化。

波兰局势的发展引起了苏共中央的极度焦虑。他们认为在波兰党内出现了一股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的倾向，必须坚决制止。十月中旬，苏联开始在通向波兰的交通要道上集结军队，两艘苏军巡洋舰要求进入波兰港口。与此同时，苏联军官指挥的三个坦克纵队包围了波兰首都华沙。十月十九日，正当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开幕的时候，赫鲁晓夫亲率一个包括三名政治局委员、华沙条约国部队总司令、苏军总参谋长以及十余名陆军上将在内的庞大的苏共代表团，在未经波方邀请的情况下突然飞抵华沙，要求波党暂时休会，同苏共代表团举行会谈。迫于苏方的压力，波党只得停止会议，连夜同苏共会谈，但对赫鲁晓夫等人的蛮横态度并未屈服。波兰局势处在十分严重的时刻。

中共中央也关注着波兰局势的发展。十月十九日和二十一日，苏共两次就波兰局势给中共中央发来电报，认为波兰局势十分严重，要求中共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如何处理波兰问题；并要求代表团的规格要高，最好由刘少奇或周恩来率领。接到苏共来电后，中共中央在二十日和二十一日接连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波兰局势和苏共的要求。会议认为，在目前这种关键时刻，中共中央应当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坚决反对苏联对波兰采取武装干涉。^①波兰局势虽然比较复杂，但“看来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走入西方集团”，应当承认目前波共中央的领导，在平等的基础上同它合作，

^① 吴冷西：《回忆毛主席》，新华出版社1995年2月版，第12页。

争取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① 会议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中共代表团去苏联。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毛泽东两次约请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请他向苏共中央转达中共中央反对武装干涉波兰的态度和对波兰局势的看法。

二十三日上午，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启程赴苏，当晚抵达莫斯科机场，在机场受到赫鲁晓夫的迎接。到下榻住地后，赫鲁晓夫不等客人安顿下来，就急迫地向刘少奇等介绍波兰的情况。他一方面向中共代表团承认在对待波共问题上采取粗暴的态度是不对的，对波兰的怀疑也没有根据；一方面又对波兰的现状和今后的发展趋势心存疑虑，希望中国共产党对波兰做些工作。就在中苏两党领导人交谈时，又传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发生动乱的消息。

匈牙利事件是继波兰之后在东欧发生的又一起举世瞩目的严重事件。苏共二十大以后，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政治气氛下，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和社会上一部分人强烈要求改变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要求对匈党在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进行彻底清算，要求摆脱苏联的控制争取独立自主，引发了匈牙利党内的严重分歧，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西方势力乘机积极参与。十月二十三日，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了示威游行的群众队伍。示威游行队伍越来越大，占领匈党和政府的一些机关，发生同保安部队的冲突，造成了流血事件。二十三日深夜，也就是中共代表团到达莫斯科的当晚，局势仍在继续恶化，匈党及匈政府逐渐失去对局势控制的能力。

二十四日，应苏共中央的邀请，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匈局势而紧急召开的主席团会议。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会议上发言。他在发言中，再次强调毛

^①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1956年11月10日。

泽东在北京同尤金大使所谈的对波兰局势的看法，并专门就波兰以及匈牙利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件的原因，对苏共中央提出坦率的批评。他指出，苏联在斯大林时代，在对待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问题上犯了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错误，因此使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正常的状态，这是波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之一。他一一列举苏联在国际交往中不平等对待兄弟国家、兄弟党的事例来作说明。他最后表示，尽管发生了一些问题，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拥护苏联做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心。^①

关于这次发言，刘少奇回国后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报告时这样说过：我在发言中“批评了他们在国际关系中间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中间的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的倾向，并且指出了他们在一些具体事情上的一些缺点错误。我们算是比较坦率地这么讲了一次”。^②

二十六日和三十日，中共代表团又两次出席苏共中央为讨论波匈局势而举行的主席团会议。在会议中，中共代表团一方面尊重苏共中央的意见，一方面也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团结的大局出发，提出自己对波匈局势的看法及处理意见。三十日，中共代表团从苏方得知匈牙利国内局势继续恶化、全国处于无政府状态、反政府势力已占优势的情况以及苏共中央对此态势已经绝望、准备从匈撤出军队、放弃努力的态度后，紧急讨论了一整天，并把讨论的结果在电话中向北京作了请示汇报。在晚上举行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向苏共中央提出反对苏军撤出匈牙利，认为在现在这种局势下苏军撤出匈牙利，把匈交给使用暴力手段的反政府势力是不妥当的。

中共代表团的意见对苏共中央的决策起了重要作用。三十一日晚，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共代表团成员启程回国，赫鲁晓夫以

^{①②}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1956年11月10日。

及苏共中央主席团的主要成员到机场送行。在机场举行的会谈中，赫鲁晓夫告诉中共代表团，苏共中央经过开会研究，已经决定在匈牙利采取进攻方针，尽全力挽救匈的局势。

刘少奇一行在十一月一日回到北京。到京后，连夜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汇报一直持续到次日清晨。

这以后，波兰和匈牙利国内的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但这件事给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共领导层以强烈震动，引起他们的深思。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刘少奇等人的汇报并对东欧局势进行讨论。中央决定，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由刘少奇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详细通报东欧的情况以及从这次事件引出的经验教训，以期引起全党的警觉。

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中共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着重讨论了国际形势和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

十日，刘少奇在全体大会上作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在向大会通报了东欧的局势和这次访苏的有关情况后，刘少奇着重谈了波匈事件产生的原因和我们应当采取的方针。

他说：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其特点是一个广大群众的反苏运动，因此也牵扯到苏联，牵扯到苏联一些工作上的缺点和他们党内的一些缺点。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过多地建设重工业，牺牲轻工业，牺牲农业，一直到现在人民生活没有改善，生活很苦，而国家领导人又学苏联一套，享受特权，引起群众不满，所以发生了“大群众运动”；这些国家照搬苏联的经验，搬了十年也不灵，于是就丧失信仰，对苏产生反感，而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又损害了他们的民族尊严，激起群众的反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否定过去的一切，在这些国家的党内引起很大

的混乱，这是批判斯大林的副作用；在波匈事件初期，苏联的处置不当，特别是波兰事件，调动军队，用粗暴的办法对待他们。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应当采取的方针时，他指出：在对待各国兄弟党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要特别保持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关系，中苏两国两党关系的好坏是决定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局势的关键。更重要的，我们要认真把中国的工作做好，只要中国的工作做好了，就可以影响其他一些国家。^①

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刘少奇把话题转向国内。他郑重地说：“为了把我们的工作做好，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以及我们国家的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员，无论如何也不要脱离工农劳动群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②

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在工人阶级执政的国家里面，就是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面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也有一种条件，产生工人贵族这种阶层？如果我们不注意，让其自流的话，在我们这些国家，也可能产生一种新的‘贵族阶层’。在工人阶级里可以产生，在共产党里面也可以产生。我想是有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如果我们注意了的话，如果我们采取一些办法的话也不一定产生，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我个人想了想，昨天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也谈了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们要采取一些办法，采取一些措施，要提起注意，在党内、在人民中间进行教育。此外，还要规定一些必要的制度，使我们这个国家发展

^①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记录，1956年11月10日。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43页。

下去将来不至于产生一种特殊阶层，站在人民头上，脱离人民。”^①

刘少奇提出：为了防止在我们的国家里面产生一种站在人民头上的特殊阶层，首先要在人民和干部中间进行教育，要批判特权思想、站在人民头上的思想、社会沙文主义的思想、主观主义和命令主义的思想、官僚主义的思想；其次要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机关的监督，订出一种群众监督的制度，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接近人民群众；同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应有一定的限制；国家领导人员的生活水平应该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过分悬殊，一些特殊的待遇应该取消；此外还有警卫制度等，在人民中间引起不好影响的也应该取消。他还设想，资本主义国家的有些制度，例如退休制度等，我们也可以参考。

当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政局动荡之际，我国社会上也出现一些不稳定因素，群众闹事的现象逐渐增多。正如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年年初在一次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说：“一九五六年这一年，无论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都是一个‘多事之秋’。”

一九五六年上半年，中国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在这种社会大变革的情况下，原有的矛盾基本得到解决，而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又逐渐产生和突出出来。刘少奇一直注视并思考着新形势下出现的种种新问题。一九五六年年底，他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说：“有一些资本家，他每年分的定息很多，有分到百把万元，几百万元的，他一家子一年用不了这么多钱，如果他们要盖工厂，是否可以准许他盖呢？可以的。”他从这里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几的社会主义，有百分之几的资本主义，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643—644页。

我看也不怕。”“有这么一点资本主义，一条是它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另一条是它可以在某些方面同社会主义经济作比较。”^①当时，更引起他注意的是：由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合理和不完善的地方，由于在我们的领导机关中还存在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弊病，加上苏共二十大全盘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在社会上造成的波动，使社会上新产生的矛盾和问题有些在激化起来，出现一些群众性的闹事。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春，在我国城市大约有一万名工人罢工，一万名学生罢课，农村中也有少数农民闹退社、分社以及上访告状等。

究竟怎样看待社会上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正确地加以解决，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全新课题。

最先从理论上给予回答的是毛泽东。他在提出《论十大关系》的基础上，对人民内部存在的种种矛盾进行了深入研究。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四日，他在致黄炎培的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②一九五七年一月，他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再次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并把这个

^① 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2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6年12月29日。

^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514页。

问题提到相当重要的程度，说：“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①接着，他在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在这篇著名讲话中，他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敌我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它可以不经过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而由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加以解决；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在刘少奇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前面讲到，一九五一年，他在读邓子恢和高岗关于工会工作的两篇文章后所写的读书笔记中，就已使用“人民内部的矛盾和关系”^②这样的用语，并且预见到：这种矛盾和关系“已经在中国开始建立起来，在今后还会长期大量地发展”，“应该用同志的、和解的、团结的办法来处理这种矛盾和关系。”^③一九五六年四月，他在向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祝词中又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但是这种矛盾不是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解决这种矛盾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劳动群众的自觉的努力，通过教育和批评的方式，不断地把落后提高到先进的水平。”^④

由于刘少奇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思考，因此，当毛泽东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后，他立即表现出强烈的理论

① 毛泽东：《在省市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月。

②③④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94、93—94、196页。

兴趣并用来指导实践，是很自然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提出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的建议后，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提出的思想不但对解决当前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将产生深远影响，应该抓住这个机会，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不断地深入和丰富。会议结束后，他决定抽出一段时间，到社会基层对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一次深入广泛的调查，并且约请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等单位有关干部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调查组。

二月十八日，刘少奇和调查组一行乘专列从北京出发，沿京广线南下，先后在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郑州、许昌、武汉、长沙、株洲、广州等地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状况进行调查，到四月十四日返回北京，历时近两个月。在调查中，刘少奇紧紧抓住社会矛盾比较尖锐和人民群众意见比较集中的问题，一方面听取沿途各省市领导人的汇报，同他们交换意见，另一方面深入到工厂、学校和农村，通过实地考察、与群众交谈、开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在调查的同时，他认真研究群众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在沿途向干部和群众宣传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解答干部群众中存在的许多模糊的或不正确的认识。

“对农村中群众意见强烈的问题，刘少奇十分关心。在第一站保定时，去满城农村的调查人员向他报告：老百姓最不满意的是，大队范围内，好多个生产队，统一分配。一年下来以后，把好的生产队的粮食一车一车往差的队拉。农民讲，每拉一车就揪心，但又不敢反对，心里难受得没法忍受。到县里，干部讲了一个情况：过去单干，自己干自己的，也要民主，但民主少一点，影响农民的生产和生活还不大；现在搞集体了，每家每户的事同

集体密切相关，领导干部如果不注意民主，非坏事不可。刘少奇听了后说：‘这就叫人民内部矛盾啊，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上级之间，这个集体和那个集体之间，群众和领导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①

如何对待群众闹事问题，是较为紧迫的问题，也是刘少奇这次调查研究的重点。调查组出发前，他对调查组成员说：“现在发生工人、农民、学生闹事情，我们要好好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情？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情的群众采取什么政策？”他说：“现在地主阶级已经消灭，反革命已基本肃清，帝国主义也赶走了，因此，和敌人的矛盾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这是主要的了。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对于闹事者，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人民内部闹事是个新问题，我们不想好办法，将来要吃大亏。”^②

在保定、石家庄、新乡、郑州等地，刘少奇先后听取一些工厂工人罢工和学校学生罢课情况的汇报，同工人代表和师生代表进行座谈。深入了解情况后，他向河北、河南等省的省地委书记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现在群众中出现的闹事几乎都是从经济性质的切身利益出发的，基本上没有带有政治目的的活动，因此，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畴，是可以通过说服和教育加以调解的。在谈到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时，他指出，除了群众中存在过

^① 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8年4月16日。

^② 刘少奇同调查组成员谈话记录，1957年2月18日。

高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外，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领导机关的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造成的。因此，闹事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可以纠正我们工作中的官僚主义，纠正我们的错误。要使群众不闹事或少闹事，除了要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更重要的是要克服领导者的官僚主义。“了解群众的情绪，了解群众的要求，了解群众的一切情况，克服了官僚主义，问题就解决了。”^①即使群众的要求过高或一时还无法满足，也要耐心地向群众解释清楚，群众会通情达理的。他告诫党的各级干部，由于官僚主义现象在党内和政府中不可能一下子完全肃清，因此群众闹事问题也不会完全杜绝，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逐步总结出一些处理的经验来。我们应该“以人民闹事教育我们的干部，教育我们的同志，也教育我们党。我们是没有受过这个教育的，如果经过几次闹事，我们党就会成熟起来”。^②

对这个问题，刘少奇并不是就事论事、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去处理，而是通过群众闹事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进行深层次的思考。他认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以后，对抗性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说明我们的社会制度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适应或不尽完善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各级领导机关认真对待，不断加以解决。他在调查中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改革意义的主张和设想：

第一，要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使它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

在河北、河南调查时，刘少奇了解到，一些农业社不顾客观条件一味追求办大社，造成许多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闹退社。

^{①②} 刘少奇在中共河南省委市委书记会上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4日。

他感到，这个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当前某些生产关系同我国比较落后的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问题，应该注意生产关系的调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听取河南新乡地委汇报农村工作时提出：“大社现在是在办多了。生产单位、分配单位、经营单位小一点，这与生产力是手工生产相适合，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①

分配问题，一直是刘少奇在调查中十分关注的问题。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②分配问题不仅包括在群众中很敏感的工资问题、住房问题、生活待遇问题，也包括带有全局性的诸如积累与消费的比例，国家预算中国防费、行政费、文教费和经济建设费的分配比例，各地区之间的投资比例等等。这些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问题，只有把它们理顺，才能减少矛盾，调动起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指出：“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上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如果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严重错误，搞得一部分人不高兴或党内的团结不那么好，情绪不那么高，那就损害了经济基础。”^③

第二，要把经济搞活，使我们的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灵活

^{①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328—329、336—337 页。

^③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341 页。

性、多样性。

刘少奇在湖南、广东等省调查时听取省委领导有关商业和市场的汇报，并且到广州的自由市场进行考察。他了解到，自由市场问题是在干部和群众中议论得比较多的问题，个体商贩在同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竞争中产生了一些矛盾，商业部门的某些干部为了减少矛盾，主张关闭自由市场。刘少奇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自由市场实际上给现实经济生活提出了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生活，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是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在这方面，苏联就是一个教训。他们搞计划经济，但是把灵活性、多样性搞掉了，把经济搞得简单、呆板。在这方面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他提出：“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①在提出利用自由市场的同时，刘少奇还提出，为了使社会主义经济既有计划性，又有多多样性和灵活性，必须增加地方和企业的自治权利，以及在一定的限度内允许个人的经济活动，甚至允许有个人的经济发展计划。他说：“地方、企业以及个人必须有一定范围的经济活动的自由，没有这个自由，社会主义经济就不可能有多多样性和灵活性。”^②

第三，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改革某些多年沿袭下来的、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为人民群众解决一些关系切身利益的实

^{①②} 《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中央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91—192、193页。

题。

这里，最突出的是学生升学问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人们对文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原来没有钱供孩子上学的家庭，现在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受到较好的教育。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全国出现学生升学难的问题。要求上学和升学的人越来越多，而国家由于经费有限，不可能增办很多学校，因此很多适龄青少年不能继续升初中、升高中或是升大学，群众意见很大。到一九五七年，这个矛盾更加尖锐，一些地方出现学生上访请愿。刘少奇在调查时十分注意这个问题。他在河北、河南、湖南等省多次召开学校师生代表和教育部门的座谈会，了解情况，倾听群众呼声。在调查中，他逐渐形成提倡多种办学形式和号召学生勤工俭学的主张。三月二十日，他在湖南听取省委汇报文教工作时提出：学校历来都是民办的，清朝只有些书院是国办，其余都是民办的。而我们采取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政策，这样国家负担不起。办学校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不仅国家办学，工厂、机关、农村合作社等社会团体也可以办学，私人也可以办学。另外，小学戴帽班（即在小学里附设初中班）、民办业余补习学校等也要搞。总之，要多种形式一起上，才能解决学校不足的问题。^①

刘少奇还提出，对那些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困难、无力支付学费和生活费的学生，要提倡勤工俭学。即使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太困难的学生，开展勤工俭学活动也是有益处的。这样，既增加学生们的就学条件，又帮助学生培养独立生活能力。他认为：“开展课余劳动，提倡勤工俭学，有可能成为解决学生学习费用困难和普及教育的一个重要途径。”^② 一起参加调查的《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根据刘少奇的讲话精神整理了一篇社论《提倡勤工

① 刘少奇在中共湖南省委汇报文教工作时的讲话记录，1957年3月20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14页。

俭学，开展课余劳动》，经刘少奇审改后刊载在一九五七年五月五日《中国青年报》上。

当然，即使学校增多了，办学条件改善了，也仍然会有一些学生升不了学。这部分学生怎么办？刘少奇认为，国家对这些学生不能不管，应当采取负责的态度，分别情况，做好统筹安排。在湖北、湖南等省召开的中小学代表座谈会上，刘少奇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提出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问题。他说，在中小学毕业生中，应当有两种思想准备，首先是努力学习，争取升学，而一旦升不了学，就要准备就业。“就什么业呢？大家知道，国家机关、事业机关和企业单位现在都在精简机构，调整人员，一两年内，这些机关和单位虽然可能从复员军人、中等专业学校和一部分高中毕业生中招收一些职工，一部分企业可能招收一些学徒，但是数量不会很多，而是很少。此外，某些城市里的服务行业（例如理发、成衣、饮食等）和某些手工业，还需要增加一小部分学徒和职工。但是，就全国说来，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小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①刘少奇认为，在这个问题上，需要转变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在一些学生以及他们家长的思想中存在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他们感到下乡种地“丢人”、“没出息”、“没有前途”、“吃了大亏”。刘少奇在同中小学毕业生代表座谈中鼓励他们：青年人要树立远大理想，不要怕自己一时吃亏，要相信，在农村中，学到的知识是大有用处的。同时，青年人在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也不要停止学习，要利用业余时间和农闲时间继续学习，将来有机会还可能上大学。

刘少奇感到，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个问题是关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79-280页。

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情，应该广泛宣传。于是，就布置随同他一起调查的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邓力群就这个问题写篇文章。邓力群根据刘少奇三月二十二日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成一篇题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文章。文章经刘少奇修改、审定并报中央后，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在四月八日发表。刘少奇在三月三十一日将文章送中央时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的信中说：“各地学生和教员以及家长，为了升学问题，情绪都十分紧张。在没有听到认真的解释以前，不少学生准备在不能升学时闹起来，在听到这种解释以后，不少的人也觉得下乡种地是有前途的，不丢人的。因此，现在十分需要有这样一篇文章。”^①

《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和《提倡勤工俭学，开展课余劳动》两篇社论的发表，在全国大中小学学生以及他们的家长中间引起较大反响，对解决社会实际问题和缓解人民群众紧张情绪起了积极作用。

城市住房问题是群众反映强烈的又一个突出问题。建国以来，特别是大规模开展经济建设以来，城市人口的数量增长很快，住房问题日益紧张起来。新中国成立后住房一直采取由国家包下来的制度，一方面群众伸手向国家要，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全部满足要求，包括群众的一些合理要求，因此群众意见很大。这个问题引起刘少奇的深思。他在河北邯郸峰峰煤矿、河南郑州国棉三厂、纺织机械厂和湖南株洲国营三三一厂（湘江机器厂）等厂矿企业视察时，就职工住房问题做了专门调查。他了解到，国营企事业单位每年都要为盖职工宿舍花很多钱，而由于国家规定的房租很低，国家不但收不回投资，反而还要补贴房屋维修管理费。郑州国棉三厂和纺织机械厂在一九五六

^① 刘少奇给杨尚昆的信，1957年3月31日。

年一年里补贴了九万元，株洲三三一厂补贴了十三万元，企业负担很重。针对这种状况，刘少奇提出了组织房屋合作社，由职工自己集资、公家帮助，来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的新思路。他设想，个人自己解决住房比较困难，组织房屋合作社后，大家集资，优先解决住房最困难的职工，单位给予一定的帮助，国家在土地使用、建筑材料、施工等方面给予优惠。这样，就可能比较快、比较节省地解决职工住房问题。由于住房属于职工个人所有，不需要交房租，还可以出卖、出租、出典，等于存一笔钱，职工个人也有积极性。他还设想，要让职工自己盖房子，就必须提高现有公房的房租，大体上要提高到能够维持日常维修费和一定比例的折旧费。加了房租以后，对真正有困难的住户，宁愿给一点救济，房租还是要加。他认为，解决群众住房问题是一个带有方针性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求得解决。在株洲三三一厂调查时，刘少奇要求他们先行试验，待取得经验后再向全国推广。

株洲三三一厂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经过几个月实践，写出《国营三三一厂关于停止国家投资建设家属宿舍，合理提高房租，实行水、电、家具收费，并组织职工走自建道路的专题报告》，在当年十一月报送中央和刘少奇。刘少奇十分重视这份报告，分别批给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请他们加以研究。他在给中共中央工业部部长李雪峰的批示中写道：“这一个关于解决职工宿舍问题的初步典型经验，值得重视。前寄来一份，已转周总理交有关部门研究。这一份请你们加以研究，似可在报纸上适当报道。”十二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职工宿舍问题怎样合理解决？请看湘江机器厂的好经验》为题报道了株洲三三一厂解决职工住房的经验，并配发了题为《一个解决职工宿舍问题的好办法》的社论，在全国范围内宣传了改革住房制度的思路。刘少奇对《人民日报》的报道和社论作了认真的修改审定。

第四，要重视领导者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防止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产生。

刘少奇在调查中感到，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的矛盾上，这应当引起各级领导的警觉。如何处理好这种矛盾，关键在领导方面。他在调查过程中多次对各地的领导干部说：“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①他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信任群众，有事同群众商量。针对一些干部在处理问题时把自己摆在和群众对立的地位、站在群众之上、指责群众、命令群众的现象，他严肃地指出：

“恩格斯讲过，要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我们党、政府、国家、经济机关的领导人，本来是人民群众的公仆，社会的公仆。现在我们有同志已经变为老爷，把人民群众当作仆人，自己还不自觉。这是错误的。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因为不这样，他就不能把群众当作跟自己一样的人来看待，处理人民群众内部的事情，就不能把普通的工人、普通的农民、普通的学生与我们党员和干部一样看待。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不信任群众，群众是不会信任我们的。”^②

某些领导干部在生活待遇上搞特殊化、严重脱离群众的情况也引起刘少奇的注意。调查结束后，他在一次党内干部会上说：“我参观了一些工厂，厂长、总工程师或者党委书记住的房子是一幢幢的公馆，是新盖的，处长又是一幢房子，科长又是一幢房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03、307页。

子，其他干部又是一幢房子，工人宿舍是另外一幢房子。等级分得很清楚，甚至厂长、处长、科长的办公室里面，住的宿舍里面，几个台子、几个沙发、几个凳子都有等级。我看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开始萌芽了一种等级制度，社会主义之下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是一种封建制度，我们抄袭了封建制度。”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如果有这种制度开始萌芽，我看应该废除。那些生活待遇上要求很高的人我看是危险的，将来会跌交子。这方面我看应该有所改变。”^①

刘少奇这些语重心长的告诫，及时地向全党干部敲了警钟。

四月十五日，因为要接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访华，刘少奇结束了这次历时近两个月的调查，从广州回到北京。

毛泽东对刘少奇这次调查很重视。四月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成员会议，听取刘少奇对这次五省调查的情况和对有关问题想法的汇报。会议从晚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

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陪同伏罗希洛夫主席访问上海时，应上海市委的要求，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报告。这个报告是对他南下五省调查的比较系统的总结。报告中，他又一次明确提出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主要矛盾的论点。他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土地改革以后，主要矛盾就转了，帝国主义赶走了，地主阶级经过土地改革也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也消灭了，主要矛盾就变成无产阶级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04、305页。

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讲了这个问题。这些矛盾都基本解决了，那么现在什么矛盾是主要的？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①

他提出：矛盾的性质变了，我们解决矛盾的方法也要随之改变。“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如果采用处理对抗性矛盾那样的办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那是在根本方针上面犯错误。”对待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而应当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和风细雨”的办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们当前的一项主要工作。他还详细谈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和正确的处理办法，批评了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的几种错误观点。

在毛泽东倡导下，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围绕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而展开的学习热潮。刘少奇南下五省的调查和他在沿途讲话中所发表的重要思想，对推动这次学习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这个学习的深入，由毛泽东发起，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旨在整顿党内思想上和作风上的缺点错误的整风运动。

这场整风的最初方针，毛泽东四月二十七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中央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中说得很清楚：整风“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在整风的前一阶段，无论是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还是毛泽东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96页。

本人，对整风都抱着殷切的期望。五月十日，上海《解放日报》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了报社邀请二十二位中小学教师座谈后整理的发言摘要，反映了领导机关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毛泽东阅后在报纸上批示说：“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他还说：“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五月二十二日，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发言中说：“我们党实行整风，很有必要。现在党外有很多的意见，党内也有意见，相当严重地脱离群众，不整风，我们党就会慢慢地毁灭掉。党外人士的意见，百分之九十是正确的。有些不正确的意见，不要忙，不要一下子顶回去。”

然而，政治局势的发展是复杂的，有时是出人意料的。为数很少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利用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的机会，恶意向党进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从六月初开始，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方法，对资产阶级右派进行反击。于是，整风运动转向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并且迅速扩大化了。

七月十七日到二十一日，刘少奇参加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这次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进一步讨论反右斗争问题。

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不仅把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使许多有才能的人长期受到委屈和压抑，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更严重的是，改变了原来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在指导思想迅速向“左”发展。九月二十日到十月九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刘少奇出席了会议。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重新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

主义道路的矛盾，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改变了党在八大提出的“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正确结论，也改变了毛泽东本人在整风之初提出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思想。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这个变化，并不符合中国实际情况。一旦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便会越走越远，一直发展到形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严重的挫折。

由于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和指导思想的改变，中共领导集体从一九五七年初开始的对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的探索，没有能按照原来的思路继续下去。然而，刘少奇对在这一时期中形成的许多具体主张并没有放弃，在以后的工作中仍在继续探索着。

三十二、在“大跃进”的热潮中

在八大确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指导下，一九五七年经济战线取得了建国以来的最好成绩，第一个五年计划胜利超额完成。但是，在这样的有利形势下，经济建设中又发生了急于求成、严重违背客观经济发展规律、对中国以后的发展造成巨大影响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大跃进”的发动，起端于对“反冒进”的错误批判。对一九五六年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提出的“既反保守主义，又反急躁冒进”的方针，毛泽东当时没有明确表示不同意见，但内心是不同意的。从一九五七年下半年开始，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的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指责。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反冒进的方针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给群众泼了凉水，是右倾保守，是‘促退委员会’，在政治上、经济上带来了不良后果。”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南宁召开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把对反冒进方针的指责推向高潮，提出：反冒进是政治问题，泄了六亿人民的气。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这三样东西。他尖锐地批评《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冒进》，说这篇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

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是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其中有些话是“尖锐地针对我们”，“是用毛泽东来反对毛泽东”。一九五八年三月在成都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一九五八年经济计划和预算，毛泽东再次提出反冒进问题，说就是要和反冒进对立起来，反对慢的路线。

刘少奇出席了这些会议，深深感到毛泽东批评的严重性。尽管毛泽东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当时主持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人周恩来、陈云等，并没有点刘少奇的名，但作为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并参与制定反冒进方针的刘少奇，深感自己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出于对毛泽东的信服和顾全大局，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也作了自我批评。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成都会议后一阶段转为开思想座谈会，由刘少奇主持。他在三月二十六日的发言中检讨说：自己的设想“同主席的设想是有距离的”，主席的设想“确实是高明，使人折服”。以前对建设速度估计不足，没有料到水利、生产运动发展得这样快。是否可以再快一点，还是有可能的。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我觉得快点慢点都可以，“没有意识到是一个方针路线的争论”。刘少奇接着表示，人们往往容易看到急性病，而忽视慢性病的危害。慢性病的损失不亚于急性病，我们要注意发现慢性病，去及时纠正它。“从当前来讲，右倾保守的危险还是主要的。”急性病也要防止，但即使有些地方在建设上犯了急性病的毛病，也并不可怕。^①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会上也先后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指责，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在这种气氛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和八月在北戴河召开

^① 刘少奇在成都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3月26日。

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达到了高潮。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根据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全国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每年举行一次的规定，于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开的。大会第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报告。这个报告是经毛泽东和中央其他负责人反复讨论修改，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

报告在充分肯定八大一次会议以来各方面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后，对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作了说明。报告说：“在过去几年中，党的领导力量主要放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今后也还必须继续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从现在起，已经可以而且必须集中更大的力量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了。”报告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把建设速度问题放在异常突出的地位，认为：“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

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报告号召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又一次不恰当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认为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发生的个别的缺点同当时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相比，是很小的，很好解决的，“但是当时有一些同志不适当地夸大了这些缺点，对于当时取得的伟大成绩却估计不足，因而认为一九五六年的跃进是一种‘冒进’。在反对所谓‘冒进’的这种空气下面，多快好省的方针、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竟然受到某些人的怀疑。其结果是损害了群众的积极性，影响了一九五七年生产建设战线上特别是农业战线上的进展”。

报告重申了毛泽东提出的“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这是毛泽东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的，后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祝词和《人民日报》社论中多次作过宣传，这次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正式提出，表明它已规定为全党的行动目标。

刘少奇对“大跃进”确实抱着满腔热情。他在报告中兴奋地说：“我们现在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伟大的飞跃发展的时代。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大批敢想敢说敢做的人，敢于破除迷信、革新创造的人，依靠这样的人，我们才能够领导全国人民跃进再跃进，多快好省地完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毛泽东在会议上多次讲话，号召全党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反对“观潮派”、“秋后算账派”，提出要插红旗，辨风向，把白旗拔掉。中央其他负责人和各省市区、国务院各部门的负责人也纷纷在会上表态，要以“大跃进”的精神加速经济工作的进行，提出过高的生产指标。当时，许多人只是有着加快建设的善良愿望，而对怎样进行建设却并不熟悉。会上所提出的目标，夸大了主观意志的作用，脱离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八大二次会议作了这样的评价：“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略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在北戴河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的思路，并且把它的不正确方面更加大大发展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上一年钢产量翻一番而奋斗。会议作出《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问题的决定》，要求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斤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达到三千万吨；提出在今后五年中，“我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要求在全国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认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当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会后，全国很快形成全民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刘少奇也出席了这次会议。

全国范围内迅速到来的“大跃进”局面，使刘少奇思想上产生急剧的变化。正如他后来总结教训时所说：一九五八年上半年的形势，使我们“感到惊喜和振奋”。在这样的心态下，刘少奇对“大跃进”初期的发展趋势，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信心。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刘少奇在接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新任驻华大使汪戴尔时说：“由于各方面工作的大跃进，过去拟定的计划指标太低了，需要大大地修改。我们提出了十五年以后赶上英国的口号，按目前情况看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时间，估计十年就可以赶上了。我们没有公开宣传，但是心里是作了那样的打算的。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做很大的努力，各方面工作都需大跃进。”^①

刘少奇七月五日在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座谈时表示出更加乐观的情绪：“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十五年赶上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国家大有希望，大有前途，超过英美就变成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多数人可以看到共产主义。”^②

但刘少奇一向是尊重实际的。随着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已在一步一步暴露出来，刘少奇开始从这种过分乐观的情绪中逐渐冷静下来。

遵照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提出要“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的建议，刘少奇在一九五八年二月至十一月中，多次外出各地视察，累计长达一百二十多天，占这十个月中百分之四十的时间。除参加中共中央在成都、广州、郑州、武汉等地召开的会议外，他先后视察了北京、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省市的农村和厂矿基层单位。在视察中，刘少奇一方面为全国人民响应党中央号召所焕发出来的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所鼓舞，另一方面，也为一些不讲科学、不顾客观条件的做法和弄虚作假、虚报浮夸的现象而不安。

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到河北省徐水县视察遂城和商庄两个人民公社。徐水是当时风靡全国的“共产主义”试点县，虚报浮夸风盛行。当县委负责人汇报今年有的地方一亩小麦播撒种子七百至一千斤时，刘少奇产生了怀疑，他对县委负责人说：

^① 刘少奇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驻华大使汪戴尔谈话记录，1958年4月11日。

^② 刘少奇在石景山发电厂工人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58年7月5日。

“一千斤种子就是一千五百万棵苗，这恐怕草也长不起来吧！”“我提议你们算一笔账，算一算种一亩高产作物用多少人工、肥料、畜力、水等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种十亩（普通作物）用多少成本费，收多少粮食，看哪个合得来。”^①

徐水的“共产主义新村”，其实只是在一些房子上分别挂上“食堂”、“俱乐部”、“养老院”、“托儿所”的牌子，不要说没有新房子，连必要的设备都没有。在视察徐水的商庄人民公社时，刘少奇针对县里和公社的干部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并把全民所有制误认为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对陪同的公社干部说：“全民所有制不是共产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叫共产主义不好。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标准很高。”^②在视察结束后同县委负责人谈话中，刘少奇进一步阐释了他的想法：你们积极向共产主义设想，这个积极性是好的；把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这是一定要变的，但转的方式方法和步骤要很好研究，不要很急；由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也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叫社会主义。什么叫共产主义呢？社会产品和思想觉悟道德水平、文化技术水平有极大的提高，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消灭了，实现了“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才叫共产主义。这个标准很高，不要把共产主义标准降低。^③

十月中旬到十一月中旬，刘少奇到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地视察。随着调查的深入，看到全国各地虚报产量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报纸宣传也不加核实地加以报道，他更加忧虑了。在宁波视察时，他对地方负责人说：“现在许多地方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的不符合实际，不能全怪报纸，是你们地委县委自己

^① 刘少奇视察河北省徐水县谈话记录，1958年9月。

^{②③} 刘少奇视察河北省徐水县谈话记录，1958年9月。

报的。问题是干部作风问题，要反对说假话，要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实一点。”^①

视察回京，在一次他和身边工作人员参加的支部生活会上，刘少奇坦率地谈到对目前国内状况的忧虑，并对自己前一段时间的盲目乐观情绪作了自责。他说：“我在山东、河北视察时说过要泼点冷水，现在我也要给你们泼点冷水，让大家的头脑都清醒清醒。对群众的积极性要爱护，不能泼冷水。问题的关键在于领导。有些事，我们没有经验，调查研究不够，受点挫折是难免的。但当前的许多不实事求是的做法、不科学的口号，特别是这股浮夸风、吹牛风，并不完全是由经验不足和调查不够所造成的，我们绝不能任其发展了。有时，我的头脑也有点热，说过些过头话，我向支部作检查。”^② 他对石油工业部余秋里等又说：政治鼓动不是生产力，只是解放生产力。如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好像人的“胆”就是生产力，这是唯心的。^③

刘少奇觉察到的问题，毛泽东也觉察到了。为了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中共中央从一九五八年冬起，相继召开多次会议，包括：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至十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十一月二十一日至十二月七日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二月一日在北京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五日在上海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等。

毛泽东在这些会议上发表的讲话和会议的文件，对纠正“共

^① 刘少奇同浙江省宁波地委负责人谈话记录，1958年11月5日。

^②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78-79页。

^③ 刘少奇在听取余秋里、李人俊、康世恩等汇报时的讲话记录，1959年2月16日。

产风”、“浮夸风”、高指标等错误取得了初步的成效。对毛泽东的这些意见，刘少奇是赞同的。但由于这些会议是在肯定“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的前提下提出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对已出现的问题的严重性和它可能导致的后果也认识不足，因而纠偏的努力仍是不坚决和不彻底的。这从刘少奇在人大常委会的讲话中也可以看出来。他说：去年的跃进，是全面的大跃进。不过，去年的大跃进也有一些缺点。我们的缺点就是对于有些东西的生产注意不够或者没有注意，因而引起经济上某些方面的失调。缺点是应该承认的，也可以指出来，但过分责备便没有必要。这些缺点以后还会不会发生呢？我看还是可能发生的。不过缺点总是越来越少，经验则是越来越多，事情也会越做越好的。^①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当选为副主席。

刘少奇是继毛泽东之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这以前，毛泽东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提出，为了集中精力研究重要问题，摆脱日常事务的干扰，希望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了毛泽东的建议，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通过决定，同意毛泽东提出的不做下届国家主席候选人的建议。会议的决定中说：“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

在酝酿新的国家主席人选过程中，曾考虑过几种方案，其中

^① 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06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2月5日。

包括当时正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朱德。朱德提议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他在给邓小平和书记处的信中说：“我提议以刘少奇同志为国家主席候选人更为适当。他的威望、能力、忠诚于人民革命事业，为党内外、国内国外的革命人民所敬仰，是一致赞同的。”^①朱德的信表示了对老战友的推崇和信任。

中共中央接受了朱德的提议。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旬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一致通过以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向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议的国家主席候选人。邓小平在四月五日所作的《两个问题的说明（要点）——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报告中，对这个问题作了说明：“国家主席有好几位同志可作，如朱德同志，如党内几位老同志，都可以作，但是大家考虑的结果，以少奇同志担任这个职务，比较更为适当些。国家主席不单是一个很高的荣誉职务，而且有一些相当具体麻烦的事要做，例如出国、会谈、接待等等。所以，以少奇同志的能力和资望，以他现在在党内所负的责任，出而兼任国家主席职务，是比较好的。”^②

在四月十五日召开的第16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就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征求党外人士的意见。毛泽东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提的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内主持工作的，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从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已经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的

① 朱德给邓小平和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信，1958年12月29日。

② 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的报告，1959年4月5日。

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国家主席比较合适。是比较起来讲，不是讲朱德同志不适合，比较起来少奇同志更适合一点。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①

在党的会议上，刘少奇多次作过推辞。但在八届七中全会作出决定和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选举后，他接受了这一崇高的职务，并承担一系列国务活动。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十日，刘少奇、宋庆龄、董必武等新当选的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会见各国驻华使节。

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发布特赦令：根据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的决定，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实行特赦。

建国十周年时，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庆祝活动，苏联、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等国派出重要代表团来华祝贺。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主持庆祝活动。九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主持隆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祝大会，致开幕词和闭幕词，并对前来参加庆典活动的各国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在庆典活动期间，刘少奇先后会见了各国代表团。

刘少奇把担任国家主席看作是当人民的勤务员。十月下旬，他在接见出席全国群英会的劳动模范时，对北京市清洁工人时传祥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段话，表露了刘少奇在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真实心情。

但就在这个时期，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一九五八年底开

^① 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4月15日。

始的虽然还不彻底的纠“左”努力在一九五九年夏季又遭到意外的挫折，这个曲折发生在庐山会议上。

一九五九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原定议题是进一步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继续解决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会前，毛泽东于六月十三日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当前工业、农业、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庐山会议需要讨论的十三个问题（会议开始时增加为十八个问题）。

刘少奇在七月一日到达庐山。对会议达到预定的效果，刘少奇是抱有信心的。在会议初期，刘少奇参加了华中、华南小组的讨论。他在七月四日的发言中说：一九五八年我们取得了大跃进的伟大成绩，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乱子，得到了极有益的教训。碰了钉子，知道转弯，这是真正的聪明人。不碰钉子而知道转弯的“聪明人”是没有的。全党全民都得到了经验，也碰了钉子，全党全民变得更聪明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这是了不起的收获。不应当因为碰了钉子而失望，而抱怨。碰了钉子就转弯。大家注意，在转弯的时候，千万不要泄气，而要更好地鼓气。^①

七月九日，刘少奇在华中、华南小组会上又说：国民经济的发展是要综合平衡的。你不管它，它要管你。它不向你让步，你要向它让步。什么叫做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要做到有计划、按比例、有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要在鼓足干劲的条件下，组织有节奏的均衡生产。高速度发展，这是从总的形势来说的。它的发展规律，只能是波浪式前进，而不能是直线上升。不能要求每一年都是同样程度的大跃进，还要准备出现马鞍形的可能。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中、华南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4日。

但是，从几年的计划看，可能是大跃进的，是高速度发展的。^①

会议初期，尽管在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经济建设中所犯错误的程度以及性质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少数人还有不同看法，但总的趋势是按照会议原定议题进行的。会议气氛轻松，与会人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当时被称为“神仙会”。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经济建设有可能走上比较健康的轨道。

没有想到，会议期间发生了一场巨大的政治波澜。七月十四日，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他的意见是提得比较尖锐的，但总的说来是正确的。毛泽东看后，没有作评论，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这样醒目的标题，在十六日批示印发给到会各同志参考。这封信就成为会议议论的中心。

刘少奇没有对彭德怀的信直接发表意见，但他仍希望会议按照原定议程，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继续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以利今后的工作。七月十六日，他在召集各协作区主任会议时提出：总结经验教训，正面经验和反面经验都要讲够。成绩说够，缺点说透。^②七月十九日，他在会议经过重新编组后的第三小组会议上再次提出：“对成绩要肯定够，对于缺点错误，也要讲透。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如果确有缺点错误，不加以检查，不纠正，不总结经验教训，下一次还要碰这样的钉子，这是危险的。”同时，他还在发言中提出三个问题，请大家讨论：一、从目前党内的思想状况来看，“左”和右这两个方面哪一个是主要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华中、华南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9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6日。

倾向？二、有的同志说，北戴河会议以后，只是在三个月中出了些乱子，这三个月是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是不是“左”倾冒险主义？三、现在把钢产量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算不算右倾机会主义？^①

会议向全体与会人员传达了刘少奇“成绩讲够，缺点讲透”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

出乎大家的意料，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召集全体会议，对彭德怀的信进行严厉指责。他在讲话中说：我劝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紧急关头，不要动摇。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这回动摇的性质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毛泽东激烈地批驳了彭德怀信中提出的观点。针对信中提出的全民大炼钢铁“有失有得”的提法说：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的。针对信中认为造成缺点错误的原因在主观上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关的提法说：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他们要搞，你能说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泽东最后还提出责任问题，说“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我提倡的，“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灭孙”。^②这表明，毛泽东认为彭德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意见是针对他本人的，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是不能容忍的，决心要进行反击！

毛泽东的讲话使会议气氛发生急剧变化。刘少奇忧心如焚。他曾想把批彭限制在小范围内进行，不要影响纠“左”的大局。二十三日会议结束后的当天，刘少奇约胡乔木到他的住处，谈了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三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59年7月19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59年7月23日。

自己的设想，仍想搞一个反“左”的文件。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一设想未能得以实行。胡乔木在三十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说：“庐山会议在毛泽东讲话以后，少奇同志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他要我起草，我感到不好写。我对他说，是不是同毛主席谈一下。少奇同志生气了，说你写出来，我自然会去谈。后来我请彭真同志找少奇同志谈，决定不写了。”^①

七月二十三日讲话后，毛泽东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批评继续升级。二十六日，毛泽东又在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云仲的一封信上作了长篇批示，指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形势急转直下，反“右倾”成为会议的主调。七月三十一日和八月一日，中央政治局常委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刘少奇参加了。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为彭德怀的“问题”定了性，并且算了“历史总账”。

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在八月二日至十六日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全会进一步开展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全会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在十三日至十六日，连续四天召开全体会议，听取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的“检查”，揭发批判他们的“错误”。全体会议由政治局常委轮流主持，刘少奇主持了十三日上午和十五日上午的会议。

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在八月十七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待革命群众运动的态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15页。

度问题和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的长篇发言。发言批判了彭德怀的“错误”，为“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的问题作了辩解。在九月九日于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刘少奇又作了内容基本相同的报告。

刘少奇一直抱着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他当时也相信，只要充分发动群众，形成广大的群众运动，建设速度是可以快些的，认为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九月二十九日，他在会见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时说：“我们在这十年当中有些改变，但还不多。要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文化的落后面貌，还要几十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有进展，但是速度比较慢。我们希望找到一种较快的方法取得进展，希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速度能够快一些。事实证明可以快一些。速度是快还是慢，在我们这里，在党内是有争论的。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快一点。快一点是广大人民的希望。我们的人民很穷，要求迅速改变现在的状态。所以把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个轰轰烈烈的广大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更快一些。当然也会发生一些局部问题，如发展比例的某些局部失调问题。”^①

庐山会议后，在全党范围开展了“反右倾”运动。这个运动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中断了从一九五八年底开始的纠“左”的积极进程，经济战线又一次陷入继续“跃进”的热潮，各项高指标再次一哄而起。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逐步积累起来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下降等矛盾，本来已经接近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一九五九年上半年作了一些调整，只是稍有缓解，而在这种情况下又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各种“大办”一拥而上，要以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实现国民经济

^① 刘少奇在会见安托宁·诺沃提尼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9日。

的继续跃进。这种完全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蛮干，进一步加剧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恶果。这是中共中央和刘少奇等始料之所不及的。刘少奇后来总结经验教训时曾不只一次地在党的会议上说过：庐山会议我们犯了一个错误，那个时候应该继续反“左”，不应反右，如果那时能够继续反“左”就好了。

由于长期伏案工作，刘少奇患有严重的肩胛炎。发作时，胳膊都抬不起来。经中央同意，刘少奇在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到海南岛休假疗养。他决定利用休假时间，认真阅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社会主义部分）。

建议全党同志认真读书，学习政治经济学，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提出的。他在《关于读书的建议》的党内通信中，建议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领导干部认真阅读斯大林所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三日、十五日，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在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学习和座谈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若干章节。同时，他还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等书。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一日，刘少奇同王光美以及身边工作人员乘飞机到达风景秀丽、气候宜人的海南岛崖县（今海南省三亚市），住进濒临海边的鹿回头招待所。次日，刘少奇给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写了一封信：

“尚昆并富春、康生、一波同志：

我们昨日一天到达，不觉疲劳。此间天气同北京的

夏天相同。

我们拟在此读完政治经济学第二册，同秘书医生等组成一个学习小组，按计划读书，并开小组会。但在这里还没有熟悉政治经济古典著作的人，了解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的人也没有。因此，想请你们物色两个熟悉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人，其中至少一人又了解一些当前经济理论性问题，即日来到这里，参加我们的学习小组，并作一些学习的辅导工作。如何？请你们务予帮助。他们来时，请带一些古典政治经济学著作，和若干经济问题的材料。

我们在此大约最少可以学习半个月，多则可以学廿多天。一本书，当然可以读完，并且还可能对当前经济形势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作为经济工作的参考。

来人请带夏季服装。

祝你们工作顺利！

刘少奇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二日”

经杨尚昆等研究，决定派著名经济学家王学文、薛暮桥参加刘少奇读书小组。十一月七日，他们两人到达海南岛崖县。

从十一月二日到二十二日，刘少奇以主要时间阅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最初，以阅读为主。十一月十日至二十二日，召开了九次学习讨论会，逐章逐节地进行讨论。广东省委书记林李明，广东省委宣传部、海南地方和驻军的部分负责人以及刘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了讨论会。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参加了部分讨论会。

刘少奇在各次学习讨论会上作了比较系统的发言。在这些发言中，他客观地评价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的利弊得失，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认识，同时，从我国经

济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经济建设中的问题作了一定程度的反思。

在十一日的发言中，刘少奇提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发展道路中，要注意农、轻、重的关系，其中，“要特别注意农业问题”。他说：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从重工业开始，对农业的发展注意不够。我们也有这个问题。多搞农业、轻工业，不会妨碍重工业，从长远看还会促进重工业的发展。美国发展快的原因之一是，农业上去了，工业也上去了。美国农业只用六百万劳力搞肉、鸡、粮食、棉花的生产，还可以出口。中国这样多的人搞农业，这是个基本问题。教科书批评东欧某些国家重工业搞得过多，摊子铺得过大。“这种错误，我们也有，犯过两次——一九五六和一九五八年，以后不要再犯了。”

在十三日的发言中，刘少奇谈了对国民经济发展中“有计划”和“按比例”两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说：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它是通过价值规律自发调节的。“有计划”发展是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出现的，通过“有计划”来实现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因此，“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生产关系跑到生产力前头，没有基础了，就会破坏生产力（如一九五八年的刮‘共产风’，就会破坏生产力）。”

在十六日的发言中，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属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阶段，但它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带有许多旧的痕迹。这些痕迹不能很快脱掉，很快脱掉是不行，要使它成熟，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是不能性急的。认识客观规律，掌握和利用客观规律，有一个认识程度问题。“局部的暂时的错误一定会犯的，也可能犯大错误，犯全国性的长期性的错误。”

在十七日、十八日的发言中，刘少奇着重谈了商品问题，

说：“斯大林同志在两个问题上扭扭捏捏。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不要回避这些问题，回避了反而讲不清。”他认为，不承认劳动力的商品形式和不承认按劳分配是商品存在的原因，是一个思路来的。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就要有商品存在。哪怕是两种所有制消灭了，只要按劳分配存在，商品仍会存在，不过商品的性质变了。劳动力仍要采取商品的形式。既是商品，就需要一种计算方式。货币是等价物，就是作为交换的媒介，这个东西没取消，怎么取消商品？他还提出：“资本主义把商品化搞得那样广，一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就把它限制得那么小，这是不是问题？”

刘少奇在发言中十分重视经济核算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提出：“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核算，很重要，基础是搞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核算。各部门、地方、企业都要做经济活动的分析。成本利润率、资金利润率、总产值、净产值等等，可以多搞几项指标，便于进行比较和分析。”“我们国家穷，资金不多，投资效果要求快，一定要搞经济核算。经济核算必须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教科书出发。从实际出发是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违背了这一条，其他都统统不行。”刘少奇批驳了单纯突出政治的观点：“经济工作越做越细就是账越算越细。如果以为有政治挂帅就不要算账那是错误的，大账小账都要算。”

刘少奇还在十三日的发言中对全民所有制的内在矛盾和调整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所有权”和“使用权”这样两个概念。他举石景山钢铁厂为例：石景山钢铁厂国家投资两亿四千万，准备五年扩建为年产六十万吨钢、一百二十万吨铁的企业。实行了投资包干，于是钢铁生产规模增了一倍，扩建时间缩短了一半。“投资还是那么多，还是那个全民所有制，生产力猛增许多，

生产力从哪里来的？无非是投资归谁掌握的问题。从冶金部所掌握、所使用，变成归石景山钢铁厂所掌握、所使用。生产力不是天上掉下来，本来就有，只是过去没有得以发挥而已。”刘少奇认为，“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石景山钢铁厂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我看使用权就是所有权，这里，厂长、党委书记就代表国家，他的积极性就大大提高了”。刘少奇得出结论：“全民所有制是否就不要发展了，不需要不断调整了呢？要不断调整，到共产主义社会还是要调整的。”^①

除此以外，刘少奇在发言中还对正确认识和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以及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等问题谈了自己的认识。刘少奇的这些发言，尽管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受到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反右倾”思想的影响，难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基本理论的见解，对经济建设中客观规律的认识，以及在企业管理、商品生产等问题上表露出来的一些思想萌芽，无疑是极有价值的，对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经济学理论，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冷静思考和总结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起了推动作用。

当年年底，李富春在上海组织《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请薛暮桥去传达刘少奇在海南岛读书会的发言。薛暮桥根据自己的笔记把刘少奇的发言归纳成十八个问题，并印发了书面稿。一九六〇年二月，周恩来在广东从化组织读书会，又印发了薛暮桥整理的刘少奇发言记录。

刘少奇在海南岛休假期间，在学习之余，还走访了附近的部队、农村和学校。

十一月八日，刘少奇乘军舰来到海南岛南面的海岛西瑁洲岛和东瑁洲岛，看望了守岛部队和岛上的渔民。这是刘少奇所到过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84页。

建设一支强大
的海军，发展
我国的海洋
事业。

刘少奇 九五九年
十月廿九日

1959年11月24日，刘少奇参观海南岛海军
榆林基地时的题词手迹

的祖国最南部。在东瑁洲岛，刘少奇为海防战士题词：“海岛是我国军事上最重要的地点，有些还是我国经济上最重要的地区，必须认真地加以经营和坚守。祝坚持海岛工作的同志们精神愉快，工作胜利。”二十四日，刘少奇在视察海军榆林基地后，又为海军部队题了词：“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发展我国的海洋事业。”

二十四日，刘少奇接到中央要他去杭州开会的通知，离开崖县，经海口、广州赴杭州。去海口的路上，刘少奇参观了万宁县南林农场橡胶园、兴隆华侨农场、琼海县大路人民公社、文昌县机械厂等单位，勉励大家积极工作，建设好美丽的海南岛。

三十三、湖南农村调查

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我国经济建设再次陷入一味强调“大干快上”的误区。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在“反右倾”思想的影响下，对经济形势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造成并正在恶化的严重后果依然没有清醒的认识，“继续跃进”成为全党的行动口号。一九六〇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提出：“我们不但对于一九六〇年的继续跃进和更好的跃进，充满了信心，而且对于整个六十年代的继续跃进，也充满了信心。”

这种“继续跃进”的盲目乐观情绪在中央以及各地各部门的具体决策中清楚地表现出来。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确定了一九六〇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今后三年和八年的设想。会议认为，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可能比一九五九年更好。会议过高地规定一九六〇年度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并脱离实际地提出在今后八年中完成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到基本社有制过渡的设想。会后，各地和各部门遵照这次会议的精神安排一九六〇年的计划和工作，有的部门还提出了比这次会议所规定的指标更高的“第二本账”、“第三本账”，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也在一些地区开始试点。这就使高指标、浮

夸风、“共产风”在全国更加蔓延开来，比例本已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刘少奇出席了一月上海会议。对中央的决策，刘少奇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但随着情况的发展，他对国内经济状况是担忧的。

一九六〇年三月下旬到五月下旬，刘少奇到外地视察工作。两个月内，先后到七个省市的天津、郑州、洛阳、三门峡、西安、宝鸡、德阳、成都、自贡、重庆、武汉、杭州、上海等地，参观和调查了部分厂矿企业、农村和学校。三月二十八日，他在天津听取工作汇报时，针对部分农村干部过分强调人民公社公有制的优越性、急于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思想，明确提出：“一平二调，刮‘共产风’，也就是人家批评我们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是不好的。马克思早就说过，平均主义对生产的发展是不利的。过渡早了，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妨碍、破坏生产力的发展。要和公社的同志们讲清楚，这是不能胡来的。过渡的迟早，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过渡，要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一是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了一定的水平，一是人们的觉悟提高到了有一定的水平。”他要求河北省负责人：“要以农业为基础，各方面都要支援农业。”他提醒道：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社会的生产水平，要看它用多少人搞饭吃，还剩下多少人去搞工业、运输、教育、文艺、科学等等。^①

四月二十日，刘少奇视察河南的郑州第四棉纺厂、郑州砂轮厂，在视察后同河南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针对工业生产中某些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追求高指标的现象说：“我主张不笼统地反对‘条件论’，要具体地讲。反对两条，一是不承认某些客观条件，一是不承认主观能动作用、主观条件。反‘条件论’过分，就可能出现主观主义、不要条件、不要革命阶段论。事物在一定

^① 刘少奇在听取河北省委书记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0年3月28日。

条件下发生转化，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这里是强调条件，不能忽略条件。”他告诫大家：“如果领导上不搞清楚这些道理，反来反去，就会走到另一个方面去。”^①

刘少奇的担忧被现实所证实。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不能不受到实际生活的惩罚。高指标和“共产风”造成的严重后果正在日益显露出来，当超过一定限度后，终于导致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出现令人震惊的大滑坡。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工业发展的势头不但没有按照年初预计的那样继续跃进，反而呈现全面下滑的趋势，而且越下滑越快。到第二季度，钢的日产量连续下降，二十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十八种完不成产量计划，其中低于第一季度水平的有十一种。农村的形势更加严重。由于一九五九年虚报粮食产量和高征购的结果，许多地方把农民应留的口粮和种子粮也征购走了，各地粮食供应普遍紧张，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的现象日益突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从来不曾出现过的。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亿人口的大国，这个问题一旦以迅速恶化的态势爆发出来，就很难在短时间内把它遏制住，更不用说使它得到迅速扭转了。五月二十八日和六月六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和《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采取应急措施，解决粮荒问题。棉布、食油、副食品、日用品的供应也全面紧缺。但收效一时还很有限。从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已进入经济严重困难时期。

严峻的现实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一九六〇年六月八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国内经济问题。会议期间，毛泽东写了题为《十年总结》的文章，重新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钢铁生产中的高指标和农村工作中“一平二调”等问题作了自我批评，并且

^① 刘少奇在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处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0年4月20日。

提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毛泽东的态度，对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刘少奇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并在实际工作中积极加以贯彻。六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主持召开有各大区负责人、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部分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座谈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上半年经济工作和人民生活中出现的问题。会议一开始，刘少奇就开门见山地把国内形势的严重性摆到大家面前：“最近半年以来，我们在工作中发生了比较多的问题，这些问题是比较严重的，有粮食问题，浮肿病问题，非正常死亡问题，事故问题，计划完成情况的问题，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他说：大家一番热情，总想多一点，快一点，盘子摆得大一点，基本建设项目多上一点，但是还要切实可靠，充分可靠，一切经过试验，实事求是，冷热结合。刘少奇代表中央对问题的产生承担了责任：“这些问题的发生，包括中央在内。中央的计划偏大，盘子安大了，要求过急了。敢想、敢说、敢做我们大提倡，报纸上也大登，实事求是这方面就登得比较少。中央跟你们共同负责。”

刘少奇说：“本来，去年庐山会议头一个阶段就想讨论这些问题的，想总结一下，得到教训，使以后这些事情减少一些。后来彭德怀问题一出来，这些问题丢到后边去了，庐山会议就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庐山会议提出这些问题，有些同志是得到教训的，而有一些同志我看是没有得到教训，或者得到的教训很少。计划偏大，有些事情不那么切合实际，统计又不那么确实，有浮夸之风。”

刘少奇要求全党正视问题的严重性，坚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他在会上提出警告：“这些问题不纠正，继续下去，现在是一个指头，将来可以慢慢扩大，可以扩大到两个指头，三个指头

的。这就是今天会议的意思。”在座谈会结束时，刘少奇进一步强调：“今后还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要着重了解实际情况，着重实事求是。”^①

刘少奇这次讲话，把经济形势的严峻性毫不含糊地提到全党特别是党内高级干部面前，对于认清形势、转变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

六月十八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批评一些人总是想多搞基本建设，不肯下马，急于多上马一些项目。他说：基本建设还得根据有多少材料、多少劳动力，决策上多少项目，而且是一仗一仗打，一个一个搞，能够搞多少就算多少。总之，在基本建设和国民经济问题上要在这次争取主动，各部门和各省市的同志要下决心，不要搞那么多基本建设。

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经济问题是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经过讨论，会议批准了李富春、薄一波提出的《一九六〇年第三季度工业交通生产中的主要措施的报告》，制定了《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关于开展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等文件，确定了压缩基本建设战线、加强农业第一线的措施。会议最后一天，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中央提出农业第一，把这个观念建立起来很必要。总而言之，各方面都不要妨碍农业，工业要尽量地为农业服务，对农业有帮助。基本建设战线不要拉得太长，这个东西还是要抓，要提到路线上来认识，战线太长违反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实际上是少慢差费。^②这是从沉重的教训中换来的认识。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0日、11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会议期间，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多次建议对一九六一年的国民经济实行整顿、巩固、提高的方针。会后，国务院在审议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时，周恩来加上“充实”二字，后来又把“整顿”改为“调整”，概括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共中央肯定了这一方针，在批转国家计委的报告时提出：一九六一年，我们要“把农业放在首位，使各项生产、建设事业在发展中得到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正式批准这一方针，并向全国人民宣布：“一九六一年应当适当地缩小基本建设的规模，调整发展的速度，在已有的胜利的基础上，采取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的方针。”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在党对国内形势的认识上是一次飞跃。这一事实表明，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在中共中央领导层中，尽管对当时经济形势的认识还不完全一致，但总的说来，毕竟已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的国民经济在经历了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的两次“跃进”后，积累起来的问题已日益严重，不实行调整政策是不行了。这样，从全局来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时期。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在过去两年的失误中，农业受到的损害最为严重，暴露的问题也最多。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是首先从农村开始的。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指示）和《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等文件，指出：“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

十一月五日，刘少奇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抵达莫斯科。随后，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宣言》。十二月九日，回到北京。

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刘少奇出席在北京相继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这两次会议决定在全国农村深入贯彻《紧急指示信》，开展整风整社。毛泽东在会上发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他在一月十三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请同志们回去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派出几个调查组到农村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在广州主持起草了旨在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倾向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条例草案共十章，合计六十条，又被称为《农业六十条》。三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召集中南、西南、华东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又称“三南会议”），讨论公社工作条例和农村工作问题。与此同时，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集东北、华北、西北三个中央局和所属省、市、自治区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又称“三北会议”），讨论的也是农村工作问题。三月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两个会在广州合并进行，成为中央工作会议。

广州工作会议是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来中共中央致力于解决农业问题的一次重要会议，主要成果是讨论并通过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强调调查研究问题。他在三月十三日写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彭真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农村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各级领导要“认真切实调查一下，不亲身调查是懂得的，是不能解决这两个重大问题的（别的重大问题也一样），是不能

真正地全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的”。

刘少奇对提倡调查研究高度重视。三月十九日，他在中南、华北地区小组会上专门就调查研究问题作了讲话，指出：“这几年调查研究工作减弱”，“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执行三面红旗的过程中，犯了不少的大大小小的错误，受了相当大的损失。各省程度不同，各行各业程度不同。这些损失，有些是不可避免的，有些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做好了调查研究，工作作风好，工作方法对，损失可能减少，时间可以缩短，不至于陷于现在这样的被动”。对于目前的被动局面，刘少奇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中央有些政策，决定前缺乏很好的调查研究。根据不够，决定之后，又没有检查执行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纠正。”他要求各级领导把调查研究作为重要工作来抓，“调查研究是今后改进工作的最根本的方法，要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最后表示：“我本人也要下决心搞调查，搞一个工作组，这比看报纸、听汇报要好得多。”^①

广州工作会议在三月二十三日结束。这次会议对调整农村政策、稳定农村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情况了解不够和认识程度不一，会上对如何估计农村形势、如何看待分配中平均主义的危害性以及公共食堂等问题，仍存在不同看法。正确政策的制定取决于对情况的明了。情况明，才能方法对，才能决心大。会后，刘少奇决定自己到湖南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对情况作出判断，采取正确的决策。

四月一日，刘少奇来到长沙，开始为期四十四天的湖南农村调查。六十三岁的刘少奇回到了家乡。

这几年，刘少奇到各地视察的时间并不少，但他感到以往的调查往往是走的地方多，但不深入，没有把情况和问题真正摸清

^①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685—688 页。

楚。这一次，他下了很大的决心，对下去调查制定了严格的纪律。离广州前，他曾对中南局和湖南省委负责人说过：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①到湖南后，他又向陪同的工作人员重申了这条纪律。^②

刘少奇湖南之行的第一站，是距他家乡炭子冲只隔十多里的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从四月二日到八日，刘少奇在这里住了六天。

刘少奇的“住所”是原生产队养猪场的一间破旧空房。一张铺着稻草的旧木架床、两张油漆剥落的方桌和四条长凳构成刘少奇“卧室”兼“办公室”的全部家当，窗户漏风用雨布遮住，没有电灯就用蜡烛照明。在这间简陋的住所中，刘少奇听取了先期到湖南调查的中央调查组和湖南省有关领导干部的汇报，并到王家湾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场同社员谈话，了解群众对食堂、分配、住房以及生产方面的意见。经过调查，刘少奇对湖南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初步了解，对农民群众生活上的困苦状况和造成的原因有了直接的感受。他在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谈话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宁乡县问题这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没有调查研究，这个教训很大。饿了一年肚子，应该教育过来了吧！”^③

四月八日，刘少奇一行离开王家湾，到韶山毛泽东的旧居参观后返回长沙。途中经过炭子冲，刘少奇只在车上扫视了一下久别的旧居，但没有停留。刘少奇决定，为了进一步了解农村的真

^① 中共长沙党史办：《刘少奇主席在天华蹲点调查概述》，《长沙党史通讯》1988年第3期。

^② 《缅怀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349页。

^③ 刘少奇听取张平化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3日。

实情况，暂时不回家乡，而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生产大队再做一番认真的调查。他在长沙同省委研究，决定先去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从广州去上海时路过长沙。刘少奇向毛泽东汇报了初步调查的情况。两人并就农村工作交换了意见。^①第二天，刘少奇带领调查组来到天华大队，在王家塘生产队的简陋办公室住下后，开始第二站的调查。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起的一面“红旗”。刘少奇来以前，中央曾派一个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他们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实际情况却是：由于受“左”的错误的影晌，天华大队粮食连年减产，平均主义、虚报浮夸现象严重存在。当地干部采取统一口径、弄虚作假等手段，隐瞒实情。中央调查组得出了同事实不符的结论。刘少奇在这里住了十八天，采取一面调查研究、一面解决问题的方法。他一到这里，就向大队干部讲清楚：请你们谈话的时候，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也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是不要社会主义了，不要人民公社了，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怎么有利于群众的方便。当然，还要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终于逐步摸清了情况，解决了一些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

首先是公共食堂问题。天华大队共二十个生产队，一千一百多人。一九五八年以来，先后成立了十五个公共食堂，社员集中食宿，人均口粮只有三百多斤，再加上自留地和自养家畜被取消、食堂管理不善、干部多吃多占等因素，给社员生活造成极大

^① 访问王光美记录，1987年3月19日；访问汪东兴记录，1987年5月22日。

困难，严重挫伤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食堂问题成为社员生活中突出的矛盾。

四月十三日和十四日，刘少奇连续召开大队干部座谈会和生产队干部座谈会。在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时，干部们一致表示，食堂有优越性，应当继续办下去，只是可以划小一点。刘少奇从他们的言谈中感到，由于受“左”的思想束缚，这些干部没有反映真实情况。刘少奇没有责怪他们。十五日，他去察看天华大队施家冲食堂，当天下午他又邀请施家冲部分社员座谈。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我是向大家求教的。这次中央办了错事，我们对不起大家，向大家道歉。但是改正错误要了解真实情况，希望大家帮助我，向我提供真实情况。^①刘少奇的诚恳态度感动了与会群众，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大家纷纷诉说入食堂后生活上的不便和对生产的影响。刘少奇还走访社员家庭，把群众对食堂的批评归纳为八条，讲给社员听，大家都赞成。

结论产生于调查之后。四月十七日，他参加中共天华大队总支委员会会议，说：看来，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一声喊，食堂就办起来，那是大错误，应该吸取教训。办食堂有一个很大的平均主义。看来多数社员是不愿意办食堂，要求散。准不准散？我看应该准。十九日，刘少奇听取调查组的汇报。在汇报会上，他说：“现在必须看到在食堂问题上，我们同农民群众有尖锐的矛盾，这是影响工农联盟的。人民共和国的巩固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只靠威信命令来维护，已经维持三年了，这对共产党来说是危险的。群众很好，农民在等待共产党表示态度，还没有丧失希望。如果还不表示态度，农民就要自己散了，那就被动了。”又说：“不是我们提倡散，而是群众要求散，要允许群众有这种自愿。”针对过去宣传食堂是社会主义阵地、现在散有顾虑的思

^① 访问原长沙县县长、调查组成员李满成记录，1987年4月21日。

想，刘少奇指出：“食堂是强制组织起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的阵地，而是平均主义的阵地。”^①

散食堂是关系社员生活的一件大事。调查组同公社、大队干部作了多次研究。刘少奇在研究时指出：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要求散食堂，如果不散，就脱离了百分之九十的群众。共产党员的义务是要经常了解群众的要求，反映群众的要求。食堂不讲散，讲退。愿意退的，自己就退出去。愿意在食堂吃饭的，可以还在食堂吃饭。在刘少奇的建议下，决定由群众自愿选择退留。这个决定受到社员群众的热烈欢迎。不久，天华大队的食堂陆续解散了。

粮食问题，也是天华大队的突出问题之一。经过调查核实，刘少奇了解到：天华大队共有一千三百多亩地，一九五八年以来连年减产，到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只有七十二万斤。但由于虚报浮夸，在统计材料上那年的粮食产量却报为一百二十万斤。这样，扣除国家征购的三十二万斤，全大队人均粮食只剩下三百三十斤，还要留下种子和饲料，社员口粮严重不足，处于半饥饿状态。虚报产量和高征购，使他们的基本生活需要难以得到保障，健康情况恶化，严重损害了社员生产积极性。刘少奇充分听取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意见，又在十五日专程回长沙同省委商量，决定一九六一年天华大队定产七十五万斤，国家征购二十二万六千斤。同时决定了奖励措施：在定产的基础上，超产百分之十以内的国家征购四成，超过百分之十的部分全部由生产队自主分配。社员口粮的分配也改变了平均主义的做法，实行多劳多分、超额重奖的政策。并且重新分配了自留地。为了打消社员群众怕政策多变的顾虑，刘少奇要求县和公社的领导当众向群众宣布，如不兑现由县和公社负责。这些措施的制定，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生产

^① 刘少奇在听取调查组汇报食堂问题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19日。

积极性，粮食生产的被动局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扭转了。

社员住房问题。天华大队地处丘陵地带，田亩分散，农户居住也较分散。一九五八年成立公共食堂以后，上级要求集中食宿，建立所谓“居民点”，造成全大队三分之一的住房被拆，百分之六十的社员被迫搬家，再加上社办企业和大队副业无偿占用社员住房，使社员住房减少一半以上，不少人家三代同住一室，群众反映十分强烈。随着公共食堂的解散，社员住房问题便更加突出出来。刘少奇把住房问题看作是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四月二十五日，他在工作组汇报会上说：“拆了人家房子，一定要赔。大队、公社干部要负这个责任，一定要赔清，使社员基本满意，不能敷衍了事。一年解决不了，两年；两年解决不了，三年；三年解决不了，四年；四年解决不了，五年。总而言之，要抓住这个事情不放。”^①刘少奇还从天华大队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解决社员住房问题的切实可行的方案。

刘少奇认为，社员住房问题是带有普遍性而需较长时间才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为此，他要调查组根据天华大队解决群众住房的方案起草了《关于广福公社天华大队房屋情况调查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五月一日回到长沙后，他写信给张平化：“湖南农村的房屋问题，是一个目前就需要处理，而要在二三年内才能解决的重要问题。调查组在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关于房屋情况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可以作为各地处理农村房屋问题的参考，请你考虑是否可将这个文件发给各地？”当日，湖南省委将刘少奇的信和调查组的报告转发全省，对全省解决农村住房问题起了指导作用。

山林问题。天华大队原有山林四千五百多亩，盛产竹木。天华山海拔四百三十米，是其中最高的山峰。山上竹木繁茂，古松

^① 刘少奇听取调查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25日。

成群，素有“天华八景”之称，天华大队由此得名。“大跃进”以来，由于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滥砍滥伐十分严重，山林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天华山上原有的三个生产队被迫陆续搬下山来。刘少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上天华山去实地调查。四月二十五日，他和调查组几位成员沿着山南的石级，登上天华山，沿途看到很多山坡都是光秃秃的，心情十分沉重。一位陪同人员看到刘少奇登山很吃力，顺手砍了一棵小树给他做手杖，刘少奇拒绝了，并且告诫大家“要爱惜树木”。^①回到山下，他在干部会上说：“我到天华山一望，山都挖得稀烂的。年老的农民都懂得，再不禁止，让他挖下去，将来是一大害！这件事要严格禁止，请你们省委、县委注意，不要放松下去。”随后，他指示调查组对山林问题作专题调查，研究出一个解决的办法。调查组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写了《关于天华大队山林问题调查报告》，提出要明确山林所有权，山林要允许由社员承包，收益按比例分成，制定山林管理办法、封山育林等具体措施。报告经刘少奇审批后，由湖南省委转发全省。

民主和法制问题。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刘少奇多次指出：要从根本上总结经验教训，就必须从政治上解决讲民主、讲法制的问题。对于农村中这几年发生的错误，他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指出，某些农村干部不走群众路线，不讲民主，不讲法制，也有重要责任。针对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不听取群众意见，搞强迫命令，甚至打人骂人的现象，他在对县、社和大队干部的谈话中说：“什么事情都要由群众来作决定，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这三年，就是没有让群众当家作主，什么拆房子呀，搞居民点呀，如果让群众当家作主，这些就办不成。”^②他建议在农村中

^① 访问原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记录，1987年4月20日。

^② 刘少奇在调查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30日。

成立社员代表大会，一切上级的指示，都要经过社员充分讨论，才能实行。特别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一定要采取慎重态度。

民主要有健全的法制做保障。对于农村和基层组织的法律观念和法制建设，刘少奇给予特别的关注。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曾发生这样一件事：湖南郴县鲤鱼江电厂青年女工刘桂阳，因为看到湖南农村在公社化以后发生的种种问题，只身北上北京，在中南海国务院北门外张贴不满人民公社的标语，被郴县人民法院定为敌我矛盾，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刘少奇了解后，认为这样处理是错误的，建议对案件进行复查。湖南省公安厅对案件复查后，给中央的汇报中提出：刘桂阳一贯表现较好，同共产党在根本利益上没有矛盾，张贴标语的动机不是以推翻人民民主政权为目的，因此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建议无罪释放。一九六一年二月，刘少奇在《公安工作简报》第八期刊登的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处理意见一文上批示：“我同意湖南省公安厅对刘桂阳案的处理意见。将此件寄湖南省委，建议张平化同志亲自找刘桂阳谈一次，一方面适当地鼓励她认真向中央反映农村情况，另一方面适当地批评她对人民公社的认识和她采取的方法，以便引导她走上正确的道路。”

这次来湖南，刘少奇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他对湖南省公安厅负责人说：“根据什么判她的罪？法律有这一条吗？无非是根据她写了‘反动标语’。反动标语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她跑到北京，还相信中央，这能说是以反革命为目的吗？她对公社的认识有错误，采取的方法是错误的，但这不应该判罪。”^①

在天华大队调查期间，刘少奇又了解到，一些基层干部因对

^① 湖南省公安厅厅长李强关于刘少奇对政治工作的指示给公安部部长谢富治的信，1961年5月4日。

“左”的错误做法有不同意见，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了职，受了批判。刘少奇认为，这是造成不敢讲真话的重要原因。他在会上明确指出：“不能给农民和基层干部戴右倾机会主义帽子。过去主张散食堂，认为密植太密、主张稀一点，认为高指标太高、主张低一点，因而戴了右倾机会主义帽子的，都取消。这样，就可以解放一大批人。”^①在刘少奇的直接过问下，一批受了不公正处分的基层干部恢复了工作。

刘少奇在调查期间还过问了一个“饲养员破坏耕牛”的案子：天华大队的一头耕牛在一九五七年二月死亡，解剖后在牛肺内发现一根三寸多长的铁丝，就认为是饲养员冯国全有意破坏。冯因此遭到批斗和关押。调查组向刘少奇汇报了这件事，刘少奇当即指出：“这不可能吧？牛皮那么厚，牛劲那么大，怎么能钉进去呢？这件事还要查，不仅要查当事人，还要问问老兽医或专门学过这种医的人。”并指示省公安厅对此进行复查。省公安厅经过调查，查明铁丝是一个小孩出于好奇喂给牛吃，然后蹿到肺中造成死亡的，冯国全破坏耕牛案完全是冤案。省公安厅为冯国全平了反，并向湖南省委和公安部写了《关于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社员冯国全破坏耕牛一案的调查报告》。刘少奇在审阅这个报告后写信给公安部长谢富治：“各地如冯国全这样的冤案还是有的，应由各地公安政治机关进行认真的调查研究，作出合乎实际情况的结论。”

通过这几件事，刘少奇感到，要做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必须在农村中加强法制建设。他说，以前我们的执法机关都设在城里，群众告状或解决纠纷十分不便，应当在农村区一级设立公安派出所和人民法庭，方便群众告状，并有利于案件的及时正确解决。经过湖南省委同有关部门的努力，长沙县农村区人民法院

^① 刘少奇在调查组工作汇报会上的谈话记录，1961年4月30日。

在四月底五月初先后建立。刘少奇回到北京后，认真审阅了长沙县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区人民法院的报告，并转给中央负责公检法工作的彭真、谢觉哉阅。不久，全国各地普遍建立起区人民法院。这一措施，对推进我国农村的法制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期间还就社办企业、农村手工业、农村商业以及国家职工在农村的家属的待遇等问题作了调查。五月十一日，刘少奇在宁乡县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报告了在天华大队的工作情况。

四月三十日，刘少奇离开天华大队回到长沙。临行前，他向省、市、县委工作队全体干部讲话，很有感慨地说：你们省委搞调查，搞了很久，这个调查不容易嘛。真正把情况调查清楚，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调查清楚，我看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容易就是人的主观世界要反映客观世界不容易，要经过一个过程，甚至是一个曲折的过程，才可能对客观实际认识清楚。这个过程，可能长，可能短，到底多长，各有不同。从四月十二日到三十日，刘少奇在天华大队整整调查了十八天。

刘少奇在长沙度过了五一劳动节。那天，他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胡绩伟等谈话，指出：三年来，报纸在宣传生产建设成就方面的浮夸风，在推广先进经验方面的瞎指挥风，在政策宣传和理论宣传方面的片面性，对实际工作造成了很大恶果。你们宣传了很多高指标，放“卫星”，《人民日报》提倡错误的东西，大家也以为是中央提倡的。报上的一切文章都应该是调查研究的结果。第二天，他到了宁乡县城，听取县委汇报工作。

五月三日，刘少奇踏上故乡的土地。他谢绝县里为他在花明楼公社安排的住所，住进炭子冲旧居小时候住过的房子。

炭子冲是刘少奇出生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地方。一九二〇年他经上海赴俄学习、投身革命以后，只在一九二五年因为在长沙养病回过一次故乡，至今已阔别三十六年了。炭子冲的一山一

水、一草一木引起刘少奇深深的回忆。然而，他更关心的，是今天故乡人民的生产和生活。

在故乡，刘少奇继续进行农村情况的调查研究。他察看炭子冲和附近生产队的农田，走访社员家庭，同家乡农民和基层干部促膝长谈。他对农民说：这几年，听说工作搞得很不好，社员吃不饱饭，病了很多，死了一些人，田地荒了不少。我是回来看看，回来得晚了，对社员不起。现在的政策还没有搞好，政策要大家来讨论。在家乡的六天中，他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他对农民的疾苦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一次，在同农民谈话时，刘少奇问：你们的困难是由于什么原因？有没有天灾？农民们回答说：天灾有，但是小，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还有一次，他问几个农民，一九六〇年门前塘里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安湖塘的水是不是车干了？农民们回答说没有，还有半塘水。安湖塘是离刘少奇家不远的一口大水塘。他记得，小时候有两年家乡发生旱灾，安湖塘和门前塘的水都车干了。这次还有半塘水，可见旱灾并不像所说的那样严重。这两件事给刘少奇留下很深印象。后来在中央召开的会议上，刘少奇多次引用这两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农村困难主要不是自然灾害而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造成的。

解放后，刘少奇一直同家乡的农民保持通信联系，从他们那里了解到很多农村的真实情况。一九五三年国庆节，刘少奇邀请家乡的农民成敬常、黄端生进京观光。当时担任炭子冲党支部书记的邓子卿和村农会主席的王升平托他们带给刘少奇一封信，汇报了家乡的生产情况和农民群众的要求。刘少奇很高兴，立刻给他们回信。信中说：“你们的来信以及很多朋友的来信，我都收到了，谢谢你们及其他来信的朋友。对于我们乡间的发展情形，我是有兴趣的，关心的，望你们经常来信，例如每年有一次至二次来信告诉我乡间的各种情况，对我是很有用的。但请你们告诉

我实在的情形，是好的就说好，是坏的就说坏，并最好能说具体些，说明事情的发展经过，而不要有任何夸大或隐藏。这须请你们注意。”此后，王升平等多次写信给刘少奇反映农村情况，当地人称他们是刘少奇的“农民通讯员”。可是，最近两三年里，刘少奇接到家乡的信越来越少了。这件事引起他的警觉。这次回家乡，他在同成敬常、黄端生、王升平等人谈话时问起这件事，并向有关部门询问，得知县里有关部门扣押了他们的信，还派人找王升平等谈话，阻止他们向中央“告状”。刘少奇愤怒了，他同王升平谈话时气愤地说：“谁打击你，谁查向中央告状，就再告他们的状，告几次不行，信被别人扣了，不见回信，你就来北京，我出路费，在北京吃住我出钱！”^①在同县、公社和大队干部的一次谈话中，刘少奇又一次提起这件事：“你们不要怕告状，不要反对告状。我是这里生长大的，我想同这里一些人通通信，经常了解一些下面的实际情况，你们给我一点通讯自由好不好？你们不要反对给我通信好不好？给我写信，给毛主席写信，给省委写信，你们不要扣好不好？给我通信不是捣公社、大队的蛋，可能会帮助你们。你们不准告状，我想帮助你们也困难。”^②

五月七日下午，刘少奇邀请炭子冲部分农民和基层干部到旧居座谈。在谈话中，他首先对这几年的困难承担了责任：“我将近四十年没有回家乡了，很想回来看看。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很苦。我们工作做得不好，对不起你们。”“这次回来，看到这里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接着，他对同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

谈到食堂问题时，他说：“食堂情况，以前我们也不清楚，讲食堂有优越性，可以节省劳力，解放妇女等。下来一看，不是

^① 刘少奇同王升平谈话记录，1961年5月6日。

^② 李强关于刘少奇的两次谈话给谢富治的信，1961年5月8日。

那么回事，专人煮饭，专人炒菜，专人砍柴，专人担水，专人舂米，一个食堂占用三分之一的劳动力，甚至半数的人都去做饭了。烧硬柴砍树，不砍茅草，砍了山林。还有其他毛病。好处也可以讲个一两条，说是出工齐。出工齐可以用别的办法解决嘛！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谈到房屋问题时，他说：“散食堂以后，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房子。一个屋场住那么多户，没有地方打灶。房子不确定，社员的很多事情不能定，自留地不能定，养猪喂鸡也难办，厕所也不好定，生产就不放心。有一些是公家占用的房子，如银行、供销社、学校、公社和大队的办公室、工厂、猪场等，都要挤一下，把多占用的房子都退出来给社员住。”刘少奇特别强调：这里不要搞我的旧居纪念馆，我几次写信说不要搞，结果还是搞了，要把这个房子退出来，分给社员住。

谈到退赔社员被平调的财产时他说：“这个账要一户一户地结。这个账要记住。赔清以后，立块碑，或者写一个大单子，用镜框子镶起来，挂在公社里。不这样搞，老百姓下不得地。不要半途而废，马马虎虎了事。要扎扎实实算一回账，算得疼一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算疼了，社员也要疼一下，疼几年。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

最后，刘少奇诚恳地对家乡的农民说：“这里是我的故乡，省、县、社对这里可能有照顾。照顾多了不好，不照顾也可以搞好嘛，要靠自己努力。大家努力事情就可以搞好，千万不要用我家乡的名义去要求别人照顾。这里还有我的亲属，也不要因为我的关系特别照顾他们。”^①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28—334页。

利用工作间隙，刘少奇祭扫了母亲的坟墓，并看望了从小一起长大的六姐。五月九日，他没有惊动下田劳动的乡亲们，悄然离开了炭子冲。在宁乡和长沙又停留几天后，于十六日回到北京。

刘少奇的故乡之行，给乡亲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人们从中看到了一位共产党人体恤民情、心系群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襟怀。随着农村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家乡的生产和生活有了明显好转。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期间，宁乡县领导受炭子冲农民的委托，向刘少奇汇报了家乡的变化，盼望他再回故乡看看。但直到去世，他再也没能回到故乡。

三十四、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上)

从湖南农村回到北京，刘少奇立刻投入紧张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中。四十多天的湖南农村调查，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作为在第一线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以高度政治责任感和全部工作精力，主持或参与中央重大政策和措施的制定。他在调整时期勇于面对现实、勇于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他所提出的许多富有独到见解的思想，以及他为落实调整措施付出的艰辛努力，反映了这一时期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

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在“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的指导下，经过半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一定成效：农村困难形势有所缓和；以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得到初步纠正，党内主要领导人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认真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思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

但是，国内经济形势仍然十分严峻，在城市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商品粮供应短缺，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生产秩序混乱，通货膨胀等情况没有根本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和身体素质都大幅度下降。但在如何看待经济调整这个关键问题上，党内思想并不一致。相当一部分领导干部不肯正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对生产力遭受破坏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认为

目前采取的调整措施也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希望经过短时期的调整后能够“更好地继续跃进”。这种思想严重阻碍了经济调整措施的真正落实。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也就是刘少奇结束湖南农村调查后不久，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是三月广州会议后又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和修改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同时制定了精减城市人口、压缩粮食销量、对几年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党员干部进行甄别平反等重要措施。

五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的讲话中，分析了党内的思想状况，鲜明地提出“造成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十分敏感而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说：

“这里提出一个问题：这几年发生的问题，到底主要是由于天灾呢，还是由于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呢？……总起来，是不是可以这样讲：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我们在执行总路线、组织人民公社、组织跃进的工作中间，有很多的缺点错误，甚至有严重的缺点错误。”^①

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失误承担了领导责任。同时指出，现在不要追究哪一个人或哪一个部门的责任，关键是要大家共同总结教训，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说，我们现在所犯的错误还不是路线错误，但是，“如果现在我们还不回头，还要坚持，那就不是路线错误也要走到路线错误上去”。^②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7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8页。

刘少奇要求全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下一个很大的决心”，把思想转变到调整工作上来。他大声疾呼：

“我看在座的同志应该是有经验了吧！饿了两年饭还没有经验？铁路还要修几万公里吗？‘小洋群’还要搞那么多吗？工厂还要开那么多吗？还舍不得关厂吗？还舍不得让一部分工人回去吗？招待所还要盖那么多吗？恐怕应该得到经验教训了。农民饿了一两年饭，害了一点浮肿病，死了一些人，城市里面的人也饿饭，全党、全国人民都有切身的经验了。回过头来考虑考虑，总结经验，我看是到时候了，再也不能继续这样搞下去了。”^①

明确提出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造成目前经济困难的主要原因，在党的正式会议上还是第一次，在参加会议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引起强烈震动。

这次会议对三月广州会议制定的《农业六十条》草案做了重要修订，形成《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其中，最重要的修改是关于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条款。公共食堂问题是在广州会议上引起较多争论的问题，尽管不少人主张解散食堂，但当时在草案中仍写上“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生产队应该积极办好公共食堂”的内容。在这次的修正草案中把这一条改为：“生产队办不办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不论办不办食堂，都应该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对供给制问题，修正草案取消了草案中关于社员分配中供给部分和工分部分“三七开”的规定，改为社员一切收入都“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修正草案还增写了山林的经营和保护、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会议结束前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8页。

《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指示》宣布，中央以前的规定，“例如供给制问题和食堂问题等，同这个修正草案，规定得不一致的地方，应该以修正草案的规定为准。”

这些重要修改，是在刘少奇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做出的。它表明中共中央在农村政策调整的认识上取得新的突破，对扭转农村困难局势发挥了重要作用。

针对“大跃进”以来工矿企业从农村大量招工、城镇人口急速增加（一九六〇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三千一百二十四万人）而商品粮供应严重不足的状况，五月三十一日，陈云在会上作了关于精减职工和动员城市人口下乡的讲话，提出要解决粮食紧张问题，必须采取四条措施：一、继续调整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二、工业要大力支援农业；三、进口粮食；四、动员城市人口下乡，减少城市粮食的销量。陈云认为，第一条是根本的，而第四条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非采取不可”。^①刘少奇赞同陈云的意见。他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关厂、并厂、缩小规模和从城市压缩人员下去的问题。”^②“这个问题到底还有什么考虑的余地没有呢？我看是没有考虑的余地了。”“现在不是工业战线踏步和前进多少的问题（某些部门可能还要前进一些，比如石油），而是要后退一步。钢，去年一千八百四十万吨，今年退到一千四百万吨，要退四百多万吨。纺织工业搞到一千万锭子，现在要退回五百万。其他方面也有这个问题。后退好了，就可以把比例搞适当。工业战线、文教战线延伸得太长了，缩短一点，同农业战线的比例就协调了，就可以和农业并举，一同前进。不然，农业不能前进，工业和其他各方面也不能前进。”^③刘少奇要求各级

① 《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61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40页。

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36页。

领导认清形势，下大决心，把措施落实下去。

毛泽东提出：光有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还不够，还要有总路线所需要的具体工作路线。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共中央根据制定《农业六十条》的经验，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又开始制定其他各个方面的工作条例和规定。

七月六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提出的《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和国家科委党组、中国科学院起草的《关于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草案）》（简称《科研十四条》）。《科研十四条》是由聂荣臻主持，经过充分调查研究，针对“大跃进”以来严重违反科技工作的客观规律，瞎指挥，简单粗暴地对待知识分子，挫伤知识分子积极性的现象而提出的，是继《农业六十条》后又一个有全局意义的政策性文件。刘少奇在总结讲话中肯定《科研十四条》：“是一个好文件。现在的问题是有偏向，要承认。有偏就要纠。这几年党登上领导位置是好事情，是成绩，乱指挥也听你的。但是继续这样下去，要跌下台的。问题是指挥方法没有掌握客观规律。我们的任务是进一步掌握科学技术工作的规律性，不要瞎指挥，不要不懂装懂。”^① 中共中央在批转会议通过的这个文件时强调：“文件的精神，对于一切有知识分子工作的部门和单位，也都是适用的。”

八月二十三日至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工作会议，讨论通过《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工业七十条》）等文件。刘少奇出席会议并审改了这些文件。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还先后制定了《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简称《商业四十条》）、《关于城乡手工业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1年7月6日。

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手工业三十五条》）、《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草案）》（简称《文艺八条》）等文件。这些文件，对纠正“大跃进”以来各方面工作中出现的混乱状况，恢复正常的生产和工作秩序，起了重要作用。调整工作开始走上轨道。

一九六一年七月中旬，刘少奇离开北京，前往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考察工作。

当经济调整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头绪繁多的时候，刘少奇为什么专门抽出一段时间去林区考察呢？

林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我国是一个森林资源比较缺乏的国家，搞好林业建设尤为重要。建国以来，我国的林业摸索出了一套集育、伐、运、加工为一体的生产经验，逐步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但是，一九五八年以来，同其他方面的工作一样，高指标、瞎指挥等错误做法直接冲击了林业，许多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被废弛，出现过量采伐、只伐不育、管理不善、浪费严重等问题，给森林资源和林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这是会给予子孙后代留下严重恶果的大问题。

进入经济调整时期以来，刘少奇一直十分关心我国的林业生产和林区建设。三月广州会议期间，他就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欧阳钦约定，会议结束后去黑龙江考察林区工作。他希望通过实地考察，能够切实解决林区的一些实际问题，并为工业战线的调整摸索出一些经验。只是由于当时调整农村政策的问题更为迫切，刘少奇改去湖南农村调查而使此行耽搁下来。尽管如此，在湖南农村调查过程中和回北京以后，他多次谈起林业生产问题，听取有关部门的汇报，并要求身边工作人员，凡有关林业方面的材料，要尽快送给他，不要压下。五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决定趁东北和内蒙古四省区林业工作会议在哈尔滨召

开之际，去黑龙江和内蒙古林区考察。

临行前，刘少奇听取林业部负责人汇报时又一次指出：“我国森林资源很少，要使已有的资源充分利用，并且永远保持下去。老的砍了，新的要栽起来。”“总之，我们这一代不要把森林资源搞光了。搞光了，我们死后都是要受审判的！”^①

七月十六日，刘少奇带领一个由林业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等工作人员，以及王光美和身边工作人员组成的小型调查组，离开北京，在沈阳作短暂停留后，于十八日到达哈尔滨。随后，在林业部副部长张昭和黑龙江省省长李范五陪同下，踏上去小兴安岭的路程。

为了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森林资源和林业生产的专业技术知识，刘少奇还邀请东北林学院的周重光教授同行。

刘少奇一行考察的第一站是伊春地区带岭林业实验局的凉水沟林场和胜利林场。

七月的小兴安岭，正逢雨季，气候多变，时而细雨濛濛，时而大雨滂沱。刘少奇一行乘坐专供林区运输用的窄轨小火车进入莽莽林海。到达林场后，随行人员考虑刘少奇已近六十三岁了，劝他不要再下去。刘少奇谢绝了大家的好意，身披雨衣，脚穿雨靴，手拄一根树枝，同大家一起穿行在泥泞湿滑的崎岖山路上。白天，刘少奇考察林场的树木园和人工更新林，观看油锯伐木和拖拉机集材作业；晚上，又召集林业局、林场的工人代表座谈。

离开带岭林业局，刘少奇一行又到丰林林业局所属林场，察看原始红松林以及采伐迹地，并召开了多次座谈会。

经过几天的实地考察和同干部工人的交谈，刘少奇对林区的生产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有了较深入的了解。他感到，要搞好林区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森林资源的更新和综合利用这两个基本环

^① 刘少奇在听取林业部领导工作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1年7月12日。

节。只有这样，才能使林业重新回到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来。

七月二十五日，刘少奇把伊春市委和林业局负责人请到专列上，谈了他对发展林业的想法。

“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需要。”这是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他在调查中最关心的问题之一。他说：“一方面山上有资源，另一方面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都很需要，如何把资源和需要结合起来，就是你们的工作。从中央林业部到林业厅、林业局、林场以至工段都是做这个工作。”^①

刘少奇所以提出“充分利用”这个问题，是他在调查中发现资源浪费现象严重有感而发的。他说：“我看过采伐过的林场，山上还剩下不少小木头，很多可以做坑木，是否可以再采一次？有很多枝桠还是可以利用的，扔掉很可惜，要想法弄出来。有些长得过密的中幼林，可进行透光伐，砍下来利用。此外，在木材加工中的一些边材废料也要充分利用起来。”^②

刘少奇没有停止在表面现象上，而是对造成资源严重浪费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他在调查中了解到，小木头和枝桠的采、集、装、运费工费时，生产成本比生产大木头要高很多，而木材价格和同工人工资密切相关的生产定额却是单纯按木材体积核算的。这样，生产小木头费工费时却不得利，林场和工人都没有积极性。针对这种不合理情况，刘少奇提出：林业的工资政策和价格政策要符合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社会各方面需要这个原则，“必须作相应的调整”。他设想，价格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收购价，一种是销售价。收购价按生产成本定价，工人的工资根据收购价来定；销售价按木材质量等级定价，木头越

^{①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448、449 页。

大价格越高。这样，既不让国家吃亏，又可以调动林场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他说：在这方面要多想一些办法。

刘少奇还指出，过去一些合理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没有经过上级批准，也没有说废除，就不执行了，这是不对的，要恢复过去合理的规章制度。今后，“规章制度不经请示批准，决不能随便废除”。^①

要抓好森林资源的培育和更新。这是刘少奇讲话中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小兴安岭林区是我国森林资源比较丰富的地区之一，被人们称为“红松之乡”。但由于只伐不育或重伐轻育，森林资源逐年减少。如何使森林资源尽快得以更新，采用什么方法使资源更新的效率更高，这是摆在林区建设中的迫切问题。刘少奇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反复听取林业专家和干部工人的意见。他在讲话中提出，各林业局要认真总结造林更新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因地制宜地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肯定了林区提出的“人工更新为主，天然更新为辅，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的方针，进一步提出，人工更新，可以采取由林场、工段、工组、家属包栽、包活、包抚育、包成林，按树木的成活率领取报酬的方法。

刘少奇在讲话中对林业部门的领导提出了新的要求。他说：“你们的领导工作，什么叫进步，什么叫英明？无非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充分利用资源，成本降低，材料节省，采伐质量更好，造林成活率更高，政治上大家心情舒畅，这就叫作先进，就叫作领导水平高，经营管理水平高。”^②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为林区题词：“充分利用森林资源，尽可能满足国家和人民群众各方面的需要。”

^{①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51、455页。

先办刹刹桑田资源
不可再得循是固家
私人成群在各方面
致富要。别字了能

1961年7月25日，刘少奇视察大兴安岭林区时题词手迹

七月二十七日，刘少奇视察了鹤岗市、佳木斯市后，来到风景秀美的牡丹江市风景区——镜泊湖休整。在短暂的两天休息中，他又先后视察了镜泊湖发电厂、人造红松林和人参种植园。

回到哈尔滨后，刘少奇在同出席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负责干部的谈话中又一次指出：森林更新问题，我们应重视。许多领导同志只顾砍树去了，没有很好地研究它。更新方法可以这样定：人工更新为主，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相结合。人工更新和天然更新两条腿走路。^①

八月一日，刘少奇一行离开哈尔滨，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王逸伦陪同下，来到地处北部边陲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继续考察。三日至四日，刘少奇冒雨视察了牙克石林业管理局所属的根河林业局和西尼气林业局，同林场的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进行座谈。

结束林区调查后，刘少奇应邀来到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旗（今鄂温克族自治县）的牧民家中做客。八月五日，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的锡尼河公社西博生产队和白音胡硕生产队像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的牧民以传统的民族方式夹道欢迎尊贵客人的到来。刘少奇在欢快的气氛中观看了赛马、摔跤、套马等精彩表演，并到牧民的蒙古包中，品尝奶茶，促膝交谈。

八月六日，刘少奇在呼盟首府海拉尔召开内蒙古林业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说：生产关系不适合，就妨碍生产力的发展，调整一下，使它适合了，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合理的规章制度，过去被废除了的，要恢复。他再次要求广大的林业干部和工人认真总结经验，把林区的工作做好，充分利用森林资源，满足

^① 刘少奇同出席东北、内蒙古林业工作会议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61年7月31日。

国家建设的需要。

返回哈尔滨的路上，刘少奇视察了富拉尔基第一重型机器厂、齐齐哈尔钢厂和大庆油田。在大庆油田，刘少奇到生产第一线察看了喷油池和钻井台。在同油田干部和工人座谈时，充分肯定大庆的艰苦创业精神和取得的巨大成绩，并嘱咐油田领导：“对那些不怕苦、不怕死、不怕累、一心扑在油田上的先进模范人物更要爱护他们，注意解决他们的困难，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对这些功臣，领导不关心谁关心？”^①

近一个月的林区调查结束了。通过调查，刘少奇不仅深刻感受到“大跃进”以来对工业战线造成的危害和损失，也感受到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中蕴藏着的巨大积极性，使他对进一步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充满信心。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中央局、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市委、县委以及全国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共七千一百一十八人，因此又称“七千人大会”。

这次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会，是在国民经济调整进入关键时刻召开的。经过一年多的调整，到一九六一年底，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已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十分严峻，工业生产继续大幅度滑坡。而党内各级领导对调整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仍不统一，不少地区和部门还采取观望徘徊的态度，许多政策落实不下去，极大地影响了调整工作的深入开展。不改变党内的这种思想状况，国民经济调整将难以为继。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这次大会来统一全党的思想，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发出《关于召开扩大的

^① 刘振德：《我为少奇当秘书》，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68页。

中央工作会议的通知》。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代表中央向大会的报告。

报告的起草工作从一九六一年底开始。这年十一月刘少奇因病到广东从化疗养，十二月十九日回到北京后，立刻投入报告的起草工作。报告由中央组织的写作班子写出初稿，在刘少奇主持下反复修改，刘少奇也亲自作过多次修改，在一九六二年一月九日形成第一稿，报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当天就看完了前两部分，并在给田家英的信中要他转告刘少奇、邓小平等：报告前两部分已看过一遍，“觉得好”。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召开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主要领导一百多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和国内经济工作，为即将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做准备。十二月二十一日，当邓小平报告国内形势时，刘少奇插话：这个时期的缺点错误，责任是谁的？第一，中央负责；第二，省市负责；第三，省市以下也有责任。各有各的账，大家来检查一下，回到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方针上来。不说老实话，或者虚假浮夸，故意多报，故意少报，这种事情作为党的纪律也要定一下。一月九日，会议分组讨论了七千人大会上报告的第一稿。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幕。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就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的报告（第一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报告不先经中央政治局通过，而直接印发大会全体代表讨论，这在党的历次会议上还是第一次。毛泽东认为，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这样做可以更好地集思广益。从一月十一日到二十九日，参加大会的七千多名代表按地区分成小组，对刘少奇的报告展开热烈讨论，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周恩来后来在传达大会精神时曾把这段时间称为大会的第一个“高潮”。

在大会对报告讨论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组织了一个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二十一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充分听取大会代表的意见，对报告作进一步修改。十七日至二十四日，刘少奇先后八次主持报告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报告作了重要修改，形成报告第二稿。修改过程中，多次送毛泽东阅改。二十四日，毛泽东在同刘少奇、邓小平谈话时肯定了对报告的修改，表示“赞成这个方向”。^①

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报告第二稿，同意正式提交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了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意义：“现在有一个七千人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各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样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一九五八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②

一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报告正式印发给大会代表。报告共分三部分：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关于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一九五八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领导责任，要求全党下大力气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报告提出当前在经济工作中要加强集中统一，反对分散主义，更快地争取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报告阐述了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等优良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17页。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1月25日。

传统作风，严肃批评这几年干部作风中虚假浮夸、强迫命令、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要求全党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分散主义等坏思想、坏作风，把党的战斗力大大加强起来。

报告认为，一九五八年以来党在工作中的主要缺点错误是：第一，工农业生产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的战线过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发生了严重不协调的现象。第二，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在一个时期内，曾经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曾经对集体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进行不适当的、过多过急的变动，这样，就违反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第三，不适当地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许多完整的工业体系，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的倾向有了严重的滋长。第四，对农业增产的速度估计过高，对建设事业的发展要求过急，因而使城市人口不适当地大量增加，造成了城乡人口的比例同当前农业生产水平极不适应的状况，加重了城市供应的困难，也加重了农业生产的困难。

对于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报告指出，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建设工作中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几年来党内不少领导同志不够谦虚谨慎，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几年来，一些过高的计划指标，一些不适当的‘大办’，以及把管理权力下放过多等等，都是中央批准或者提倡的。中央有些同志，常常只是依靠汇报来了解情况，并且轻易地相信了那些不符合实际或者不完全符合实际的汇报，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有一个时期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因而对于某些工作问题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报告明确

提出：“对于这几年来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①

报告要求全党，要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把思想统一到经济调整中来，落实中央提出的各项调整措施，“踏踏实实地、干劲十足地做好这种调整工作”。^②

按照原定计划，报告由刘少奇在一月二十七日的大会上宣读。开会前一天，毛泽东提议：既然报告已经印发，在大会上就不要念了，请少奇同志根据报告的精神在大会上放开讲一讲。这样，刘少奇连夜准备了一个讲话提纲。第二天大会开始前，刘少奇在会场休息室里把提纲送给毛泽东和其他中央常委传阅。经常委同意后，他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对报告作补充说明。

刘少奇的讲话和书面报告一样也分为三部分，但同报告相比，在一些问题上讲得更为透彻。书面报告中提出党在一九五八年以来犯了许多缺点错误，但这些缺点错误同成绩相比究竟怎样，哪一个主要的？书面报告只是笼统地说：总的来说，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在讲话中，刘少奇对这个问题作了具体分析：

“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

^{①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55、368页。

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①

刘少奇在讲话中纠正和清理了最近几年中央和地方提出的一些不正确的口号和提法，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把重视客观条件叫做“唯条件论”、“左”比右好以及用经济上的具体指标和数字来划分“左派”和“右派”等。他建议，中央和地方要继续清理这类口号和提法，以便使我们的干部和群众转变观念，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

在党的建设上，刘少奇着重谈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指出：“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很重要的。要实事求是，就要调查研究，就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就要从实际出发来拟定政策，拟定计划，拟定措施。”“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② 针对党内这些年出现的不敢讲真话、不敢讲老实话、怕吃亏、怕受打击报复的现象，他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要发扬毛泽东提出的“五不怕”（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精神，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

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在大会中引起强烈反响，对广大党员干部从这几年“左”的思想禁锢中进一步解放出来起了重要作用。这次大会原定一月底结束，但会议代表纷纷表示还有许多话要说，希望能延长会期。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在北京过春节，让大家“出气”，把话说完。第二天，毛泽东又在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充分发扬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大会延长到二月七日结束。代表们在分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21页。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38页。

组讨论中结合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揭露矛盾，总结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热烈的讨论。大会进入第二个“高潮”。

在大会第二阶段，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用较多精力，处理和解决安徽省的问题。安徽在过去几年中是发生问题比较多的省份之一，“共产风”、浮夸风以及瞎指挥盛行，给工农业生产 and 人民群众生活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但省委个别负责人却没有如实反映情况，还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打击报复，致使下面的干部不敢讲话，问题迟迟不能解决。大会期间，安徽省有的干部写信向中央反映情况。刘少奇抽出时间，三次到安徽组参加讨论，会后还分别听取各地委的汇报，同安徽省委负责人个别谈话，详细了解安徽省的实际情况。在参加安徽组讨论时，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对安徽省过去几年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严肃批评了省委主要负责人的错误，要求安徽省参加会议的同志，充分发扬民主，实事求是地总结产生错误的原因，吸取教训，回去把工作做好。二月九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宣布调李葆华担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毛泽东一月三十日在大会上作了发扬民主、健全党内民主集中制的讲话。这个讲话引起刘少奇及其他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刘少奇感到，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当前政治生活和经济工作中极其重要的问题，而大会的报告在第二部分只强调了集中统一，对发扬民主有所忽略，应该把毛泽东的意思加进去。二月八日，即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刘少奇又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进一步修改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刘少奇在会上提出，起草书面报告时，把分散主义作为主要问题来批评，忽略了民主集中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建议把报告第二部分“关于集中统一”改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把毛主席讲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意思加进去。他在讲话中还说：“这几年，我们

吃了不调查研究的亏，吃了不讲民主的亏。我们不发扬民主，不善于听人家的意见，不充分在人民中间讨论，不认真取得他们的同意，这是一条很大的经验教训。”他要求：要形成一种能够畅所欲言的空气，党内如此，党外更应如此。无论如何不能以党代替政府，不能以党代替工会，因为党员总是少数。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通过这个制度去实行人民的民主。^①

会后，由刘少奇主持，对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和讲话再次作了修改，形成了第三稿。同第二稿相比，这一稿除增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外，还在第一部分增写了“基本经验教训”一节。在整理讲话稿时，刘少奇感情激动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②二月二十三日，报告和讲话修改稿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阅改后在给刘少奇的批示中说：“修改得很好了，即请你处理！”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和讲话正式由中央办公厅印发全党，成为国民经济调整时期指导全党工作的重要文件。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2月8日。

② 访问邓力群谈话记录，1998年3月25日。

三十五、主持国民经济调整(下)

“七千人大会”的召开，为全党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上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这么多人参加的大会不可能具体研究和落实国民经济调整的措施。如何把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仍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细致的任务。“七千人大会”结束后，毛泽东到南方视察，这项任务落在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以及处于经济领导工作第一线的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的肩上。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即“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第十四天，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连续开了三天，到二十三日结束，除毛泽东外，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成员和中央经济部门负责人共十六人参加会议。由于这次会议是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的，后来被称为“西楼会议”。

这次会议是七千人大会的继续，在分析国民经济状况和落实调整政策方面比七千人大会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会议检查了中央财贸办公室在“七千人大会”期间向中央提交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执行情况以及一九六二年预算和信贷的安排的报告》，发现一九六二年财政预算和信贷计划有很大的赤字，商品供应和社会购买力之间有很大的逆

差；同时又发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四年内各年的财政收入都有虚假的成分，财政支出都有较大赤字。

刘少奇针对这个问题指出：“收入要可靠，争取的数字不能打上。支出要打足，各种支出都要打上。实际支出如超出了预算，作预算的人要负责。有赤字要提出来警告大家，采取措施来弥补。过去几年没有揭露赤字是不对的。搞不好，经济还要继续恶化。只有暴露了问题，才好解决问题。”^①

会议进一步对国内的经济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刘少奇明确提出：“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他说：目前的形势是一个困难的形势，“类似非常时期”。他要求全党要有勇气正视困难。他坚定地提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陈云在会上作了系统的发言，全面地谈了目前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和克服这些困难的意见。他列举目前财政经济困难的主要表现：一、农业在近几年有很大的减产；二、已经摆开的基本建设规模，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性，同现在的工农业生产水平不适应；三、钞票发得太多，通货膨胀；四、城市的钞票大量向农村转移，出现了严重的投机倒把现象；五、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针对这些问题，陈云提出六条措施：一、把十年经济规划^②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048页。

^② 指1958年拟定的1963年至1972年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的初步设想。

段；二、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三、采取严格管理现金、尽可能增产人民需要的生活用品、坚决同投机倒把活动作斗争等办法，制止通货膨胀；四、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五、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六、计划机关的主要注意力，应该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农业增产和制止通货膨胀方面来，并且在国家计划里得到体现。后来中共中央在批转陈云这个讲话时，为了同其他文件保持语言上的一致，把陈云讲话中“前一阶段是恢复阶段，后一阶段是发展阶段”的提法，统一为“前一个阶段，是调整阶段，后一个阶段，是发展阶段”。

陈云的讲话，得到刘少奇和出席会议的其他领导人的完全赞同。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全体会议，请陈云再展开讲一讲，以便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他对陈云说：“光是你在这个会上讲，我们赞成还不行，建议召开一次国务院的全体会议，更充分地讲一讲，让参加国务院会议的全体同志都了解我们的经济情况，了解我们的方针政策。”^①

根据刘少奇的建议，陈云在二月二十六日召开的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作了《目前财政经济情况和克服困难的若干办法》的报告，再次阐述了他在常委扩大会议上所讲的内容。李富春、李先念也分别作了《关于工业情况和建设速度问题》、《当前财政、信贷、市场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应当采取的措施》的报告。陈云等的报告在国务院各部委党组成员中反应强烈。大家都感到这几个报告把问题讲得很透彻，提出的措施切实可靠。为了使更多人了解中央的精神，刘少奇主张由中共中央将陈云和李富春、李先念的报告转发全国，并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批发陈云等讲话的指示。

^①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4—5页。

三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同时还讨论通过了关于节约的紧急指示和关于渡荒的指示等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明确提出：“我们现在在经济上是处在一种很不平常的时期，即非常时期。”“中央认为，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大力恢复农业，稳定市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也就是说，目前全党必须集中力量，增加农业生产和日用品生产，解决吃、穿、用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至于基本建设，在最近两三年内，除了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工程和十分必要的扩大再生产的某些工程之外，其他都要一律停止。”指示还提出，一九六二年的计划，“必须根据上述原则迅速进行调整”。刘少奇还在十三日的会上提议由陈云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

中央财经小组是一九五八年六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负责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组长就是陈云。但不久后开始的“大跃进”中，中央财经小组实际上停止了工作。“西楼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决定恢复中央财经小组，统管全国的经济工作。刘少奇和周恩来都主张由陈云当组长。陈云因为身体原因，一再推辞，提议由其他人担任组长，自己当组员。所以最初曾确定李富春为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周恩来、陈云都是组员。当讨论中央批发陈云等讲话的指示时，刘少奇又提出，有同志建议，让陈云同志来当中央财经小组组长，富春同志当副组长，请大家再议一下。李富春也表示，陈云同志当组长最合适，自己当陈云同志的助手。与会人员一致赞同刘少奇的提议。当时陈云没有参加会议，他知道后还是推让由其他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刘少奇对他说，大家都同意你当，你就当，就我

个人来说，全力支持你，支持到底。^①

毛泽东这时在武汉，没有出席这次常委扩大会议。三月十六日，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批转陈云等讲话以及由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等问题。毛泽东同意会议的决定。这样，《中共中央关于批发陈云等同志讲话的指示》和陈云、李富春、李先念等的讲话于三月十八日发出，宣布陈云担任中共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通知于四月十八日发出。

三月二十一日，刘少奇主持最高国务会议，通报了不久前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他在讲话中说：这个时期，我们调查研究不够，只是听汇报来了解情况，而且轻信那些汇报，人家一报，我们就信了。但是人家的汇报，有许多是浮夸的，不符合事实的，或者不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们就相信了。又没有很好地同群众去商量，没有很好地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许多高指标，都不是从群众中间来的，是上面定的，拿到群众中间，又没有很好地听群众的意见，因此有些缺点、错误就不能很快地发现，不能很快地改正。有些地方，就完全依靠命令办事，用电话的形式瞎指挥。同时，有一段时间在党内、在群众中，又进行了一些错误的过火的批评斗争。这样，就使得群众和干部不敢讲真话，有意见也不敢讲，严重损害了民主集中制。

刘少奇十分重视陈云从实际情况出发对经济工作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意见。他感到，不仅陈云二月二十六日的讲话对当前的工作具有指导意义，他在近几年内的多次讲话和文章也很有价值，应该整理出来，让更多的人了解。从武汉回京后，刘少奇要邓力群组织几个人，把这些讲话和文章找出来，编辑印发。邓力群收

^① 邓力群：《向陈云同志学习做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6页。

集了陈云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讲话和文章，编成一本四五万字的材料，并整理出一万多字的摘要。刘少奇决定，将这个材料印发给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四月十六日，刘少奇写信给毛泽东，汇报这项工作：

“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决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刘少奇对陈云经济思想的重视和在实际工作中对他的支持，是国民经济调整的全局工作中的重要一环。尽管陈云在讲话后不久就因病到南方休养，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进行，但陈云在调整初期提出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措施对推动经济调整工作仍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的短短几个月中，经过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的紧张工作，全党进一步认清了形势，落实了具体措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显著进展。

但是，事物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调整工作需要加大力度的关键时刻，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的个别领导人思想上仍存在种种疑虑，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例如，有人曾对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提出非议；还有人不同意中央在七千人大会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提出：在七千人大会上中央对形势已经作了正确的估计，现在只过了几个月，又讲一篇同那时的估计大有区别的话，这样好吗？

为了进一步统一思想，进一步调整一九六二年的计划指标，中共中央于五月七日至十一日在北京再次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各大区中央局书记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共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这是一次对进一步落实调整措施有着关键意义的会议，通常称为“五月会议”。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如何看待目前的经济形势，再次成为会议的突出议题。五月七日，刘少奇在全体会议上宣布会议日程时提出：“我们现在的困难到底有多大？是不是有这样大的困难？我们现在是把困难讲过头了，还是讲得不够，还是讲得差不多了？这个问题请大家考虑。”

对这个问题，刘少奇毫不含糊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现在看来，我们对困难的认识迟了一点，措施也采取得迟了一点。早一年，去年春上我们开会采取这个办法就好一些。今年再也不能推迟了。如果今年再不采取措施，到明年形势就更坏。目前这个趋势不扭转，发展下去，我看是一个很坏的趋势，国民经济要崩溃。”^①

在五月十一日的总结讲话中，刘少奇又一次强调：“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

如何对待当前的困难？在困难面前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刘少奇说：

“对困难的估计，无非是这样三种：估计够了，或者估计过了头，或者估计不够。我看，对困难估计过分危险性不大。我们估计有那么多困难，后来发现好一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7日。

点，困难没有那么多，这好，这危险不大。但是，对困难估计不够就危险了。我们多少年都是因为估计不够而陷于被动。是估计过头了危险，还是估计不够危险？比较起来，还是估计不够危险。现在还没有那种因为把困难夸大而使工作受损失的危险。将来可能有那种危险，但是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我们应当充分估计当前的困难以及现在还设想不到的困难。要准备迎接困难，克服困难。否则，对克服困难我们就会精神准备不够，这是危险的。一个人，充分估计了困难，但不害怕，还是干劲十足地挺起胸膛前进，这是勇敢的。分明有困难，却说没有困难，这样的人，不能算勇敢的人。共产党员的革命气概，应该是充分估计困难，而且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是挺起腰杆前进。我想，我们革命家的气概，马克思主义者的气概，应该这样。对困难估计不够，自己安慰自己，那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自己也有一个认识逐步深化的过程，但当他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痛苦的思考，一旦认识到形势的严峻，立即以唯物主义者的坦荡襟怀和对国家对民族的高度责任感，毫无保留地摆明自己的观点，并努力使它变成全党的共识。

这次会议还研究了大幅度精减城市人口、关停并转部分工业企业、调整一九六二年计划指标等力度很大的落实措施。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会上对这些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刘少奇针对会上有人提出采取这样大步骤的调整措施是不是太消极的疑问，在总结中指出：“我们减少这么多城市人口，关这么多厂，指标调低，是不是消极的？我看不是消极的。缩短工业战线，是为了加强农业战线。只有这样，才能停止目前经济状况的继续恶化，才能转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5—446页。

人主动，才能在以后继续前进。我想，这样的步骤是当前我们所能采取的最积极的措施。”在会议结束时，刘少奇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有这个本事，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把当前的困难一步一步地克服。”^①

在这前后的一段时间里，围绕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有一个问题成为人们议论的重要话题，并对以后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这就是农业生产中的包产到户问题。

包产到户是一种统称，实际上包括六十年代初在我国农村中形成的各种形式的以家庭为主要单位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最初出现在安徽农村，并得到省委的支持。不久，河南、广西、湖南、浙江、陕西、甘肃、贵州等省部分地区也相继出现不同形式的包产到户。包产到户是农民群众对人民公社化以来农业生产中“大锅饭”、“大呼隆”的“左”的做法极端不满、迫切要求生产自主权而出现的一种创造性尝试，它对尽快恢复农业生产、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势具有十分明显的作用。

在一九六一年三月广州会议期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向毛泽东汇报了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的情况，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包产到户的做法。当时毛泽东表示可以试验。于是，包产到户在安徽全省范围内以及在全国部分地区较快地铺开了。据统计，在这一期间，安徽有百分之八十、全国有百分之二十的农村先后实行了包产到户。这做法引起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的重视。他两次派人到安徽农村考察，并根据考察所得的结果肯定了包产到户的做法。

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子恢在谈农村工作问题的发言中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47—448、449页。

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自留地、饲料地、借冬闲田、自由市场等也可以适当放开或扩大。他说：“我认为，当前在一定范围之内，扩大小自由没有危险。过去我们对自发资本主义的危险，我看也有点太夸大了。因此，可以适当扩大小自由。”“我认为，适当扩大小自由，包括自留地、饲料地、借地、借冬闲田等，总不要超过总耕地的百分之二十。主要的生产关系还是集体所有制，加上百分之二十的小自由，就变资本主义呀？干部是我们的，国家主要的经济是我们的，就发展资本主义呀？把资本主义看得太厉害了。”^①以后，他又应邀在军委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多次阐述了这样的观点。

邓子恢提出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没有展开讨论，刘少奇和其他中央领导人也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但如何看待在农村中已经出现、并有扩大趋势的包产到户等问题，已经迫切地摆在中央和各级领导面前了。

刘少奇内心是赞成在农村搞包产到户的。他一贯主张，在农业生产管理中一定要实行劳动生产责任制，农业劳动“要有一定的自由，太集体化了不行”。^②一九六一年到湖南农村调查时，他又多次对当地的干部群众讲到，“有些零星生产可以包产到户”，例如田塍、荒土等。^③但是，由于包产到户是一个涉及全国的政策性很强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没有征得毛泽东同意，为慎重起见，刘少奇没有在正式场合明确表明态度。

这年七月初，田家英从湖南农村调查回京向刘少奇汇报工

^① 邓子恢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5月9日。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29页。

^③ 《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等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论述选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4期。

作。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并担任着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田家英受毛泽东委派到湖南湘潭、湘乡、宁乡等地调查贯彻执行《农业六十条》的情况。他带领一个调查组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认真听取并思考了农民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得出结论：包产到户在当前具有优越性，对于解救已经遭到破坏的集体经济的危机、迅速恢复农业生产是有利的和必要的。调查期间，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调查情况和他的想法，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赞同。七月初回到北京后，田家英又向刘少奇汇报他的意见。当时和田家英在一起工作的逢先知回忆道：

“汇报刚开了个头，就被刘打断了。刘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接着就提出关于实行包产到户的主张，并且详细讲了对当时形势的看法。田问：‘少奇同志这些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刘说：‘可以。’刘少奇又吩咐田家英把他的意见在‘秀才’中间酝酿一下，听听反应。他为慎重起见，并且希望能够真正听到‘秀才’们的真实意见，嘱咐田不要说是他的意见。”^①

从这次谈话中可以看出，刘少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认为实行包产到户的条件已经比较成熟了，希望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并且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这期间，陈云、邓小平等也在不同场合表示了赞同包产到户的意见。

出乎刘少奇的意料，毛泽东不仅没有同意包产到户的主张，而且严厉批评了田家英等人。就在刘少奇同田家英谈话的几天以后，毛泽东从邯郸回到北京，听了田家英的汇报后，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后不修改《农业六十条》，却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毛泽东并在同田家英谈话时问他：是你个人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田家英为了不在中央领导层中

^①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第 67 页。

造成裂隙，回答是个人意见。尽管如此，毛泽东在同刘少奇谈话时，仍对刘少奇前一阶段在京主持工作表示不满，指责他在包产到户问题上为什么没有顶住。^①

在毛泽东明确表示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后，刘少奇收回了自己的意见。七月十八日，他在接见中央下放干部的讲话中，专门谈了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不够巩固，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许多地方的农民，甚至于干部，要求单干，要求分田到户，或者包产到户。”“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工作的、到地委和县委工作的同志，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但在谈到怎样巩固集体经济时，他仍认为必须实行责任制，“我看实行责任制，一户包一块，或者一个组包一片，那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如何使责任制跟产量联系起来。”^②

和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全面展开同时，其他各条战线的调整和纠偏工作也开展起来。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刘少奇除经济工作外，重点抓了整顿公安、政法战线的工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左”的错误指导思想不仅给经济工作造成严重恶果，而且带给政法、文化、教育、统战等工作的损害也是严重的。在政法战线，由于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不依法办案、打击面过宽的现象严重，造成许多错案、假案。有的党政部门负责人，不经过公安、检察机关就随便决定捕人，甚至有的公社、工厂和工地也随便捕人，在群众中造成很坏影响。

刘少奇一九六一年四五月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就了解到不少

^① 访问王光美谈话记录，1994年6月17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61、463页。

这方面的情况，他直接干预了女工刘桂阳上京“贴反动标语案”和饲养员冯国全“破坏耕牛案”的复查工作，还对宁乡县扣压群众信件、乱捕人的现象提出严厉批评。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感到，对政法工作中这种混乱状况，必须进行全面总结和整顿。不搞好法制建设，就不能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一九六二年三月，刘少奇在公安部编发的《公安工作简报》第六期上看到关于一九六一年公安工作情况的通报。通报称，一九六一年是公安工作困难最大的一年，但捕人最少、杀人最少。刘少奇根据他对实际情况的了解，认为这个材料反映的情况是虚假的，掩盖了公安政法工作中的主要矛盾。他在三月十五日写信给中央政法小组负责人、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严厉批评这种不如实反映情况的做法。他说：“此件看过。我认为这是一方面的你们能够控制的好的情况，请你注意另一方面的情况，就是从一九五九年以来，有许多地方公安机关，甚至公社大队等用长期拘留、长期劳改、劳教等方式，实际上逮捕了許多人，饿死和折磨死了一些人。而这些是你们不能够控制的，没有统计的，或者统计不确实。一九六一年，这种情况还没有完全停止。去年我在湖南就还看见这种情况。你们应该严格地检查、揭露、批判和纠正这种违法的情况。”

第二天，刘少奇同周恩来、邓小平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后，他约当时也在武汉的谢富治、罗瑞卿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专门谈了对政法工作的想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四年的经验教训多得很，你们要好好总结。主要经验是混淆两类矛盾。混敌为我的也有，但主要是混我为敌。”“你们的简报上说去年杀人最少，那是你们能够控制的情况，是假报告。下面不按照法律，县、公社甚至大队用长期拘留、劳改、劳教等办法，不知折磨死了多少人。”他指出：“你们

要认真检查，彻底揭露、批判。”在谈到可能造成的影响时，他说：“当然，揭露出来是不好看的，是很丑的。但是，有那个事实嘛，怕什么丑呢？今天不揭，明天还要揭；你自己不揭，别人要揭；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也要揭。”在谢富治谈到这几年政法机关经常被批评为“右倾”时，刘少奇激动地说：“你们怕‘右倾’吗？无非是撤职。坚持真理，撤职也是好的，也光荣嘛！”^①

刘少奇的批评给了公安、政法部门的领导人很大震动。公安部党组整理了刘少奇同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的谈话记录，送给刘少奇审阅，并准备印发到下级单位。刘少奇没有同意印发这个讲话。他四月四日在送审稿上批示：“这个记录稿不要印。过去，你们已经印得有些过多了，将来会出毛病的。四年来，公安政法工作方面的确有不少新的经验需要总结，如果你们搜集了材料，我可以参加，和你们一道，认真地系统地进行总结。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不要这样草率、零星地印发东西。”

四月下旬，中央政法小组准备召开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一步总结政法工作的经验教训。四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召集会议，听取中央政法小组关于筹备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的情况汇报。在谢富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等人汇报后，刘少奇指出：“我们无产阶级的法律还没有成熟，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过去列宁写了《国家与革命》，斯大林也搞了一些东西，毛主席规定了我们专政工作的路线，又提出两类矛盾问题。现在的经验是两方面的，赫鲁晓夫不要专政，斯大林后期把肃反扩大化，我们也有混淆两类矛盾的经验。现在要纠正，要总结经验教训，要从理论上、方针原则上、机构分工上和具体办法上搞出一套来。”在谈到政法工作和党的领导的关系时说：“检察院、法院要独立办事，

^① 刘少奇同罗瑞卿、谢富治、王任重谈话记录，1962年3月17日。

党委不要干涉具体事务，党委什么都干涉不好”，以后下面公检法机关“向上面写报告要直接报，不要经党委批准，经过党委批准是错误的。要有对立面，唱对台戏，三机关互相制约也是对立面，也是唱对台戏。什么事情一个渠道是不行的，老百姓都能反映情况嘛”。“这几年犯的‘左’的错误是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犯的，这是一条重要的经验。”^①刘少奇建议，先不要急于召开会议，要把会议的报告准备好，可以先在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一讲，打个基础。

在五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谢富治作了关于政法工作的发言，对前几年的政法工作作了初步总结。会后，遵照刘少奇的指示精神，中央政法小组经过多次讨论，起草了《中央政法小组关于一九五八年以来政法工作的总结报告》初稿，送给刘少奇审阅。

刘少奇认真审阅了报告初稿，并在五月二十三日约请中央政法小组成员开会，详细谈了他对报告初稿的意见。刘少奇认为，报告指出目前这个时期主要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是对的，但在这个问题上讲得还不够，特别是没有着重强调要严格区分处理两类矛盾的两种不同方法。他说：

“这几年的政法工作，就问题方面来说，总的经验教训是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主要是误我为敌，打击面过宽。就是说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没有把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清楚地、严格地、细致地区分开来。同时，又没有严格区分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说服、民主的办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压服，只能用来处理敌我矛盾。这是根本不同的两种方法。要调用两种不同的方法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这几年的错误，主要是

^① 刘少奇听取中共中央政法小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记录，1962年4月28日。

用处理敌我问题的办法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专政的办法来处理自己人的问题，处理劳动人民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错误。这不是共产党的方法，而是国民党作风，是站在人民之上，向人民施用压力。”^①

他提出，公、检、法机关不仅要处理敌我矛盾，而且要成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机关，这个观念要好好研究一下。“你们叫公安局嘛，名为公安，就是要管公共安宁。公共是谁呢？是人民。”“无产阶级法制，就是人民民主的法制，也就是社会主义法制。法制不一定是指专政方面的，人民内部也要有法制，国家工作人员和群众也要受公共章程的约束。”^②

他还提出，搞这个文件，把今后一个时期的方针、政策讲清楚。要从实际出发，然后提高到一般原则和理论高度。“不要光从原理出发，要解决实际问题。”^③搞好以后，提请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讨论通过，然后作为中央文件发下去，指导全国的政法工作。

这以后，中央政法小组经过反复修改，并多次送刘少奇审阅，形成一份正式文件，准备提交中央工作会议讨论。但由于在不久后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这份文件没有能在会上拿出来。尽管如此，刘少奇在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思想和意见，对政法战线的纠偏和整顿工作仍起了重要作用。七千人大会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法制状况有了较大程度的改善。

这段时间内，刘少奇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修订和补充他一九三九年在延安发表的重要著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强调共产党员在取得政权后更要加强思想意识修养。经过修订补充后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50页。

^{②③}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51、452页。

的这部著作，于八月一日由《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重新发表，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

会前，中央发出召开这次会议的通知。在这个经过刘少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通知中，规定这次会议所要讨论和解决的主要内容是：（一）目前农村中的一些问题；（二）粮食问题；（三）商业工作中的问题；（四）国家支援农业的问题，并列出了四十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请各地准备意见。

会议的最初阶段，与会人员按照这个议程分小组讨论了农业、商业等有关文件。但是，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改变了会议的原定议程。

八月六日，中央工作会议举行第一次全体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讲话，提出：社会主义究竟存不存在阶级？这两年国内的形势究竟是一片光明还是一片黑暗？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包产到户、闹单干，就是搞资本主义。接着，在八月九日、十一日、十三日、十五日、十七日、二十日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书记等二十多人参加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插话，继续阐发他的观点，严厉批评“黑暗风”和“单干风”。这样，会议改变了原定议程，转到着重讨论阶级斗争问题和开展对“黑暗风”、“单干风”的批判。

所谓“黑暗风”和“单干风”，实际上是指“七千人大会”以来党内一些负责干部对国内困难的经济形势的估计和对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村家庭生产责任制的支持。这同在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有直接关系。面对毛泽东的尖锐批评和指责，刘少奇不得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八月十一日在中

心小组会上，刘少奇说：“形势问题，一月会议我们做过一次估计，当时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五月会议又有一个估计。现在看五月会议对困难有两点估计过分了。第一是认为夏收减产已成定局，现在看没有减产还增了产。第二是那时估计单干在全国已占百分之二十，现在看全国最多也不过百分之十。因此五月会议上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是指全国讲的，有些地方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五月会议下了决心，减轻征购任务。当时对困难估计有三种设想：一是估计够了，二是估计不够，三是估计过头。当时认为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点，即使出现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也会有思想准备。但是有些丧失信心。”^①

刘少奇对毛泽东是尊重和依赖的，在党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上，即使他的想法同毛泽东发生分歧，他也总是放弃自己的意见，转而支持毛泽东。这次也是如此。但是，对于重新强调阶级斗争，并且把党内不同意见提到这样高的纲上来认识，刘少奇是深有忧虑的。他担心这会打乱正在进行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再次出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全党反“右倾”的局面。他希望能把这次会议的精神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以免影响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在八月二十日中心小组会上，他提出建议：“这次会议如何传达？这次会议讨论阶级和阶级斗争，一讲阶级和阶级斗争就联系很广。传达时要联系到对干部的教育问题，讲好了，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这是个复杂问题，闹不好在实际上可能发生反右。阶级问题一联系，什么问题都联系上了。比如自留地多少，生产责任制，包工包产等等。现在实际上是研究的问题，容易划分不清，把什么都联系到阶级来分析。”“究竟怎样传达？是传达广一些好，还是传达窄一些好？传达广一些，对干部教育有好处，但是容易联系到反右。应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8月11日。

该规定个传达范围。”^①毛泽东同意了这个意见。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会议决定，紧接着在北京召开中央全会，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八月二十五日，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回到北京。二十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召开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在预备会议期间，又发生了两件事：一件是批判彭德怀的“翻案”，另一件是批判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利用小说《刘志丹》“为高岗翻案”。

彭德怀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和处理。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他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封很长的申诉信（被称为“八万言书”）。在北戴河会议结束前两天，他再次写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请求对他的问题进行全面审查，做出正确的处理。作为一个党员，写信给中央，为自己申诉和辩解，完全是正当的。但是，彭德怀这两封信却被认为是翻案，是向党提出挑战，在会上受到严厉批判。

与此同时，有人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在康生挑动下，会上又对这本书的作者及审阅和支持过它出版的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等展开批判，把他们打成“反党集团”，并把这件事同彭德怀的信、同高岗联系起来，说成“彭、高、习反党集团”。

这两件事的相继出现，使会议的气氛变得更加紧张。

九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毛泽东在二十四日的大会上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的讲话，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承认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我们可以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大会就讲，使全党提高警惕，使我们有一条清醒的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中心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2年8月20日。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并再次批判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他表示赞成毛泽东的意见。在谈到经济困难时，他说：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所遇到的困难是革命胜利后头一次考验我们。我们在困难面前有三种态度：第一种是克服困难，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第二种是被困难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往后倒退；第三种是利用我们的困难，向党发起进攻，企图推翻党的马列主义的领导。第一种态度是正确的，而第二、第三种态度是错误的和反动的。我们要坚持第一种态度，反对第二、第三种态度。现在，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形势已有好转，我们更应该坚定。但是，在宣传上还要说有困难，要继续克服。他再一次对前一阶段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承认“今年五月对困难估计得多了一些”。在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提出：对全党干部进行教育是必要的，但要划个范围，“不要都卷入这个斗争中，受它干扰，妨碍工作”。^①

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期间，刘少奇两次提出对会议精神的传达要划个范围，只传达到党内高级领导干部，不向下传达。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毛泽东说：“决不可以因为阶级斗争妨碍我们的工作。”“要把工作放到第一，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不要让阶级斗争妨碍了我们的工作。”^②全会规定会议精神只传达到党内十七级以上的领导干部，不向下级传达，也不开展全党讨论。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国家生活出现一种复杂的状况：一方面，政治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进一步严重发展；另一方面，经济上调整工作基本上仍按照原定计划继续进行。政

^①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2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70页。

治上的错误指导思想还没有对经济工作造成严重冲击，这是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的努力分不开的。

为了安排好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八届十中全会结束后，刘少奇从十月十五日至十一月二十七日，主持召开了九次中央政治局汇报会，先后听取农林、国防工业、工交、财贸、文教、科技、基本建设等方面负责人的汇报，对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间的经济工作做了具体部署。在汇报会上，刘少奇要求各个系统要坚决贯彻落实国民经济调整以来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在经济有了好转趋势的形势下不要放松。他指出：“国民经济开始好转，但是还要紧张工作。”^①“要继续贯彻五月会议精神，基本建设应该下马的还得下马，精简城镇人口要继续减，不然，对我们十分不利，使我们十分被动。明年的计划可能还是大了一点，不要一下子搞那么大，搞得大了，又来调整。这两年，我们花了很大的力量扭转了这个局势，不要再一次扭转了，那样就划不来了，时间也耽误了，老百姓也吃了苦头，国家也受了损失。不如现在紧一点，搞小一点。”^②

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到一九六二年底，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九六三年国民经济出现全面回升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三年年中决定，原定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第三个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暂不实行，推迟到一九六六年开始。从一九六三年起，再用三年时间调整，着重于巩固、充实、提高，为国民经济今后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在经过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的严重挫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听取国家计委副主任顾卓新汇报基本建设情况时的插语，1962年11月1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汇报会上听取李富春、李先念汇报全国计划会议情况时的插语，1962年11月27日。

折后，经过这几年的调整，取得明显成绩，已经开始复苏，开始沿着良性循环的轨道向前发展。但是，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久又遭遇巨大的曲折。

三十六、中国人民的使者

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除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参与制定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外，外事任务也日益增多起来。他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身份出现在国际外交舞台上。在外交出访活动中，他作为中国人民的使者，为沟通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各地区人民之间的理解和友谊，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应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政府的邀请，刘少奇率领中国代表团飞赴莫斯科，参加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庆祝活动，并准备出席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以后的第一次出国访问。

中国代表团是在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刻来到莫斯科的。

从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如何公正地评价斯大林、如何正确处理兄弟党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这以后，虽然有时稍有缓和，但分歧远未消除，并还在逐步加深。

一九五八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和苏中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这年八月一日至三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同来华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连续举行会谈。毛泽东坚决拒绝了苏方的无理要求，指出苏方是想在军事上控制中国。这件事使得稍有和缓的中苏关系又一次紧张起来。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苏方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随后，在一九五九年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苏联出于自身需要，不顾事实，公开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国的分歧公开化。

进入六十年代后，中苏两党的分歧扩展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理论和国际战略策略等问题上。一九五九年九月，赫鲁晓夫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美国戴维营会谈。接着，赫鲁晓夫访问中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国庆宴会上，他宣传所谓“戴维营精神”，并无中生有地教训中国“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赫鲁晓夫回国后，在讲话中继续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战争”。中国连续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点名地进行了驳斥。

一九六〇年六月，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在会上，苏共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向各党代表团散发《苏共致中共通知书》，指责中共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在国际群众组织中采取“宗派主义立场”，并发动许多党的代表团围攻中共代表团。面对苏共的挑衅，以彭真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作了针锋相对的驳斥。布加勒斯特会议使中苏两党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接着，苏联又把对中国的压力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这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并中止继续派遣专家。苏联专家撤退时，带走了所有图纸、计划和资料。同时，苏方还停止向中方供应建设中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关键部件的供应。苏联的做法，使中国大批建设项目突

然陷入停顿和半停顿状态，造成极大损失，对中国本已处在严重困难境地的国民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在苏联的高压政策面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不畏强暴的英雄气概。八月二十四日和二十六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召集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通报了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和停止供应主要设备的情况。他说：“在这种困难面前，在这种风浪面前，我们团结一致，这很好。我们应该有这个志气，站起来！中国这个民族，一百多年来是受压迫的，但是没有压倒嘛！难道现在就可以压下去？我们站起来了！不光是这一件事情，再大的事情也压不下去我们。”同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政策是坚持立场，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同时要谨慎对待。”^①

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国际共运中产生巨大的震动。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对改善中苏关系做出积极的努力。

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共派出以邓小平为团长、彭真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到莫斯科同苏共中央举行两党会谈。随后，中共代表团又参加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在莫斯科举行的由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组成的文件起草委员会会议。这些都是为即将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做准备。但会谈的进展并不顺利，还发生激烈的争论。

十月二十七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中共代表团参加二十六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会议批准了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这个阶段的工作，并决定组成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和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

刘少奇正是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中，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来到

^① 刘少奇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26日。

莫斯科的。从十一月五日抵达莫斯科，到十二月九日回国，刘少奇在苏联度过了三十四天。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他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为争取中苏关系的改善做了不懈的努力。

十一月七日是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三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刘少奇登上莫斯科红场的检阅台，观看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活动。在这前后，刘少奇同中国党政代表团成员先后拜会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拜谒了列宁和斯大林陵墓。

十一月十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召开。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八十一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由于苏共中央在会议开始前向出席会议的各代表团散发了一份长达六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会议气氛从一开始就很不正常。

中共代表团早已预料到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坚持原则，在大会上清楚地说明自己的观点，一方面通过各种渠道做其他代表团的工作，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合作。

代表团刚到莫斯科不久，刘少奇在同代表团成员、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谈话时就提出：我们代表团要高举照顾大局、互谅互让、达成协议、加强友好团结、开好会议的大旗，把这次会议开好，并在这一基础上改善中苏关系。他要刘晓以多种方式把中国代表团的这种态度透露给苏联和其他国家的代表。当会议争论激烈、气氛比较紧张时，刘少奇又要刘晓去做波兰和罗马尼亚使馆的工作，通过他们影响波兰和罗马尼亚代表团，希望他们在会议气氛紧张的时刻能起缓冲的作用。^① 这个做法取得了良好的效

^①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101、102页。

果。

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十四日和二十四日的大会上代表中共代表团作了两次长篇发言，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重大问题的基本观点，并诚恳地表示中国共产党愿意消除分歧、加强团结的愿望。会后，在起草和讨论会议声明时，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一些非原则问题上做了必要的让步。

经过这些工作，终于使濒于破裂边缘的会议走向正常，紧张气氛得到缓解。会议最后通过《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简称《莫斯科声明》）和《告世界人民书》，刘少奇代表中共代表团在这两个文件上签了字。

十二月一日，会议的最后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虽然这次会议的过程是有曲折的，有一段时间的气氛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不少兄弟党的代表对我们党提出了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批评和指责”，但是，由于参加会议的各代表团“要求团结的强烈愿望，终于克服了困难，使这次会议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他说：“我们希望在这次会议以后，各兄弟党将更加亲密地并肩前进，在自己的队伍中消除分歧、停止攻击，集中我们的全部力量，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发展我们的共同事业。”^①

会议结束后，按照预先的安排，邓小平等部分代表团成员先期回国，刘少奇受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访问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等城市。这是一次沟通和增进中苏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机会，刘少奇不顾连日开会的疲劳，在苏方安排下进行了紧张的活动。

^① 刘少奇在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稿，1960年12月1日。

十二月三日，刘少奇和中国代表团部分成员在勃列日涅夫陪同下，来到苏联第二大城市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在访问著名的基洛夫工厂时，中国客人受到了全厂工人的热烈欢迎。以后，他们又参观了位于冬宫内的艾尔米塔什博物馆。

第二天，刘少奇一行登上停泊在涅瓦河畔的“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四十三年前，就是这艘战舰，打响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炮。舰上全体官兵整齐列队，以迎接国家元首的仪式欢迎中国贵宾的来访。

下午，他们参观了宏伟的斯莫尔尼宫，伫立在宣布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的会议大厅里，伫立在列宁的办公室和住房前，表示深深的敬意。

晚上，在苏共列宁格勒市委和市苏维埃执委会为欢迎中国党政代表团举行的宴会上，刘少奇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列宁格勒是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摇篮。”“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人物能够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观察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这就开始了中国革命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十月革命后的第四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沿着十月革命的道路，经过反复的斗争，终于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胜利，现在，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正因为这样，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伟大的十月革命，永远记着首先举起这个革命火炬的列宁格勒人民。”^①

十二月五日，刘少奇等在勃列日涅夫陪同下到达白俄罗斯共和国首都明斯克，参观了市郊的集体农庄，并游览了市容。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5日。

结束对列宁格勒和明斯克的访问后，刘少奇一行于六日回到莫斯科。当天下午参观了全苏规模最大的李哈乔夫汽车厂。七日，莫斯科各界为欢迎刘少奇访苏举行盛大的群众大会。刘少奇出席大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就是生命，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的讲话。讲话中，他在深情地回忆三十九年前第一次来苏联的情景后说：

“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有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耐心地向我们解释发生各种困难的原因。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这样，到莫斯科以后不久，在一九二一年冬，我就加入了共产党。从那时候起，我就为拥护苏联、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而努力。”^①

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中苏两党两国对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两党两国的团结也就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中苏的团结。

刘少奇诚挚的讲话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纷纷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有的还唱起了《国际歌》。

^① 《人民日报》，1960年12月8日。

十二月八日，刘少奇从莫斯科启程回国。在苏联东部工业城市伊尔库茨克作短暂停留，并参观了伊尔库茨克水电站，游览了贝加尔湖，在九日回到北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到机场迎接刘少奇访苏归来。

刘少奇的访苏，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顺利召开，使一九五八年以来日趋紧张的中苏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不幸的是，这种局面没有能维持多久。不久，随着苏共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对阿尔巴尼亚党的攻击和对中国党的指责，中苏两党的分歧重新加剧，最终导致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

正当中国和苏联两国关系趋于紧张之际，中国同亚洲许多邻国的友好往来却日益频繁起来。

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和九月，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先后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和朝鲜。这次访问，使我国同亚洲地区许多国家加强了友好合作关系。

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后不久，就接待了来华访问的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一行。双方就签订中柬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等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十二月十九日，刘少奇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仪式，并在联合声明上签字。

一九六一年六月中旬，刘少奇同来华访问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举行会谈，并出席中国同印尼两国互换中国—印尼友好条约批准书的签字仪式。

这年九月，尼泊尔国王马亨德拉·比尔·比克拉姆·沙阿·德瓦来华访问。刘少奇同马亨德拉国王举行会谈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尼泊尔王国边界条约》上签字。

十月，刘少奇在北京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会谈，中缅两国签

订了关于两国边界的议定书。

一九六三年一月，刘少奇在北京会见锡兰（今斯里兰卡）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

这年二月，刘少奇在北京再次接待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

在同外国领导人的交谈中，刘少奇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说明我国的对外方针政策，表达了我国愿意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友好相处的愿望，同时对亚洲一些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表示理解和支持。刘少奇诚恳而热情的态度，得到来访的外国领导人的尊重和好感。

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国领导人在访问中国时，多次盛情邀请刘少奇访问他们的国家。

为了进一步增强中国同东南亚地区国家的友谊，刘少奇在一九六三年春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身份出访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越南等国。

四月十二日，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马腰兰国际机场上人潮涌动，鲜花簇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和夫人张茜、外交部副部长黄镇等陪同下从昆明起飞，在缅甸首都仰光作短暂停留后，抵达雅加达。在机场上，刘少奇等受到苏加诺总统、印度尼西亚政府高级官员以及身穿鲜艳民族服装的一万多名印度尼西亚青年男女的热烈欢迎。

印度尼西亚位于亚洲最南端，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岛国，素有“千岛之国”之称。早在一千多年前，它就同中国有了经济、文化来往。一九五〇年印度尼西亚和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是最早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印度尼西亚人民在苏加诺总统的领导下，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斗争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同中国以及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建立了广泛

的联系和合作。一九五五年四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市召开的亚非会议（又称万隆会议），形成著名的“万隆精神”，对亚洲和非洲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和解放起了重要作用。在万隆会议召开八周年之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印度尼西亚，在两国关系史上写下了新的一页。

刘少奇在机场欢迎仪式的答词中，对印度尼西亚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给予高度评价。他说：

“印度尼西亚是万隆精神的诞生地。万隆精神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精神。万隆精神是争取和保卫民族独立、加强亚非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精神。万隆精神反映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都应当加强友好合作，加强相互支持。中国人民将同印度尼西亚人民一起，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共同奋斗。”^①

刘少奇一行在印度尼西亚进行了八天正式访问。在这八天中，深切感受到印度尼西亚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和友好。

到达雅加达的第二天，刘少奇在苏加诺陪同下，参加了印度尼西亚第十七届国家航空节庆祝活动。按照传统习惯，印度尼西亚航空节庆祝活动应该在四月九日举行，为了欢迎刘少奇的来访，特意改在十三日举行。印度尼西亚空军的表演和航空展览，给中国客人留下深刻印象。当天下午，刘少奇向印度尼西亚烈士墓敬献了花圈。

十四日，刘少奇一行在苏加诺陪同下离开雅加达，到外地参观访问。在距离雅加达六十公里的避暑胜地茂物市，参观了世界

^① 《人民日报》，1963年4月13日。

著名的热带植物园。十五日，抵达万隆。

万隆市民以极大的热情和独特的方式欢迎来自中国的贵宾。街道两旁和下榻的宾馆周围，挤满了手持标语和鲜花的欢迎人群。第二天，刘少奇一行来到位于万隆以北二十公里的复舟山火山观看火山喷火口。海拔一千多米的复舟山火山是印度尼西亚著名的活火山之一，喷火口冒着蒸腾的热气，空气中充满硫磺味，景色十分壮观。人们惊奇地发现，在喷火口凝固的熔岩上，竟用岩石砌着“欢迎贵宾们”的标语。陪同的主人介绍，万隆会议结束后，为了纪念这次会议的成功，一些当地的勇士冒着高温来到喷火口，用岩石砌下“亚非会议，印度尼西亚，一九五五年四月”的字样。这次为了迎接中国贵宾，又砌了这条标语。

十六日，刘少奇一行抵达日惹。日惹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一千二百多年前修建的婆罗浮屠佛塔耸立在日惹西北郊，是世界著名的佛教建筑。日惹又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二次大战期间作为战时首都成为全国抗日的中心。为了迎接中国贵宾的到来，日惹人民在机场通往市中心的道路两旁用椰子树叶搭成许多拱门，代表当地最高规格的礼仪。在日惹，刘少奇饶有兴致地登上三十一米高的婆罗浮屠佛塔，观赏了这座代表印度尼西亚古代传统艺术的精美建筑。

刘少奇一行参观访问的最后一站是印度尼西亚中部的岛屿——巴厘。十八日，在巴厘首府巴塘市，巴厘人民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欢迎中国贵宾。在群众欢迎大会上，刘少奇对几天来受到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对印度尼西亚和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运动表示坚定不移的支持。他说：

“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是世界和平运动的极重要组成部分。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绝不是对立的。事实上，越是加强反对帝国

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就越能有效地捍卫世界和平。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道路，就是捍卫世界和平的道路。”他同时也指出：“政治上的独立还不是完全的独立。只有继续从各方面彻底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斗争，并且依靠人民，建立起独立的民族经济，才能实现一个国家的完全独立。”^①

在下榻的坦帕西林宫，刘少奇同苏加诺总统举行了会谈。二十日，刘少奇同苏加诺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联合声明》。

当天，刘少奇等满载着印度尼西亚人民的友好情谊离开雅加达，乘专机前往缅甸进行友好访问。

在仰光明加拉顿国际机场，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和张茜、黄镇以及其他陪同人员受到缅甸联邦革命委员会主席、革命政府部长会议主席奈温将军和夫人以及缅甸政府主要官员的欢迎。

缅甸是中国的邻邦，是当时除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以外第一个承认我国的国家。一九五〇年六月缅甸正式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两国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一九五四年六月，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首次访问缅甸，两国领导人间从此开始频繁往来。一九六〇年初，中缅两国签订边界协定，圆满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同时签订中缅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关系得到顺利的发展。刘少奇在这次访问中多次说：“中缅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是亚非国家和睦相处、友好合作的一个光辉范例。”^②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元首的来访，缅甸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二十一日晚，在国宾馆悬满彩灯的美丽花园里，奈温举行盛大国宴，缅甸政军高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几乎全都到场。在宴

^① 《人民日报》，1963年4月20日。

^② 《人民日报》，1963年4月23日。

会上，奈温回顾了缅中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历程，热烈欢迎刘少奇主席的到来。刘少奇也发表讲话。他说：

“中缅两国是山水相连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亲如手足的‘胞波’。在我们两国独立以后，我们的传统友谊又新的基础上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我们的友好合作不仅符合我们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非团结和世界和平。我高兴地听到，奈温主席表示将为不断巩固两国的友谊而努力。我们方面，我们也一定尽到我们的责任。我深信，在我们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两国的友谊一定能够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①

当天下午，刘少奇一行在奈温陪同下观赏了有二千五百年历史的缅甸佛教名胜——瑞光大金塔。这天正好是星期天，阳光明媚，一百余米高的大金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数千仰光市民和香客聚集在佛塔周围拜佛。刘少奇等遵照当地习俗，赤脚参观了金塔，并捐款六千缅元供修缮宝塔之用。接着，刘少奇又向在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中被帝国主义势力杀害的缅甸民族英雄昂山陵墓敬献了花圈。

二十二日，刘少奇一行由奈温陪同到达掸邦首府东枝访问，游览了风景名胜茵莱湖。第二天，到达缅甸西南海岸的海滨休养地额不里。宾主将在这里休息和举行会谈。在额不里海滩，宾主度过了轻松而愉快的一天。

额不里海滩海沙细腻，椰树成林，形成天然的避暑胜地。在茂盛的椰树叶下，宾主品尝着新鲜的椰子汁，时而下海沐浴，时而愉快交谈。在奈温的提议下，宾主组成两支特殊的混合足球队，在海滩上展开“角逐”。奈温将军和陈毅元帅也兴致勃勃地上场“竞技”。他们的表演，引起在旁观看的刘少奇和其他来宾

^① 《人民日报》，1963年4月23日。

的阵阵掌声和笑声。晚上，在几千盏彩灯下，宾主共同品尝了鲜美的烤鹿肉和海鲜。

二十四日，刘少奇同奈温在额不里举行会谈。谈到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外交政策时，刘少奇说：“在我们这些新独立国家面前，有三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资本主义道路。但是，现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会让后起的国家特别是小国变成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这条道路是走不通的。另一条道路是殖民地、附属国的道路，我们也不愿采取。因此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们要采取经济上的独立，需要几十年的工作。在国内，我们必须依靠最大多数人民，即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其他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在国外，我们必须联合一切尊重我们独立、平等待我的民族，反对帝国主义。这样，我们就能站得稳。”谈到中缅两国关系时，他说：“中国是真正尊重缅甸独立的，平等对待缅甸的。缅甸可以依靠中国，中国不会做损害缅甸的事。”^①二十五日回到仰光后，刘少奇同奈温继续进行会谈。随后，刘少奇同奈温共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联合公报》。

结束对缅甸的访问后，刘少奇一行在二十六日乘专机回到昆明，准备在昆明稍作休整后前往柬埔寨访问。

当刘少奇一行对缅甸的访问即将结束时，却从北京传来一个意外的消息：国家安全部门根据截获的情报分析，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将在代表团出访柬埔寨期间组织暗杀活动，首要目标就是国家主席刘少奇。

蒋介石集团自一九四九年溃退到台湾后，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一直处心积虑，想推翻中国共产党在大陆的领导，并且企图

^① 刘少奇同奈温会谈记录，1963年4月24日。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暗杀。一九五五年，台湾特务机关获悉周恩来总理将率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后，在香港制造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使用定时炸弹将代表团租用的印度航空公司专机在飞往雅加达的途中炸毁。周恩来和代表团其他领导人因临时改变计划、转道缅甸而幸免于难。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柬埔寨，台湾特务机关企图再次下手，因为时间紧迫和器材不足而未能得逞。

刘少奇这次出访活动确定后，中央有关部门加强了出访的安全保卫工作。一九六三年三月，成立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牵头，总参谋部、外交部、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门等负责人参加。小组的重要决策由周恩来直接负责。周恩来还委派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随刘少奇出访，担任代表团秘书长兼党支部书记，具体负责出访的安全工作。

四月十一日，刘少奇出访前夕，周恩来召集中央安全领导小组会议，对刘少奇出访的安全工作作出详细部署。在刘少奇访问印度尼西亚和缅甸期间，国家安全部门得到确切情报：台湾特务机关准备在刘少奇访问柬埔寨期间实施暗杀计划，并已指使他们驻西贡的“南越第三工作指挥站”和它下属的“金边组”组织策划（台湾特务组织把这个计划的行动代号定为“湘江案”计划，后又改名为“秋风案”计划）；但没有完全掌握他们的具体行动方案。

这时，离刘少奇一行原定出访柬埔寨的日期只有几天了，情况万分紧急。访问究竟是否还按原定计划进行，成为问题的焦点。

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安全领导小组进行了多次研究，决定一方面将敌情用电报通报给正在缅甸访问的刘少奇和陈毅，并在他们回到昆明后派专人前去汇报，请他们权衡情况后对是否继续出访柬埔寨作出决定；一方面选派得力的安全保卫人员飞赴柬埔寨

寨，协同柬方安全部门抓紧侦破工作，做好继续出访的准备。考虑到中国原驻柬埔寨大使王幼平对柬埔寨的情况比较熟悉，周恩来同时决定，速调王幼平回京，以外交部特别顾问的身分参加中国代表团的工作，并先期赶往柬埔寨，协助现任中国驻柬大使陈叔亮做好安全保卫工作。王幼平这时正在河南信阳蹲点，接到命令后，便星夜赶回北京待命。

二十六日，刘少奇、陈毅、罗青长等在昆明听取刚刚赶到这里的公安部局长凌云和王幼平关于敌情的汇报。刘少奇听取汇报后微微一笑，只说了一句：“敌人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刘少奇性格比较内向，平时言语不多，但往往言简意赅。短短一句，充分体现出他对敌人的藐视和对国家安全保卫人员的充分信任。他叮嘱王幼平：在同柬方交涉时，一切要持商量态度，安全保卫工作要靠柬方，商谈问题时要充分尊重和信任对方。陈毅也表示：“我们都是警卫员，负责保卫少奇同志的安全。”^①刘少奇和陈毅经过慎重研究，提出按原计划访问的建议，联名给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发了电报。

周恩来接到代表团的电报后，立刻向毛泽东汇报。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安全领导小组决定访问仍按原计划进行；同时采取一切措施，确保这次出访的安全。

当刘少奇在昆明休整期间，先到柬埔寨的王幼平、中方安全保卫部门负责人和中国驻柬大使馆工作人员全力以赴，配合柬方开展侦破工作。短短几天内，终于摸清敌人在金边波士东国际机场通往市区的道路挖掘暗道，埋藏炸药，企图在刘少奇到达金边时引爆迎宾车队。柬埔寨警方在五月一日凌晨逮捕了台湾派遣的特务，起获全部作案工具。这时，距离刘少奇到达金边只有不到半天时间了。

^① 访问凌云谈话记录，1996年3月6日。

五月一日上午，按照预定方案，刘少奇、陈毅等在昆明拓东体育场参加云南各界群众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活动，然后直接到机场登机，在当地时间十点四十五分抵达柬埔寨首都金边。在金边机场，他们受到柬埔寨王后和西哈努克亲王的热烈欢迎。为了确保安全，在柬方安排下，刘少奇、陈毅和王后、西哈努克等没有乘坐迎宾车队的汽车，而是直接登上直升飞机，到达代表团住地——柬埔寨王宫。^①

柬埔寨位于印度支那半岛西南部，一九五三年摆脱法国的统治宣告独立，一九五八年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以后，柬国家元首西哈努克亲王多次来华访问，周恩来也进行回访，并于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在北京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两国关系十分密切。这次，刘少奇以国家元首的身份首次访问柬埔寨，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促进。

到达金边的第二天，刘少奇等在西哈努克的陪同下，来到距金边三百公里的古城暹粒。暹粒以佛教古迹吴哥城闻名于世。在通往吴哥的路上，西哈努克亲自为中国客人驾车。吴哥寺是吴哥古迹中最美丽和保存得最完整的部分，高耸的圣塔是柬埔寨的象征，柬埔寨国徽上有着圣塔的图案。在圣塔下，西哈努克向刘少奇等介绍了雕刻在沙石壁上长达数十米的浮雕，这些精致的浮雕展示了古代战争的巨大场面。他们又乘车游览了范围广大、隐现在丛林中的大吴哥古迹。

回到暹粒，已是傍晚。吃过晚饭，刘少奇和王光美到西哈努克住处看望西哈努克和夫人。他们走出王宫，在街道上漫步交谈。这是一次事先未经安排的活动。看到两国领导人这样不拘礼节地悠闲散步，市民们惊喜地报以掌声。

^① 以上情况综合参考了1996年3月6日访问凌云记录，1996年4月25日访问罗青长记录和王幼平回忆材料等。

三日，刘少奇一行抵达磅湛市，参观由中国援建、一九六〇年投产的柬中友谊纺织厂。

四日，刘少奇同西哈努克在山城基里隆举行会谈。基里隆位于群山之中，风景优美，是新开发的游览胜地。为了纪念刘少奇的访问，西哈努克将这里的主要街道命名为“刘少奇路”。

结束了在外地的参观访问后，他们回到金边。五日，刘少奇同西哈努克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柬埔寨王国联合声明》。

为了庆祝刘少奇访问柬埔寨取得成功，金边各界人民举行了盛大的群众集会。刘少奇在讲话中热烈赞扬柬埔寨在国际事务中所起的作用。他说：“国家不分大小，在国际事务中都能够独立地发挥自己的作用。任何歧视和轻视小国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都是错误的。”他对当前世界发展趋势作了展望：

“人类历史的进程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曲折，但是总的趋势是朝着进步的方向前进的。长期以来，亚非各国人民是帝国主义奴役和掠夺的对象，被剥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现在，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亚非各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正在蓬勃地发展；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赢得了不同程度的独立。亚非各国人民已经觉醒和站立起来，成为决定世界历史进程的强大因素。”^①

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广大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五月六日，刘少奇、陈毅等结束对柬埔寨的访问，回到昆明。

在昆明短暂休息后，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访问越南民主共和国。

^① 《人民日报》，1963年5月8日。

五月十日，刘少奇在陈毅等陪同下乘专机到达越南首都河内。在机场上，受到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刘少奇和胡志明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就结下深厚情谊的老战友，这次在河内相见，分外欣喜。在机场的讲话中，胡志明用“心心早相印，今日喜相逢”的诗句来表达他的兴奋之情。

刘少奇是在越南人民开展反对美国武装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斗争的关键时刻来到越南的。在十二日河内人民为欢迎刘少奇的访问而举行的有二十万人参加的盛大群众集会上，刘少奇再次重申：“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坚决地支持越南南方人民和全体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和平统一祖国的爱国主义斗争。”^①刘少奇的讲话得到与会群众的热烈欢呼。

从十一日到十五日，刘少奇同胡志明等越南党政领导人连续举行会谈，交换对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会谈结束后，原定还要去海防等地访问，但由于长时间在外奔波，加上天气比较炎热，刘少奇患了感冒，发起烧来。这样，就没有再按原计划到外地访问。^②

五月十六日，刘少奇和胡志明共同签署《刘少奇主席和胡志明主席联合声明》。当天，刘少奇一行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国。

入夏后，由于工作繁重、一直顾不上休息，刘少奇经常感觉疲倦，有时还伴有低烧。在例行体检中发现，他在战争年代曾患过而后已痊愈的肺结核又有复发。^③周恩来知道后，十分关心，多次催促他抓紧治疗。这样，从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五日，刘少奇在王光美陪伴下到北戴河休养治疗。经过一段时间，健康状况

^① 《人民日报》，1963年5月13日。

^{②③} 访问王光美谈话记录，1995年6月18日。

稍有好转。

九月十四日，刘少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应邀前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访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林枫、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叶剑英以及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北京市副市长万里等陪同访问。

中朝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到中国访问。这年六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来华访问时，代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日成邀请中国领导人访朝。经双方商定，刘少奇在九月赴朝访问。尽管身体没有完全康复，刘少奇仍带病开始了十五天的朝鲜之行。

为了欢迎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访问朝鲜，朝方安排了隆重的接待。刘少奇一行乘坐的专列刚刚驶过横跨鸭绿江的大铁桥，立刻感觉到处处洋溢着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的气氛。专列在新义州、南市、定州、新安州等地的车站停留时，每站都有数万群众在站台上欢迎。刘少奇等走下列车，频频向欢迎人群招手致意。

在平壤车站，刘少奇一行受到金日成、崔庸健和朝鲜其他党政领导人热烈欢迎。在欢迎仪式上，刘少奇回顾了中朝两国人民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抗美援朝期间共同战斗的历程，赞扬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他说：“中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我们的伟大友谊和团结，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的，是用鲜血凝成的，是牢不可破的。”^①

^① 《人民日报》，1963年9月16日。

九月十六日、十七日、十八日，刘少奇同金日成举行会谈，交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

十九日，刘少奇一行在崔庸健陪同下抵松林市访问。在松林市，刘少奇参观了朝鲜最大的钢铁基地——黄海钢铁厂，兴致勃勃地观看了高炉、炼焦、平炉、轧钢等车间的生产情况。第二天，抵达朝鲜第二大城市咸兴市。在那里，参观了“二·八”维尼龙工厂、兴南肥料厂和咸州郡的朝阳合作农场。二十三日，在返回平壤途中，参观了朝鲜最大的水利灌溉工程——平安南道延丰水库。

在平壤，刘少奇同金日成继续举行会谈。

十五天的访问很快过去了。九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一行乘专列离开平壤回到北京。

从朝鲜回国后，刘少奇搬了一次家。自建国前夕中共中央住地从香山迁入中南海后，刘少奇一家起初住在一座叫万字廊的平房小院里，后来搬到新建成的中南海西楼甲楼。这是一座西式的三层灰色小楼，一层是会客室和工作人员办公用房，二层是刘少奇王光美夫妇的办公室和卧室，三层是子女们的住处。由于当时的条件有限，这座小楼盖得比较简陋，房间不大，楼梯较陡，取暖和通风条件也很差。在这里，刘少奇一家住了将近十年。刘少奇患病以后，中共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考虑到刘少奇年事渐高，身体不好，每天爬楼很不方便，决定给刘少奇调换一下住处，搬到中南海北侧的福禄居。福禄居是一座两进院的老式平房，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生前的住处。经过简单的修缮，刘少奇从朝鲜访问回来后，就搬住进来。在这里，刘少奇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段岁月，直到一九六九年被送往开封。

三十七、在“四清”运动中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党在继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经济调整的同时，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就在刘少奇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出访东南亚前后，一场遍及我国三分之一以上农村和部分城镇、延续达三年之久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逐步开展起来。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的错误指导思想下开展的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群众运动。这场运动，最初以在城镇进行“五反”（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和在农村进行“四清”（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务、清理工分）为主要内容，以后扩展到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正式决定统称为“四清”运动（它的内容也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当时，农村干部中多吃多占、账目不清等现象相当严重。这场运动对解决干部队伍中严重存在的思想作风和经营管理方面的问题起了一些作用，但由于运动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下进行的，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看作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对国内的阶级状况和党内干部队伍中的问题作了夸大的过分严重的估计，因此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效，反而在干部

和群众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在毛泽东的直接发动下展开的。

刘少奇对农村干部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也很感焦虑。作为中共中央主持日常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他参与了“四清”运动的领导。

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突出强调了阶级斗争问题，并提出要对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对参加中央组织工作会议的各方面负责人说：执政党有两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基层组织问题，一个是干部问题。两个问题中，起作用更大、影响更大的是干部问题。要重新教育干部，选择干部，保证干部队伍的纯洁。共产党当了权是不是会腐化？这的确是个问题。如果我们不注意，不留心，党也可以变质。对贪污、腐化、堕落的干部，要大张旗鼓地处理。要通报全党，进行教育。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在会上说：“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责任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他提出：“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①刘少奇也在会上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会议期

^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3年2月28日。

间，毛泽东将湖南省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和河北省委关于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运动情况的报告在会上印发，在批语中要求与会同志认真加以研究。

这次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相继批转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两个问题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河北保定地委关于进行“四清”和邢台地委关于建立贫下中农组织的报告等，在批语中要求各地各级组织把社会主义教育当做一件大事来抓。

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讨论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决定草案的内容共十条，为了同后来制定的另一个文件相区别，通常被称为《前十条》。决定草案指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而我们的许多同志对于敌情的严重性“并没有认真考察，认真思索，甚至熟视无睹，放任自流”。因此，“党中央认为，必须在农村中普遍地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分清敌我矛盾，分清人民内部矛盾，分清是非，以便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继续贯彻执行六十条修正草案和关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的决定，发展农业生产”。决定草案规定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个决定草案经五月十八日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后，于五月二十日下发。

这样，一九六三年上半年，继“五反”运动在部分城市开始试点以后，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工作也在全国各地开展起来。

对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刘少奇是赞同和持积极态度的。

一九六〇年下半年开始国民经济调整以来，党内一些干部在

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一直使刘少奇深感不安。在七千人大会的报告中，刘少奇在谈到反对分散主义问题时指出：“有一些干部，利用分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现象，营私舞弊，甚至同社会上的坏分子互相勾结，为非作歹，扰乱市场。这些干部，实际上已经蜕化变质。”他还指出：“近年来，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违法乱纪的事件大大增加”，“在不少的干部中间，那种摆排场，闹阔气，假公济私，明目张胆地挥霍人民财产的特殊化作风，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有了滋长”。^①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不同场合也对这些问题提出警告和批评。但他们当时在分析这些问题时，主要还是把它作为党内问题和人民内部问题来批评和纠正的。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情况起了明显变化。在突出强调阶级斗争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人们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重新审视眼前发生的一切。从刘少奇这以后的一系列讲话中，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

在一九六三年二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个有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成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为中央工作会议做准备。这次会议于二月六日至九日在北京举行，主要讨论大中城市集市贸易、粮食、劳动工资以及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等问题。七日，当彭真汇报时，刘少奇在插话中强调这次运动的意义，并且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了。他说：“估计这是一个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对我们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在会议结束时的讲话中又说：“要把这个运动看作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这次不会比上次‘三反’‘五反’小，要大一些，涉及的面要广一些，人要多一些，而且这一次不是抓原来的资产阶级，是搞新生的资产阶级，是搞共产党和国家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381、401—402页。

干部中间的资产阶级，是搞劳动人民中间出来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危害性更大，反起来更难，而且人数比上一次‘三反’‘五反’要多”。^①

二月中央工作会议于十一日召开。在十二日的全体会议上，彭真作了关于开展“五反”运动的报告。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他在讲话中说：“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正式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的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他进一步阐述道：“我们已经消灭过资产阶级，现在又有新的资产阶级。对于新的资产阶级和对于老的资产阶级的态度不一样。老的资产阶级，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是赎买政策，还要他当政协委员。这些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他们比老的资产阶级分子小得多。那些老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本钱比较大，有店铺，有工厂，有生产资料，而这些新的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在国家和人民困难的时候剥削来的，是破坏性的。”因此，要把“五反”运动“看作是一个消灭新起来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斗争，看作是又一次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②

中苏两党争论的日趋激烈，又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认为苏联已经出现修正主义，正在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从而把国内的阶级斗争的形势看得越来越严重。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报告。他在报告最后谈到国内如何防止产生修正主义的问题时，提出要把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农村中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3年2月7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12日。

伍，在人民中间进行阶级教育等，作为防修反修的主要内容来抓。他把这个问题提到战略的高度，说：“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一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他强调指出：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①

刘少奇思想的变化，相当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共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的共同认识。

毛泽东五月间在杭州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书记制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时，刘少奇由于出访东南亚而没有参加。从越南回到昆明后，刘少奇看到决定草案，很赞成，认为三年困难时期以后，在干部队伍中确实出现很多不良现象，例如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②

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经验教训，起草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纪要）》。这个文件主要是针对运动中出现的急躁情绪和过火斗争、乱打人抓人等违法乱纪现象而起草的。刘少奇因为在九月十四日出访朝鲜，没有参加后一阶段的会议。

回到国内后，刘少奇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于十月三十一日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草案）》。他建议将这个文件的题目改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3年2月25日。

^② 王光美在国家机关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会议上的发言，1980年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会议同意了刘少奇的意见。

十一月一日，刘少奇同其他中央领导人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并在毛泽东主持的有中央华东局负责人和华东各省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对文件作了进一步修改。同时，会议还在毛泽东起草的基础上，改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

刘少奇在九日回到北京。十四日，由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这个《规定（草案）》和《通知》。

《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的内容也是十条，后来被称为《后十条》。同《前十条》相比，《后十条》在指导思想上仍继续强调阶级斗争，并且明确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但对运动中应该注意掌握的政策作了许多补充规定。《后十条》提出，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并且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前提条件”；要求运动“依靠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干部”，“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进行指导和帮助，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方法，而绝不能包办代替”；对犯错误的干部，要以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在具体问题上，批判退赃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后十条》还提出必须团结中农，特别是正确对待上中农；要正确对待地主、富农的子女；要划清进行复辟活动的阶级敌人同一时糊涂的落后群众、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倾向比较严重的农民、贪污盗窃同超支挪用、多吃多占腐化堕落同一般生活作风的界限等一系列具体政策。

《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将《前十条》和《后十条》下发至农村和厂矿企

业的每个支部，由负责干部到群众中进行宣讲，“要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后十条》的制定和普遍宣传，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的“左”的错误，但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具体工作中打击面过宽、违法乱纪现象严重的偏向。

两个十条发布后，在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四年的冬春农闲时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经过试点，在全国部分农村中逐步铺开。

毛泽东和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初衷，是通过这场运动，解决在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缓解一度比较紧张的干群关系，并为铲除滋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对和防止产生“修正主义”探求一条有效途径。然而，随着运动的展开，他们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党内干部队伍状况作出越来越严重的估计，并要采取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消除社会中的不良现象，这就得到事与愿违的消极效果。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第三个五年计划、加强战备等问题外，着重讨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对运动的指导方针和具体步骤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会议初期主要是分组讨论，各省市负责人汇报了运动进展的情况和发现的各种问题。六月八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的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上，在周恩来、彭真等谈到运动中暴露出来的一些基层干部严重蜕化变质的材料后，提出：“总之，我看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

不掌握在我们手里，掌握在敌人手里。”^①类似的话，毛泽东这以前在个别谈话时也讲过，但这次是正式在中央会议上提出的，意义就不同了。这表明，在如何估计敌情这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问题上，毛泽东已经作出极为严重的判断。

刘少奇接受毛泽东的判断，并且作了发挥。会议结束后他到外地视察时，有些地方干部认为“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结论不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干部的提法相矛盾。刘少奇严厉批评了这种观点，说：“毛主席说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个话有人怀疑……实事求是，多少就是多少。我也希望没有三分之一，问题是三分之一打不住。”^②回到北京后，他在一个大会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毛主席讲，我们的基层单位，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看来是有些地方少一些，有些地方还可能多一些。”“据我看，包括蜕化变质的，也不会少于三分之一。农村里面犯‘四不清’错误的，可能不是少数，可能是多数。还有不少的单位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③刘少奇对干部中存在问题的这种估计，无疑对他后来积极领导和部署“四清”运动是深有影响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还提出在清查农村基层干部“四不清”问题时，要注意追上边的“根子”。六月八日，毛泽东谈到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在我们手里时，刘少奇插话说：“现在下边发生的问题就是不追上边，恰恰问题就出在上边。抚宁县的农民说，不仅下边有根子，上边也有根子。朝里有

^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8日。

^② 刘少奇在华东局、上海市委负责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7月21日。

^③ 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人好做官。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①

这个“追根子”的思想，刘少奇是在这年春节期间同王光美谈话时提出来的。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下旬，王光美在刘少奇的同意和支持下，化名董朴，以工作队队员的身份参加河北省委在抚宁县开展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短期集训，工作队分配她到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担任副组长。一九六四年春节期间，王光美回京休假，向刘少奇汇报桃园大队一些基层干部中“四不清”的情况，提到：群众反映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同公社、县和地区的某些干部有牵连，在上面有“根子”。听到这些情况，刘少奇说：“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基本的根子。群众还提出有上边的根子。上边的根子有没有？要不要挖？应该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般干部的不好作风的影响）。”“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在公社、区、县和地委都有根子，要切实追查一下，要切实整一下。”他还说：“可以提挖上面的根子，这是群众提出的，是有事实根据的。要好好想想，在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往这方面引导，要看情况。”“有些大队和公社，个别的县，在一个时期内，变了质，变成修正主义，并不可怕，只要上面清醒，发现了这种情况，能够下决心革命，就好了。危险的是上面不清醒。”^②刘少奇这些谈话内容，王光美春节后回到抚宁，向县工作队队长肖风作了传达，肖风记录下来。记录整理稿在三月三日报送河北省委。

刘少奇提出这个问题，也受到毛泽东的影响。王光美回忆

^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6月8日。

^② 刘少奇1964年春节期间同王光美谈话记录整理稿。

说：“我参加‘四清’每次回北京，主席都问我很多情况，也不是专门的汇报，是在跳舞时谈的。记得第一次回来是十二月（一九六三年），大约在中旬。在一次跳舞时见到主席。主席就问我，桃园是一类队，为什么群众有那么多意见呢？我说可能是上面有人支持，还举了干部吃吃喝喝的例子。公社干部带着下面的干部吃，群众都说干部‘吃懒了’。讲到这里，主席就说，根子在上面。回来后，我把同主席谈话的内容向少奇汇报了。”^①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为了稳妥起见，把肖风的记录整理稿又作了个别修改，然后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审阅。

“追上面的根子”和“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这两个提法合在一起，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和干部队伍状况描绘出一幅令人震惊的图像。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向“左”发展。

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间的中央工作会议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运动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②这以后，刘少奇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到领导这个运动上来。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刘少奇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许多重要措施的提出和重要文件的批发，都是由他主持的。由于对情况的估计过分严重，他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出明显的急躁情绪。表现在：

第一，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不少省地县一级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对运动的领导很不得力，必须大

^① 王光美在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18日。

^②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7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第328次会议纪要。

力纠正。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各地相继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刘少奇从六月二十八日至七月二十五日，先后到天津、济南、合肥、南京、上海、郑州等地，同当地各级干部和军队干部座谈如何深入广泛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他了解到，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来，很多省地一级领导干部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到基层蹲点调查，掌握第一手材料，而是靠听汇报、看材料了解动态。即使下去了，往往也是蜻蜓点水，浮在表面，没有真正深入进去。还有一些干部存在畏难或抵触情绪。

刘少奇对这种情况十分焦急。他认为，不下大力气纠正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这些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无法搞深搞透。他多次严厉批评各级干部没有认真下去蹲点调查，要求省委、地委和县委的领导干部直接到生产大队，至少蹲三至五个月，了解和掌握运动的全过程，然后才有资格领导运动。他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个大革命，实际上比土地改革、合作化，比过去任何一次革命都广泛、深刻、复杂得多。它和过去历次革命不同，非要自己亲自去做不行。这个运动，既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解决“四不清”，又要开展对敌斗争，还要解决干部参加劳动。这些事情过去都没有解决，解决这些问题比土地改革困难得多。自己不去取得直接经验，就不能领导这个革命。他多次说过，没有经过蹲点调查的人，没有资格当地委书记、省委书记。^①

回到北京后，刘少奇建议召开一次党内领导干部大会。征得中央其他领导人同意后，中共中央在八月一日召开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刘少奇在会上就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作了长篇讲话。在讲话中，他总结了前一阶段运动的情况，再次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下去蹲点的问题。他提出各级领导

^① 刘少奇在安徽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

干部必须自己到农村工厂去蹲点，取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直接经验，才能领导现在和今后的革命斗争，否则不能领导。

他在讲话中说，在过去一年多里，“四清”、“五反”是起了一些好作用的，是有成绩的，主要是起了煞住歪风的作用，对推动生产也起了好的影响，“但是，不论农村也好，城市也好，据我的估计，‘四清’、‘五反’多数是搞得不深不透，甚至没有搞开，没有入门”。“过去一年多，我们在这个革命斗争中间打了败仗，不是打胜仗。”他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是很多领导干部没有按照中央的要求下去蹲点调查，“现在党的许多领导机关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许多重要的情况不知道，严重的问题发现不了”。他要求，从中央到地县的各级领导干部，“除开有病的，年老体弱的以外，凡是能够下去的，都应该去参加这个大革命，搞两个典型”，^①这样，才能取得运动的领导权。

刘少奇的讲话是有针对性的。他认为，运动的这种状态，实际反映了在领导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思想。在七月三十日中央会议上他说过，我这次在各地的讲话，实际上是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只是没有戴这个帽子。八月十一日，他在广州听取广东省委汇报运动情况时再次提出：“现在党内严重右倾相当普遍。我过去怕讲右倾，有顾虑。回去向主席汇报后，主席说不要怕‘左’，半年总结一次。后来在北京作了一次报告，不戴右的帽子，实际上全是反右的。”他同时也指出，“但是要掌握火候，掌握火候也者，就是防‘左’。”^②

以后，刘少奇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到全党面前。十月十一日，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反映了山

① 刘少奇在北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8月1日。

② 刘少奇听取广东省委负责人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8月11日。

西、河北等省的县级领导干部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有抵触情绪。刘少奇建议把这封信转发全党。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写道：“在目前情况下，不向党内各级干部明确地指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右倾危险，是不利的。”要求“根据各地干部的思想情况，及时地向地委书记和县委书记提出反对右倾的问题，怕‘左’不怕右、宁右勿‘左’的问题，进行认真的讨论，以便为当前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好思想基础”。经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同意，此件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反右倾的提出，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巨大思想压力，对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也产生重大影响。

第二，在刘少奇主持下，对《后十条》草案作了重要修改。

刘少奇在五月二十八日主持召开的各中央局书记会议上提出：《后十条》强调发动群众不够，比较多地强调依靠基层干部，强调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于是，基层干部和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就拿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来反对“四清”。^①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对《后十条》草案进行修改。到外地视察时，刘少奇又多次谈道：在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以前，过多强调政策，那些政策就会变成一种清规戒律。^②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后十条》的修改工作开始进行。起初，修改工作是在分管农业工作的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主持下进行的。八月五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又决定，《后十条》的修改由刘少奇负责。这样，从八月初开始，刘少奇的工作重点转入修改《后十条》。

八月五日，刘少奇带领毛泽东的秘书、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田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负责人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5月28日。

^② 刘少奇在安徽省地市委书记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7月13日。

家英等从北京出发，准备到广州修改《后十条》。田家英在出发前一天曾问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讲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在飞往武汉的飞机上，田家英把毛泽东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①

刘少奇沿途在武汉、长沙等地听取各省负责人的汇报，并在湖北、湖南省地干部大会上作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报告，在十一日到达广州。

从八月十一日至二十日，刘少奇在广州停留了十天，修改《后十条》，由田家英主要执笔，刘少奇最后定稿。修改过程中，刘少奇加写了一些十分尖锐的语言，并主持召集中南局常委和广东省委书记处成员座谈会，听取对修改稿的意见。经过近十天，《后十条》修改稿基本完成。

十九日，刘少奇委托即将回京的田家英将修改稿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阅。他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二十七日，毛泽东将修改稿批发给正在北京参加中央召集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成员，“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②

刘少奇从广州又到南宁、昆明视察后，在八月二十六日回到北京。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他连续四天主持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十条》修改稿。修改稿经毛泽东批改同意后，定

^① 《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12月版，第75页。

^② 毛泽东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时的批语，1964年8月27日。

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后称第二个《后十条》），在九月十八日由中共中央正式发出。

同第一个《后十条》相比，第二个《后十条》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认为这个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为广泛、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正在猖狂进攻，“他们对干部拉拢腐蚀，实行和平演变，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还利用我们文件中的某些条文同我们进行合法斗争”；文件提出必须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通过访贫问苦、扎根串联，发动和组织贫下中农群众”，“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划清敌我界限”，强调要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作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文件在工作方法上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这样，就在运动的领导中把广大基层干部撇开，扩大了打击面。第二个《后十条》的发布，使得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越来越“左”的做法有了政策依据，加剧了运动的“左”的错误。

第三，刘少奇在修改《后十条》的前后，还在为中央起草的一系列文件批语和向毛泽东的建议中，提出了一些带有全局性的意见和措施。

八月十六日，刘少奇在广州致信毛泽东，提出在城镇“五反”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要加强领导，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建议改变过去“以县委领导为主”的方法，实行“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的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中央各机关也抽出人来组织工作队，在北京进行初步训练和准备，

然后分到各大区的若干省，再由省分到几个县，由省委领导。”这封信用电报发到北京，毛泽东在十八日给刘少奇的复信中表示“完全赞同”，“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

十九日，刘少奇就批转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的报告致信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并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批语。

王光美的报告是七月五日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作的，主要介绍了她在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生产大队蹲点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又被称为“桃园经验”。它的主要内容是：“四清”与“四不清”的斗争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桃园党支部“基本上不是共产党”，“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工作组进村后，先搞“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然后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在群众已经发动起来、又有过激情绪的时候，要注意掌握火候，强调实事求是；对待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在情况还未搞清楚时就采取“一切经过基层组织”的做法是错误的；“四不清”干部不仅有受地主、富农、资本家影响这个根子，还有上面的根子，不解决上面的问题，“四清”就搞不彻底；“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清工分、清账目、清财务、清仓库，而是要解决政治、经济、思想和组织上的“四不清”。

王光美在河北省委作了这个报告后，在随同刘少奇到外地视察时还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以及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大会上作了同样内容的报告，不少地方“四清”工作队队员收听了报告录音，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刘少奇在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

们。王光美在河北省委的记录稿上修改了两次，我也看了并修改一次，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在代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写道，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同时也指出：“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

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送审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少奇同志意见的。”九月一日，经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后，这个报告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至全党。

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为了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而写的。

天津小站地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陈伯达直接抓的一个点，天津市委抽调了大批干部加强工作组的力量，中央一些部门的干部也在这里蹲点。八月初，陈伯达在给中央的信中汇报这里抓了三个“反革命集团”的情况，并附了“反革命集团”的社会关系网和历史大事记。九月二十五日，以天津市委的名义向河北省委、华北局和中央写了《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报告认为，小站地区的政权是“三个反革命集团”建立的“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们长期“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前，这里的天下还不是我们的，或者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我们的”。“三个反革命集团”“上面的根子就在区委。区、社一部分领导干部，实际就是他们的保护人”。报告汇报了在这里开展夺权斗争、改组区委领导的情况和经验。

中共中央决定转发天津市委的报告。刘少奇在起草的指示中写道：“小站地区的敌我矛盾，主要的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这就迷惑了一些人，并且长期得不到解决”；要注意防止“只注意对社会上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忽视这一部分隐藏在人民内部和党内的敌人”的偏向，“凡是被敌人操纵或篡夺了领导权的地方，都必须进行夺权的斗争，否则，要犯严重的错误”。指示同时指出：“在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之前，必须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才能确定领导权是否在敌人手里，才能确定这个地方的领导核心是否变质，才能决定是否应当进行夺权斗争。”

十一月七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央关于在问题严重的地区由贫协行使权力的批示》，提出：“在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地区，如果发现有的基层干部躺倒不干，以抵抗运动；有的地方领导权被蜕化变质分子所掌握；有的地方领导权被地富反坏分子或新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握。上述三种情况，在查明确实后，经工作队批准，都可以由贫协组织取而代之，一切权力归贫协。”

十二月六日，刘少奇致信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将《河南省委关于集中整训工作队、解决县社两级骨干“四不清”问题的报告》推荐给东北地区各省委阅读。河南省委在报告中反映了河南部分地区县社两级干部严重“四不清”的情况和他们集中力量解决问题的做法。刘少奇在信中要求东北局和东北各省委领导参照河南的做法，“亲自抓住几个县和一二个市的工作队去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运动中不断整顿工作队，并取得运动的胜利”。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此信和河南省委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下发。

刘少奇提出的上述建议和为中央起草批发的一系列文件，进一步加重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越来越“左”的倾向。其中，影

响最大的是“桃园经验”和关于小站地区夺权的报告。这种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估量一切、把大多数基层干部放到运动的对立面的做法，实际上重复了土地改革中曾经犯过的错误，给广大基层干部造成了伤害。尽管刘少奇的出发点是想在“四清”运动中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阴暗面，认为只要干部同人民群众始终同甘共苦，不脱离人民，就能克服一切困难，但由于对问题作出过分严重的估计和采取了不适当的做法，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不少基层干部在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或过火的打击。

十二月十五日至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按照原定计划，这次会议是利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各地负责人集中在北京的机会，总结前一阶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会期的安排也并不长。但是，在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在运动的性质以及运动的做法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刘少奇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会议由此延长至一个月之久。这件事，对以后国内政治局势的进程产生了不寻常的影响。

在十五日的会议上，刘少奇作主要发言。他在讲话中传达了会议的预定开法，并且提出了一些前一阶段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问题，例如在农村中如何划分阶级、如何进行整党、领导干部如何下去蹲点、工厂干部的民主选举等，要求与会人员充分讨论，“交换一下意见，交换一下经验”。^①会议从十六日至十九日接连召开全体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各中央局负责人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决定，由陈伯达主持起草一份会议纪要，作为下一阶段运动的指导文件。这时，会议仍按原定议程正常地进行着。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12月15日。

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运动的有关问题，并为起草文件做准备。会议首先讨论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和当前的主要矛盾。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开始显露出来。刘少奇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①对刘少奇的意见，毛泽东在会上没有反对，但在言谈中却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在会议开始时，刘少奇说要议论一下主要矛盾的提法，毛泽东立刻说：“不管怎么提，主要是整当权派。”^②刘少奇在发言中讲道：陶铸同志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是这样提，还是说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所以不要管下层，就是要发动群众整我们这个党，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③当刘少奇讲到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时，毛泽东很不高兴地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④

在这些不同提法的背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分歧的实质是什么呢？

对于毛泽东发动的这场运动，刘少奇是赞同的。他认为，大跃进以来在党内和社会上确实存在着相当严重的投机倒把、贪污盗窃等腐败现象，党内确实存在着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对这些必须下大力量进行整顿，必须对广大党员和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但是，他的着眼点主要放在整顿基层组织的基层干部上，并

^{①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③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29页。

^④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0日。

且把出现的问题主要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在到外地视察时他多次说过，即使有些问题是敌我矛盾，因为两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也要先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看待，人民内部的事搞清了，敌人自然就暴露了。他虽然提出过要“追上面的根子”，但仍认为问题主要在下面。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多次提出：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在一起，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在一起。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解决这些矛盾。

毛泽东的想法显然有所不同。八届十中全会以来，毛泽东更多地考虑的是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发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是在寻找一种防止和反对中央领导层出修正主义的有效途径。在一九六三年三月部署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就说过，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掉修正主义根子。在这之后，他又多次提出，要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并认为在我国已经出现了“官僚主义者阶级”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此，当刘少奇提出运动的主要矛盾和性质的提法时，毛泽东的不满立刻溢于言表。

会后，毛泽东明确提出：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尽管刘少奇和毛泽东在认识上不尽相同，并且总是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但刘少奇对毛泽东一贯是尊重和服从的。会后刘少奇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陈伯达主持起草了一个会议纪要。这个纪要对运动的性质这样写道：“几种提法：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

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接受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这个纪要。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参加。^①

这个纪要在十二月二十八日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它的形成有个过程：当二十四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时，题目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全文共十六条，题下的括号内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未定稿，请同志们提出意见，以备修改。”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结束的当日，把这个文件报送毛泽东。以后，这个纪要又作了修改，在内容上加写了一条，并把题目改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括号内的文字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纪要”，在二十七日再次报送毛泽东。毛泽东两次看后都批示“照办”，第二次审阅时还将括号内的文字改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国工作会议讨论纪要”。由于它的内容共十七条，因此被称为《十七条》。

尽管《十七条》对运动性质的提法已作了明确规定，毛泽东认为问题并没有完。二十八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大会讨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主持会议。他带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两本书到会。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提出运动性质问题：“性质问题，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恐怕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政治局常委是谈过的，与地方一些同志也商量过，认为还是第三种较好。因为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名称就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不是叫“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运动，也不是

^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事表。

叫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运动。所以，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他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告诫大家“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显然，这番话是有针对性的，多少已可看出他所说“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指的是什么。

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拿着他带来的那两本书，说了一段语气更为严厉的话：“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道，‘在法律上人人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各级党委整顿好。这叫结社。”^①

毛泽东讲这些话的时候，表情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毛泽东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毛泽东非常不满，所

^①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记录，1964年12月28日。

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在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的生日。建国以来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这次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在人民大会堂小宴会厅举行，并亲自审定了请客名单。到场的除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外，还有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等共四十多人。毛泽东特意把钱学森、陈永贵、董加耕、邢燕子等劳动模范和科学家安排在同自己一桌，刘少奇等中央其他领导人被安排在别的桌子上。席间，毛泽东讲了话。薄一波回忆说：“他一开始就讲，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席间鸦雀无声。”^①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这次会上，一些省委负责人汇报了运动开展情况。当河北省委负责人汇报到保定地区新城县的试点情况时，毛泽东打断说：“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工作队）学习文件四十几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他又说：“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一千多户就去了五百人的工作队，怎么搞得开？搞人海战术不行。”“这样集中力量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31页。

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我看方法要改。”“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没有虱子能找出虱子来？”在谈到工作队集中时间学习文件的问题时，刘少奇解释：工作队集中学习文件是为了反右倾。毛泽东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①他在讲话中要求各级领导改变领导方法，文件直接同群众见面，广泛发动群众，迅速打开局面。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重新讨论了《十七条》，并作了重大修改。修改后的文件内容增加到二十三条，新增加的有“形势”、“搞好运动的标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抓面的工作”、“干部问题”、“建立贫农下中农协会”、“思想方法”等七条，去掉了“集团问题”一条，在文字上也做了许多修改。毛泽东在“运动的性质”一条中针对“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和“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的提法又加写道：“这两种提法，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上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新修改的文件，题目仍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由于内容已增加到二十三条，又被称为《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肯定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要求尽快解脱他们，逐步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工作方法要走群众路线，不要搞神秘化，也不要靠人海战术，“四清”要落实在建设上面，增产要成为搞好运动的标准之一。这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以来运动中某些“左”的做法，

^① 刘澜涛关于毛泽东 1965 年 1 月 3 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笔记。

对安定干部和群众情绪起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二十三条》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指出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他们的人，有的在下面，有的在上面，甚至有的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这样，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更加具体化，“左”的错误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从这里，已经多少可以看到不久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先兆。

一月十四日，全国工作会议结束。同日，在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正式通过《二十三条》，并下发全党。中共中央在关于下发《二十三条》的通知中指出：“中央过去发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文件，如有同这个文件抵触的，一律以这个文件为准。”

二十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宣传“二十三条”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把《二十三条》和中央的通知“在点上和面上都进行一次广泛的宣传”，“使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加健康地向前发展，使得今年的生产建设搞得更好。”

全国工作会议结束了，但这次会议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造成的裂痕是巨大的。党内不少领导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刘少奇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①

^① 王光美在审读《刘少奇年谱》时的谈话记录，1994年6月20日。

尽管刘少奇做了这些努力，但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裂痕并未消除，实际上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导火线。

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所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就把“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作为刘少奇的一条罪状。他在这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过，常委分工，搞一、二线，是我建议的，再嘛，又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时，斯诺问他从什么时候起明显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说是制定《二十三条》那个时候。

全国工作会议结束一年半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三十八、探索改革的道路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特别是“四清”运动开展后，国内局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一方面，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政治以及文化领域中的“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民经济调整和建设工作的仍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发展。

处于这种复杂的形势下，刘少奇作为在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思想和工作也处在十分矛盾的状态中。一方面，他用相当多的精力来领导“四清”、“五反”运动，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占用了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另一方面，他又时刻关注着国家的经济调整和经济建设事业，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

刘少奇当时着重抓的一个问题是，进一步巩固几年来国民经济调整取得的成果，防止重复过去盲目投资、经济过热的老路。

按照最初的设想，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一九六二年底结束，一九六三年转入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一九六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分析了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决定再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七月底，邓小平在全国工业问题座谈会上传达了中央这个决定，他说：“还要进行三年调整，重点是巩固、充实、提高，创造条件，

为第三个五年计划做好准备。”^①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研究农村“四清”运动和经济计划等问题。在讨论一九六四年国民经济计划和今后工业发展问题时，会议确定再用三年时间进行调整，提出：“把这三年调整作为第二个五年计划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过渡阶段，继续贯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工业部门要认真做好提高质量、增加品种、填平补齐、成龙配套的工作，并搞好设备更新和专业化协作。”

刘少奇坚决贯彻中央这个方针。他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告诫大家，要汲取过去的经验教训，在经济形势有了好转的情况下，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再次出现基本建设投资过大、战线过长等同实际国力不相适应的经济过热现象。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在十月下旬连续三天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在插话中提出一些很重要的意见。

当谈到要继续执行缩短工业战线的方针时，他说：“缩短工业战线，主要是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过去基本建设战线太长，项目过多，要求太快太急，设计没有搞好，急于上马。项目多，战线长，浪费很大，一心搞扩大再生产，忽视了简单再生产。同时，在生产方面，只注意增加数量，忽视质量，提的指标过高，超过设备的可能，本来可以用十五年的设备只能用五年，设备损坏过多，又不注意维修，不让它休息，造成不好的后果。”他强调：“这些都是痛苦的经验，有了痛苦的经验才能认识”，“付出代价，取得经验，要永远记取”。^②

刘少奇提出，国家的投资不要都搞新的基本建设，重点要放

^①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1194页。

^② 刘少奇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10月21日。

在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上。他说：“钱放到什么地方？有一部分可以用于新的基本建设，但大部分还是要用于现有企业。过去把老企业的折旧挪过来搞新建项目了，今后要还账。首先要搞设备更新，维持简单再生产，而后行有余力，再搞扩大再生产，不是先搞扩大再生产，而后有可能才搞设备更新。应该说，扩大再生产也是首先放在老企业。”^①

刘少奇强调，搞建设要把勤俭节约放在重要的地位：“节约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长期方针，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勤俭持家，国家才能兴旺。不要以为这是‘小气’，这是国家兴旺之气。全党、全国、全民族提倡这个风气，一年就可以节约几十亿元。一种风气，一种民族风格，会流传几百年。”^②

一九六四年初，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的方案。在这以前，国家计委曾对第三个五年计划有过一个初步考虑，提出“三五”计划的目标是集中力量解决吃穿用。但那时还没有确定三年继续调整的方针，所以最初的方案还带有恢复经济的性质。这次重新考虑“三五”计划时，方案作了相应的改变。一九六四年四月，国家计委向中央报送《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的初步设想》，提出“三五”计划的基本任务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第二，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第三，与加强农业和加强国防相适应，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并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

这个初步设想同前两个五年计划相比，突出的特点是强调了

^① 刘少奇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10月22日。

^② 刘少奇听取薄一波汇报工业情况时的谈话记录，1963年10月23日。

发展农业，把基本解决人民的吃穿用放在首要位置上。但是，在编制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不少矛盾，主要是各部门各地区对基本建设投资的要求高，同实际可能有很大距离，缺口很大。国家计委把这些矛盾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和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

国家计委提出的矛盾正是刘少奇所担心的。他在听取汇报时要求计委在编制计划时要充分留有余地，以后根据情况再作调整，他说：“长期计划要留有余地，年度计划也要留有余地。年度计划可以调整，每年到了六七月，如果情况更好，基本建设也可以加一点，但不能加得太多。”他还提出：“农业建设要自力更生，主要靠农民自己搞，国家给予帮助；文化教育也要提倡群众办，国家帮助。”^①

国家计委的初步设想经过修改，提交同年五月中旬至六月中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五月十八日，会议在刘少奇主持下，听取李富春代表计委对这个初步设想的说明，并进行讨论。五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又主持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讨论制定“三五”计划的方针。发言中，刘少奇再次强调要控制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提出：“现在，形势全面好转了，国家财政收入多一些了，但出现一个苗头，就是大家都想多办点事。这个苗头继续放下去，就又要发生过去的基本建设战线过长等问题。一些工业部门都要保持过去两年的作风，对基本建设要控制，不能松。”^②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国务院和有关经济部门开始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做准备。但不久，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央提

^① 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4年5月18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4年5月28日。

出要集中力量搞内地大三线的建设。这是毛泽东对战争形势作出新的估计而提出来的。

进入六十年代以来，中国周边的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国对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一九六四年八月，美国悍然轰炸越南北方，将战火烧近我国的南大门。在美国支持下，台湾蒋介石集团用武力袭扰东南沿海地区。在西南方向的中印边境和西部新疆地区的中苏边境，局势也一直相当紧张。而我国的主要工业设施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一旦战争爆发，极易受到攻击和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出，对于可能发生的战争我们不得不有所准备，要准备敌人大打，早打。因此，要首先集中力量建设大三线，作为我国的战略大后方。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国务院有关部门重新调整和修改了一九六五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建设大三线”的指导方针，刘少奇是赞同的，并在具体工作中坚决予以贯彻。同时，他也感到，集中力量开展大三线建设，必然会增加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资金缺口会更大，运输、电力、煤炭等基础工业也会更紧张，因此，更要控制其他建设项目的上马，防止战线过长。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一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党组提出的《关于一九六五年国家基本建设计划调整情况的报告》和《关于适应备战形势，调整一九六五年国家预算的报告》等文件。在会上，刘少奇要求做好三线建设工作，同时也指出：“现在全国是一千二百六十多个基本建设项目，跟最高时期的一千七百个差不多了，战线已经相当长了。各地方、各部门要切实控制这种基本建设战线拉长的情绪，要切实控制，不准自由上马，以后中央批也要注意。同时，这一千二百多个里头也有一些是可以推迟的。要注意，不要又搞一次基本建设

战线过长。”^①

五月十五日，刘少奇再次主持政治局会议，听取国家计委副主任叶林关于工业生产的汇报和李富春关于小三线建设的汇报。小三线建设是相对大三线建设而言的。大三线指全国的战略大后方，包括云南、贵州、四川、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河南、湖北、湖南、山西等十一个省区，小三线指各省区自己的小后方。刘少奇在会上要求国家计委要抓好基础工业的建设，为经济建设的发展创造条件。当叶林汇报到目前煤炭、电力、运输的供应紧张问题时，刘少奇说：“今年已经紧张了，那么明年怎么办？明年总要比今年还要提高一点吧！明年更紧张，后年更紧张。现在大概是运输能力、煤炭能力、电力已经到了饱和点了。不再增加运输能力跟发电机组，煤炭不增加，事业就上不去，钢材当然也上不去。所以，现在不只是解决今年的紧张问题，现在就要着手为明年、后年做准备。这样，才可以从被动走向主动。”^②

在中共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五年的艰苦奋斗，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果。到一九六五年底，国民经济的各项指标都有明显回升，一些部门和项目还取得新的进展。这样，从一九六六年起，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宣告结束，开始实施第三个五年计划。刘少奇一方面为经济建设取得的成果感到欣慰，一方面仍提醒全党，不要忘记过去的教训，要保持冷静的头脑。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他在主持政治局常委会听取正在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情况汇报时，语重心长地说：“一九六五年的成绩是八年积累来的，现在看，进步很大。但是，应当说，发动群众的积极性，还只是开始，潜力还很大。”“一方面要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5年5月11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5年5月15日。

鼓足干劲，一方面要稳步前进，头脑要保持清醒，还是要做冷静的促进派。”^①

五年来，国民经济调整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果，但是，这一时期取得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恢复和整顿的性质，还没有触及我国经济体制由于长期沿袭苏联模式而造成的一些弊端。要使我国经济建设事业获得进一步发展，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新的改革探索，为以后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因此，刘少奇在注意巩固国民经济调整成果的同时，对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也从理论上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在实践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是刘少奇在六十年代中期提出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

刘少奇这一思想的提出，既是他对国民经济调整中现实问题研究的结果，也是他在建国后十几年领导经济建设的实践中一直在思索的问题。

建国前夜，刘少奇在探索如何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小手工业者等个体经济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轨道时，就提出用“和平的经济竞争”的办法对待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用商业的办法，用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引导小商品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主张。他说：“所谓经济竞争，就是不以行政手段为主”，“是在大体上相同的条件下，看谁经营得好”。^②“必须在和平的合法的经济竞争中证明了新民主主义制度优于旧资本主义制度之时，旧资本主义才会让位于新民主主义。”^③对于用商业和组织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引导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作用，他明确指出：“我们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2月19日。

^{②③}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1、15页。

不能用行政命令，而必须用商业的方法战胜资本家”，“谁领导了市场，谁就领导了国民经济”。^①在这里，刘少奇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已见端倪。

五十年代中期，我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但当时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下达，生产资料由国家统购包销，物价由国家统一制定，劳动力由国家统一安置。这种体制在经济建设刚刚起步的阶段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它的弊端也逐步暴露出来。

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刘少奇逐渐感觉到现行经济体制的弊端，试图有所突破。一九五六年八大后，他就提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他在同中共高级党校学员谈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说过：“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他们只有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只讲究计划经济，搞得呆板，没有多样性、灵活性。”“我们一定要比资本主义经济搞得更多样，更灵活。如果我们的经济还不如资本主义的经济灵活、多样，而只有呆板的计划性，那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②

从这种指导思想出发，刘少奇在五十年代中期先后提出要充分利用自由市场、利用价值规律指导生产、给企业以更大的自主权利、允许私人开办工厂以及要改变由国家统统包下来的用工制度等一系列值得注意的主张。但当时他这些想法还不很成熟，不很系统。由于我国经济建设刚刚起步，发展比较顺利，对经济体制的变革还缺乏紧迫感，加上当时国内政治气候和国际环境的影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1、15、55 页。

^② 《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版，第 678—679 页。

响，特别是不久后“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发动，他没有能沿着这个思路继续探索下去。

经过三年调整，我国的经济建设得到较好的恢复。复苏后的国民经济仍沿袭着过去经济体制下的老路。随着建设规模的扩大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原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存在的矛盾更为尖锐地暴露出来。

刘少奇敏锐地感觉到这个问题，在国民经济形势刚刚有了好转时，就开始研究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提出要按照经济办法管理经济。

一九六三年十月，刘少奇在同薄一波等工业部门的负责人谈话时说：“中央成立部，各省成立厅，都是行政机构，管理企业，恐怕不合适。”“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中央各部和省、市的厅、局都干预经济，这是超经济的办法，不是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封建主义的办法。”他建议中央工业部门的领导对如何管理好企业的问题进行讨论，“体制问题要好好研究”。^①

两个月后，他在听取薄一波、余秋里汇报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的情况时，又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说：“要考虑我们是个大国，将来工厂越来越多，究竟怎样管理对国家有利。”“我们过去都是行政机关管工厂，用行政办法管理企业。过去苏联也是这样搞的，证明不行。”“总而言之，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苏联没有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解决，我们也没有解决，将来势必要解决。”针对党和政府部门对企业的具体事务干预过多而缺乏全局观点，他激动地说：

“党委和政府超脱一点，不好吗？站在公司之上、矛盾之上，有问题我们来裁判，不要做当事人，不好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26、528 页。

吗？有的厅局长、工业书记、商业书记、煤炭书记都滚到里面去了，不看全局。自己不滚进去，不是聪明的办法吗？超脱一点，就有全局观点了。党和政府不是不管，是怎样管的问题。管计划、平衡、仲裁、监督、思想政治工作。生产由公司、工厂去经营。”^①

这以后，刘少奇多次提出“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来组织、按“经济办法”来管理经济生活的思想，并在实践中作了初步探索。

从这个总体设想出发，刘少奇重点抓了流通管理体制、劳动用工制度和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具体说来，就是物资工作的改革试点、两种劳动制度的设想和试办工业托拉斯的尝试。

生产资料的管理和流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重要而又复杂的环节。长期以来，受苏联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式的影响，我国一直否认生产资料是商品。在国家工业体系中，实行的是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纵向管理体制和产品统一调拨的分配方法。这种方法人为地制造了很多矛盾。首先是生产部门的经营自主权和独立核算权得不到承认，成为行政机构的附属而影响生产积极性；其次由于单纯的行政手段无法及时预测复杂的市场情况，经常造成一些企业物资积压而另一些企业物资短缺的混乱状况，很多企业的采购人员为了寻找物资不得不“满天飞”。

刘少奇在五十年代就对生产资料不是商品这种观点提出疑问。在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当周恩来在发言中谈到生产资料的调拨问题时，他在插话中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30—531 页。

这个理论恐怕还值得研究。”^① 一九五九年底在海南岛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学习讨论会上，他又一次对苏联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说：斯大林“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资本主义把商品化搞得那样广，一到了社会主义，一下子就把它限制得那么小，这是不是有问题？”他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把生产资料当作商品来搞，我们应比他们搞得更好。”^② 他还设想在国务院内建立一个管生产资料分配的部，专门做这件事情。

五十年代末期，物资系统开始了一些局部改革的试验。在刘少奇建议下，国家经委内部成立物资办公室（后改为国家物资总局），对物资工作改革提出一些设想。^③ 但由于经济形势的恶化和调整工作的开始，这些设想并没有能付诸实践。一九六二年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和经济状况的逐步好转，原有的物资分配体系已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需要，在这种形势下，物资工作改革再次提上了议事日程。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刘少奇约请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和国家经委副主任兼国家物资总局局长袁宝华到他的住所谈物资工作。对于这次谈话，刘少奇做了充分准备。据袁宝华回忆，在他们向刘少奇汇报物资工作时，可以看出刘少奇对国内物资工作的状况非常了解，所谈的问题也考虑得很成熟，因此，他只简单地听听汇报，就很系统地谈了他对今后物资工作的想法。^④

刘少奇首先强调物资工作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性，指

①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作关于1957年计划报告的速记稿，1956年11月10日。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99、403、414页。

③ 访问袁宝华谈话记录，1993年3月24日。

④ 访问袁宝华谈话记录，1993年3月24日。

出：“物资部门是先行部门，不是后勤部门。国家计划工作必须建立在物资基础上，要有物资做保证，不掌握物资，计划是空的。”针对目前物资供销管理混乱、机构重叠、很多企业的采购人员“满天飞”去找物资的状况，他要求国家物资部门把物资的供应和管理工作全面抓起来，“物资部门是综合部门，要有全面观点。物资管理必须是全面管理，集中统一管理”。

如何全面管理好物资工作，刘少奇谈了几点意见：第一，物资工作必须“为生产服务，促进生产的发展”。他认为，现在物资工作同生产是脱节的，没有从生产的需要来考虑物资的安排，所以造成一部分企业物资积压而另一部分企业又物资缺乏，许多企业不得不派出采购人员“满天飞”的状况。他说：“解决了生产上的问题，‘满天飞’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或消除，因为用不着再‘满天飞’了。”第二，物资工作要管三类物资，今后的工作“重点要放在这方面”。所谓三类物资，是指除国家统一分配的一类物资和中央各主管部门分配的二类物资之外，由地方管理的其他物资。这类物资，由于没有列入国家计划，因此经常处于无人过问的混乱状况，是造成“满天飞”的重要原因。他要求物资部门要把这部分物资管起来，“这部分没人注意、没人管的物资，正是生产上必不可少的物资，你们不全管怎么能行呢？”“你们必须把物资工作的重点，由管计划内的大路货，转向管理计划上没有列、没人管、没人注意的那些物资上去。”第三，物资机构要加强，而且首先要加强经营管理机构。他提出，在调整物资机构时，“行政机构可短小精干，经营管理机构要充实加强”，“总局要成立各种全国性的总公司，还要设立很多分公司”。他还对物资的销售业务和物资仓库的管理等谈了许多具体意见。^①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97、498、500页。

这次谈话后，国家经委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开始全面考虑物资系统的改革，并于五月一日以国家经委党组的名义向中央提出《关于物资工作贯彻执行集中统一方针，实行全面管理的初步方案》。方案分析目前物资工作存在的问题，提出集中统一，全面管理；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建立一套统一的物资管理系统和业务经营网的改革方针。中共中央于五月十八日同意并批发经委的方案，物资工作的改革进入试点阶段。

刘少奇对物资工作改革这个刚刚起步的新事物给予很大的关注。一方面，他组织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家经委的一些工作人员成立两个调查组，选择石家庄市和无锡市对物资工作改革进行调查和试点。在这过程中，他经常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对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指导；另一方面，他在调查和试点的基础上对物资工作改革继续进行探讨。从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的谈话到一九六五年，他先后七次召开研究物资工作的专门会议，发表了许多具有指导性的意见。

首先，随着实践的深入，刘少奇更加重视市场的作用。在物资改革试点刚开始时，他就说过：“实际上物资部门也是商业部门，是管理生产资料的商业部。”^①做好物资供销工作，“要按规矩办事，要有科学管理”。^②当物资工作改革取得一定进展后，他又多次提出：“物资工作就是个市场，是生产资料的市场。”^③在这里，刘少奇提出了生产资料在社会主义经济下可以作为商品流通的思想，为物资管理工作冲破单纯行政管理的老框框，引进市场机制开拓了一条新路。

其次，刘少奇提出要以市场的需要来决定物资的生产，物资

^{①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17、510 页。

^③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48 页。

部门要介入到生产的过程中去，避免生产的盲目性。他对物资系统的管理干部说：“物资部门就是要干预生产。”“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就是经济危机，工厂关门、工人失业、资本家破产。盲目生产的产品，你们就不收购，不能鼓励盲目生产。到一定时期，物资部门也像商业部门一样，搞加工定货，企业生产听你们指挥，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就可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①以后，他曾多次谈到这个问题。

再次，刘少奇要求物资部门改变过去机构重叠、中间环节过多的状况，提高物资供应的效率。在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三日政治局讨论物资工作时，他批评道：“商业、物资系统的一级站、二级站，不愿定点供应、直达供货，而愿增加中转环节，层层加费，这是在起反动作用，是‘必求垄断而登之’，妨碍经济进步。”“东西没经过你，你只盖个章子，就要收百分之几的手续费，这是不劳而获，等于旧中国时代的税卡，等于是拦路打劫，要向一、二级站的工作人员讲清楚，绝不许他们阻碍物资流通，一定要发展定点供应、直达供货。”^②他多次告诫物资系统负责人，要注意汲取过去机构重叠、中间环节多的教训，“不要把机构官僚化了”。^③

最后，刘少奇强调，物资工作改革是一个新事物，要先试点，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不能盲目铺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五日接见全国物资工作会议代表时他提出：“还是要靠试点总结经验。每个大区，每个省、市都要搞试点。没有经过试点，就全面铺开，会犯错误的。”^④一九六三年一月，他听取国家经委党组汇报物资管理试点工作再次提出：“战略上要有远大目标，

^{①②③}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13—514、523、517 页。

^④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09 页。

要藐视困难，但在具体步骤上、做法上，一定要谨慎一些，要走一步，看一步，看准一步，走一步。在今年、明年、后年三年之内把全国物资管理工作搞好，也算有成绩，也算快，不算慢。”^①

经过几年的努力，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国的生产资料管理体系出现了可喜的局面。省、地、市、县等各级普遍建立了专门负责生产资料流通的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包括专业公司、各种类型的供应站和生产资料服务公司等；组织起一支从事物资管理和经营的专业队伍；理顺了物资流通渠道，建立了物资供应的新秩序。物资体系的这些变化，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建设起了积极作用。

刘少奇对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设想是和他对教育制度改革的设想一起提出来的，这就是六十年代中期在我国社会生活中曾引起很大反响并在实践中得到一定发展的“两种教育制度和两种劳动制度”的思想。

刘少奇这个思想最初是在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来的。在这以前，特别是在一九五七年春季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和广东五省调查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时，他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他感到：一方面，随着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要求上学和继续升学，这是正当的要求，也是国家建设所急需的，党和政府应该尽力满足他们的要求；而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的财力和设施所限，一时无法满足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从改革我国现行的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入手，从中寻找出路。带着这个问题，他在调查中多次听取各省市领导和群众代表的意见。回京后，又反复进行研究，并征求周恩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版，第 521 页。

来、陆定一等的意见，最终形成比较成熟的想法。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给毛泽东的信中汇报了他的想法，征得毛泽东的同意^①后，在三十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了他的想法。他说：

“我们国家应该有两种主要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厂农村的劳动制度。一种是现在的全日制的学校教育制度和现在工厂里面、机关里面八小时工作的劳动制度。这是主要的。此外，是不是还可以采用一种制度，跟这种制度相并行，也成为主要制度之一，就是半工半读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就是说，不论在学校中、工厂中、机关中、农村中，都比较广泛地采用半工半读的办法。”^②

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后，引起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半工半读教育在一九五八年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有了一些发展，例如天津有一百多所工厂办起了半工半读学校，全国其他地区也陆续办起一批这样的学校。劳动工资制度根据刘少奇的建议也做了一些改革试验。但后来由于国内经济形势出现困难，党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调整上，这些改革试验大多没有坚持下来。

进入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逐步好转和建设事

^① 刘少奇 1958 年 5 月 25 日在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的信（手稿）中写道：“我曾同恩来、定一同志以及几个省市的个别同志谈过以下两个问题：一个是在实行现在的学校教育制度和工矿机关的劳动制度之外，是否可以同时实行一种半工半读的学校制度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另一个是除开在城市职工和农业合作社中集中注意组织生产运动之外，是否可以在为生活服务事业（如做饭、带小孩、洗衣、补衣补鞋以至商店、小学和其他服务事业）的基础上，把职工家属和农村中的妇女及其他半劳动力也组织起来，以与生产运动相配合？这两个问题，同我谈过的同志都赞成我的意见，并愿意在个别单位中先进行试验。”毛泽东阅后指示：“此件已看过，同意你的意见。”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324 页。

业的发展，刘少奇感到，对现行的劳动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有重新提出的必要。他把这件事看作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根本措施。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听取教育部负责人汇报时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有什么办法使资本主义不复辟？这是个世界历史上没有解决的问题，要我们来解决。现在我们所想到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发动群众搞“四清”，一个是改革教育制度和劳动制度。五月中旬，他在听取国家计委草拟的国家“三五”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再次提出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问题。

他说：“从长远考虑，我们这个国家怎样普及教育？按照现在的办法，农民负担不起，国家也负担不起，在目前的制度办法下，谈普及教育是行不通。”“现在看只有一种制度不行，必须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学校制度。”^①

对劳动制度的改革，刘少奇除提出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外，他的思路比几年前又有新的发展。他提出，不但要实行半工半读的劳动制度，与此并行的，还要实行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我国厂矿现在实行的是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固定工的劳动用工制度。这样固定工越来越多，国家的负担很重，结果是多花钱少办事。可以考虑在一些行业中，例如矿山、森林工业、水利、公路建设等部门，实行合同工、临时工、季节工，充分利用我国广大农村的劳动力，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做工。这样，对国家、对企业、对农民都有好处。^②

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农村工作及“三五”计划等问题。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在十八日的全体大会上汇

^① 刘少奇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记录，1964年5月14日。

^② 李富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汇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传达刘少奇讲话的记录，1964年5月18日。

报“三五”计划初步设想时谈了刘少奇的这个意见，得到会议的赞同。毛泽东看了会议的简报。六月八日，他在会上的讲话中也肯定了刘少奇的意见，说：“会议的简报我在努力看，有许多好的东西，看了社会主义教育，“四清”、“五反”，还有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你（指刘少奇——引者按）提的嘛，下面已有这样的情况嘛！”^①

得到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刘少奇决定在全国范围大力宣传和倡导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从六月下旬到八月下旬，先后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等省市自治区视察工作，每到一地，他都作关于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同部分地方干部就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问题进行座谈。

刘少奇在各地作的报告中，对实行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教育制度的意义、具体设想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同时，也对过去的经验教训作了反思。他在谈到亦工亦农的劳动制度时说：“我们现在只有一种劳动制度，固定工，有劳动保险，招来了不能退，要退很困难。以后，我看劳动制度不要只是一种，要尽量用临时工、合同工。这种临时工、合同工，也是正式工。有些工厂，历来就是季节性生产的工厂。例如糖厂、烟厂、榨油厂、碾米厂、面粉厂、造纸厂，就是用季节性的工人，有工作就来，没有工作就回家。过去上海、无锡那些地方都是这样。我们在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反而把这些季节工改成固定工、常年工。这件事情做得真是蠢呀！”^② 在谈到临时工问题时，他还说：“临时工转正，我是反对的，不赞成这件事，但是反对不了，还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4年6月8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70页。

是转了。转了好啦，去年前年动员工人下乡，也算吃了苦头了。今后增加工人，不要增加固定工，或者少增加固定工，大量地用临时工。劳动保险制度也要修改。”^①

在刘少奇的大力倡导以及中央和地方各级领导的重视下，从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始，对劳动用工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进行了尝试：一大批半工半读和半农半读学校陆续建立起来，许多企业普遍采用了合同工、临时工和季节工的做法。这些做法，在当时对增加人民群众学习和就业的机会，减轻国家和企业的负担，促进工人劳动积极性的发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试办托拉斯是我国在六十年代为改善国家工业管理体制而进行的一项重要的改革试验。这项试验是在刘少奇倡导下开展起来的，他率先提出要试办托拉斯的建议，并就试办托拉斯的意义、方针以至具体组织实施等方面给予指导。

托拉斯为英文 trust 的音译，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出现的一种具有行业垄断性质的经济组织。它的基本特征，是由许多生产同类产品的企业或与产品有密切关系的企业合并组成大企业集团，旨在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适应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这是一种适应经济自身发展规律需要的现代化工业组织形式。

列宁曾对托拉斯这种经济组织形式给予很高评价。他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明确提出过要向资本家学习办托拉斯，并把这看成是社会主义的“入口”和“取得可靠胜利的条件”。^②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最初考虑新中国的建设道路时也注意到这种组织形式，刘少奇在建国前夕提出过“按各产业部门成立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版，第 472 页。

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60 年 4 月版，第 556 页。

公司或托拉斯，经营国家的工厂和矿山”^①的设想。以后十几年内，刘少奇又多次讲过要注意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经验，要考虑组织托拉斯。但是，由于当时全面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工业管理体制主要是按行政方式进行的，因此，组织托拉斯的设想在五十年代没有能付诸实践。

进入六十年代后，刘少奇等处于第一线的中央领导人在领导国民经济调整工作过程中，更加深切地感到按行政手段来管理工业所带来的弊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后中央权力下放过多、分散主义现象严重的现实原因，又把组织托拉斯的问题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讨论“二五”计划后三年的规划时，议论过试办托拉斯的问题。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一九六三年九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一份《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提出：“管理工业企业，主要是要用经济办法，而不能片面地依靠行政手段。”“可以考虑利用像托拉斯这一类生产、交换和科学试验的综合性的组织形式，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由于当时条件尚不成熟，这个文件没有下发，但文件的精神已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得到贯彻。

这年十月，刘少奇听取薄一波关于工业情况的汇报时提出：“资本主义管理企业的经验，特别是搞垄断企业的经验要学习。苏联好的经验也要学。托拉斯、辛迪加、国家资本主义等等，列宁不是早就讲过了吗？”“组织全国的专业总公司，可以试试看。”“组织专业公司管企业，可能比行政机构管得好一些。”^②在这次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429页。

^②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27、526页。

谈话中，他还就如何组织汽车、钢铁、有色金属、航运等行业的托拉斯企业谈了具体意见。

这以后，国务院在同年十二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就试办托拉斯问题进行酝酿和征询意见。十二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在听取薄一波、余秋里等汇报这次会议情况时，针对一些地方负责人担心办托拉斯会影响地方利益的意见，再次强调了试办托拉斯的意义。他说，办托拉斯要从我们是个大国、究竟怎样管理对国家有利来考虑，不能单单考虑地方利益，“要撇开个人主义、地方主义、行业主义。什么‘地方不方便’、‘利润分成’、‘产品分成’、‘谁大谁小’、‘谁说了算’等等，不在考虑之列。这些问题，放在分配制度、财政制度中研究。”他还提出，要从思想上解决由过去的部和厅局直接管企业向今后放权给公司管企业转变的问题，“由公司来管，同由部来管，观念就不一样”，由公司来管，“部就轻松了，搞平衡、检查、监督，帮助公司搞好工作。厅、局也去搞这些事，不直接插手管工厂”。“这个问题，好好讨论一下，酝酿酝酿。能试验更好，大概必须试验。”^①

一九六四年一月七日，薄一波等又向毛泽东汇报全国工业、交通会议的情况，刘少奇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刘少奇重申他对试办托拉斯的意见。毛泽东也给予肯定，说：“目前这种按行政方法管理经济的办法，不好，要改。”“打破省、专、县界嘛！就是要按经济渠道办事。”^②

从一九六四年上半年起，国家经委会同工业、交通各部门开始研究试办托拉斯的具体方案。

二月二十六日，煤炭工业部党组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书记处提

^① 《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29、530页。

^② 毛泽东听取薄一波等人汇报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情况时的讲话记录，1964年1月7日。

出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的报告。报告说：“根据少奇同志关于组织托拉斯、用经济办法管理工业的指示，今年我们准备首先在徐州成立华东煤炭工业公司进行试点，国务院已经正式批准。”报告提出了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的业务范围、发展规划以及领导归属。四月三十日，中央批准这个报告。这是我国成立的第一个托拉斯试点企业。

随后，国家经委在七月十七日向中央提出《关于试办工业、交通托拉斯的意见的报告》。报告提出：“根据中央和少奇同志关于试办托拉斯的指示，在今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上，对试办托拉斯的问题进行了酝酿。半年来，我们会同国务院工业、交通各部进行了多次研究，有一些部已经提出了试办行业性的托拉斯的方案，有些省、市也准备试办地区性的托拉斯。现在，应当尽快地从酝酿规划阶段，进入试办阶段。”报告在分析我国现行工业管理体制和管理制度存在的弊端和阐述试办托拉斯的意义后，对托拉斯试点企业的性质、管理办法、组织形式以及托拉斯同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作了具体规定，同时还提出第一批十二个试点企业的名单。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批转这个报告，并在批语中强调：“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来管理工业，这是工业管理体制上的一项重大改革。”“试办托拉斯以后，现行的有关计划、财政、物资、劳动等各项管理制度，要作相应改进。”

这样，一九六四年全国先后办起了华东煤炭工业公司、烟草工业公司、盐业公司、汽车工业公司、拖拉机内燃机配件公司、纺织机械公司、制铝工业公司、橡胶工业公司、医药工业公司、地质机械仪器公司、京津唐电力公司、长江航运公司等十二个托拉斯试点企业，对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点，托拉斯这个我国工业体系中的新生事物展现出良好的发展前景。首批试点的中央和地方的托拉斯企业

大都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并且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积累了经验。但在试办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矛盾，主要表现在：一、全国和跨地区的托拉斯企业同地方的矛盾；二、托拉斯内部统一经营同所属企业分级管理的矛盾；三、托拉斯的管理模式同现行工业管理制度的矛盾。这些矛盾的产生，有些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大环境和托拉斯自身的管理机制尚未成熟的条件下是不可避免的，有些则可以通过总结经验 and 调整关系来逐步完善。中央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决定暂不发展第二批托拉斯企业，先对第一批试点企业认真进行总结。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日至六月七日，国家经委党组在北京召开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除首批十二个试点托拉斯企业的负责人以及主管部的负责人外，还邀请了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重庆、武汉、广州等七个城市和辽宁、江苏等两个省的负责人参加。这次会议的目的主要是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试办托拉斯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六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等听取座谈会领导小组的汇报。刘少奇在讲话中要求有关部门不要害怕和回避目前出现的问题，要勇于实践，创造经验。他说：“有不同意见好嘛！就是要把各方面的意见谈出来，把矛盾摆出来。有不一致是正常的。”“办托拉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参考资料，但都没有完整的经验，要我们自己创造。托拉斯不是只办十二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大点，全面看问题。”他再次阐述了办好托拉斯的原则和目的，指出：试办托拉斯“要按经济管理的原则，考虑合理性”，“要高质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技术，适合人民的需要”。

针对前一阶段在试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刘少奇设想，托拉斯的组织形式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些，采取多种形式，而不要拘泥于一种单一的形式。他说：“可以考虑托拉斯有三种形式：

一种是人权、财权、物权全部统，工厂全部收；另一种是只统一计划、价格、原材料供应和产品销售；第三种是只管计划、安排任务、交流经验。恐怕几种形式都要有，只一种不行。”“托拉斯的核算单位问题，有的是总公司核算，有的是分公司核算，有的是企业核算，几种都需要，看具体情况。”针对在试办托拉斯期间中央和地方之间出现的矛盾，他提出要兼顾中央和地方的利益，说：“要全面考虑一下，哪些托拉斯由地方办合理，哪些托拉斯由中央办合理。有些由中央办合理的，也不一定马上就办，可以让地方先办，将来再成立总公司。有些将来也只能是地方办的，中央就不要办。”^①

刘少奇的建议，对开拓试办托拉斯的思路，有针对性地解决试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起了很好的作用。这些建议的内容，大体上都包括在这次托拉斯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形成的《会议纪要》中。

这次座谈会结束后，中央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对托拉斯试点工作重新作了调整，决定原先准备马上成立的一些全国性的托拉斯暂时缓办，先成立一些区域性的托拉斯，待进一步积累经验后扩大规模。这样，在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又陆续成立了一批区域性的托拉斯企业，如东北电力机械公司、华东电力机械公司、陕西棉纺织公司、贺兰山煤炭工业公司等。同时，各省市也成立了一批地方性的托拉斯企业。

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试办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托拉斯这种适应现代工业需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在我国工业体系中兴起了，并在不断摸索、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一定规模。

^①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474—475页。

刘少奇在六十年代提出的按经济办法管理经济的思想以及在
这一思想指导下对我国流通管理体制、劳动用工制度、工业管理
体制的改革尝试，反映了他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正在大胆
地进行探索，并且力求按照经济发展的规律对我国的经济体制不
断进行改革。

当然，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总体框架还没有被触动的
历史条件下，刘少奇这种改革思路，无论是物资工作的改革试
点还是试办托拉斯，都还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要走的路还很
长，还很艰巨。但是，这种探索的方向是正确的。可惜，正当我
国的经济建设在探索中前进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大风暴
来临了。这就是一九六六年五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
长达十年之久的政治动乱中，这些已经初见成效的改革探索不
但被迫停止，而且受到不公正的批判。

三十九、“文化大革命”暴风雨的来临

一九六六年是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已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就在这时，一场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出人意料地在这年春夏之交爆发了。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八大以来，刘少奇和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毛泽东提出退居二线，不再参加中央的一般会议和日常事务，但重大决策仍由他提出或经他同意。在这十年中，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很大成就，摸索到不少经验，也出现过很大失误，特别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指导思想的发展，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他的本意是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但他对国内的阶级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完全错误的判断，甚至认为党中央内部出了修正主义，准备用暴风骤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来解决这个

问题。到一九六五年底一九六六年初，这种错误认识已发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毛泽东的个人专断作风这时也日益严重。他没有经过中共中央的集体研究，没有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商量，采用公开地、全面地、自上而下地发动群众起来“造反”这种极不正常的方式，发动了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

揭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是上海《文汇报》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这篇文章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攻击他所写的《海瑞罢官》鼓吹“单干风”、“翻案风”，“是一株毒草”。文中提出的这些指责，实际上暗指国民经济调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一些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写作和发表这样一篇提出严重的政治问题、又涉及高级干部的批判文章，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在事前一无所知，直接有关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们都是在文章发表后才看到的。

这篇文章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她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外没有别的职务，但出于政治野心，屡屡挑起和策动文化领域的批判斗争。一九六五年二月，她到上海，同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密谋，约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执笔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文章的写作和发表得到毛泽东的同意。江青后来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①这说明江青组织这篇文章就是要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向中央第一线领导发难。

姚文元的文章受到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和中央宣传部

^① 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为人民立新功》，1967年4月12日。

部长陆定一的抵制。北京各大报纸隔了十多天后在受到很大压力的情况下才被迫转载，而且仍把它作为学术讨论来对待。毛泽东对此很不满。十二月二十一日他在杭州一次谈话中说：《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①这样，《海瑞罢官》的问题进一步升级为在政治上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严重问题。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一批学术界代表人物和领导干部被报刊点名批判，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很大思想混乱和恐慌。

针对这种状况，兼任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②组长的彭真，一九六六年二月三日召集五人小组扩大会议研究解决方针，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报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这个提纲通常被称为《二月提纲》。《二月提纲》的指导思想，是力图纠正文化领域批判运动中的极左倾向，把运动置于党的领导下，不使它变成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提纲强调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领导批准”。提纲中还提出：“即使是坚定的左派（从长期表现来看），也难免因为旧思想没有清理或者因为对新问题认识不清，在某个时候说过些错话，在某些问题上犯过大大小小的错误，要在适当时机，用内部少数人学习的办法，清理一下，弄清是非。”

^①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谈话记录，1965年12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是1964年7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成立的，任务是“负责领导各有关方面，贯彻执行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指示”；组长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成员陆定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扬（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吴冷西（人民日报社社长、新华通讯社社长）。

一九六六年二月五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五人小组汇报。会上由彭真和参加起草提纲的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作口头说明。常委们对提纲表示同意，要求五人小组尽快向毛泽东汇报。

第二天，彭真将《汇报提纲》用电报发给在武汉的毛泽东。二月八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吴冷西等去武汉向毛泽东当面汇报。毛泽东问了一些问题，没有表示不同意。二月十二日，经邓小平签发，中共中央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转发全党。

刘少奇后来对这件事没有继续过问，因为当时他工作比较繁忙，还有好几件国际国内的重要工作需要他去处理。二月中旬在北京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和全国工业交通政治工作会议，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会上提出的各种问题，指导把会议开好。他还主持召开有在京各副总理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全国农业机械化的方案和工作安排，这是毛泽东最近批示要刘少奇办的。二三月间，刘少奇还先后接待来访的加纳共和国总统瓦米·恩克鲁玛、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维·乔·威尔科克斯并且同他们会谈。使他花费更多精力的是，二月底三月初在北京举行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的会谈，会谈中涉及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谈判进行了多次。双方会谈时，中共方面以刘少奇为首，日共方面以日共总书记宫本显治为首。三月中旬，刘少奇和周恩来、朱德等去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随后，按照早已确定的安排，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分，在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等陪同下，出访巴基斯坦、缅甸、阿富汗。这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风暴将要降临。

刘少奇访问亚洲三国，是在三月二十二日离京，四月十九日结束访问回到云南昆明的。在这二十多天中，国内政治局势已经

骤变，接连发生了几件令人震惊的大事：

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毛泽东在上海连续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和中共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他指责说：《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他还说：“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①

四月十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全党。这个座谈会是江青在林彪支持下于二月二日至二十日在上海召开的，主要是由江青发表意见。会后，经陈伯达、张春桥等帮助整理成《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又作了三次修改。《纪要》宣称建国以来文艺界“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

四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传达贯彻毛泽东三月底的谈话。康生、陈伯达在会上“系统地批判了”彭真的“一系列严重错误”。会上决定，撤销《二月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

随后，由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组成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着手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通知稿歪曲《二月提纲》的本意，毫无根据地指责它是一个为资产阶级复辟做舆论准备的修正主义纲领。《通知》的最初几稿还没有点彭真的名，后来便直接点名批判了。整个起草工作是在毛泽东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在修改中加写了许多重要的话，其中提

^① 毛泽东谈话记录，1966年3月28日、30日。

出：文化领域和党、政、军各界混进了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必须批判和清洗这些人。

四月十六日起，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二月提纲》和彭真、罗瑞卿等人的问题。与会人员到达杭州的时间有先有后。林彪到得最早。大部分人员包括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以及六个中央局的书记李雪峰、李井泉、陶铸、宋任穷、魏文伯、刘澜涛，在四月十六日赶到。陈伯达、康生十七日晚从上海到杭州。会议的前一段时间是阅读有关文件，主要是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所作的几次修改。

刘少奇、陈毅四月十九日从缅甸仰光回到昆明。他们出国二十多天，一时还不清楚这段时间国内政治局势已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原来还打算在昆明停留几天，视察一下云南这个边陲省份的工作。但他们一到，便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要他们马上到杭州，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陈毅放弃原定的视察计划，立刻坐专机直飞上海，换乘派来接他们的火车专列，急忙赶到杭州。刘少奇住下后，周恩来赶来向他介绍了前一段会议的情况。

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时已近尾声。《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基本定稿，一些重要决定已经作出：撤销中共中央原来已发出的《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设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四月二十四日，会议基本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作出组织处理。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罗瑞卿是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秘书长、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尚昆是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他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已被免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他们被加上“反党”等严重罪名，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审查。

林彪、江青在这件事中起了很大作用。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却在这四个人的问题提出前并不知情，甚至不止一次地发生有的政治局常委到临开会前仍不知道会议的内容。

杭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先后回到北京，准备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决策。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讨论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二、讨论并处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问题。

一九六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七十多人，其中包括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但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没有参加。会议进行了二十三天，到五月二十六日闭幕。由于毛泽东仍在杭州并表示暂不回北京，依照惯例，会议由刘少奇主持。

会议先讨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由于多数与会人员不知道为什么要发这样一个通知，更不了解这个通知的产生过程，所以先开几天“介绍情况的座谈会”，传达毛泽东最近的一系列指示，介绍《通知》的起草修改情况。

“座谈会”从五月五日至七日共开了五次，实际上并没有座谈，而是听取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的讲话。其中，康生一个人用两个半天时间，传达了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以来关于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开展文化革命以及批判彭真、陆定一的多次谈话。这些谈话定下了会议的基调。在当时全党对毛泽东存在严重个人崇拜的情况下，尽管不少人对这些谈话感到意外和不

解，但仍都表示拥护。

通过情况介绍，与会人员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产生的来龙去脉，知道它在四月十四日至三十日的十七天中经过毛泽东八次审阅修改，并已在杭州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基本通过。因此，各小组讨论后，对这个文件一致表示拥护。

五月十六日上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本来在分组讨论过程中，有的同志曾从文字语法的角度对《通知》稿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都被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整个通知稿一字未改，一个标点符号也没有动。

刘少奇作为会议主持人，只能勉强地解释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叫大家讨论，提了意见不改，连几个字都不改，这不是独断专行吗？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吗？我原来考虑过改一点，大家意见还是不改好，不如原来的好。”^①因为《通知》中对彭真作了点名批判，刘少奇特意问道：“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见？”彭真回答说：“一个检查，一个改。”刘少奇问：“对通知有什么意见？”彭真说：“没有意见。”^②

这样，《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就在会上一致通过。因为它是在五月十六日通过的，人们通常称它为《五一六通知》。文件中的一些段落是毛泽东加写的，其中最重要的有：

“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5月16日。

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5月16日。

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些内容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观点。他认为党的领导层出了修正主义，党和国家面临着资产阶级复辟的现实危险，发出党内出了“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的严重警告。但事实证明当时他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

五月十八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由林彪讲话。他在讲话中大讲古今中外的各种政变，制造中央内部有人要搞反革命政变、颠覆政权的恐怖气氛。他毫无根据地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个人的事硬扯在一起，说他们“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夺取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林彪还别有用心地鼓吹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说：“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

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①

在当时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林彪的这篇讲话被称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件”，成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主题报告。会后，中共中央将林彪这个讲话作为中央文件发到全党，要求“全党全军都应当认真学习，认真讨论，认真领会”。

从五月十九日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连续举行全体会议，根据林彪讲话中定下的口径，以反党集团的罪名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五月二十三日，会议通过决定，停止或撤销他们的职务，决定成立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们进行审查。会上决定，调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调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军委秘书长，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同林彪盛气凌人的讲话相反，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在讲话中除了谈对文化革命的认识外，就是检讨自己跟不上毛泽东思想，并对多年来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最后一天的全体会议上发言，由周恩来主持会议。刘少奇在讲话中首先对会议安排他在这样一个重要时间讲话表示感谢，接着他讲了根据毛泽东最近一系列指示开展文化革命、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意义和他自己的认识。整个讲话的精神是表示要努力跟上形势，保持晚节，革命到底。

对于“文化大革命”，刘少奇是缺乏思想准备的。他在谈到自己的认识时说：“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

^① 林彪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5月18日。

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①

同周恩来等一样，刘少奇也对自己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他检查回顾了自己大革命时期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一九四七年指导全国土地改革、一九四九年在天津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讲话、一九五一年关于山西互助组织的批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一九六二年对经济困难的估计和制定《二十三条》过程中不主张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问题上的“错误”。刘少奇检讨的这些“错误”，其中很多实际上并没有错，有些还是可贵的真知灼见。刘少奇讲话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随即闭幕。

会后，中共中央在五月二十八日发出文件，宣布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成员中包括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当时名列副组长的还有王任重、刘志坚，但他们和其他几个成员很快就受到诬陷迫害，被排除出这个机构。

《五一六通知》的发出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5月26日。

四十、工作组事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没有结束，江青、康生等便不顾党的纪律，有意将会议上批判彭、罗、陆、杨的信息散布出去，煽动社会舆论。

五月八日，江青在《解放军报》发表由她组织写的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关锋在《光明日报》发表署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五月十日，上海《文汇报》、《解放日报》同时以很大篇幅发表姚文元的又一篇文章《评“三家村”》。五月十一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这些公开发表的文章把攻击矛头集中地直指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北京日报》、《前线》杂志、《北京晚报》是反党工具，邓拓、吴晗、廖沫沙^①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文字都带着强烈的煽动性，掀起了一股猛烈攻击北京市委的狂潮。

五月十七日，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带人到北京大学，避开陆平、彭珮云等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策动哲学系总支书记聂元

^① 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由于曾在刊物上开辟《三家村札记》杂文专栏，被指责为“三家村黑店”。邓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廖沫沙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

梓等写“往上搞”的大字报。聂元梓等经过秘密串连，写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于五月二十五日午后突然在校园内贴出。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立刻在北京大学引起巨大轰动。人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许多师生主动站出来反对。刘少奇、周恩来得知后，分别派人到北京大学了解情况，重申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遵守纪律，使校园秩序稍稍稳定下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后，本来应该按党的一贯做法，有步骤地逐级传达贯彻会议精神。但社会上出现的种种反常事态，使这一工作变得复杂起来。五月二十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位负责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有关部门开会研究。鉴于宣传舆论工作和北京大学急需加强领导，会上决定：由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带领临时工作组，到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版面，并指导新华通讯社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张承先带领华北局工作组到北京大学领导文化革命。这一决定当场由周恩来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请示了在杭州的毛泽东，取得同意。第二天，刘少奇又和周恩来、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正式发出请示电报说：“我们今日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每天的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吴冷西和其他副总编辑的职务暂时不动。内部整风学文件，也可以继续写大字报，但一部分态度较好、愿意积极工作的编辑人员，要集中力量，维持每日版面。在报纸版面改观后，再进一步解决内部问题。这种措施是否恰当请速复示。”^①毛泽东当夜批示：“同意这

^①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致毛泽东电，1966年5月30日。

样做。”^①第二天，陈伯达带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第一个工作组。

进入六月，情况发生急剧变化。

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在头版醒目位置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号召群众起来“横扫盘踞在思想文化阵地上的大量牛鬼蛇神”，“把所谓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这篇社论是陈伯达进驻人民日报社后连夜主持起草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个标题也是陈伯达拟定的，发表前并没有报告中共中央。

当晚，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节目中播出。这是康生背着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把大字报底稿直接送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由毛泽东告诉康生向全国广播的。大字报责难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说：“你们是什么人，搞的什么鬼，不是很清楚吗？直到今天你们还要负隅顽抗，你们还想‘坚守岗位’来破坏文化革命。”

在一天内突然向全国发表这样两篇东西，不但一般干部和群众感到惊讶，也出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第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意料之外。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广播后，在北京大学引起强烈震动，多数师生迷惑不解。晚上十点多，张承先率领的华北局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

事态还在急速发展。六月二日，《人民日报》在“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一个大阴谋——‘三家村’黑帮分子宋硕陆平彭珮云负隅顽抗妄想坚守反动堡垒”的通栏大标题下，全文登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报纸同时发表一篇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号召人们向“反革命黑帮”作斗争，

^① 毛泽东批示，1966年5月30日，手稿。

“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

从这天起，《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煽动“文化大革命”的大量社论、文章和新闻报道。六月三日公布了中共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北京新市委决定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消息。

局势急转直下。北京和许多城市的大中学生立刻纷纷起来响应，把学校校长和一些教师当作“黑帮”来批斗，刮起一股乱揪乱斗之风。许多学校的党组织陷于瘫痪。无政府主义的狂热情绪从北京迅速向各地扩展。

“文化大革命”的狂潮，就这样迅猛地席卷全国。

这种局面，使刘少奇陷入极为为难的境地。他不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意图，又不得不处在领导运动的岗位上；他不同意最近出现的这一系列不经过组织程序、不采用正常方式的做法，但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行动看来得到毛泽东的授意或支持，因而又不便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只有在工作中更加依靠集体领导，重大问题多向毛泽东请示，努力使运动走上他认为正确的轨道。

六月三日，刘少奇紧急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席会议的，除在京主持日常工作的三位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外，还有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文革小组、北京市的负责人。

刘少奇主持会议。首先由新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汇报。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学校的最近情况。接着，会上议论了准备向学校布置的八条要求：（一）大字报要贴在校园内；（二）开会不要妨碍工作、教学；（三）游行不要上街；（四）内外区别对待，不准外国人参观，外国留学生不参加运动；（五）不准到被揪斗的人家里闹；（六）不准打人、污蔑人；（七）注意保密；

(八) 积极领导，坚持岗位。李雪峰最后提议：“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①

会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的意见，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到各学校贯彻这八条要求。刘少奇提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的秩序，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②

中共北京市委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开始向各学校派出工作组。大学工作组由中央组织部从各部委抽调，中学工作组由团中央抽调。

报纸公布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消息后，北京市大多数学校的青年学生一面把本校领导当作“黑帮”来攻击以至批斗，一面成群结队向中共中央、国务院、北京市委要求派工作组进校。许多大学、中学的领导班子对这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毫无思想准备，在青年学生的狂热冲击面前已难再行使领导职能。鉴于无政府状态迅速蔓延，混乱局面日趋严重，中共北京市委在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后，从六月五日起加快派遣工作组的进度。到六月中旬，北京地区的大多数大专院校和部分中学先后有工作组进驻。中共中央在刘少奇主持下并没有作出过普遍派工作组的决定，更没有发出这方面的文件，但迫于面临失控的局势，全国大部分省市和一些中央部委，纷纷效仿北京市的做法，自动向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

宣传、文化系统当时被看作有一条“黑线”在那里“专政”，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六月六日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新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党委书记的肖望东（原南京军区第二政委），

^{①②} 汪东兴 1966 年 8 月 8 日追记的 1966 年 6 月 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内容。

向文化系统各单位派出由军队干部组成的工作组，其中从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三百多名干部参加工作组是经林彪同意的。

毛泽东这时仍在外地，但中共中央通过各种方式经常向他汇报工作，派工作组的事他是了解的。中央文革小组身处北京并且直接参加中央各有关会议，对此更是一清二楚。当时，没有人对派工作组的做法提出异议。

《五一六通知》发出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的号召，但对运动的方针、步骤、政策等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人们对事情各有各的理解。仓促进校的工作组面对狂热的学生，想管又不敢管，很难工作。而被六月一日以来一篇篇社论、文章、报道煽动起来的青年学生，头脑已极不冷静，总想挖出一批黑帮斗争一番。没有多久，学校的正常秩序已完全被打乱，学生不上课，教师不教课，党团组织生活也无形中停止了。

局面混乱，难以驾驭。这种状况当然不能让它长此下去。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差不多一两天就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但由于毛泽东不在，许多重大政策确定不下来。六月九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乘专机飞抵上海，从上海乘车去杭州。当天下午，他们向毛泽东作了简单汇报。

六月十日至十二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开了两次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陶铸，还有根据毛泽东意见增加的陈伯达、汪东兴和六个中央局的书记李雪峰、宋任穷、刘澜涛、魏文伯、王任重、李大章。陪同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胡志明来杭州的康生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中的朱德、陈云没有被通知到会，林彪请假。这两次会议只是漫谈，议论的内容涉及“文化大革命”的方方面面。毛泽东在会上讲了“文化革命是政治斗争”等原则性看法，但对当前运动应该怎样进行没有提出具体意见。刘少奇也谈了他的设想，

说：“学校如何搞法？有的是夺权，有的是批判学术权威，然后就搞教学制度改革，解决考试和教材等一连串的问题。城市工厂和农村文化革命运动，是不是同四清结合起来搞。”^①会上对运动的计划、安排等等没有展开具体讨论，因而也没有形成明确的结论。

会上没有专门讨论工作组问题，只是毛泽东在议论中讲到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②

但这时北京各学校的工作组基本上已经派出。

会议结束后，刘少奇等回到北京。因为周恩来按照已一再推迟的计划，要在六月十五日出访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指导运动的责任就落在刘少奇、邓小平两人身上。当时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同大多数干部群众一样，仍怀有许多美好的期望，希望通过这场运动能够消除党内存在的阴暗面，改革不合理的体制。他曾对家里人说：“过去中央千方百计想寻找一条途径，以纠正、杜绝各级干部正在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作风和脱离群众的现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尝试，希望文化革命是一个更好的机会。”^③六月二十七日，他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还说：“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变化”。^④

杭州会议上曾议论到运动可能要要进行半年时间。毛泽东还说

① 刘少奇在杭州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6月12日。

②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6月12日。

③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④ 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6月27日。

过：“半年之内，我看不读书，最活的是读报纸。”^① 根据这一精神，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于六月十三日发出联合通知，宣布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实际上是让大中学生停课半年搞运动。同一天，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和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以便各地对运动的大体安排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材料。

六月十四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这以后，他们又多次召集会议听取“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研究处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尽力按照杭州会议上毛泽东一些讲话的精神，引导群众参加运动。刘少奇还在深夜先后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看了师生们张贴的大字报。

关于工作组，毛泽东只是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但没有要求把已经派出的工作组都撤回来。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中学）工作组是团中央派的，有的是好的，能与学生三同，同吃、同住、同工作，不好的应该撤回。”他还说：“工作组派下去被赶回，证明他不行了，乱就好么！”^②

由于几乎所有学校的一二把手都受到冲击，工作组又不敢对学生的种种造反行动予以有力制止，致使乱批乱斗现象增多，校园里整天乱哄哄的。各校的师生因为观点不同而分裂成两派或几派，互相之间展开攻击。许多教授、专家被当作坏人揪出来示众。抄家、打人、批斗会等已司空见惯。自杀和打死人的情况也

^① 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6月12日。

^② 汪东兴1966年8月8日追记的1966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内容。

时有发生。有些学校发生学生同工作组对立的事件。

六月十八日上午九时，北京大学一些学生乘工作组正在集中开会时，擅自把四十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学生们强迫这些人站到所谓“斗鬼台”、“斩妖台”上，给他们戴上纸糊的高帽子，脸上涂上墨汁，并对他们施以罚跪、扭打、揪头发、撕衣服等种种人格污辱，现场十分混乱。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闻讯急忙赶来，严肃批评了这种目无法纪的乱批乱斗行为，制止了事态的进一步蔓延。

当天下午，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将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处理情况编印成《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呈报给中共北京市委。市委立刻将它转报刘少奇等政治局常委。

继北京大学这次事件后，清华大学在第二天也出现公开鼓动驱赶工作组的情况，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有少数学生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有消息说，这部分学生正在互相串连，酝酿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事态越来越严重，局势面临失控的危险。刘少奇对家里人说：“这是全国大分裂的开始，不可忽视。后面可能有高级干部。”^①显然，如果听任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将会导致不可收拾的局面。

刘少奇不得不采取措施。六月十九日，他要王光美去清华大学，作为校工作组顾问，观察动态，及时反映学校运动的情况。二十日，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肯定了驻北京大学工作组的做法。他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批语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

^① 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理。”当时，乱斗乱打等违反法纪的行为在全国各地已时有发生。文件的发出，使这种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

当天下午，刘少奇把驻北师大一附中的工作组成员找来，要他们组织师生讨论学校里出现的反工作组大字报，发动群众回击反工作组势力。他对工作组负责人说：“开始出现一些问题了，说你是黑帮，给你贴了十几张大字报。不要紧。大字报出来，证明内部意见不一致嘛，证明他们对运动不满，学生之间不团结嘛。”“现在人家向你们进攻，人家向你们采取攻势了，这好嘛。敌人出来了，这个蛇出洞了，你消灭他就容易了。要把这张大字报讨论好，再斗争。”^①

六月二十一日，刘少奇、邓小平又一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研究运动中出现的問題。在汇报讨论后，刘少奇提出：要划一个界限，不要把什么人都说成是黑帮，六月三日公布北京市委改组以前听市委话的，都一律不追究，这个问题由北京市委起草一个文件报中央批转全国；在运动中要恢复党团组织生活，党委烂掉的，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大部分党委是好人嘛，以文化革命为纲，但不要打倒一切；运动的整个过程，要抓生产、工作、生活，恢复星期日，注意劳逸结合；要注意反革命分子有的用“左”的面貌出现，有的用右的面貌出现，我们利用大字报，反革命也会利用大字报；我们要用《二十三条》的精神，禁止打人、污辱人和变相的体罚。^②邓小平也在会上就工作组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提出了

^① 刘少奇同驻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工作组成员的谈话记录，1966年6月20日。

^② 汪东兴1966年8月8日追记的1966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内容。

意见。

会议精神逐级贯彻下去，学校中基本的教学和工作秩序开始恢复，无政府主义现象得到相当遏制，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定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后来，刘少奇在七月五日的会议上又提出要制定文化革命的规划，中学的由团中央起草，大学的由北京市委起草，一周内起草出来提交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邓小平还提议八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三分之一。

“文化大革命”的开展，对全国的工业、交通影响很大。运动开始后，生产形势不好，事故增多。钢、钢材、木材、煤的产量下降，质量下降尤为突出。基本建设在上半年只完成全年任务的百分之三十五六，大大低于原定计划。刘少奇、邓小平把薄一波、陶鲁笳等主管工业交通生产的负责人找来，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向毛泽东提议：把文化革命的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和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运动的部署，分期分批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并由上级派工作组领导。六月三十日，刘少奇、邓小平联名向毛泽东请示，要求发出根据这一精神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毛泽东同意将这个通知迅速发下去。

由于采取了这一系列措施，运动开始向有领导有计划的方向发展，却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

中央文革小组一面挑动学生同工作组对立，一面在一些场合对工作组提出种种非议，实际上是要取消工作组，制造更大的社会混乱。陈伯达在参加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提出这种意见时，遭到大多数与会领导人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人的意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被否决。

这样，围绕工作组等问题，刘少奇、邓小平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同中央文革小组之间，分歧和矛盾越来越加深。不少学校内，在拥护工作组还是反对工作组问题上分成两派，尖锐对立，驱赶工作组的现象也增多了。

七月十八日，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他在听取汇报并看了中央文革小组提供的一些材料后，对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发展情况不满；但最初没有在工作组问题上表态，没有提出要撤出工作组。七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批转总政治部《关于抽调军队干部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请示》，其中提出“采取抽调干部参加地方四清的办法组织工作队，支援地方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仍表示同意。

这时，刘少奇仍继续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处理“文化大革命”问题和各项日常工作。

但是，社会上和中央会议上围绕工作组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大了。七月十九日，陈伯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又提出工作组问题，说：“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会上多数人仍表示现在不能撤出工作组。邓小平提出：“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的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刘少奇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①

七月二十二日，刘少奇、邓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会上对工作组问题又发生争论。后来江青讲到这次会议的情况说：“二十二号晚上

^① 汪东兴 1966 年 8 月 8 日追记的 1966 年 7 月 1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内容。

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规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①江青的说法印证了当时大多数中央领导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的批评和抵制。刘少奇、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仍坚持“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这一意见。

但这种意见同毛泽东的“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大相径庭，加上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的片面汇报，终于使毛泽东得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的结论。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毛泽东连续两次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和正在北京开会的各大区中央局书记谈话，提出要撤出工作组。他说：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就是六月二十号左右以后，有许多地方搞得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②在毛泽东已经作出决断的情况下，刘少奇等没有提出不同意见，服从了毛泽东的决定。

七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二十七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作了修改。二十八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关于撤销各大专院校工作组的决定》，文件中说这一决定“也适用于中等学校”。

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市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有一万人参加的全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李雪峰在会上宣读了关于撤销工作组的决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讲话。周恩来、刘少奇也先后讲话。他们在讲话中都说明

① 江青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小组会上的发言记录，1966年8月5日。

② 毛泽东谈话记录，1966年7月24、25日。

派工作组是中共中央决定的，代表中央承担了责任。刘少奇说：“过去曾经派工作组，刚才雪峰同志、小平同志、恩来同志都讲了，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中央同意的。现在发现，工作组这种方式不适合于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退工作组。”“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做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正如邓小平同志刚才说的，工作组有好的，比较好的，或犯有严重错误的。”^①

刘少奇在讲话中又一次谈到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至于怎么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主要的靠你们各个学校广大的师生员工在革命的实际中间来学会革命。”

“怎样革命，现在只能讲一句话，放手发动群众，依靠广大的群众，依靠革命的同学、革命的教师、革命的员工，团结广大的群众，放手发动他们进行革命。更具体的方法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现在，北京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有两个月，你们知道的比我们多，我们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现在有饭吃，吃饱了又不上课，党中央决定半年不上课。半年不上课干什么？干革命，专门干革命。在这半年中间你们可能取得很大的进步。我们也可以跟着你们学习一些。”^②

这次大会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撤销了工作组。但毛泽东

^① 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记录整理稿。

^② 刘少奇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7月29日，记录整理稿。

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仍不满意。他认为前一段运动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走了弯路，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把刚刚兴起的“文化大革命”压了下去。他决定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以便排除“阻力”，重新把运动全面发动起来。

四十一、“炮打司令部”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至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六十七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会议。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以及首都高等院校师生代表也列席会议。会前从七月二十七日起开了几天预备会，主要是传达讨论毛泽东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的谈话。

这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毛泽东后来在一九六七年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有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意见带到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去讨论。^① 这次全会的召集十分仓促，七月二十日才发出通知。因此政治局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连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大会作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工作的报告，也没有来得及起草报告稿，只是在开会时作口头报告，周恩来等还临时插话补充。中央文革小组的全体成员都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等所谓革命师生代表也始终列席会议，这是以往中央全会没有的事情。

八月一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开幕会上

^① 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记录，1967年5月。

说：“这次八届十一中全会，今天以前算作小组预备会议，从今天起正式开会。大概是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开五天。今天开一次大会，全体到，中间开三天小组会，最后开一天大会，就行了。”^① 这个日程后来被大大突破，会议一直进行了十二天。

毛泽东讲完开场白后，邓小平宣布会议议程：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追认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人事任免的決定。

接着，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常工作主持者向全会作报告。报告的前半部分，是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际、国内各方面所采取的重大政策措施；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工作，并且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作自我批评。

刘少奇在报告中对前一段运动中发生的问题承担了责任，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他对前一时期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围绕撤不撤工作组问题的讨论情况作了回顾：“陈伯达同志早就提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我也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我曾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伯达同志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要看一看；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主席回来的第二

^①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日。

天，又开了个会，感到是个问题。会后请示主席，主席下决心撤出工作组。”^①

毛泽东在刘少奇讲工作组问题的过程中频频插话，更加严厉地批评工作组，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②

会议气氛紧张起来，原定日程开始被打乱。八月二日下午继续安排开大会，周恩来、陈毅、李雪峰等讲话。周恩来在六月中旬至七月初因出访欧洲而不在国内，对工作组问题参与比较少，但一开始决定派工作组和后来讨论撤不撤工作组，他是参加研究的，所以也主动承担了责任。他说：“对于工作组问题，我认为常委特别是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对派遣工作组负责任。”“一直到主席回来，我们汇报的时候，还主张工作组不撤，这就是更大的错误。”^③ 在以后的发言中，其他负责人也都就工作组问题作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通。

刘少奇虽然对撤销工作组没有想通，但仍想努力跟上形势。毛泽东前几天在一次谈话中提出，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都应该亲自参加一所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以取得感性知识。刘少奇在同李雪峰商量后，选择到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去。那时候，同许多大学一样，这所学校的师生在工作组等问题上也分成两派，严重对立。

八月二日晚上，刘少奇来到北京建工学院。该校归口属国家

^①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1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插话，1966年8月1日，记录稿。

^③ 周恩来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日。

基本建设委员会领导，国家建委主任谷牧，还有李雪峰，随同刘少奇一起来到学校。刘少奇要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他们派来了戚本禹。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刘澜涛等几位领导人也跟来参观。其他一些领导人在这天晚上到别的学校去。邓小平、陶铸去了中国人民大学。

刘少奇等到北京建工学院，出席了两派学生的“辩论会”，耐心地听取几种不同观点的发言，最后讲了话。他说：“看来工作组在你们学校是犯了错误的。这个错误也不能完全由工作组负责，我们党中央和北京新市委也有责任。派工作组是党中央同意的，市委跟上来了。”“这个会不要叫辩论会，叫讨论会好不好？有不同意见讨论嘛！有错误改正错的，对的坚持，错了改正，团结起来。如果我能够帮助大家做些团结工作，我就很高兴了。”^①

八月三日，刘少奇再次来到北京建工学院。他把“八一团”、“革命团”这两个群众组织的头头找来，分别听取他们的意见，同他们谈话，希望通过做思想工作，使两派学生团结起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由于会内会外的气氛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会上对《決定》本身没有切实展开讨论。大多数与会人员在大会小会的发言中总是检查自己跟不上形势，对“文化大革命”“很不认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没有对“文化大革命”应该怎样进行提出意见。虽然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就对工作组问题提出了严厉批评，但没有人主动出来批评刘少奇、邓小平。

全会进行到第四天，情况出现了重要变化。

八月四日，原来已经通知这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全体会议。代表们到达会场后，会议工作人员告诉他们下午不开全体会了，改为小组讨论。原来，毛泽东临时决定在下午召开中

^① 刘少奇在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2日。

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下午三点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主要是毛泽东讲话。他在讲话中严厉地批评了前一阶段中共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前清时代，以后是北洋军阀，后来是国民党，都是镇压学生运动的。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镇压学生群众，为什么不能反对？我是没有下去蹲点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规定班与班、系与系、校与校之间一概不准来往，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有人对中央六月二十日的批语有意见，说不好讲。北大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北京公社。贴大字报是很好的事，应该给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报告中却说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内外有别。”“团中央，不仅不支持青年学生运动，反而镇压学生运动，应严肃处理。”^①

刘少奇主动出来承担责任，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接口说：你在北京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8月4日。

专政嘛，专得好！^①

当叶剑英讲到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泽东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②

这次会议的情况表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已不能平等地集体讨论工作。

此后，毛泽东又接连采取了几个惊人的行动。

八月五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③

八月六日，毛泽东要秘书通知还在大连休养的林彪出席全会。林彪在当晚坐专机回到北京，直接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会议。

八月七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他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全会上印发。这张“大字报”，把中共中央领导层几年来在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分歧说成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自然在与会人员中引起极大的震惊。“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但谁都看得明白，它所针对的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在一线主持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计划开五天，现在显然不可能准时结束了。八月八日，全会通过

^{①②}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记录，1966年8月4日。

^③ 毛泽东手稿，1966年8月5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完成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所需的法定程序。随后，会议转入讨论毛泽东的“大字报”。

毛泽东的“大字报”改变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议程和方向。实际上出席会议的多数领导干部本身也是“大字报”指责的对象，许多人思想上难以接受。因此，除陈伯达、江青、张春桥等少数人外，多数人没有表态。后来陈伯达讲到这次会议情况时说：“事实上文件只是在会议上通过了一下，有相当数量的同志有抵触。”^①毛泽东后来也说过，他的看法当时在会上只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有许多人仍然是不通的。^②

会议分组讨论中的一天，刘少奇到小组参加讨论，听取批评意见。编在这个小组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当几次小组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时一直保持沉默。那天讨论休息时，她特意走到刘少奇身边，当着许多人的面向他说：“少奇同志，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刘少奇明白这位老大姐的好意，缓缓地站起来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③这确实是刘少奇的肺腑之言，希望这场政治风暴不要累及其他人尤其是下面的干部，一切责任由他来承担，使党的事业少受损失。他在会议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中说：“在主席不在北京时，中央在文化革命中所犯的路线错误，主要由我负责。我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我都负责，决不推脱。其他同志所犯错误，我也有责任。”^④以后，他在各种不同场合先后以书面或口头的方式多次向中央提出这个意见。

① 陈伯达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1967年3月10日。

② 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记录，1967年5月。

③ 吕玉临：《陈少敏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版，第222页；张李文、陈承模：《杰出女性陈少敏》，纺织工业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1页。

④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1966年8月，手稿。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分组讨论的同时，中央政治局开了几次生活会，批评刘少奇、邓小平。江青在会外策动一些人向刘少奇、邓小平“开炮”，但没有完全得逞，陶铸就首先拒绝了她。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前，毛泽东又提出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的意见。这是原定议程中所没有的，因而没有也来不及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酝酿讨论，更不用说在中央委员中征求意见了。八月十二日，全会补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六人、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并重新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原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七人组成。重新选举后增加为十一人，即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名次排列中，林彪由原来的第六位上升为第二位，而刘少奇由原来的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

刘少奇对这一选举表示，保证服从党的决定，努力认识自己的错误，不做任何不利于党的事。他在发言提纲中写道：“我当遵守党起码的纪律，不搞两面派，不搞地下活动，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来。”^①

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四个人的副主席职务以及邓小平的总书记职务以后不再提及。只有林彪继续被称为副主席，并被宣布为“毛泽东同志最亲密的战友”，实际上成为唯一的副主席。

全会改选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也没有能正常地行使职权。选出的十一名政治局常委中，刘少奇、邓小平因被指责为犯了“路线错误”，已不再参与中央的日常领导工作；朱德、陈云也受到批判，常委职务有名无实；陶铸、李富春不久也被排斥。

^① 刘少奇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所写的检讨发言提纲，1966年8月，手稿。

八届十一中全会结束后，“文化大革命”的狂潮，便几乎不受任何约束地在全国范围内猛烈展开。林彪在八月八日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说：“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①八月十八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的群众达上百万人。这时“文化大革命”还在发动阶段，本来无所谓“庆祝”，实际上只是用这种方式来大造声势，进一步鼓动群众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改选结果，中共中央曾在八月十四日发出通知，要求传达到县团级，不向党外传达。但八月十八日的群众大会，实际上向国内外公开了中共中央高层的这次重大人事变动。在大会主席台上，中央政治局常委按新的次序排列。在新闻报道中，林彪被放在突出的位置，配发了单独的照片，刘少奇的名字却被一笔带过。

刘少奇和其他政治局常委出席了这次群众大会。这是他降职以来第一次上天安门城楼。检阅休息的时候，刘少奇坐在一旁随意翻看报纸，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伍修权走过来打招呼，交谈了几句。刘少奇对他说：自己把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反复看了几遍，实在看不出它的意义为什么比巴黎公社宣言还要重大。^②

在这天的大会上，毛泽东身穿解放军军服，臂戴“红卫兵”袖章，检阅群众游行队伍。这使年轻的红卫兵们感到极大兴奋。大会后，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集结起来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席卷全国。各地的大中学生是红卫兵的主要成分。在一系列惊人事

^① 林彪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谈话记录，1966年8月8日。

^②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6月版，第274页。

件的刺激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竭力煽动下，这些年轻无知而又陷于狂热的红卫兵到处串连造反，还自以为是“革命行动”。他们冲击党政机关，使各级领导机构难以工作。在严重失去控制的状况下，大量传统文化设施、文物古迹、宗教场所被当作“四旧”砸烂焚毁，许多党政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民主人士被当作“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遭受批斗、抄家和种种侮辱迫害。社会秩序陷于极度混乱。整个社会为之震动。

刘少奇的女儿平平、儿子源源正在上中学，也参加了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并且跟着参加过一次抄家活动。他们以为“破四旧，立四新”是党中央号召的革命行动，为参加这样的活动而高兴，放学回家后兴致勃勃地讲他们的所见所闻。这天吃饭的时候，孩子们又谈到，学校红卫兵组织通知晚上要去抄家，正好被刘少奇听见，他立刻阻止道：“不要去！”

饭后，刘少奇严肃地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把儿女们叫到身边叮嘱道：“你们破‘四旧’，我不反对，但不能去抄家、打人。我是国家主席，必须对国家负责。许多民主人士，跟我们党合作了几十年，是我们多年统战工作的重要成果，来之不易呀！不能使它毁于一旦。现在，由于我的处境，不能阻拦你们，你们也拦不住别人。但是我要对你们讲清楚，要对你们负责。”^①从此，他的孩子再也没有去参加抄家之类的活动。

八月十八日大会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到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学校师生，总人数达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外出串连的食宿交通都免费。他们在各地自由流动，到处煽风点火、乱揪乱

^①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斗，造成全国范围的社会大动乱。人们普遍对运动中出现的许多颠倒是非、无法无天的行为感到不解和反感。

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社会上有几种思潮，就有几派，都要登台表演。过去五十天，那个司令部只领导了一种思潮。派工作组的人要承担责任。国务院各口的负责人，要到群众中作检讨，到工作队员中去作检讨。这样，解放大多数。^①

接着，各工作组陆续进行整训检查。刘少奇、邓小平被要求向北京各工作组领导干部会议写出书面检讨。

九月上旬，刘少奇开始写自己的检讨书。他再次对派工作组一事承担了责任，并且按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定性，把它说成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

“在今年六月一日以后的五十多天中，我在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路线错误、方向错误。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应该是由我来负。其他同志的责任，例如在京的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国务院某些部委的领导同志，北京新市委的领导同志，某些工作组的领导同志，某些地方的领导同志等等，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责任，但是，第一位要负责任的，就是我。

“在今年七月十八日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毛主席不在北京，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由我主持进行的。北京市各方面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是经常在我主持的中央会议上汇报的。在这些汇报会上作出了一些错误决定，批准或同意了一些错误的建议。”^②

刘少奇努力按照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纪要，1966年8月29日。

②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报》中的提法，对这五十多天里的工作进行上纲上线的检讨。他写道：“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和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①

大约九月十日前后，刘少奇把检讨写好并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九月十四日作了批示：

“基本上写得很好，很严肃，特别后半段更好。建议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提出意见，可能有些收获，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可能稳正一些，请酌定。”^②

刘少奇在收到毛泽东批示的当天，给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写了一封信，赞成按毛泽东的意见办：

“我的检讨提纲，毛主席已经看过，并批了一段话，退还给我。现送上，请你看看。我赞成毛主席的意见，以草案形式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工作组领导干部、北京市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各同志讨论一下，并请他们提出意见，退还给我，然后酌加修改，再作报告。关于

^① 刘少奇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1966年10月23日。

^② 毛泽东对刘少奇检讨的批语，1966年9月14日，手稿。

印发事，请你批办，请各同志在几天内提出意见告我，给我以帮助。主席的批语也印发。如何？请你酌情安排。”^①

九月十九日，周恩来将刘少奇的检讨稿和毛泽东的批语印发有关人员征求意见。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文化大革命”迅猛发展。自林彪指示取消原来关于军队院校“文化大革命”由党委领导的规定后，各地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全国除野战军外，各级党委在红卫兵、造反派的冲击下几乎都陷于瘫痪，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也被迫中止党的活动。红卫兵又逐渐分裂成几派，各派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社会秩序遭到全面破坏，“天下大乱”的局势终于形成。但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仍是“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很不认真”，多数人消极应付，不少人还用各种方式进行抵制。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那一套主张在党内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出现了所谓两头热、中间顶的局面。针对这种状况，林彪提出：“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② 为了进一步排除来自党内干部的阻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工作会议。

这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是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伯达在会上作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中心内容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讲话中公然对刘少奇、邓小平作了点名批判，说：“提出错误路线的，是错误路线的代表人，即刘少奇和邓小平两位同志，他们负主要

^① 刘少奇致周恩来信，1966年9月14日，手稿。

^② 林彪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群众大会上的讲话，1966年10月1日。

责任。”^①

与此同时，在中央文革小组挑唆下，社会上也掀起一股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和大批领导干部的狂潮。十月六日，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召开十万人规模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在一些校园和大街上，公开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开始出现。这在以前是不曾有过的，是十分反常的。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安排，十月二十三日由刘少奇、邓小平作检讨。他们分别在全体会上读了经过毛泽东审阅的检讨稿。刘少奇的检讨讲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犯了“路线错误”；二是历史上“犯过一些原则性和路线性的错误”，其中比较具体地讲了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提示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三是犯错误的原因。看得出来，刘少奇还是在尽力按照毛泽东的批评，对照检查自己的错误，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

十月二十四日，中央工作会议分组讨论。当晚，毛泽东听取各小组召集人的汇报，然后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当康生插话说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八大所作的报告中有取消阶级斗争的思想时，毛泽东反驳道：“我们都看过的嘛，大会通过了的嘛，不能单他两人负责。”^②这时，毛泽东仍没有同意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贴大字报等过激做法。

^① 陈伯达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16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第二天，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议，由毛泽东、林彪讲话。林彪在讲话中又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说：“中央有几个领导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①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也对红卫兵的造反行动给予肯定和支持，但他没有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认为路线错误改了就好，中央的问题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他说：

“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②

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的精神，周恩来、陶铸等在会议期间和会后，多次出面制止红卫兵对刘少奇、邓小平采取过火行为。十月十二日，周恩来坚决拒绝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到该校接受批判的要求。十月十九日，周恩来严正回答哈尔滨工业大学造反派说：“即使少奇同志有错误，我现在也没有权力回答你们。你们把少奇同志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你们要考虑考虑。少奇同志

^① 林彪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25日。

是政治局常委，是国家元首，你们贴到天安门，外国人就会怀疑我们是发动群众，制造舆论。少奇同志不是普通党员，也不是普通的领导，就是要撤换也不需要去发动群众。”^①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新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陶铸，得知中央组织部机关内贴出批判刘少奇的大字报后，在十一月二日赶去制止，要求把这些大字报取下来。他对在场群众说：“我不赞成写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他还是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犯了路线错误，也是团结一批评一团结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②

毛泽东这时也是这种态度。十一月三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第六次接见全国各地来北京串连的红卫兵和其他群众。刘少奇作为政治局常委也参加了接见。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主动同刘少奇交谈，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情况。交谈中刘少奇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答道：“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③

但毛泽东一方面认为对刘少奇、邓小平不能否定一切，他们的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另一方面仍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行动，同意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把“文化大革命”深入下去。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在会上的讲话“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一本”。林彪的讲话也大量印发。毛泽东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原来不向群众传达，现在由于陈伯达在讲话中已全文引用而等于公开发表。这样，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很快在全国掀起。

^① 周恩来在接见哈尔滨工业大学红卫兵时的讲话记录，1966年10月19日。

^② 陶铸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机关的讲话记录，1966年11月2日。

^③ 王光美和原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红旗飘飘》第20辑，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259页。

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发到县团级，下发时却略去了毛泽东的批语。两人的检讨很快被扩散到社会上，成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靶子。

各地造反派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口号中得到极大鼓舞，采取了更加激烈的造反行动，肆无忌惮地揪斗领导干部，冲击包括省、市、自治区一级在内的各级党政机关，使这些领导机关很快陷于瘫痪。在这种情势下，北京和各地的造反派明目张胆地攻击刘少奇、邓小平。点名批判他们的大字报、大标语不断出现。各种红卫兵小报上，充斥着对所谓“刘、邓路线”的诬蔑攻击之词。

刘少奇已不再参与中央的领导工作。他从孩子们买回来的各种小报、传单中，看到了这些形形色色的批判文章，坦然地对家里人说：“他们有极大的片面性，主席迟早要批评的。”^①

面对这种情况，王光美向刘少奇提议说：“能不能跟中央说说，你辞掉国家主席，我和孩子们劳动养活你。”刘少奇回答说：“已经向中央提过，总理说有个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不能再说了，不要让组织为难。”^②

^① 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② 王光美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1980年1月25日。

四十二、“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文化大革命”以来，林彪、江青等人为了实现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政治野心，对多年来在第一线主持中央日常领导工作的刘少奇等，根本不满足于一般的批判，而是更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极端卑劣的陷害活动。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和十二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尚未结束，林彪的妻子叶群就两次找总参谋部作战部一个副部长，向他口授了一些诬陷刘少奇的内容，指使他根据这些内容写成书面揭发材料。林彪看了材料后，又指使他改写成致毛泽东、林彪的信，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八月十四日，林彪将这一揭发信批送江青“酌转”毛泽东。这是林彪、江青继合伙炮制《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后的又一次相互配合和勾结，开始了直接陷害刘少奇的联合行动。

八月十三日，康生让他的妻子曹轶欧出面，写信揭发刘少奇、王光美。九月十六日，康生又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利用一九三六年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经组织决定出狱一事陷害刘少奇，说：“我长期怀疑少奇同志要安子文、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的决定。”“有些人本来就已经或企图‘叛党保命’，少奇的决定，就

使这些人的反共叛党合法化了。”^①

这以后，在中央文革小组指使下，造反派用贴大字报、喊口号等方式，一再把矛头指向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批评了这种做法，周恩来、陶铸等更多次直接出面制止。

随着全国性动乱局面的加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央同意成立审查王光美的专案小组。设立这样一个专案小组，重要目的自然是针对刘少奇，在实际运作中很快就演变成同时搜集刘少奇、王光美材料的专门机构。

就在决定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的当天下午两点来钟，张春桥在中南海西门传达室紧急约见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向他发出打倒刘少奇的信号，说：“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②

十二月十八日晚七点多钟，在中南海西楼一个小会议室里，谢富治、汪东兴召集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公安部等单位抽调来的四名干部开会，宣布成立王光美专案小组，说：中央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审查王光美，名称暂叫中央办公厅丙组。谢富治在交待了领导关系、工作要求等后，拿出一份手写的“王光美专案小组领导成员名单”交给他们，要他们好好保存。这份上面有三个人字迹的名单是这样的：

谢富治（组长）

江 青 汪东兴

萧 华

叶 群

^① 康生致毛泽东的信，1966年9月16日。

^②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蒯大富的起诉书，1982年11月10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154页。

伯 达（顾问）^①

这份名单是经过毛泽东的。据当事人回忆，名单中把江青换成汪东兴，是江青出于某种考虑自己提出来的，而要陈伯达当顾问是由林彪提议的。不久，小组的成员状况又有了变化。萧华在一九六七年一月遭到诬陷和冲击。陈伯达的“顾问”一职实际上没有担任。而原来没有列入小组的江青、戚本禹很快补充为正式成员。

这以后，中央文革小组多次在各种场合公开攻击刘少奇。十二月二十四日，戚本禹在北京矿业学院宣称“刘、邓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二十六日，康生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时，公然称刘少奇为“赫鲁晓夫”。年底，江青派王力、戚本禹找刘少奇的一个女儿谈话，后来又自己找她，要她写大字报揭发刘少奇。

十二月二十五日，蒯大富根据张春桥十八日的授意，经过几天准备，组织清华大学造反派发起所谓“一二·二五打倒刘少奇大行动”。他率领五千多人到天安门广场，大张旗鼓地举行“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集会结束后分五路向王府井、西单、北京火车站、菜市口游行，一路上呼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彻底打垮刘、邓资反路线的猖狂反扑”等口号，并沿途贴标语、撒传单、作演讲。这一活动持续多天。二十七日，北京高等院校造反派又在工人体育场联合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会上公开喊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的口号。经过这两次大规模行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舆论布满全北京，迅速传向全国。

^① 中央档案馆档案。

进入一九六七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怂恿下，造反派开始向刘少奇正面冲击。一九六七年元旦这天，中南海内的造反派在刘少奇住处福祿居贴出大字报，在院内的地上墙上刷大标语。一月三日，造反派冲进刘少奇住处，直接对他和王光美进行围攻。

一月六日傍晚，以蒯大富为首领的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设圈套将刘少奇、王光美骗出中南海，并强行扣押了王光美。后来经周恩来派人去清华大学交涉，造反派才将王光美放回。

一月十二日，戚本禹将中共中央办公厅一些人召集到钓鱼台开会，对他们说：“中南海冷冷清清，外面轰轰烈烈”，“刘、邓、陶在中南海很舒服，你们为什么不去斗他们？”^①当晚，办公厅秘书局的“红色造反团”组织了一二百人，喊着口号冲进福祿居，把刘少奇、王光美叫出来进行围攻。造反派要刘少奇在严寒的室外低头站着，回答他们的各种责问，还要王光美站在一张桌上。当刘少奇背不出他们指定的语录时，便起哄嘲笑。刘少奇严肃地对他们说：“叫我背词句，我背不出。你们可以问我毛主席的哪篇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什么，针对什么问题，在当时起到什么作用，在理论上有什么创见，这些才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我是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主任，无论哪一篇文章的问题我都可以回答。”^②

这些状况的出现，显示对刘少奇的冲击正在升级。但当时毛泽东还不是要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一月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两派红卫兵组织几次“勒令”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一月五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请示道：“北京建筑工业学院井冈山红卫兵

^①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对戚本禹的起诉书，1983年4月22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9页。

^② 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总部来信，要我在一月七日四时以前到该院作公开检查。另有该院八一团红卫兵来信，也要我到该院作检查。我是否到该院去作检查？请主席批示。”^①毛泽东一月六日批示给周恩来：“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②周恩来在七日凌晨接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一月十三日夜，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少奇接到人民大会堂，两人进行了一次交谈。毛泽东问候了刘少奇家人的近况。刘少奇在谈话中向他提出：“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尽快把广大干部解放出来，使党少受损失。二、辞去国家主席、中央常委和《毛泽东选集》编委会主任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使国家少受损失。”毛泽东要刘少奇认真学习，保重身体，并建议他读一读德国动物学家海格尔写的《机械唯物主义》、狄德罗写的《机械人》等书。^③

这期间毛泽东正在考虑筹备中共九大，仍认为刘少奇应该当选为中央委员。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见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时，在谈话中还称“刘少奇同志”，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中央委员），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④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毛泽东在同张春桥、姚文元的三次谈话中也讲到：刘少奇看来九大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

① 刘少奇致毛泽东信，1967年1月5日，手稿。

② 毛泽东在刘少奇1月5日给他的信上的批示，1967年1月6日，手稿。

③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④ 毛泽东同一位外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记录，1967年1月17日。

毛泽东对刘少奇态度的明显改变，看来发生在一九六七年三月。

三月九日、十日，陈伯达、康生在部队军以上干部会上讲话，点名道姓地对刘少奇进行了从历史到现实的系统批判。三月二十一日下午七时半，毛泽东、林彪等中央政治局常委接见与会人员后，留下来议论一些问题。议论中对有人提到“刘耀祖案中涉及刘少奇在一九二九年叛党嫌疑问题”作了研究，决定把这方面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指定由康生分管这件事。戚本禹写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在最后一稿中增加了不指名地责问刘少奇“八个为什么”，称他是“假革命、反革命”。这篇文章经毛泽东批准，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毛泽东为什么改变了对刘少奇的态度？原因很复杂。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林彪、江青一伙的阴谋陷害。他们有计划、有预谋地将造反派捕风捉影揭发刘少奇的材料、特别是诬陷刘少奇有重大历史问题的材料，报送毛泽东；同时有意向社会散布，制造舆论，影响毛泽东改变看法。其次，随着“文化大革命”局势的恶性发展，发生了一批老一辈革命家拍案而起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二月逆流”事件。许多干部和群众也以各种方式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抵制。毛泽东认为运动遇到了“刘少奇代理人”的抵抗。于是一错再错，把刘少奇作为靶子。

自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同意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交丙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后，“王光美专案小组”实际上就成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正式开始。社会上种种恶毒攻击刘少奇的行为也更加肆无忌惮，而且无人制止。

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没有用任何方式通知他本人，也从来没有听取过他的陈述。刘少奇只是从大字报和红卫兵小报中，

看到诬陷攻击他的一部分言论。为了反驳这些诬蔑不实之词，他用各种方式一次又一次地提出申辩。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刘少奇从儿女们上街买回来的小报中看到，张春桥等人诬陷他吹捧电影《清宫秘史》、自称“红色买办”。他立刻给毛泽东写信，说明自己“根本没有《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种想法和看法”，也不可能说出“《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这样的话，要求中共中央调查。^①

刘少奇这封信并没有起作用。四月一日，《人民日报》等登载戚本禹所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继续散布刘少奇吹捧“电影《清宫秘史》”的谎言，并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猛烈抨击刘少奇说：“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从报纸上读到这篇文章，极为愤慨。他把报纸狠狠一摔，说：“这篇文章有许多假话，我什么时候说过那个电影是爱国主义的？什么时候说过当‘红色买办’？不符合事实，是栽赃！党内斗争从来没有这么不严肃过。我不反革命，也不反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是我在七大提出来的，我宣传毛泽东思想不比别人少。”“我早在去年八月的会议上就讲过五不怕，如果这些人无所畏惧，光明正大，可以辩论嘛！在中央委员会辩论，在人民群众中辩论嘛！我还要为这个国家、人民，为我们党和广大干部讲几句话！”^②

从四月初起，各报刊有组织地连续发表文章，以“中国赫鲁晓夫”等作为代名词，大肆攻击刘少奇。《人民日报》等报刊专

^① 刘少奇致毛泽东信，1967年3月28日，手稿。

^② 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门发表号召开展“大批判”的社论。四月三日，北京红卫兵又一次公开举行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在中央文革小组布置下，北京和各地贴出大量“打倒刘少奇”的大标语、大字报，接连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有的群众为刘少奇鸣不平，被指责为反革命，遭到残酷批斗甚至逮捕。全国很快掀起“打倒刘少奇”的舆论高潮，造成令人恐怖的气氛。

在这种强大政治压力下，在刘少奇办公室工作的秘书、警卫、服务人员也不得不宣布造反，成立名为“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组织。他们在四月六日、十二日对刘少奇采取两次“革命行动”，要刘少奇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提出的“八个为什么”。

刘少奇按历史事实逐条据理驳斥，说明事实真相。当问到“八大政治报告为什么没有提毛泽东思想”时，刘少奇回答说：“八大报告中写不写毛泽东思想，在议论时意见也不统一。不主张写的人占多数。他们认为毛主席曾多次从宣传文章中删去这个提法，看来毛主席并不主张到处使用。另外，七大是第一次提出毛泽东思想，那时我们还没有取得全国胜利，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思想还不熟悉。七大至八大，形势有了根本性的变化，毛泽东思想早已深入人心，不写进报告也不会影响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不都在宣传嘛，只不过没有像现在这样宣传就是了。”当问到“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怎么回事”时，刘少奇发了脾气，说：“这批人出狱是经过中央批准的，早有定论，几十年来也没有人提起这件事，现在说成是叛徒集团，简直岂有此理！”“这批人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他们有的有城市工作经验，有的有白区工作经验，有的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在后来几十年的实践中也证明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成绩，绝大部分是我们党的骨干。王明路线时，白区的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许多好同志都牺牲了，难道这六十一位同志让国民党反动派都杀了我们就舒服了？现在把他们说成是叛徒集团，将

来，我们党的历史怎么写？”^①

按照“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要求，刘少奇在四月十四日交出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的“八个为什么”，逐条澄清事实。在回答“为什么你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勾结另一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和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刘少奇写道：“我现在也还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看到一篇能够完全说清楚为什么犯路线错误的文章。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判了我的错误之后，又有人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可见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将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阅读毛主席指定我要阅读的其他书籍和报刊的有关文章，以便能够完全在思想上弄清楚这个问题，并且认真地在革命群众实践中去加以检验。那时才能答复我为什么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路线错误，又如何改正了这个错误。”^②“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把刘少奇书面答复的原件上报，另外以大字报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这一做法被其他造反派指责为“为刘少奇开脱罪责”。答辩大字报很快就被别人撕毁了。

由于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刘少奇委派，参加过驻清华大学工作组，清华大学的造反派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指使下，借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次要把她拉到学校批判，都被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制止。但到一九六七年四月，情况变了。四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说中央常委同意王光美到清华大学作一次检查。清华大学的造反派更是借题发挥，决定在四月十日组织数十万人的大会批斗王光美。四月九日，刘少奇得到消息后，极为愤怒。当时在场的刘少奇的儿女们回忆道：

^① 原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② 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派的检查》，1967年4月14日，手稿。

爸爸一听，立即震怒了。他推开饭碗，大声激昂地说：“我有错误我承担，工作组是中央派的，光美没有责任。为什么让她代我受过？要作检查，要挨斗，我去！我去见群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死都不怕，还怕群众？”爸爸胸中的激愤终于像火山似的爆发了。

妈妈急切地说：“清华大学的运动是我直接参加了的，当然应该是我去向群众检查……”

“你是执行者，决策的不是你嘛。”爸爸激动地说，“我绝没有反过党，没有反过毛主席。别人反过毛主席，林彪反过毛主席，江青也反过，我一直是拥护主席的。在我主持中央工作的几十年里，违反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有，但没反过。工作错误有，但都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我没有搞过阴谋诡计。工作是大家一起做的，要我承担责任，可以！但错误得自己去改！”爸爸说到这里，把手中的汤勺猛地往桌上一摔，手都微微颤抖了。“别人就是一贯正确的吗？要一分为二。为什么不许人家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有不同意见就把人抓起来！”

爸爸继续说：“去年八月，我就不再过问中央工作。从那以后，错误仍在继续；将来，群众斗群众的情况还会更厉害，不改，后果更严重。责任不能再推到我身上。这么多干部都被打倒了，将来的工作谁去搞？生产谁来抓？”

我们凝神静听，感到爸爸的心胸是那样坦荡，那样光明磊落。爸爸神情严肃地望着我们，语气坚定地说：“有人要逼我当反革命，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不论过去和现在，就是将来也永远不反毛主席，永远不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个革命者，生为革命，死也永远为共产主义事业，一心不变。”

爸爸停了一下，长出了一口气，似乎他的话已经说完了，激动的情绪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安详神态，亲切地望着我们，缓慢地说：“将来，我死了以后，你们要把我的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大海连着五大洋，我要看着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你们要记住，这就是我给你们的遗嘱！”

妈妈哭了。她泣不成声地说：“还不知道孩子们能不能看到你的骨灰呢？”

“会把骨灰给你们的。”爸爸语气坚定地对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儿子、女儿嘛！这一点无论什么人还是能做到的。你们放心，我不会自杀的，除非把我枪毙或斗死。你们，也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要在各种锻炼中成长。你们要记住：爸爸是个无产者，你们也一定要做个无产者。爸爸是人民的儿子，你们也一定要做人民的好儿女，永远跟着党，永远为人民。”我们几个孩子眼泪早已流尽，瞪大眼睛，仔细静听，生怕漏掉一字，默默记在心里。爸爸说完，站了起来，坚定而又响亮地说：“共产主义事业万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共产党万岁！”说完，便回到他自己房间去了。^①

四月十日一早，清华大学的造反派便将王光美用汽车拉到学校。造反派先将她关在学校主楼一间屋子里“审问”，然后揪到大操场批斗。这次批斗大会号称有三十万人参加，并把彭真、薄一波、陆定一、蒋南翔等数百名干部拉到台上“陪斗”。造反派强迫王光美在接受批斗时穿上旗袍，戴上用乒乓球串成的“项

^① 刘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链”，进行人格污辱。大会结束后，又把她拉到主楼屋子里“审问”了两次，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王光美在造反派的威逼面前始终没有屈服，沉着地坚持说理斗争。造反派向她提出“刘少奇为什么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等种种责问，王光美回答说：“我从来没有听少奇同志讲过这个片子是爱国主义的。少奇同志肯定没有讲过。我相信毛主席，毛主席总会调查清楚的。”“同意派工作组当时中央常委会决定。当然毛主席不在，刘少奇要负主要责任。但真正他派的，只有我一个人。”针对造反派蛮横无理的“审问”，她严词反驳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如果你们摆事实讲道理，就让我把话说完。毛主席说，坏话、好话、反对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话讲完。你们要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①批斗活动结束后回到家里，王光美在四月十五日、二十日两次致信毛泽东，申述对这次批斗会的意见，说：“我决不是坏人，刘少奇也决不会是假革命或反革命。”^②

“文化大革命”这时已陷入错上加错的恶性循环，对刘少奇的迫害也进一步加剧。五月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以批判《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为名，批判刘少奇。五月十一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这篇文章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经毛泽东批准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

^① 《三审王光美》，红代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井冈山》专刊，1967年8月10日。

^② 王光美致毛泽东的信，1967年4月20日。

词，对刘少奇进行无限上纲的批判。此后，全国各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刘少奇的文章，并在群众中开展主要针对刘少奇的“大批判运动”。这些所谓大批判文章，不但蛮不讲理、乱打棍子，而且颠倒是非，把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当作修正主义肆意批判，搅乱了人们的思想，导致社会文明和道德水平滑坡，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更加泛滥。

在“大批判运动”热闹地开场的同时，康生、陈伯达、江青、谢富治等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中旬多次开会，研究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工作，抽调人员增加专案组的力量，并“确定先狠抓刘的自首变节”问题。从五月开始，他们连续批示专案组逮捕关押了一批所谓“知情人”，其中包括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孟用潜（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的老师）、天津市居民王广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他们指挥专案组对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和诱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

面对汹涌而来的“大批判”文章和种种颠倒黑白的指控，刘少奇只有利用写检查、答辩等机会，表现他的抗争。

七月四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说：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七月九日，刘少奇把检查写好交了上去。他在检查中首先说明当时到北京建工学院参加运动的原委：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毛主席号召中央所有负责同志和各地来到北京的所有负责同志都去亲自参加北京学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便取得感性知识。我就是在毛主席的这个号召下，在去年八月一日到李雪峰同志处同北京新市委的同志一起研究”后确定到建工学院的，“当时我们几个人都没有要创造什么经验、向全国推广的意思”。他再次对“文化大革命”

初期派工作组等问题承担了责任，同时指出：“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了，我才知道我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我对自己所犯的这次错误，直到去年八月五日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理解的。在此以前，我是不理解我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①

这份检查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证和宣言书”。北京建工学院造反派又纠缠不休地要刘少奇检查。七月十六日，刘少奇针对这种无理要求致信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拒绝再作新的检查。信中说：“鉴于我上次交出的检查影响不好，说我是进行‘反扑’，‘挑动群众斗群众’，现在再向建工学院进行第二次检查，也还会和上次检查差不多，也不会有好的影响，所以我不准备向建工学院再作第二次检查了。”^②

对刘少奇的迫害在继续升级。

七月中下旬，在中央文革小组煽动下，由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领头，北京和外地上千个造反派团体成立所谓“揪刘火线指挥部”，纠集数十万人在中南海四周安营扎寨，游行示威，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这些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一次又一次地发来所谓“勒令”书，要刘少奇交出“认罪书”。刘少奇对这种目无法纪的行为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传送“勒令”来的人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③他当即把这些“勒令”书原封不动转交中共中

① 刘少奇：《向北京建筑工业学院革命师生员工的检查》，1967年7月9日，手稿。

② 刘少奇致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信，1967年7月16日，手稿。

③ 原刘少奇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

央，听凭处理。

中南海内的情况也发生急剧变化。七月十三日晚和十四日晨，毛泽东、周恩来先后离开北京去武汉视察（随后发生了武汉的“七·二〇事件”）。他们刚走，戚本禹便煽动中南海机关的造反派在七月十四日强迫刘少奇出来看大字报，乘机进行围斗。当天晚上，造反派把围斗情况专题报告戚本禹，还递交了一封给汪东兴并周恩来的信，提出要开大会“批斗刘少奇”。戚本禹避过周恩来，将这封信批给康生、陈伯达、江青，请他们决定。陈伯达批示将“批斗刘少奇”扩大为“批斗刘、邓、陶夫妇”，江青、康生又提出要“批斗并抄家”。七月十七日晚，他们几个人在人民大会堂具体策划如何“批斗刘、邓、陶夫妇”。戚本禹紧接着在十八日凌晨一点多钟召集中南海机关造反派开会，布置成立“批斗刘、邓、陶战斗指挥部”，“组织队伍，投入激战”，并决定：当晚先批斗刘少奇、王光美，在开批斗会的同时抄家，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隔离“监护”。

十八日上午，刘少奇、王光美从孩子们口中获悉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刘少奇意识到这是针对他的一个严重步骤，同家人生离死别的日子也许就在今天。他向孩子们交待了几件事情，然后静静地等待着这一时刻的来临。他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①

晚上，造反派在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组织了有三百多人参加的两个会场，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送到这两处批斗。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刘少奇申辩一句话，却强迫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在批斗会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刘少奇的住处进行全面搜查，抄走了几十本笔记和大量文件、书信等。

^① 王光美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1980年1月25日。

这一搜查没有经过任何手续。随后几天内，邓小平和夫人卓琳、陶铸和夫人曾志，也遭到类似的厄运。

七月十八日批斗会结束后，刘少奇被押回福祿居前院，王光美被押回福祿居后院，两人被分开关押，不但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对刘少奇夫妇采取了比囚犯还要严格的看管措施：房间门口增设岗哨，电源换成低压，搜走小刀、绳子等物品，安眠药要“两人送药、当面服用”，另设专人轮流昼夜监视他们的行动并且上报。从此，刘少奇、王光美完全失去行动自由，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视。

和中南海内批斗、关押刘少奇的行动相呼应，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闹剧也愈演愈烈。府右街一带挤满了人，上百个高音喇叭不分昼夜地对着中南海内狂呼乱叫。七月二十六日，戚本禹根据江青的指示，到现场向造反派表示慰问。八月五日，天安门广场举行有上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毛泽东《炮打司令部》一周年大会。与此同时，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布置，中南海内分三处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邓小平和卓琳、陶铸和曾志。在这三处批斗会中，批斗刘少奇、王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派来的曹轶欧等人直接掌握，规模最大，手段也最残暴。刘少奇、王光美的几个儿女回忆当时情景说：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斗争会上，爸爸不断遭到野蛮的谩骂和扭打。爸爸的每次答辩，都被口号声打断，随之被人用小红书劈头打来，无法讲下去。我们看见爸爸在尽力反抗，不肯低下那倔强的头。他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机密，并为许多好干部承担责任。会场上，突然喊起打倒十几个老干部的口号声，爸爸却纹丝不动。那些人揪着他责问为什么不喊口号，爸爸回答：“我负

主要责任，要打倒，就打倒我一个人。”^①

刘少奇对中南海内出现这种行为极为痛心和愤慨。被押回住处后，他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严厉地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②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仍被单独关押。看管的措施比以前更加严格，每天二十四小时都有哨兵监视。他和王光美自七月十八日被分开“监护”后，除了在八月五日的批斗会上一同挨斗外，再也没有见过面。从这一天起，他也没有见过任何一个亲属。

根据从武汉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在中南海四周安营扎寨的造反派撤销“揪刘火线指挥部”，返回各单位，一场“围困中南海”的闹剧终于结束。

八月七日，《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的大批判文章。文中毫无根据地诬蔑刘少奇策划、支持了所谓“畅观楼反革命事件”。刘少奇读后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无中生有的指责。信中说：“当我看到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我从来就反对在党内搞派别活动，而且长期抵制和厌恶那

^①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② 刘平平等：《胜利的鲜花献给您——怀念我们的爸爸刘少奇》，《工人日报》，1980年12月5日。

些过分吹捧我的人。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信中又一次正式提出：“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①

但是，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没有得到任何答复。相反，对他的监视越发严密，各种迫害进一步加剧。他被单独关押在住处，见不到一个亲属。刘少奇感觉到了这一切，知道无论怎样争辩都没有用。于是，他不再写信和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连生活上的话也不说了。他把满腔愤懑埋在心里，用沉默来表示他的抗争。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靠反对刘少奇而在“文化大革命”中迅速得势的人，利用他们把持处理刘少奇专案组的大权，千方百计地对刘少奇进行政治陷害，要把他彻底打倒。

本来，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政治局常委只是同意把有关刘少奇的材料“交丙组（即一九六六年底成立的王光美专案小组）专案办公室调查研究”，并没有提出要成立审查刘少奇的专案组，但康生等在实际操作中却设立起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明明对刘少奇进行专案审查已从一九六七年三月起正式开始，谢富治还在五月间向专案人员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一九六八年四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案情的各种文件和报告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透露出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的做贼心虚。

^① 刘少奇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信，1967年8月8日，手稿。

刘少奇专案组的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几经变动，但这项工作一直处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严密控制下。谢富治兼任专案组组长，是专案工作的具体负责人。江青、康生是决策和指挥者。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六日，谢富治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①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待：“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好。”^②康生作为政治局常委分管这件事。一九六七年九月逮捕王光美的报告，就是他亲笔写的。

江青、康生等人知道，光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不能彻底打倒刘少奇，必须加以更严重的罪名。他们千方百计搜罗和制造能将刘少奇定为敌我矛盾的“证据”。一开始，他们曾寄希望于能找到“自首书”一类的物证。因此一面发动全国各地揭发，一面组织大批人员从敌伪档案和陈年报刊中清查。光为查找所谓“一九二九年在沈阳被捕叛变”的证据，就在沈阳组织了四百人的“彻查队伍”查阅档案材料，结果一无所获。当搜索物证的各路人马都空手而归后，专案组便不择手段地用逼供和诱供等卑劣手段制造伪证。经江青、康生等人批准，专案组先后拘押了一批无辜人员，其中有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也有普通的居民、炊事员、保姆。仅由专案组直接关押的就有六十多人。他们把这些人抓来后，采取长期隔离、轮番批斗、软硬兼施等手段，逼取假口供，拼凑栽赃刘少奇的伪证。在专案调查过程中，不少人如实反映刘少奇从事革命

^① 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一份报告上的批示，1968年2月26日。

^② 专案组工作人员笔记。

活动的历史真相，也有人在逼供下作了伪证后又多次更正，但专案组将这些说明真相的证词和更正的说明都扣压不报。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同刘少奇一起被捕的孟用潜，在严重的逼供信下被迫写了刘少奇“叛变”假证词后很快就自己推翻了，先后写了二十多次材料要求改正，但这些要求改正的材料都被扣压或撕毁，不再被人所知道，更没有向上报送。

一九六八年，中共中央决定年内召开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了在中共九大前完成对刘少奇的组织处理，在江青、康生一再催逼下，谢富治督促专案组日夜奋战，终于在一九六八年九月整理出三份所谓“罪证材料”。江青九月十六日在“罪证材料”上批示：“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隐藏如此深、如此久，如果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怎能暴露和揪出来？”^①随后，林彪、康生、陈伯达也作了同样意思的批示。林彪还赞扬说：“挖出刘少奇这个隐藏四十多年的特大坏蛋，清除这一最大隐患，更加证明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无比深远。”“专案工作卓有成效。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②

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于一九六八年十月十三日至三十一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极不正常。在一百九十五名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百分之五十二点七的人被诬陷为“叛徒”、“特务”、“反党分子”、“里通外国分子”等等，不准出席会议。九十七名中央委员中，除上次中央全会以来去世的十人外，只有四十人到会，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

^① 江青在“罪证材料”上的批示，1968年9月16日。

^② 林彪对“罪证材料”的书面意见，1968年9月29日。

将十人增补为中央委员，才勉强超过半数。九十八名候补中央委员中，除已去世的十二人和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十人外，能出席会议的只有九人。而被扩大进来参加会议的中央文革小组、军委办事组成员和其他人员却达七十四人，占与会人员总数一百三十三人的百分之五十七多。后来发现其中有一人竟然不是共产党员。扩大进来的并非中央委员的人中有些还被指定担任组长、副组长。这些都严重地背离了党的组织原则。

这次全会的主要议题是讨论中共九大的筹备工作和通过关于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会议一开始，林彪、江青等人就组织围攻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所谓“二月逆流的干将”，批判朱德、陈云、邓子恢等所谓“一贯右倾”的老同志。会上，江青、康生、谢富治等指使“刘少奇专案组”将三份所谓“罪证材料”综合起来，改写成《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经张春桥修改定稿后，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名义提交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审查报告》诬陷“刘少奇一九二五年、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被捕叛变，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最后提出处理意见说：“撤销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党内生活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没有也不可能对这个《审查报告》进行核实和认真讨论。不少人对《审查报告》的内容及其形成过程感到怀疑，但无法表示出来。全会在最后一天错误地批准了这个根据伪证写成的《审查报告》，铸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尽管如此，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陈少敏在讨论《审查报告》时始终不表示同意，为此受到康生的点名训斥和组织围攻。陈少敏不畏高压，在全会表决通过《审查报告》时仍没有举手。

从对刘少奇立案审查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审查报

告》，一直对刘少奇本人严格保密。在对刘少奇专案审查的整个过程中，从没有听取过他本人的陈述和解释，完全剥夺了他按照党章规定申诉的权利。刘少奇主动作出的多次口头争辩和要求澄清事实的书面报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从各方面说，都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八〇年九月的统计，因刘少奇一案受株连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达二万二千多起，有二万八千多人被判刑。刘少奇的家人更是首当其冲。他的夫人王光美被诬陷为特务，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正式逮捕，十一月转往秦城监狱，关押了将近十二年。在包头某国防工厂任副总工程师的长子刘允斌，一九六七年底挨斗后卧轨自尽。在内蒙古自治区计委工作的长女刘爱琴，受到造反派批斗毒打，并被长期关在“牛棚”。在七机部一院当技术员的次子刘允若，一九六七年初被江青点名后被捕入狱八年，在狱中受尽折磨而得病，出狱不久就死亡。原来一直同刘少奇、王光美生活在一起的四个尚未独立生活的子女，也在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三日被赶出中南海，三个已经上学的分别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最小的女儿当时只有六岁，还没有入学，只好随保姆搬出另住。十八岁的女儿平平和十六岁的儿子源源后来也遭逮捕关押。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期间，《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刊在十月十六日同时发表《红旗》杂志社论，号召进一步开展针对刘少奇的“革命大批判”。这篇社论采用断章取义甚至无中生有的手法，捏造刘少奇有所谓“黑六论”，即“阶级斗争熄灭论”、“驯服工具论”、“群众落后论”、“入党做官论”、“党内和平论”、“公私溶化论”。北京和各地的报刊紧接着发表大量所谓“大批判文章”，以“左”倾错误思想批判正确思想，在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造成极大的混乱。

刘少奇这时仍被单独监禁在中南海福禄居住处。精神上的沉重折磨和生活状况的骤然改变，使他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从一九六八年年初起，刘少奇陆续发生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疾病，三月以后病情加重。到四月中旬，他的神志已不大清楚，表情呆板，两脚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①

一九六八年七月上旬，刘少奇的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病情日益严重。这时才紧急从北京医院和军队医院调来几个医生组织抢救。医生会诊后认为：“现病人的情况处于十分危重的状态，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并建议住院治疗。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批准，只能从医院借调一些医疗器械，就地救治。经过抢救，刘少奇到七月二十四日才脱离危险期，但没有根本好转。这次发病后，他已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只能卧床接受治疗，病情一直不稳定，支气管肺炎频繁发作，一次比一次严重。十月九日以后，刘少奇完全不能进食，只得从鼻孔插管往胃里灌流质以维持生命。十月十四日中南海门诊部写的《刘少奇病情报告》说：“从七月上旬患严重支气管肺炎以来，一直不断有反复，三个多月较大反复五次。”“今后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也有可能突然变化。防止在短期内死亡。”^②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至二十四日，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时刘少奇已重病缠身，对外界的反应能力很弱。尽管如此，负责看管刘少奇的人员还是奉命不让他收听广播。七月五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又一次发作，体温升高达摄氏三十九度。医生会诊后一致认为情况严重：“因他年龄大，久病长期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刘少奇情况反映（56）》，1968年4月12日。

② 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1968年10月14日。

卧床，消瘦，抵抗力极差，容易发生休克、心力衰竭、糖尿病酸中毒等并发症，故预后不良，可能随时发生死亡。”^① 经过紧张治疗，病情才暂时稳定下来。

一九六九年十月，毛泽东对当时世界动态作出国际形势有可能突然恶化的估计。全国据此进行大规模的备战行动。中共中央决定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陈云、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等疏散到外地。

这件事从决定到执行非常仓促。十月十七日晚，重病中的刘少奇被抬上担架，在两名专案组人员押送下，乘一架伊尔-14型飞机，转移到河南省开封市。由于刘少奇病情沉重，身上还插着鼻饲管、吸痰器、输液管，所以派了一名医生、两名护士和刘少奇原来的卫士长随同前往。

当晚九点三十分，飞机抵达开封机场。刘少奇被抬下飞机直送监护地点，安置在市革命委员会机关一号楼小天井院北楼一层一个套间的里屋，现场还布置了严密的看守措施。

本来就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十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十一月六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

十一月十日，刘少奇的病再度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医务人员参照上两次的办法医治。十二日凌晨一时许，刘少奇病情出现异常症状，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在六时三十八分紧急通知医护人员抢救。六时四十二分医护人员赶到，还没有来得及采取措施，六时四十五分，将满七十一岁的刘少奇的心脏停止

^① 中南海门诊部：《刘少奇病情报告》，1969年7月5日。

了跳动。

刘少奇去世的情况被逐级上报，对外仍严格保密。“刘少奇专案组”迅速派出人员赶到开封处理后事。十一月十三日午夜，刘少奇的遗体被谎称为烈性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运往开封火葬场秘密火化。专案组人员在登记“火葬申请单”时，“死者姓名”填了“刘卫黄”。骨灰被装在一个普通木质骨灰盒里，寄存在开封火葬场骨灰存放室。

“文化大革命”这时已进行了三年多，但还看不到结束的迹象，社会仍处在动乱中。将近两年后，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三位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先后逝世。同年十月上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断然粉碎了江青等“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持续十年多的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

春回大地。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开始全面、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以前的严重“左”倾错误，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拨乱反正，并有步骤地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

当“文化大革命”进行过程中，已有许多人对刘少奇问题表示怀疑和不满，不少人为此被打成反革命，张志新等甚至献出了生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外的干部群众纷纷向中共中央写信，要求为刘少奇平反昭雪。

一九七九年二月，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一案进行复查。联合复查组经过逐项调查核实，证明江青、康生、谢富治等炮制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是根据伪证写成的。“报告”中加给刘少奇的罪名没有一项符合事实，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

开封市火葬场火葬申请单						字第	316	号		
死者姓名	刘红黄	性别	男	年龄	21	民族	汉	籍贯	河南省	
死者职业	无	死亡原因	病	死亡时间	无	尸体地点				
火葬日期	1969年11月14日	火葬时间	0时	火葬地点		骨灰处理		下怀处		
申请人姓名	刘元	性别	男	与死者关系				父子		
申请人住址	812式打队								电话	
登记日期	1969年11月14日	火葬时间	0时	申请人姓名或签名	刘元					
备注	育4个孩子1-3									
经办人							1969年11月14日	刘元		

河南省开封市火葬场火葬申请单

联合复查组于当年十一月将复查结果正式报告中共中央。

一九八〇年二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经过认真讨论，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全会发表的《公报》指出：

“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昭雪，是五中全会的另一项主要议程。全会认为，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几十年来一贯忠于党和人民，把毕生精力献给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化大革命前夕，由于对党内和国内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党内存在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随后又提出了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些论断是完全错误和不能成立的。林彪、‘四人帮’一伙出于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目的，利用这种情况，捏造材料，蓄意对刘少奇同志进行政治陷害和人身迫害，并把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诬为刘少奇的代理人，统统打倒，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必须彻底平反。近一年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针对一九六八年十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的刘少奇同志的各项‘罪状’，进行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反复核对材料，向中央作出了详尽确切的审查报告。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这个审查报告，据以作出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草案）。全会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这个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强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撤销原审查报告，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在适当时间为刘少奇同志举行追悼会；因刘少奇同志问题受株连造成的冤假错案，由有关部门予以平反；本着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精神，把全会的决议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传达，消除过去对刘少奇同志的错误处理所造成的影响，鼓舞全党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充满信心地献身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事业。”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后，为刘少奇恢复名誉的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中共河南省委派专人查找到刘少奇的骨灰，并把它从开封接到省会郑州。一九八〇年五月，由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负责人和各方面代表人士组成刘少奇治丧委员会，筹备以国家元首的规格补办刘少奇的丧事。五月十三日，治丧委员会派出代表，同刘少奇的亲属一起，专程前往河南迎接刘少奇的骨灰。河南省暨郑州市举行了隆重的迎送仪式。五月十五日，刘少奇治丧委员会发出公告：“为深切悼念已故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同志，定于一九八〇年五月十七日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同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中央、国家机关，我国驻外使馆和其他驻外机构，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政府所在地的机关、部队、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下半旗志哀，停止娱乐活动一天。”

五月十七日下午，刘少奇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各方面代表一万多人出席大会。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刘少奇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战斗了一生。他是受到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爱戴的、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江青一伙出于阴谋篡党

夺权的反革命目的，利用我们党的缺点和错误，蓄意诬陷和残酷迫害刘少奇同志。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刘少奇同志在河南开封不幸病故。这是我党和我国人民巨大的损失。党中央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倒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我们党采取的这种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立场，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

邓小平在悼词中介绍了刘少奇一生的革命经历，高度评价了刘少奇为中国的革命、建设事业所作的杰出贡献及其优秀品德。他最后深情地说道：

“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十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刘少奇生前曾多次表示，他去世后骨灰撒在大海里。一九五六年四月，他曾郑重地嘱咐王光美：自己去世后遗体火化，不保留骨灰，把骨灰撒在大海里，像恩格斯一样。

刘少奇追悼大会后的第三天，五月十九日上午，刘少奇的骨灰在治丧委员会代表和刘少奇家属子女护送下，从北京由专机运抵青岛军港。青岛港码头气氛肃穆。闻讯赶来的群众和人民解放军官兵早已等候在这里，为刘少奇作最后的送行。中午时分，停泊在军港的舰船汽笛长鸣，为刘少奇志哀。执行散撒仪式的驱逐舰在前后左右四艘护卫舰的护航下，缓缓离港。五艘军舰在绵绵

细雨中编队驶向黄海预定海域。午后一时许，军舰上哀乐低回，鸣礼炮二十一响，刘少奇的骨灰由王光美和他的其他亲人们撒向广阔无垠的大海。

刘少奇永远和波涛万顷的大海同在！

刘少奇将永远活在他所热爱的中国各族人民心中！

后 记

编写刘少奇同志的传记，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承担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经过两年多时间的集中写作，本书在刘少奇同志百年诞辰之际出版。

本书主要是依据历史文献档案编写的，包括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大量刘少奇同志的文稿、电报、书信、讲话记录和有关会议记录，以及王光美同志提供的一批手稿、信件、笔记。同时，也参考了与刘少奇同志有过直接交往和接触的同志的访问记录、回忆录、录音录像，当时报纸、杂志（包括内部报刊）及有关资料。编写时力求全面客观、翔实准确。

本书由金冲及任主编，黄峥任副主编。各章执笔人如下：

第一至七、三十九至四十二章：黄峥

第八至十三章：黄少群（中共中央党校）

第十四至二十四章：王双梅

第二十五、二十六章：黄峥、张文和

第二十七至三十八章：马云飞

金冲及统一地对全书作了仔细的补充修改，并负责定稿。黄峥负责全书编写的组织工作。王双梅等选定书中的照片和插图。

本书的编写和出版得到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厅秘书处和档案处、中央文献出版社，以及陈绍畴、张飞虹、吕小蓊等的

支持帮助。

书中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九八年八月

再版时，由王双梅对全书进行了校核。朱薇参加了部分工作。

二〇〇八年八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刘少奇传 下

SS号=13148814